《田方文集》

岁月印痕

田方 著

金城出版社

作者简介

田方，浙江海宁人，1918年6月生。曾任国际新闻社、解放日报、新华社记者，新华社一野分社副社长、陕西日报副总编辑；为习仲勋当过秘书；曾任中共宝鸡地委书记；离休前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离休后为国家计委咨询小组成员、中国企协执行理事、中国记协特邀顾问、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1989年秋曾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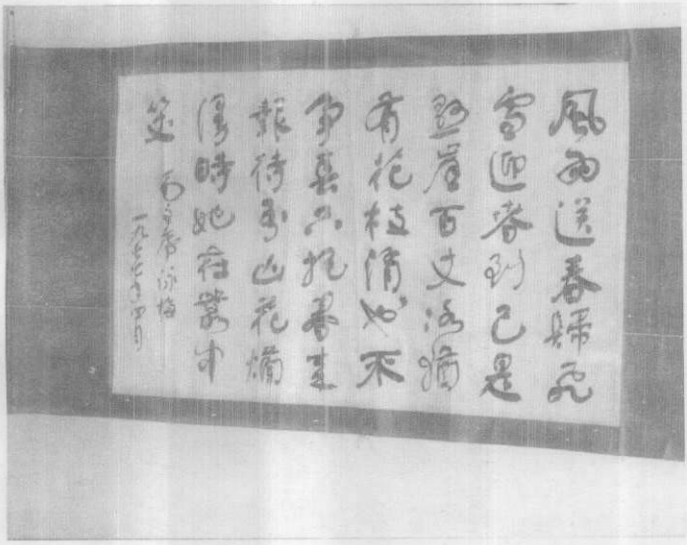
◀ 1939 年 10 月在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 前排左一田方, 后排右三为副社长孟秋江.

▼ 1941 年 2 月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勒令封闭, 国新社重庆办事处同志在疏散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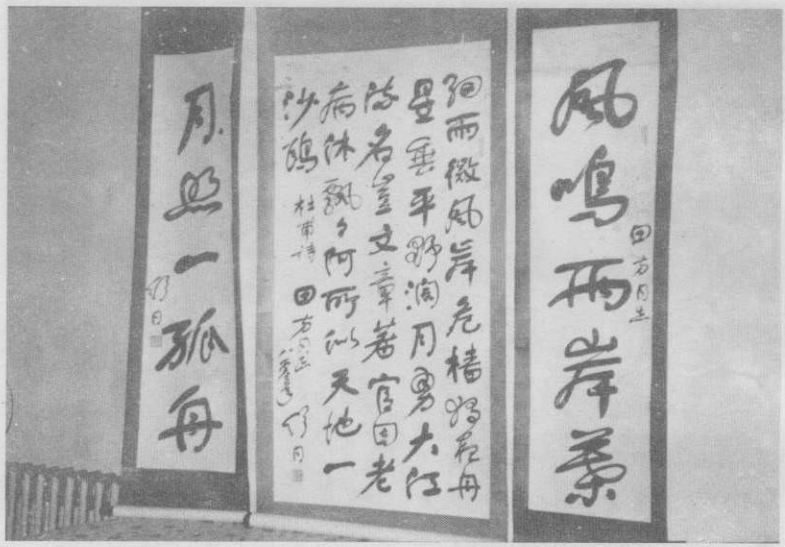
▲ 1951 年 2 月与赴朝慰问团少数民族代表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

▼ 1951 年 3 月参加赴朝慰问团西北分团 (前排右三为团长李敷仁，第二排左二为田方).

▲ 1963 年作者在《陕西日报》副总编期间重返延安，在《解放日报》宿舍窑洞前留影。



◀ 1977 年 4 月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病房，舒同题赠墨



▲ 1980 年秋舒同与作者同住三 0 一医院，出院时题赠.

▶ 1981 年夏刘玉厚来京时合影.

▲ 1982 年 4 月习仲勋 (左三) 与油画《良宵》作者 (右二) 及有关人员合影. (右三为甘露, 左一为张志功, 右一为田方).

▼ 1983 年 10 月参加研究水库移民问题经济交流会 (前排右九为作者).

▲ 1983 年 10 月率记者团赴内蒙古采访 (右四为田方).

▼ 1984 年春《解放日报》老同志座谈会时，陆定一与作者握手交谈.

▲ 1988 年 5 月澜沧江流域水电经济综合开发考察团部分团员合影. (左一为作者).

▼ 1991 年 5 月在北京参加《解放日报》创刊 50 周年纪念会. (右二为田方, 左二为廖冰, 左三为海稜, 左四为郁文).

1992 年春周培源接见时合影.

岁月印痕

——田方文集

田方 著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印痕:田方文集/田方著.—北京:金城出版社,1998.1

ISBN 7-80084-163-4

Ⅰ.岁… Ⅱ.田… Ⅲ.田方-文集 Ⅳ.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478 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 100006)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5.625 印张 插页 4 392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84-163-4/Z·31

定价:25.00 元

自　序

生逢其时

我这一辈子能够活到如今耄耋之年——七十有九，确实也不容易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历经苦难和战争，胜利和欢乐。在这曲曲弯弯、坎坎坷坷的人生旅途中，我的童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国民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待到成年以后，日寇入侵，国土沦丧，爆发抗日战争，艰苦奋斗，八年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又发动内战，紧张激烈的三年解放战争，很快地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胜利来之不易，死了多少中国人，想起为国捐躯的战友，心里就很难过。在新中国创建后的27年中，先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觊觎新生的共和国，抗美援朝战争居然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此后才说集中全力建设新中国，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反右派、反右倾、三面红旗直到十年"文革"，"左"到登峰造极，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好在自从邓小平同志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革命与建设拨正了航向，继续向着光明与胜利前进。

回顾历史，如果在全国解放以后，能够平平稳稳，一心一意搞建设，那么，如今的日子，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实的路子，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历史地、辩证地说，我们应当认认真真地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有

益的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以利前进。我们美好明天的道路还更长更远！生长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应当是生逢其时，时运很好。可不是么？日本军国主义者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思想要时刻牢记，千万不可丢失。如今东条英机阴魂不散，靖国神社还是当今日本首相参拜的偶像。他们的用心何在？岂不昭然若揭。台湾李登辉之流，还在做他的"台独"美梦。他们仰仗美国的势力和一些优势是死不甘心的。美国当政者对待中美关系，总要挟带这个"权"那个"权"，他们对日益强大的新中国，怎能心甘情愿？我们自己国内"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远没有肃清，也还要警惕着右的悄然进攻；我们相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坚强的和正确的，但由于共和国前进的道路并不那么平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此等等，如果不是我们这辈人亲临其境，谁也不会有我们今天这么深刻的印记。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历史！我所以能够成长到今天，除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和教育我的党以外，还有多少亲朋好友，以及革命历程中的生死战友，为我指引了人生道路，帮我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特别使我终生难忘的三位良师益友：一位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我和他相处相识最长最深，他为人厚道，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和一贯实事求是的道德风范，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再一位是陕北劳动模范刘玉厚，他那朴实诚恳、勤奋踏实，一步一个脚印，永葆劳模本色的先进事迹，从我参加革命初期到晚年，一直深印在我的脑际。还有一位是国内外闻名的老科学家，一代宗师周培源，我和他交往虽则只有短短的6年，但他那种敢于直言，敢讲真话，坚持真理以及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成了我晚年受到深刻教育的老师。其它诸如彭德怀、胡耀邦、胡愈之、范长江、孙越崎、高天、陈晓和爱国老人沈钧儒等等人物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过我。他们都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导师，精神文明建设的榜样。可以说，我一生的成长离不开他们，没有和他们的交往，就没有

我田方的历史。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我没有创建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我之所以有今天，还能在晚年作出一些有益的业绩，就是和上述方方面面不平凡的人的交往分不开的。所以我要记下他们的教益，献给那些将比我活的更有意义的人们，使他们从这些小故事中汲取有用的东西，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本书是我一生写作生涯的总结，为人处世的总结，更是良师益友给我教益的总结。在我晚年能够顺利问世，贺保阳同志给予了热情的帮助，金城出版社的同志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在此，我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田方

1996 年 10 月草于中国北京

1997 年 1 月成于新西兰基督城

作者离休后和朋友们合作主编出版的作品：

《内蒙古好地方》

《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中国人口迁移》

《中国人口迁移新探》

《中国移民史略》

《国外人口迁移》

《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

《澜沧江—小太阳》

《开发大西南》6卷丛书："综合卷"、"地区产业卷"、"四川、云南卷"、"贵州、广西、西藏卷"、"纪实卷"、"联合开放开发卷"

《延安颂歌》

《延安记者》

《秋实集》

即将出版的：

《习仲勋的革命生涯》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篇　纷纷扬扬的世界 …… (1)
童年的印记 …… (3)
小镇名人 …… (5)
最喜欢到外婆家 …… (8)
孙传芳败兵过境和北伐军的到来 …… (9)
从小学教员到学徒生涯 …… (1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 (11)
离别上海参加抗战 …… (12)
震动香港奔向桂林 …… (13)
皖南事变后——从重庆到延安 …… (16)
第二篇　记者笔下的革命圣地 …… (21)
三届工展参观记 …… (23)
记中央医院 …… (26)
走向农村 …… (29)
中心工作在开始着 …… (32)
减租会的成立 …… (35)
炭窑 …… (40)

讨论减租交租的时候 …… (44)
马丕恩在召唤 …… (47)
家庭会议 …… (51)
劳动人民的旗帜 …… (54)
农作法的模范 …… (60)
心声 …… (66)
公共卫生训练班的学习 …… (72)
移民问题 …… (75)
刘玉厚的光辉 …… (87)
绥德分区改良农作法 …… (92)
棉花打卡…… (104)
绥德分区文教会中的几个中心议题…… (107)
工农干部当了完小教导主任…… (111)
文教工作中的两位老先生…… (115)
开展灭虫工作…… (119)
今年冬季移民工作…… (123)
练兵两月…… (127)
“国家的兵”及其它…… (132)
访问参议员…… (137)
悲！愤！ …… (140)
记八一老人高愉庭…… (146)
教育家马议员济川…… (150)
日记的一页…… (153)
谈米脂小型合作社…… (155)
光华农场参观记…… (160)
对镇原查租工作的意见(短评)…… (166)
新疆归来同志访谈…… (168)
公共卫生训练班…… (171)

如何联系实际(短评)…… (176)
第三篇　转战陕北…… (179)
拉开陕北战场的序幕—西华池遭遇战…… (181)
转战陕北中的范长江…… (187)
习仲勋与彭德怀的战斗情谊…… (191)
第四篇　赴朝慰问…… (199)
我敬仰的彭德怀…… (201)
中朝人民在一起…… (213)
金刚山的烟斗…… (218)
第五篇　忆延安…… (223)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 (225)
“声播蚕桑女,名扬花木兰”——一个延安的养蚕姑娘的人生际遇…… (233)
难忘的人民医院…… (246)
“八一五”在延安…… (250)
第六篇　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 (253)
初次相识于危难时刻…… (258)
他带我到群众中去…… (262)
和邓宝珊早有交往…… (265)
报纸宣传要适应迅速发展的新形势…… (267)
初写习仲勋…… (271)
调到他身边当秘书…… (276)
为他草拟第一篇文稿…… (279)
要正确对待文艺批评——在政务院文委的领导岗位上…… (282)
进入国务院——为直属机构制定规章制度…… (287)
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 (289)
1958 年到西北考察 …… (292)

提升他为副总理…… (298)
长葛调查…… (300)
他教我不要搞特殊化…… (305)
在“真理标准”讨论前后——对广东实施特殊政策的
时候…… (308)
第七篇　永保劳模本色的刘玉厚…… (315)
劳模刘玉厚的发现与宣传…… (317)
王震奖给他一支手枪…… (319)
他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共商国事…… (319)
“我是党的干部，为群众办点事是理所当然的。”…… (321)
老当益壮为民谋福利…… (322)
三次进京探望老战友…… (323)
第八篇　周培源与三峡工程的论证…… (325)
初识于三峡工程的论证…… (327)
不应“就三峡论三峡”…… (329)
大力支持“开发大西南”…… (331)
三峡工程议案表决前后…… (332)
坚持民主科学精神的一代宗师…… (333)
坎坎坷坷论三峡…… (335)
“匹夫有责”未敢忘…… (344)
和周培源的书信往来…… (349)
第九篇　我和爱国老人沈钧儒五代的交往…… (371)
“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374)
他的左倾思想来自他的祖母…… (375)
“人生有真爱　快乐在贞一”…… (377)
良师益友范长江…… (378)
沈大夫和沈师母…… (379)
沈老的孙子谈沈老…… (382)

人骅和秉德的婚恋…… (384)
从来自大洋彼岸的长途电话说起…… (386)
沈老的曾孙和玄孙…… (386)
第十篇　我想念他们…… (389)
年轻人的引路人——悼念胡愈老…… (391)
悼念周老…… (394)
胡耀邦谈鲁迅杂文…… (399)
怀念高天同志…… (402)
共产党的诤友孙越崎…… (405)
大西南的儿子—陈晓同志…… (409)
第十一篇　笔耕选粹…… (415)
《开发大西南》丛书"联合开放开发卷"编前话…… (417)
《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编前话…… (422)
为《近代中国移民史要》作序…… (425)
《延安记者》前言…… (429)
《路魂》—吹来一股新风！…… (433)
《青春的脚步》是美好的！…… (438)
面对抗战胜利50周年的感言 …… (442)
商品经济本来就姓"商"…… (446)
钥匙在锁家…… (450)
如何借鉴移民…… (452)
故乡的蝴蝶(按语)…… (455)
读《周王庙小城镇建设启示录》有感…… (458)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461)
让说心里话蔚然成风…… (466)
希望医院少折腾老人…… (468)
喜闻家乡群众文化的先声…… (470)
和习仲勋生活在一起…… (472)

一幅没有题名的舒同墨宝…… (475)
我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478)

第一篇

纷纷扬扬的世界

童年的印记

我本来不想写我的童年生活，因为我的童年没有多少幸福和愉快的回忆，只有孤苦贫寒的印记。但是，想到人的一生总离不开童年的影响，特别是想到母亲的慈爱，苦撑我童年的家庭生活，还是应当留下一笔的。

1918年6月5日，我出生在浙江海宁一个水乡小镇——周王庙镇。我父亲叫田月桥，母亲叫陈柏贞，生我姐姐田如珍，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我。我父亲在我3岁时就去世了，哥哥和弟弟也在幼年时夭折了。所以母亲是很伤心的，总认为她命苦，带着我姐弟孤儿寡母操劳度日。主要靠母亲纺线、姐姐学做女红的微薄收入过日子。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早上把母亲纺好的棉纱线送到镇上的蒋万源米店，由店员过称后付给一斤棉纱的手工钱，再付一斤棉花带回家。我姐比我大6岁，已经上了小学，回家后教我识字，但等她上到小学五年级时就因家贫辍学了，她的功课成绩很好，周王庙小学的冯校长答应给予免费优待，但终因贫困所迫要她帮助持家而停学了。

因为我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无论如何要供我上学。所以我7岁（实际上是6岁）时就上了周王庙小学。这是在庙堂里设立的小学。一年级就设在弥勒佛的殿堂。课堂比较宽敞，对常开笑口的弥勒佛

印象很好，孔夫子的牌位就设立弥勒佛像前面。初上学拜孔夫子时也拜了弥勒佛。但是，刚进庙门的大殿中供着威严的周王菩萨，两厢却是青面獠牙、头戴高帽、吊魂的黑白无常以及可怕的牛头马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埋下了神鬼的阴影。由于我童年时体弱多病，小镇上缺医少药，又因家贫看不起病，所以母亲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求神拜佛，托菩萨保佑。说来奇怪，当时庙里和尚问明病情后抽签给的神药，不是九包香灰（治拉肚子），就是九枚乌梅（治停食、帮助消化），居然还一吃就灵。因此，等我病好以后，母亲总要陪我带着供品（一般是九块芝麻饼和九双草鞋以及九对香烛）去给菩萨还愿，表示谢意。当然这些供品全由和尚领受了。所以我从小就跟着母亲相信菩萨的神灵。

有幸的是，我小学前三年学习都名列前 3 名，后三年也都在 5 名前后，所以前三年每年暑假都有不少奖品抱回家中，受到家人和邻居的称赞。大概这就是我童年时代最开心的事。成绩的取得，固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用功，但想起当时的家庭背景，也是很有关系的。我家的邻居，也是我们的房东，一个大门进出，和睦相处，相安无事。房东家虽是个破落户，但比我家富裕得多。男主人王家仁 30 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一个老母亲和大小老婆、两个儿子。问题是大老婆不生孩子，领养一个儿子名叫王望生，意思是领养后可望生育；小老婆却生了个儿子，取名王海得，在上海生的。这使大老婆心理很不平衡。由于王望生不是亲生的骨肉，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从小就很调皮，上学后也不好好学习，经常逃学，每天放学回家，不仅功课成绩很差，而且满身污垢和墨迹，和他母亲望子成龙的愿望恰恰相反，气的他母亲由训斥、怒骂以致殴打。我母亲再三劝架也不顶事，闹的我家也不得安宁。王望生被打得无外逃匿，有几次甚至偷偷爬进我家的床底下，半夜里把我们母子三个也吓坏了。这样的事，邻里都认为王望生这孩子不争气，使他母亲脸上无光。相比之下，我家虽穷，但我还算是个好孩子，母亲常常教导我要听她的话，

好好学习，为母亲争气。所以。我从小就记着“要听话，要争气，这是对母亲最好的孝顺！”

母亲看我听话、也争气，所以总是节衣缩食供我上学。我病愈后，她总要买点鱼肉给我补养身体。每月初一、十五上庙进香时，总是虔诚地跪拜菩萨，默默地祷告保佑我健康成长。我每天放学回家，也从不外出游玩，除了向母亲报告学习成绩以外，就在家中复习功课。有几次随母亲走亲戚家，夜间睡梦中还背诵功课，所以我总是受到亲友们的称赞。

周王庙小学是由地方上几位有名望的乡绅如许行彬、孙凤藻等为校董于1908年发起成立的，是全日制小学，比较正规，还是海宁县倡办新式小学的先驱。学校虽则设在庙内，但在操场后面新盖了一幢两层楼房，五、六年级和图书馆以及两位老教师的宿舍在新楼，有玻璃窗，宽敞明亮。在楼上还可以远眺过境的沪杭铁路和来来往往的火车。操场大约有三个蓝球场那么大，当时感到是很大的。操场北端有两棵代代桔子树，每当春暖花开时，满院清香扑鼻，令人心醉；还有校门内两旁那两棵高大的梧桐树，以及二年级院内的蜡梅树和书蕊树，都留下过温馨的印象。校门外庙堂内有一座戏台，每年总有两次演唱大戏，那是周王庙镇上的节日，四邻八乡的农民都要到镇上看戏，各种小吃摊贩摆满街道。学校也要放假，我们把课堂的桌椅搬出来搭台看戏，那也是最开心的。演的戏大多是有关包龙图和关云长的。虽然听不懂，但知道都是关于倡导公正廉明、忠义道德、劝人为善的好戏。

小镇名人

教我书法的蒋廉清

周王庙是个水乡小镇，塘河横贯全镇，沿河东西两街最为热

闹，南街稍见偏僻，当时没有北街。全镇不到百户人家，但地主兼经商（大多经营米店）的有钱人家总有十来户。他们的子女有出息的上了大学以后又回家经营家产。我家邻居南街上的老财东蒋鹿平，就是地主兼营蒋万源米店的。他的大儿子蒋廉清在上海政法大学毕业后回家就为米店管账。那人文质彬彬，一只假眼，配带一幅金丝眼镜，为人也还平易。我在小学四年级寒假期间，那时大概是国民党政府实行土地丈量，地主家的土地都要一一登记。我被蒋廉清邀请，为他家填写土地登记表，就整整填写了一个寒假。每张登记表的内容包括佃户的姓名、藉贯、地址，租用他家土地×亩×分，东至——、南至——、西至——、北至——。言明租米×石×斗等等。整整一个寒假填写完毕，赏给了我四块银元，当时大约可买一石大米。那时我才9岁，得此重赏，就很高兴地拿回家交给母亲，也受到母亲的赞赏。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劳动报酬，当然是忘不了的。蒋家的房屋很阔气，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蒋廉清让我在他书房抄写，他擅长书法，练得一手清代名书法家何绍基行书。练字时，只见他着意运肘挥毫，屏息敛气，用笔遒劲，神采奕奕，兴趣盎然。整篇字体，气苍韵雅，古茂浑朴。当时我虽不懂书法功夫，但对这种清雅字体，十分喜欢，蒋廉清就教我练字的基本功，特别是提肘捉笔时，还得在右手姆指与食指间的圆孔上放一盛水的小酒盅，练出端正平稳的功夫。我受良师教导，初步学习了何绍基字体，高兴的一度达到痴迷程度，回家后用旧报纸练习写字。我11岁时，母亲病逝，家境更加贫困才告停笔。接着我离家外出，走上了社会再也没有练字的机会。但说来有趣，过了50多年，离休以后，偶尔兴至，仍然可以按照何绍基字帖，自鸣得意地泼墨挥笔，自我欣赏一番。

民间调解员朱达卿

小镇东街有一位朱达卿，算是知名度较高的老知识分子，他是

落第秀才，还是我姑夫的长兄。我父亲和姑夫去世后，他就比较热心地照顾我们孤儿寡母，经常来我家看望，帮助我家排忧解难，出出主意。他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眼镜，长着山羊胡子。他经常是一早就来我家，在关心我们的同时，顺便就在我家把早餐吃了；随后就往街上茶馆里一坐。他的光临，茶馆老板非常欢迎，照例不收他的茶钱。他和乡里上镇卖菜的农民谈这谈那，捎带就把便宜的蔬菜买了。他有更大的任务是充当民间调解员，当时虽则没有这个头衔，但是凡有邻里间相互难解的纠纷，就上茶馆来吃讲茶。先由双方各自申述原委，再由满座茶客各抒己见，一一评说，最后由朱先生作出判断，谁是谁非，一锤定音。然后由输家支付全堂茶费，并当众赔礼道歉；赢家则事后给朱先生送礼，所以朱先生不仅具有相当的威望，而且他家收受的酱肘子、咸鱼、咸肉等礼品，是一年四季不断的。他整天由东街、西街、南街闲逛闲聊，信息灵通，受人欢迎。他特别爱在南货店闲聊，因为他可以随便吃店里的花生、冰糖，只吃不拿，分文不收。

权威人士许行彬

小镇在政治上最具权威的人物，莫过于东街开丝行的许行彬，人们都说他家最阔气，我从来没有进过他家，小时候路过丝行门口，总有一股威严的感觉。偶尔从他家围墙的花洞中望进去，见到花园里确有亭台、假山等等。后来才知道，许行彬早年就在杭州创办《白话报》、《西湖报》、《省钟报》、《良言报》和《杭州报》等 20 余年，一生从事笔政，由于反对袁世凯称帝，对抗孙传芳等，曾先后 5 次入狱。许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同盟会会员，和孙中山早有交往，孙中山 1916 年 9 月 15 日谐夫人宋庆龄和随员蒋介石等到海宁观潮，就是搭沪杭路快车特定在周王庙站下车，曾在许行彬家休息，并由许行彬等陪同，坐了十乘轿子到海宁盐官镇，观潮毕孙中山回

到上海后，还给许行彬等写信表示感谢，并题赠“猛进如潮”四个大字。

最喜欢到外婆家

我童年时最喜欢的是跟妈妈一起到外婆家。外婆家在乡下陈家田畈，离镇约二里多路。外婆家有大舅、小舅，还有两家堂舅舅，表兄弟、表姐妹很多，他（她）们都很欢迎我这个从镇上去的表弟。外婆家门前有两口池塘，有外婆亲手栽的一颗高大的柿子树和一棵枣子树。每年夏季收摘蚕茧的农忙时节，妈妈就带着我去帮舅舅家的忙，往往蚕茧丰收，全家喜气洋洋，吃的也好，有咸鸭旦、白切肉、新鲜鱼虾之类的。再就是冬季准备过年的时节，几家舅舅联合起来，把两口池塘的水车干，竭泽而渔，活蹦乱跳的各种鲜鱼，一筐筐地分给各家，除了当时就吃的鲜活鱼外，还有腌起来晾干长时期吃的咸鱼。柿子红了、枣子熟了，更是甜美诱人。而在众多的表兄弟、表姐妹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比我大两岁的表姐陈祥云，她能下水游泳捉鱼，爬树摘柿子、采枣子；还能捉知了，捉蟋蟀，使我这个文弱表弟对她十分敬佩。中间虽然阔别了五六十年，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都还经常人来人往，书信往来。表姐夫苏如江，原来是我姑母家的邻居，从小就很熟悉，也是十分聪明能干之人，他虽则深居农村，但擅长书画，我还裱糊了他题赠的墨宝。我对他们非常感恩戴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帮我找到了父母的尸骨。因为抗战时期日寇焚烧了我家崇德县（现为桐乡市）的祖居，烧毁了我父母的棺木，当时因为我参加了革命，谁也不敢声张，只是由亲友拣拾了我父母的尸骨，装罐后随便掩埋在一块农田里，以后就是由我的表姐夫妇和亲友们帮助找到，起出来重新装罐安葬，埋坟立碑，墓碑也是这位表姐夫题写，并由他亲自石刻，每年清明时节，还由

他们清除坟头杂草，准备供品代为祭奠，这种代我尽孝的义举，真是感人肺腑。表姐陈祥云，从小学会了缝纫，是这一带方圆20多里闻名的裁缝师傅，她培养的学徒总有10多人，至今她的徒弟中有的到镇上干个体开业致富的，对她仍十分尊敬。1982年，这位表姐还专程来到北京，为我全家缝制新衣，又是一番感人深情！这是我童年亲友中至今还健在的一对表姐夫妇。我离休13年来，曾经三次回乡探望，都承他们盛情款待，真是情挚谊深，令人终生难忘！

孙传芳败兵过境和北伐军的到来

童年时代经历过的政治上紧张多变的日子，就是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的败兵过境，和国民革命北伐军的胜利到来，大大震动了我们这个沉寂的水乡小镇。那是1927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春节刚过。我早先在学校楼上北望铁路线上就有运兵车往来，知道时势紧张。不料那天早上我妈妈正在烧粥，就听到街上人声嘈杂，高喊“北佬兵来了！”人们纷纷关门闭户，躲避起来。因为我们租住王家房屋比较高大，唯恐败兵进来抢劫，所以就从后院爬梯翻过矮墙躲到邻居破旧房内，从门缝里看到一群群“北佬兵”枪尖挑着包包担担，哼哼哈哈地摇晃而过。大概他们已在前村抢劫够了，所以只在这里路过一下，但已经使小镇人家惊恐不已了。

过后不久，国民革命的北伐军来了。在镇中心的桥头上竖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北伐军还在茶馆里用留声机进行宣传，播放北伐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学校老师就很快教会了我们。从此，每周星期一早上，由冯校长主持，全校师生集合在一年级大课堂举行朝会，向孙中山先生遗像行三鞠躬礼，并恭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给小学生们灌注了反帝反封建的

思想。镇上另一家蒋姓财主，大概属于土豪劣绅，被北伐军打开粮仓济困扶贫，并且在庙里和尚大锅里烧施粥，救济四乡穷人，来自农村扶老携幼的农民挤满了庙堂，我和几位同学还参与了掌勺施粥的工作。小镇显得生气勃勃，活跃非凡。北伐军在镇上驻了几天，军民关系很好，一家水果店店主冯春芳的儿子要求参军，父亲只此独子没有同意，北伐军开拔以后，那个儿子从此急的发了疯，印象十分深刻！

从小学教员到学徒生涯

我 11 岁小学毕业时，我母亲得病去世，我是非常悲痛的，仅留下我姐弟二人。当时经我的两个舅舅和父亲生前友好的照顾，资助我到海宁县城盐官镇县立商科职业学校念书，读了一年，初步学了些商业簿记、打算盘、点银洋、广告画等等商科专业，不料发生学潮，学校停课，我也就辍学了。那是 1931 年夏季，周王庙小学一位张世清先生，清清瘦瘦，和气待人，一直对我很好，他说因害肺病，要回家休息养病，委托我替他代课。当时我自己才 13 岁，也居然上讲台当了小学教员。由于我在商校学习过，所以主要为张先生代理一、二、三年级的算术课和三年级的珠算。代课期间，月工资 8 元，除去伙食费还有 5 元的收入，当时也不算小数，替我姐持家增加一点收入。可是代课半年以后，张先生病愈回校，我就失业了。不久我姐出嫁，经我父亲生前友好和堂房的伯父介绍我到杭州一家益成丝织厂当学徒。当时对学徒有许多清规戒律，是必须遵守的，进厂时首先得跪拜师傅——工厂的经理。指定的任务，每天早起扫地抹桌，倒痰盂，清洗水烟壶，给师傅倒尿盆。我身体瘦弱，但每天得无数次地搬运丝锭；吃饭时先站桌旁替职员们添饭，待他们吃完后才轮到我吃那些剩饭残菜。这是一家整天 24 小时轮班倒的电机丝

织厂。夜间，先要替师傅捶背，待他吐出老痰睡下以后，我才得在办公室兼倒花车间的地铺上入睡。半夜，当夜班的职员们饿了，就把我踢醒替他们上街买夜间的点心，自己虽则也饿，但8角钱的津贴是吃不起点心的。如此折腾了8个多月病倒了，被赶出厂门回了家，住到了舅舅家。当时外出做事干不了回家、名声是很不好听的。以后又经亲友介绍，到了上海南京路老九和绸缎局当学徒，虽则也很辛苦，但比杭州那家丝织厂文明一些，期间也害过几次病，但总算顶了下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30年代中期，那是我们祖国被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的一个苦难而屈辱的悲壮时代。我所在的那家绸缎店地处南京路望平街（现山东路）口，这里是一块报贩的集散地。当时由邹韬奋、夏衍等人主编的《生活日报》、《大众生活》、《永生》周刊、《抗战》三日刊、《力报》等等报刊，正在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等爱国主义思想，非常受青年学徒店员们的欢迎。当时我们商店还有一位神秘的老店员，名叫周永浩，经常流动在各商店服务，传说他是共产党员，为人谦和，沉默寡言，常给我们教教英语，时而宣讲一些抗日救亡的道理；特别是1936年11月23日，以沈钧儒为首包括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必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共政策，因爱国有罪而被捕，从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对上海各界人民，包括我们这些青年学徒店员振动很大。从而使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当时租界上各商店资方为了表示支持抗战，也同意我和另两位青年学徒参加了上海南市公民训练义勇队，接受军事训练。“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我们就担负了南市后方警戒任务，到前线挖掘

战壕、救护伤兵、捕捉汉奸等战地服务工作。11月上旬，日寇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淞沪守军侧背受敌，部队奉命西撤。11月12日上海市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在这3个月中，日本侵略军先后投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14个半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30多艘，飞机400余架，战车300多辆，狂妄宣称一个月内占领上海。当时国民党政府划京沪杭及浙江全省为第三战区，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广东、广西等地方部队等兵力共70多个师投入战斗。应当说：当时国民党广大官兵也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勇敢善战的。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奋力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终于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寇所谓的中央突破、速战速决、在短期内征服中国的美梦。我们南市公民训练义勇队驻守在南市芦家湾地区，由于当时法国政府支持我国抗战，法国驻军同意义勇队退入法租界，被收容约一个多月，由各队员原服务单位分别铺保释放，我也回原单位继续服务。

离别上海　参加抗战

上海被日寇侵占后，租界便成了孤岛，但仍有各种地下秘密的抗日救亡活动。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原《力报》的记者沈可人，他正秘密串连组织一批青年到内地参加抗战。他声称曾经到过延安，这次出来主要带他的未婚妻杨烨、妻弟杨以廉和他自己的弟弟等人再去延安；同时再组织一些抗日青年同去。这对于我是很有吸引力的，经我和同事查云卿又串连了5位男女青年共12人，组成了“上海市流亡青年战地工作队”，准备出发。但当1939年春要离开上海到内地时，由海路搭轮船到宁波的航线已被日寇封锁，上海租界的形势也在日寇的威胁下日趋紧张，我们已不宜在租界久留，只得搭轮船到香港再经广东、广西到内地。为此，我得到我姐夫

孙瑞耕的同情和支持，资助我100元，才得以购买船票，和大家一起，于1939年4月间悄然离开上海（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姐夫又曾资助我200元路费，才得以离开重庆）。记得当时有几位青年出于爱国热情，隐瞒父母私自出走。在我们搭乘的太古轮船启航之前，有的青年的父母察觉后赶到船边呼唤儿女的悲壮场面，印象至为深刻。

震动香港　奔向桂林

到达香港，经沈可人的朋友介绍，我们借住在一所小学校内，当时学校正是假期，几位青年男女老师对我们非常热情。但由于沈可人原约定到内地的介绍人已经离开香港，以致失去联络，各人所带路费已经用完，只得典当随身所带衣物，每天三餐上街吃四角钱一碗的鱼生粥度日。正在狼狈的时候，沈可人找到了从上海流亡到香港的新闻界朋友。接着，香港大大小小的报纸记者纷纷来访，报纸上连续报道了12位流亡青年从上海孤岛投奔内地抗日的消息，还配发了我们12人的照片，一下轰动了香港，包括香港爱国的工人、妇女、学生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其中很多人都是从上海流亡出来的），相继邀请我们举行座谈会，发动募捐，资助路费，我们才得以购买船票离开香港搭轮船到达广州湾。当时有两位香港记者也参加我们工作队一起到内地。我们在湛江上陆，当天到达遂溪。当时广东地方上为了防止日寇在此登陆内侵，所以北上广西桂林的公路，已被彻底破坏，沿途根本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步行。记得第一天黎明从遂溪出发还争论了一番，由于沿途除60里处有一村庄外，再没有落脚地点，只有走120里到廉江才能休息。大家出于满腔热情，感到一天走60里太少，下决心以到达廉江为目标。没有料到中午过后，就下起了飘泼大雨，因为5月间正是广东的雨季，

大家冒雨前进，不仅脚底早已起泡，穿的胶底鞋，经不起长途行走已早磨破，雨水浸透脚底的泡，沙子嵌进泡内，刺痛难忍，一直挨到半夜12点钟，总算到了廉江。这是我们离开上海以来第一次碰到的严峻的考验，决定在廉江休息几天。这时，两男一女三青年感到这样参加抗战太艰苦了，加之他们家中有钱，就打电报回上海，让家中汇寄路费后就和大家告别了。当然三个人的离去，并没有动摇我们大家的决心。接着，继续步行，经陆川到玉林，这是比较大的县城，有国民党部队的驻军和广西学生军，他们都对我们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在休息的几天中举行了几次座谈会。驻军首长还透露了要挽留我们参加他们部队并许以军衔的意图；广西学生军在一次月夜欢迎会上，边吃新鲜荔枝，边唱学生军军歌；

“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呀！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呀！打！打！打！民众起来，杀尽各地汉奸！民众起来！杀尽各地汉奸！杀！杀！杀！

以浓烈的地方口音，唱的铿锵有力，大大鼓舞人们的斗志。当然，任何吸引力都阻挡不了我们向往桂林的目标。因为当时在我们心目中，桂林文化城正集中全国著名的进步文化人，有的人也钦羡主张抗战的李（宗仁）、白（崇禧）。所以又继续前进，经桂平到柳州。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达桂林已经8月份了。一到桂林，由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就首先报道了上海市流亡青年战地工作队到达桂林的消息。不久，国际新闻社社长范长江派张铁生到我们驻地进行慰问，张铁生原来是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纵队的成员，后来回祖国参加抗战，在国新社担任国际新闻主编。他为人谦和慈祥，我们对他也十分敬佩。他帮助我们病员治病，生活给予接济，并协商给我们分配工作的意见。这时工作队成员内部起了分化。领队的沈可人和他的爱人、弟弟以及香港两位记者，他们

5人主张参加由国民党当局分配的工作，而我们几人接受了进步文化界的分配。比如：陆清参加了范长江领导的国新社，高静参加了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曹禺础参加了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沈可人的妻弟杨以廉、查云卿和我参加了胡愈之领导的文化供应社，不久后我又被调到了国新社。而这些进步的新闻文化团体，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所以，从此我们便正式走上了抗日救亡和革命的道路。

据事后了解，沈可人于1938年曾以记者身份到过延安，也受到领导上的欢迎。但是他过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所以又返回上海，带了他的未婚妻、妻弟和他自己的弟弟，组织我们一批人出来。到了桂林以后，他未婚妻杨烨曾在桂林参加演出，担任话剧《红娘子》的主角，红极一时，沈可人本人则参加了国民党地方的《桂林晚报》担任副刊的编辑。从桂林分手以后，再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了。

皖南事变以后，杨以廉、查云卿、陆清、高静等由组织安排，撤离桂林，辗转到了华东新四军根据地，杨以廉则在随军战斗中光荣牺牲。我当时在国新社重庆办事处，由沈钧儒、刘尊棋、陆诒、石西民、徐迈进等协助下离开重庆，经洛阳和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于1941年8月到达延安。

皖南事变后

——从重庆到延安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

当时，我在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重庆办事处工作。国新社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当时投降分裂的危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起一个相当广泛的通讯网，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加强了联系。从桂林总社、香港分社和重庆办事处发向国内外各个报纸的中英文新闻通讯稿和专电的订户共达150多家，对内对外宣传团结抗战、打击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1939—1940年，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新社的宣传业务发展到鼎盛时期，受到抗日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国新社也受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被安上“异党宣传”的罪名。桂林总社和重庆办事处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要目标，国新社各地的社员和记者，成为

迫害对象。他们在公开采访场合被特务搜身，住处被搜查，或被跟踪盯梢。皖南事变后国新社被勒令封闭。国新社金华办事处两同志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当时正在桂林总社召开的国新社第二届年会，也受到特务的监视。重庆办事处周围经常发现形迹可疑的人，我们只有在深夜焚烧一些有可能被视为“异党宣传”的文稿和书刊。一夜，我们烧完文稿后，已在二楼地板的统铺入睡，我因失眠而清楚地听到楼下有人撬门的声音，我推醒大家起身，包括于友、高天等十多人，各人拿棍棒、手电等，我随手拿起一柄鸡毛帚，下楼时用帚柄在门板上猛力一抽，可能这有似枪声“啪!”地一响，把特务吓跑了。下楼后在四周察看已无任何踪迹。但从此大大加快了办事处人员疏散的速度。国新社遵照党的指示，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从桂林、重庆两处有计划地把干部转移到香港、南洋、国统区内地、新四军根据地和延安等地。但国新社全体成员无论走到哪里，仍然坚持团结抗战。1941 年 4、5 月间，桂林、重庆两地国新社被迫关闭。

当时，范长江从桂林写信给我，让我找“姑夫”（沈钧儒的代号）联系，请沈帮助找刘尊棋、石西民、陆诒、徐迈进等新闻界前辈，特请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协助，介绍给在国统区合法的朝鲜义勇队，改名换姓，化装成朝鲜人，跟义勇队的朝鲜同志一起离开重庆，经过一番曲折才到洛阳。

朝鲜义勇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引导和倡议之下，于 1938 年 10 月 10 日经国民政府批准，在汉口宣告成立的。在举行成立大会时，周恩来、郭沫若都到会祝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朝鲜与我国唇齿相依，中朝革命人民并肩抗日，英勇事迹很多。义勇队刚成立时，有队员 140 多人，编为一个总队。总队长金若山，副总队长申岳，下设两个支队，我们参加的是第一支队，支队长朴孝三，政治指导员石正。义勇队的大部分队员是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数接受过军事训练，队伍精干，活动能力很大。第一支队有

十几位朝鲜同志，我们中国青年还有裘一民、胡瑞英、陈凯、冯晔等5人，和他们相处很好，亲密无间，犹如兄弟姐妹。但也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抗日，在自己祖国的大地上都不能自由行走，而要化装成朝鲜人才能通行。每想及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之火，不禁油然而生。朝鲜义勇队在国统区虽是合法组织，但在反共高潮下，唯恐反动派无理刁难，也不敢公然在交通要道上通行，而选择了水路从重庆搭江轮到巴东，再走山区小路经老河口、南阳去洛阳。

一路之上，我们尽量避免在城镇要道歇息。有一次不得不在某一县城过夜，当地县政府见是国民政府三厅厅长郭沫若的介绍，还是很客气地热情接待了朝鲜义勇队。当然，我们几个中国青年只能悄悄地默默无言。长途步行，虽则相当艰苦，但年轻人在一起，有说有笑，还是相当愉快的。何况朝鲜同志都能讲中国话，更是自然融洽。

5月中旬到达洛阳，朝鲜义勇队同志们回到了他们的洛阳办事处。我们几个中国青年找到了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一个多月紧张的行程暂时告一段落。办事处周围虽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但办事处内部则是团结抗战、活泼严肃的气氛。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同志相聚一起很快成了朋友。我的任务是在一架收音机上收听延安新华社的广播，编写新闻后在墙报上发表。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副总编吴敏（杨放之）夫妇，也在办事处，我们相处较密。当时还见到了前线记者徐盈、子冈夫妇。

在办事处40多天，为避免不测，不能外出。敌机空袭，就到后院空地躲避。洛阳隔黄河对岸，是敌寇占领的济源县，敌机一起飞就到了洛阳上空，我们既不能、也来不及外出防空。办事处后院只挖了几条防空壕，敌机空袭时，只能就地跳进壕里。我们只是默默祷告："马克思在天之灵"。说来也怪，多次空袭我们却平安无事。6月下旬，延安中央组织部来电，说因工作需要，凡新

闻工作干部尽快调到延安。我和吴敏夫妇等7人立即起程，先是搭陇海路火车公开到西安办事处。没有料到的是中途发生了一次事故，当火车通过潼关时，对岸日寇炮击火车。因此，到潼关前，全车乘客必须下车，在山区绕道到潼关西站再上车西行。可是，当我们在潼关西站候车期间，同行的战友刘群上了一次厕所就失踪了。等到开车时未见人来，急得大家，特别是他的夫人心急如焚，但也毫无办法。此人以后过了几个月，才被释放返回延安。可见当时要到延安的艰难。车到西安已是深夜，西安国民党的军警宪兵已知道乘客中有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因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站台到出站口，布满警宪。我们几人被扣，经过一一盘问，严格搜身，检查全部行李才放走。幸好我们事先在洛阳办事处有所准备：作为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调回延安的合法身份，背诵了受盘问时应答之词。加上西安办事处已派人来接，我们几个男同志又佩带尉级以上军官的领章、佩斜角皮带，才安全通过。

我们在西安办事处又住了一个多月，正逢国民党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搭办事处的汽车从西安回延安述职，和我们同车，我们才得以顺利到达延安。我们同行的几人从窒息的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出来，经过艰难曲折的行程，如今聚集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的草地上，耳听潺潺延水、仰望高高蓝天，呼吸着自由的新鲜空气，陶醉在幸福、舒畅而愉悦的蓝天下。我被分配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任编辑。在采通科科长郁文（以后为海棱）领导下，既当编辑，又当记者。每当夏天延河涨水，南关通讯站交通受阻，稿源中断时，我就踏着泥泞道路去俄文学校、王家坪中央军委、延安大学、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鲁艺、中央医院、朝鲜军政干部学校等单位，采访他们的学习和生产情况。我还兼任对通讯员进行业务教育的刊物《新闻通讯》的编委，担任报社整风墙报《春风》的常务编辑等等。当时工作热情十分高涨。不论白天黑夜，唯有奋发工作，刻苦学习，别无他求。就这样直到抗战

胜利。50年过去了，今天忆起这段战斗历程，不禁激起脑海中激动的浪花。

（原载《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第306页—309页。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6月。
在此，作者稍加补充。）

第二篇

记者笔下的革命圣地

三届工展参观记

（1941 年 11 月 11 日）

走进翠柏牌坊，步入银行大楼；整个宽敞的二楼，布满 10 余种类、700 多件工业展览品，琳琅满目，令人有踏进大都市中百货公司的感觉。

展品中最引人入胜的，要算难民、纬华、交通、团结等厂，抗大纺织合作社，高等法院生产合作社和安塞、延长、固临、陇东分区等生产合作社所出品的布匹、毛呢、绒毯、毛线、毛毡。这些产品的光泽、花样、质地、都堪和战前上海、无锡沿海各国货工厂的出品媲美。清涧出产的丝织品：绉纱、纺绸、提花绸、手绢、丝线，颜色鲜艳，光滑柔软，虽则目前产量不多，但已具备有希望的基础。纺织工业是近年边区工业中最发达的一环了，边区纺织工厂公营的现在已有 41 家。它的资金，从 1939 年 6 家工厂的 7 万多元，增加到今年上半年为止的 180 多万元。这些精美的成品，正从 2300 多工人们手里制造出来。现在他们可以保证每月产纱 6 万斤，布 2000 疋，毛毯 600 多条。它们的原料：一、羊毛：1940 年已可年产 150 多万斤。内有瑞士种美利诺羊改良种的毛，雪白、柔软、悦目。二、麻：经过炼制染色后，也显得漂亮了，32 万亩的植麻地域，也是纺织业的主源

之一。三、棉花：两棵像圣诞树的棉枝，吐放雪白的花朵，它俩代表目前关中延长、固临等地 4 万亩的植棉区来出席这盛会，它们是那样纯洁骄矜。看了难民纺织厂和交通纺纱厂的制程简表，知道怎样地经过逐步的手续，才制造出这些成品。巡视了纺织业部门的展品，使参观者身上也似乎觉得热烘烘。两架巨大的织布机和手摇纺纱机以及各种铁的木的零件，这些手工业的生产工具，边区也能配合目前工业的需要而自给了。有农具工厂、机器制造厂等 14 家来供给着，400 万资金，二三百个工人，已经可以生产这些初步的生产工具。

印刷和造纸两种文化工具是边区极待发展的，中央印刷厂正在号召创设小型印刷厂，他们送的一架小型印刷机，是用敌机丢下的炸弹头做的滚筒。小型的排字架，铅字和整套的印刷工具，小巧玲珑，搬移便利；既节省而又简单科学，生产量也可提高，这在抗战中的前后方是都需要的。铜锌版的制版过程，告诉着是用了多少化学原料配制而成的。八路军印刷厂也陈列了他们的制品。马兰草造的纸，今年上半年已经出产了 6 万刀，已能作到坚实、光滑。全边区现有振华、金盆、利华、绥德等 11 家造纸厂，但是对于边区激剧发展的文化事业，还是感到供不应求。其它如皮革、制鞋、日用品等小手工业的成品，精致的也有不少；如三边的羊皮和各种兽皮，退毛皮革制成的皮衣、帽、鞋等都很好。

在化学工业和制药业的部门中，可以看到边区的化学技术人材，是在埋头苦干，日新月异地发展着。盐的提炼，石油的分离，酒精的试造以及肥皂、蜡烛、牙粉、粉笔等正在大量的生产。国药厂、八路军制药厂，千余种由国药炼成的药品，对于边区人民的保健是大有贡献的。走到矿业展品前，首先触目的就是各种不同种类的，黑油油的煤块，白光光的石腊、石膏，细粒粒的沥青、池盐。……据 1940 年的统计，边区的煤产量已达 30 万斤，今年到 10 月份止已有 22 万驮，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产，正待边区人民去开

采。粗枝大叶的看得差不多了，在一角里放着一瓶芦粟糖精，两节碧绿的芦粟，不禁令人垂涎，希望在光华农场的创导下，大量的出产，首先须供给我们的小弟弟妹妹们吃。

参观者无不赞赏着：边区有这许多资源、宝藏和精美的工业成品。从入口到出口，给每个参观者注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象。正如他们说明书上所说的："三届工展会明确的呈显着边区工业发展的概况和它在国民经济上所占的相当重要的地位。"为求建设边区，达到边区自给自足，工业是还要大大发展的啊！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1 年 11 月 11 日）

记中央医院

（1942 年 2 月 12 日）

专业的缔造者

院长何穆是留法 10 年的肺科专家，儿科主任侯大夫，外妇科主任金茂岳，内科主任墨道文，化验室兼教务主任李之中，药师孙元辉，他们都是抱着高度革命热情，跑进这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边区来的医士。以他们的宝贵技术，建立了这座抵抗病魔的坚强堡垒——中央医院。同时更培养了许多技术干部：医生、护士、农村卫生工作人员，使边区卫生事业向前大大发展。

布尔塞维克的护士精神

180 个病员，除了医师的诊断外，他们整个的生活时间，就必须由护士来照顾。护士们日以继夜的周转在呻吟的环境中，提心吊胆的看护着病员。她们不停留地忙奔着。没有星期日，没有假期，从山上山下跑来跑去，心脏病更容易侵袭她们，可是没有阻止她们

神圣的工作。40位护士分别看护着五个科的病员，尤其在手术室里，急病应诊时和产妇临盆时，更特别需要护士的看护。

她们大多是陕公、抗大、党校的同学，她们没有受过专门的护士教育，可是有着人类最崇高的布尔塞维克的服务精神，以革命同志的友爱来看护着病了的干部。

一切为了病员

为了使病员恢复健康，除服药外就必须注意他们的营养。根据病况的程度不同，分为硬食、软食、流汁三类饮食：面、大米、挂面、鸡、肉、牛奶、鸡蛋汤、白菜、红米粥，必须随时保证供给。产妇生产后，婴儿由小儿科护士充当保姆，使得产妇好好的休息，病人往往脾气古怪，护理时态度的温顺，使得病员感到精神上的安慰，但也不能完全顺从他们，饮食的冷热必须随时照顾，否则病况出了岔子又是极危险的。所以住院期间亲身经受的慎密高明的诊断，温顺体贴的看护，这些都是每个病员出院后所深刻感念着的。

大量的消耗

无论饮料、洗涤，每天用水是很可观的。从延河里驮到高山上一天450担水，是多么的艰苦呵！假使逢到天雨水浊，天旱水涸的时候，更不是单靠力气所能奏功的。千余斤木炭一天的消耗，从40里外驮回来，常常是供不应求的。药品器材也是异常缺乏，现在他们只有一双施行手术用的橡皮手套，土产医品只不过补充一部份吧了，但质的方面还差得很远。“消耗和供应始终是不能解决的矛盾，”石副院长感叹着说：“物资虽则在不断的增加，但消耗的速度要快上几倍，目前财政的支出，我们是知道的，但又不能不出这笔经费，医院是不能自己生产来补充的，又没有‘外援’，物价的高涨

更威胁着我们。”

两年多来

1939 年 5 月中共中央委派何穆同志为院长开始创办时，仅 5 千元的建筑费，两年多来总共也只花了几万元。而从一座荒凉的山坡上，已建筑起了 102 个窑洞，90 间平房。8 层高大的山楼，使人远远地就看到它雄伟的外貌了。两年多来，在何穆院长的领导下，是迅速的发展着：从创办时起到同年 8 月是规模初建的时期，接着到 1940 年的 12 月已经分设了内外妇三科，并开始接收病员，原来何穆院长从外面带来了几位医师，许多医药和器材，在人力、物力上给了相当的补充。在第三个时期中，护士、医生、农村卫生人员训练班先后成立了：小儿科，传染病科，手术室等也增设了。从去年 11 月两周年纪念时起，院内各科正规工作制度更趋健全，技术水平也逐步提高，可是由于院务的逐日发展，困难问题也相随增多了。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2 年 2 月 12 日）

走向农村

记西北文艺工作团

（1942 年 4 月 29 日）

《北京人》的演出，将是西北文艺工作团和延安观众作暂别时的纪念。这一次他们为了庆祝边区文协重新改组，和 5 月间召开的边区宣传工作会议开幕，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行将转入新的环境、接受新的工作任务而对于自己阵容的一次检阅。《北京人》是曹禺名作之一，它描写一个封建家庭的破灭，虽则全部剧情最后告诉观众的是呼唤人们回到祖先时代的幻想，而没有明确的暗示人类中还有不可被战胜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但是作者在全剧中描绘对黑暗的憎恨和对光明的憧憬，却是相当熟练，尤其在剧情和技巧上的细腻与精密，是超过了《日出》和《雷雨》的。西北文艺工作团经过了 3 个多月的排演，和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将是演出成功的有力保证，在布景方面虽没有花费多少钱，然而由于他们埋头苦干的精神终于把一些旧布景精巧地的改造了。

西北文艺工作团不像一般的剧团，她的内部包括着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四个组、全体团员 40 余人，分门别类的从事他们的

研究工作。当每次剧本演出的时候，他们便集中力量围绕到戏剧的岗位上；美术组担任舞台装置，文学组担任宣传，音乐组担任效果。她的前身是这样：1940 年的秋天，在陕公各个学习班中调集了一批对文化工作有兴趣和稍有经验的同志，成立了《文艺工作队》，初创时，全凭队员们的大力支持，他们没有向任何方面领到一点创办费，可是在第一次《蜕变》演出后，就获得了相当满意的成绩，他们也就在这一部份的戏剧财产上，奠定了今日的基础，在不断的学习和工作中，逐步提高了他们文艺工作的水准。在年半以来他们演出了三个大剧：除刚开始时的《蜕变》外，皖南事变后，他们又及时的上演了宋之的所著五幕大剧《雾重庆》，给延安观众介绍了大后方的黑暗现象。去年秋天，正当中央改变关于干部学校计划时，他们又上演了自己翻译的苏联新剧——《生活在召唤》，这剧为观众所最熟悉的，配合实际情况的新戏，对干部教育上也起了相当的刺激作用。据说有个别平时对本身学习漠不关心的同志，看了这戏后还回家痛哭了一场，继后又有许多观众要求继演这戏。

是时陕公归并入延大，这个团体也就根据它的工作性质，归由西北局直接领导了，由于这个团体的特点，他们不但专演大剧，其他独幕戏、歌剧和组织布置纪念晚会其他种种文化活动，使延安增加了不少活跃空气。

这一群年青活泼的艺术工作者，大都曾经在晋西前线活跃过，他们虽还说不上有高超的艺术水平，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却是他们基本的优点。尤其到延安以后，在相当时期的训练中，也逐步把他们的水平提高了：当 1940 年能够参加各种表演的（包括演戏、歌咏、器乐）仅全体团员的 40%，而现在已有 80%了；能够创作的（包括文学、美术、剧本、乐曲）由 30%增加到 60%；能够翻译的（包括英文、日文、世界语）由 5%增加到 10%了，所以延安的戏剧界对西北文工团的评价：认为艺术水平还没有达到最高的理想程度，但由于他们优良的艰苦作风和虚心学习的态

度，是有他们光明的前途的。

他们的组织机构，有一个由四五人所组成的团部，正团长宋一萍负责行政工作，副团长朱丹负责教育训练，下设组织科、总务科，40多位团员在“个别负责，集中领导”下亲密的合作着。

在过去短短的历程中，可以说是为培养干部的时期，巩固了集体的力量，奠定了团体的基础，可是过去每次的演出和其它活动，是没有一定的方针，所以最近得到西北局的指示：他们今后的工作方向，将去开展文化教育落后的广大农村，同时，在边区文协的帮助下，他们将把过去所学的经验教训，注射 到广大农村中去，全体团员兴奋地接受了这个使命，他们希望着政府划给一个“文化实验区”，让他们的才能在农村中自由舒展；他们准备深入农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提高农村文化水平，搜集农村丰富材料，使自己将来能真正担负起提高整个西北农村文化水准的任务，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正待他们用耐苦和努力去实践。该团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打算着这次《北京人》演过后，将立刻研究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3个月以后，他们可以更坚强地擎着开拓文化的旗帜，深入农村，面向群众。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29日）

中心工作在开始着

——记延安县生产动员大会！

（1942年3月11日）

川口的老乡们，这几天在注意着县政府召开的什么动员大会。在这次生产的动员大会上，出席的有区长、乡长，和各区经建助理员，合作社主任等将近200人。经过两三天连续的报告和讨论，根据多方面的材料，王议长做了一个总结。认为要实现今年的生产计划，首先就要安定民心——巩固老户和安插新户（难民移民）。对老户要深入宣传：解释去年的负担为什么重，今年公粮决不超过20万石，大家努力生产，是替自己增加财富，这个任务最好由区乡长担负，因为他们是最接近群众，也容易取得群众的信任，好像丰富区有20多户准备出去了，结果由乡长去详为解释而安定下来，只迁走4户。本来今年准备扩大合作社股金40万元，也不必由政府去动员，因为政府动员，人民就认为是负担，像南区合作社，办得好，对人民有切身利益，人民就会自动要求入股，正如刘主任所说的："一不要开会，二不要摊派，只是根据群众的需要，适当的提出口号"这是很正确的。还有8000驮公盐，旧年前已完成一半，再有

的4000驮也是为老户们所担心着，要动员人力、牲口，跑这样远的路，实在是不愿意，他们还是愿意交纳代金，所以高厅长也同意：运公盐可以变通办理不必强迫，由人民自愿好了，交代金或去运输都可以，只要在10月底前完成任务。对于新迁来的难移民，最好也是通过他们的亲友关系，让他们自由活动互相帮助，以乡或村为单位调剂粮食、工具、劳动力、土地等，“按庄稼”和“调份子”，也可以由政府帮助组织介绍。边府并为难移民特增发农贷5万元，帮助解决农具问题（全县原定农贷款额30万元，现已全部发放，约50%以上为耕牛贷款）。

春耕运动中的初步工作，需要有组织的深入动员，但应避免经常开会的方式，要挨门挨户去订计划，按户计划订好后，再汇订庄子计划，将来可以照计划进行检查，这一工作主要得依靠乡参议会，因为他们是具体了解每家农户的情形的。“二流子”在延安县是相当多的，他们认为受苦多收获多，给公家缴的也多，还不如舒舒服服的逛荡。所以对“二流子”必须严加组织，使他们不逍遥在生产线外。今年开荒10万亩的任务相当大，提高劳动力就必须注意采用扎工、编工、换工等集体劳动法。为增加粮产，改良农作法是积极的办法，“拌茶博”值得大大的倡导；把去年秋收后留在地里的粮根，挖出焚毁，这样一方面可以烧死潜伏在根里的害虫，另方面还可以利用根灰作为肥料。此外，如农谚所云：“种地不要问，全靠土和粪”，“修水利，修水利，眼前亏百年利”。从这几方面去增加粮产，的确也是有效办法。

延安县各个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好像川口、金盆、柳林、河庄、姚店5个区，荒地多，人口多，副业多，地区大，以开荒和安插难移民最适宜。又如川口、姚店、蟠龙、丰富4个区宜于植柳种苜蓿，金盆、柳林、河庄等区宜种麻。所以必需按情况执行计划，以符“地尽其利”的原则。最后一点就是建立健全的工作制度：旧一套的领导方式要除去，一把抓的动员方法要革掉，上级对下级是帮助而非代

替。检查和督促要规定经常的正规制度；乡长检查各户5天一次，区检查乡7天一次，县检查区10天一次，县向边府一月作两次报告，各级也按此办理。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

减租会的成立

（1942 年 12 月 21 日）

高起家坡的佃户要组织减租会了，保长毕守信要李尚樊领我们去看看，李尚樊披上他的短羊皮袄，戴着一顶高耸的蒙古帽，个子显得特别高大。我们走出了保长的家，沿着一道山沟，边走边谈。

现在庄稼已经打好了，李尚樊在他的七垧半租地上打下三石来粗粮，等着那一天二老财来收租。他和他的老婆被这七垧租地已经紧紧缚住了 7 年，今年又添上了一个娃娃，光景更难过了。上个月月中的一天，他正盘算着怎样渡过这年头，村主任来叫他去开保参议会，会上就是传达了今年要认真实现减租。几个参议员见了就说："还是这么一回事，顶个球事！"但是李尚樊觉得这总是政府照顾穷人的法令，他听了回家和老婆又盘算了一下：如今年真的减了租，那末三石来粗粮，还可以剩下两石多再合上些山药南瓜，今年可以渡过了。初五，李尚樊进城赶集，首先到镇公所去打听了一下，又到县务会的收发老张那里问了问，大家都对他拍着胸："老李，今年一定保险。减租交租，保你有地种！"李尚樊去赶集，可是什么买卖也没做，三脚两步，上山下坡的奔回了家，村上人都没回来，他的老婆在烧瓜饭，娃娃在炕上哭着，他自忖着，忖着，又想到了二老财

年年来收租的神气，已经7年了，受苦人总是没力量，怎办呢？……他没心意的走出窑门，望见本村赶集的人们都从山上下坡回来了。李尚樊等大家歇了一会，正在抽烟谈行情的时候他也凑了进去，一开口就是减租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是关心的，只是没信心，李尚樊想起了进城打听的经过，于是他也对大家拍着胸："今年一定保险，减租交租，保你有地种！"大家听得很出神，只是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映着二老财的影子。小李家坡二十来户人家，都是二老财的佃户。最后李尚樊提出了："咱们组织个减租会，二老财来收租，咱们就家家户户都照政府减租法令来交租，他要耍花样，咱们就一伙出主张，看他怎办？！"可是李均立泄气的说："年时咱就要减租，可是李炳耀和李禄汉都实交了，二老财就要把咱的五垧地典给李炳耀，咱没有办法，也只好实交了，你说怎办？"二老财去年收租时的花样很多，总之减来减去都交了实数，有的连今年的地也没种了。李尚樊又出主意了："咱们的减租会也要有规矩，谁加入了，谁就得守规矩，像李炳耀这种人，咱们就可以去告发，政府法令上有的：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同样要受罚！""对！"李尚樊的话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拿来了笔、墨、砚瓦和红纸条，大家都报名参加了减租会。李尚樊被选为主任；李均惠当宣传，任务是把政府法令给每家"言传"清楚；李自毛当组织，任务是管理会员。最后又在红纸条上写了四条规矩：(一)要减租也要交租；(二)不抢种人家的地；(三)不和地主订秘密条约；(四)开会要到，一伙出主张。

小李家坡成立了减租会，李尚樊就任这减租会主任。消息传到了各个村子，大家都打听怎样组织起来的。不到半个月时间，8个自然村里都有了减租会。

高起家坡的佃户，也要成立减租会，保长要李尚樊带我们去看看，同时也要李尚樊去"言传言传"明白。

我们跨过了冰冻的山溪，爬上一座山，再走三里地，才到高起家坡。山顶上，夕阳映射着收割了庄稼的黄松土，起伏的山峦，一直

伸展到无边的远方。李尚樊熟悉地指点，从这个山峁到那个山峁，以及四周无数的山峁峁："这都是二老财的土地，一满千多垧！"那末这些村上的人家呢？"一橛头的土地也没啦！"李尚樊对高起家坡三四十户人家，全都知道，他们都是二老财的佃户，所以李尚樊对高起家坡的减租问题，也同样关心："同是二老财底下的佃户，大家都得一致么！"

我们到了高起家坡，跨进了村主任高步肖的家，村主任忙着要我们上炕。隔壁人家的高瑞照、高禄凯也捧了饭碗进来，他们吃什么呢？竟使我认不出来，"这是受苦人吃的谷累，今年年成坏，打不下粮，二老财的租子又少不了一颗，咱们吃不上粮，就把谷累凑得吃。"我没听到过"谷累"，更没吃过"谷累"，于是我就从高禄汉碗里挟了一筷尝尝、除了几块洋芋屑外，那就是干燥的糠秕呀。

高瑞照、高禄汉都是二老财的佃户，他们早在等着有人来给他们提个头，成立减租会，村主任也同样想着，可是他一不知道究竟用什么办法搞起来；二说这个村上人员复杂，事情难搞。听说二老财已经准备好就要来收租，所以大家都在急待着。

月光透过山腰里的寒气，洒满每家的窑顶、打谷场、院子，人们披着羊皮袄朝着村主任家里走来，30多家佃户的汉子都来了。大家要李尚樊先"言传"一下，李尚樊把他已经说得熟练了的话，向大家说明了减租会的意思和办法，最后，对大家拍着胸说："今年一定保险，减租交租，保你有地种！"大家都懂得了，脸上露出朴素的笑容来。会议继续进行，要大家提意见，可是只听到几声轻轻的耳语，谁也没正式说话，村主任催促着："大家提意见么！"得到的回答，却是几声："没啦！"和静默，李尚樊打破了静寂："没啦意见么？就报名参加减租会！"于是：

"高瑞照，参一个加！"

"高禄汉，参一个加！"

"高步喜，也参一个加！"

“高均温，也参一个加！”

“村主任，高步肖你怎？”

“咱当然么，给咱写上个名儿！”

名字拥塞着向上报，写的人听不清楚了：“慢慢儿来，写了一个报一个！

“……”

“……”

纸上写满了姓高的名字，当中只有两个姓石的，是外来的石匠，他们并不是犁农，但石生兰说：“咱虽不是庄稼汉，也是穷人吆！加入减租会也可给大家讲讲话！”减租会成立了，村主任高步肖是主任，也推了一个“宣传”，一个“组织”，也言明四个规矩。

村主任对大家说：“没意见就散会吧。”但是满窑里的人并没有散去，有几个却又抽出烟管安闲地燃起烟来了。李尚樊跟他们随便“闲拉”了，于是正式减租会的“讨论”，在他们的“闲拉”中开始。

原来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刚蹲在我背后的高均耀，以及挤在人群中的高均明、高远，已经先走了他们几个，就是这个庄里的“复杂份子”。高均耀曾在军队里混过，偷枪逃跑出来，又当过土匪，去年抬高租子抢种别人的土地，现在和他的老婆俩口子，光景过得很好，在村里称霸作恶，没有人敢和他来往。高均明去年做二老财的假典户，把高均恩的五垧租地假典去租种了，他非但没有减租，还给二老财多加了五升租子。高远家里弟兄多，有劳动力，也好和地主勾结搞鬼，捣动本村别人的租地。这些人的事情，全村人都知道，可是大家怕惹人闹是非，所以那几个“复杂份子”在的时候，大家都不好讲话，生怕讲了出来，被他们透到二老财的耳里。他们走了，大家才你一句我一句的说了很多，而且意见也渐渐一致了：“复杂份子”不要他们加入减租会，并且要高均恩到政府去告发高均明。

最后的问题又集中到二老财了，这是有关大众的事，谁也没有放松提供二老财的材料的机会：去年他收租时光“拣嫩吃”，他只

说："不交足，好，明年你想种不？"这样，有的佃户就眼巴巴的让他全数照收了，也有的佃户去年和二老财"抬门板"就减了租，但一到今年，"减租"两字没人提了，二老财在夏收后，又赶了驴子来补收夏租，要不然，"给你挂上账加利！"有的佃户向二老财说："某人的地要减租，咱给你多交几升租子，给咱种了！"于是二老财就把原租户的租地转租了。……总结起来，二老财犯法案子15件。当夜决定：要减租会主任会同保长向县上告发二老财！

他们不知夜深，还继续抽着烟，"闲拉"着。月光落到山背后去了，他们才渐渐走散。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1日）

炭　窑

（1943 年 2 月 15 日）

这里是离开绥德 80 多里的一个产煤地区，当你沿着冻了冰的大理河，钻进一条静静的山沟走不多久的路，你就可以看到这幅炭窑的画面。

每天，太阳从东山直到西山，这里拥挤着做买卖的脚户，机关里的采买员，以及他们带来的骆驼、马、驴。阳光晒着一堆堆乌亮的煤块，人们都是为了它，整天地忙着，把它从 15 丈深的地层里掏起来，划上码子，运销出去。窑口上七八个绞把工滚辘轳声，“炭毛”们挥舞手臂为自己锤练劳动工具的打铁声，他们每人必须把尺来长的鹤嘴镢锻炼出锋芒，然后下窑去和炭石搏斗，而且，在下窑时，还唱着道情，下去后做 15 小时以上的紧张劳动。

在地面上，地层里，一个经常出现在“炭毛”中的 40 来岁的“炭毛”，他是个矮胖个子，和其他“炭毛”一样，从头发到脚根，全被炭沫涂黑了。他有时像煞有介事的正经，有时也发发脾气，可是大多数时间，他总是带着微笑。这个“炭毛”的名字，就是领导着四个炭窑 150 多个炭工的蔡子举。

无论那个炭工都说蔡子举是个好人，和他很亲密，夸耀蔡子举

是领导他们的工会的分会主任，是模范炭工，像是夸耀他们自己的光荣一样。可是当你问起他们：蔡子举好在那里？这对炭工们似乎成为难题，因为他们不能有条有理的说出来。有一次我请他带我下窑去参观掏炭。他试了我有否下窑的胆量，又鼓动了我的勇气，于是，他拿了一块黑得发油光的方头巾，替我包扎上了，再在额前头巾的线结上挂了一盏油灯，他自己也这样作好了，然后嘱咐绞把工人把我谨慎的摇放下去。蔡子举先踏上铁钩辘轳慢慢地滚动着，只见他头顶摇晃着的灯火，渐渐地缩小着沉下去了。

接着，我被铁链缚住腰节，两手擎着粗索子，也坠下炭窑，越深下去越热，人吊空在窑里打圈子，头有些发昏，十五丈深，得下好几分钟。

蔡子举正和底下的"炭毛"们打着哈哈："现在边区连咱们炭毛也吃开啦！人家这下窑来看咱们！"

窑底，木架上挂着两盏油灯，气候显然比地面相差两季，三个赤裸裸的"炭毛"，递给了我的"羊骨腿"，他们都显出谈话快慰的心情，他们要听老蔡讲什么：延安工人里出了个赵占魁啦！"炭毛"也要选模范啦！工会真是咱们的家呀！

他们在等着"溜溜"（炭壕）里推出煤块，上了筐让绞把工人绞上地面。窑底，好像蜂蛛网一样，四面八方都挖进了二尺来高的"溜溜"，每条"溜溜"之间也开了通道，作为空气的输送管。"炭毛"七人或八人为一班，轮流钻进"溜溜"去掏炭。蔡子举除了自己掏炭外，他还经常钻到每条"溜溜"去察看：里面石块有否危险性，工具是否需要修理，"溜溜"掏的深度怎样了。蔡子举像穿山甲一样，在地层里到处串着。

"看掏炭去！"于是蔡子举又带我在窑底钻进了二尺来高的"溜溜"里，人只能双手扶着推车伏行，头上的油灯成为唯一的向导，我们来不及谈话，气喘喘的直往里边推进，背脊不时和壕里滴着水的石壁摩擦着，灯火来回晃着，灯蕊上发出的油烟气经常刺进鼻孔，

约摸推了半里多路，我从红红的灯光里，隐约地见到“炭毛”们仰卧着，蹲着的在壕里，挥动锤子和镢子的掏炭姿势。从这里，你可以体验到“炭毛”们无比的劳动强度，可是蔡子举还对我这样说：“还得往里，一溜溜掏上五、六年才里多长，要到里边点不着灯火为止”！

老蔡提着油灯，指着这二尺来高的三层炭介绍道：

“这是浮炭，掏下来都是碎块块，这是腰炭，这是最好的底炭，中间的石块块最危险！以前大家忙着掏炭，没人照顾，掏空了炭，石块压下来就压伤人！”

另一个“炭毛”指着旁边一堆石块说：“现在不怕啦！老蔡总是照顾，顶石块和掏炭同样重要！”

我很不习惯地蹲在这气闷的地层里，但我仍然需要听取蔡子举讲着关于掏炭的劳动生活：他们现在有规则的被分配了每隔两天半下一次窑，每次的劳动收获，大约有1000斤以上的炭，合现在的批价可值850元（合市价900元），现在的生活显然比过去大大的改善了，原因是1939年成立了工会以后，由过去和窑主的一、二分改为现在的一、三分（炭毛得三成，窑主得一成），这使他们的劳动情绪提高了，现在一个“炭毛”每天的食量，就需要一升小米（三斤），上窑做了买卖以后，有时三五人“拼伙”到窑上的小饭店里去吃好的：面片儿，炖羊肉，蒸馍。炭窑上一切和过去一样。不同的是3年前“炭毛”们建立了自己的工会。

他们团结起来了，不要说为了抢工做或任何小事情而吵骂打架的事情没有了，就是“炭毛”之间，那个有困难病灾，大家都相互关心着，去年大水以后，有的“炭毛”就不能过活了，他们向工会领到了救济的粮食。戒除嫖赌吃喝，成了共同遵守的信条。

窑主们对大家比以前好说话多了。他们也相信虽则他们今天少分了一成，但是“炭毛”们生产量的提高，也直接在增加窑主们的财富。劳资间有些什么问题，经过工会调解，很快得到解决。比如那一次关于绞把上粗索子的事情吧：那条用了不少时间的粗索子，

快要断了，它已经成为每个“炭毛”每天上下炭窑的生命线。这是一件大事情呀！于是大家向窑主提出要求换新的。买一条那样长的粗索子确实是很贵（价值一千多元），因此窑主虽则没有说不给买，但总是拖拖拉拉的又延了一些日子，“炭毛”们于是不安宁了：“不下窑，看怎办！”工会派蔡子举跑去请来了窑主，共同察看那条粗索子的使用寿命，蔡子举以他 28 年（他 12 岁时，他的父亲就带他下窑做工）的经验来说明它已经不耐了，半年来绞上绞下的辛勤劳动，粗索子也显得苍老而蓬着鬓发了！他又以大家不下窑和窑主的长远利益关系，劝窑主赶快换上新的索子。窑主答应了，隔了一天辘轳重新滚动了，地面上地层里又继续着劳动的声息。

百余个“炭毛”们每月有着两次亲密的集会，大家讨论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炭毛”们已共同感觉到不识字的痛苦，以及炭窑以外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因此他们期望着工会上给予更多的教育机会。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 年 2 月 15 日）

讨论减租交租的时候

（1943 年 2 月 15 日）

李乡长是一位地主，秀才出身，又懂得医道，过去在这三不管的插花地乡上，还有他的威信，在这次乡选中，他被选为乡长。在一个月夜里，我进了这位地主乡长的大门，他忙着招呼我上炕，屋里只到了四五个人，我想到会的人太少不可能有什么收获吧！即时使我向李乡长发出了疑问："今晚的会就这几个人吗？"这一问却使李乡长着慌似的赶快派人去催促了。利用等人的时间我和一位乡参议员乐老汉拉起话来，乐老汉本来也没知道今晚开啥会，只是蹲在炕上吸他的旱烟。他回答我的话，是那样简单："伙种了十垧地，一家大小四口，去年打下高粱七石，分给地主三石半。"这里的租佃关系方面伙种比租种来得便宜，地主只出土地，此外一切种籽、肥料、牛工、人工都由伙家出，秋收后佃主对半分。像乐老汉这种情形，在这里是最普遍的了。我又继续向乐老汉发问："那样你家四口一年能吃得上吗？"他吸着旱烟，喷出的白烟，燎绕在他的白头发与白胡须之间，他用迟钝的眼光，望了望我身旁的李乡长："有啥办法，吃不上的时候，就用山药蛋子混了吃，再就是杂杂饭，喝稀稀，受苦人就是这样！"

"那么你不能向地主要求减租子么？现在政府规定的，像你这样的伙种，应当是四六分。"

"地主！"乐老汉看看我，又望望李乡长："今年四六分，明年可连地也没种了！"乐老汉虽则是个乡议员，可是这个时候，他连今天为啥开会，也还没知道。因此我就给他作了解释："政府为顾穷人生活，穷人能过活才能帮助抗战，过去这里插花地没人管，所以减租的事没做到，尔格成立了县政府，为的要替人民解决问题，今晚开会，就是要讨论减租问题。"乐老汉"解开"了我的话，但他又半信半疑的问我："好同志！真的能办到么？"我回答他是"今晚的会开了以后，就要开始实行了！""那好！咱今年得多出几升救国公粮！"

参议员、政府委员、行政村主任们到得差不多了，20来人挤满了李乡长的石窑。这里除了一位经建委员和一位文教委员也是地主外，大多数是佃户或租户。李乡长宣布开会了。上面发下来的命令和条例，李乡长因年老眼花，交给了另一位识字的年青人，请他朗读一遍，但是那文件是油印的，在摇曳的青油灯下，实在看不大清楚，又加上那人识的字并不多，朗读的时候就不免断断续续。等到他很吃力的念完后，大家都嚷着要求解释一遍："受苦人解不下念的啥，要讲明亮一点！"于是李乡长又站起来，他大概对这减租法令，已经研究透了的，所以他不用看法令，就背着解释了。可是在李乡长的解释中，似乎这减租法令，就是为了佃户而发的，法令里有几项佃户违法行为，李乡长却特别讲的那样响亮："有力量交租子的佃户，如果不按照规定交足的，要处罚，……"参加开会的人沉默了一阵，一会儿他们又都在一簇簇地开起"小组会"了，窑里充满了旱烟气、喧闹声。当时的李乡长，大概以为这个会就这样算完了，因此他宣布："有意见提出来，没意见就谈各村修桥派款的事情。"大家又沉默了一阵，好像一锅沸腾了的水，忽然罩上了一个锅盖。但那乐老汉说话了："今黑的会，不是讨论减租的事么？今年咱们这里的庄稼收成又不好，受苦人还要伙分一半给地主家，不是太吃亏了

么？尔格咱这搭也有了县政府，就是给咱们老百姓解决问题。“年时”（前年）都没认真减租，受苦人吃了亏。……”

似乎是放开了水闸，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抢着嚷起来了：

“马××给李家伙种对半分，还要给地主家担常年的水！”

“咱年时定租时就付给了租子，还有啥办法”？

“今年减了租，明年地主家不给种怎办？”

人们议论着，人们要求我来“言传”一下法令，我只好请乡长“再来一下”，于是他不安而勉强地念出了那一段来。

其中的一条也念了出来：“那一个区或乡，执行得不够，即由该区长或该乡长是问，若包庇自己或人家，则加倍处罚。”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2月15日）

马丕恩在召唤

（1943 年 3 月 17 日）

村边的杨柳已经发出淡绿色，山溪里的冰块也已经溶化而响着淙淙的流水声，和风吹拂着在阳光下闲话马丕恩的人们。春已到了，老乡们又将开始他们一年的辛勤了。马丕恩回家来了三天，已经给马家园子的人们播下了一颗心灵上的种子："到延安去过好日子！"劳动英雄的母亲刚送走儿子和四个乡亲到延安，她正在为 85 年来没有梦想过今天的日子而喜乐时，县务会的马主任特地从县里下乡来看她。

"进里边坐吧！咱恩儿今早动身去延安了，上头正等他去开大会呢！"劳动英雄的母亲摇动着她的小脚所支撑不稳的身体，笑开了没牙齿的嘴巴，她的耳朵显然没有听清别人讲的什么话，但她已经知道这是恩儿从延安带回来的光荣的事情。

"不，让我们在太阳底下拉话吧！暖和些。"

马家园子的人们，都知道了马丕恩的光荣，现在，大家都聚拢来了。这里有马丕恩的亲弟马丕功，堂弟马丕丰、弟媳妇、侄子们，以及他的叔伯们、乡亲们，小小的院子里拥塞了带着钦羡眼色的人群。让大家在院子里，听着和看着这位一县的行政首长慰问那位劳

动英雄的母亲吧！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呵。

马丕恩的亲属们，尤其是他的小侄子们，在尽可能挤到人群的前面来，要给说马丕恩回来讲的话，以及今天有四个人跟他走延安的事情。马丕恩这次回家来可忙啦！他从后村到前村，又从前村到后村，和乡亲们谈下南路到延安的好事情，他又要紧赶回延安参加给奖大会，所以急急忙忙只带走了四个人，昨天晚上刚到区上，今天一早就走了，带走的四人中还有一个女子，那是马丕恩伯父的儿媳妇，她要跟堂兄到延安去学杏儿的样呢！“这是咱们马家园子的光荣呵！”

“不，这是咱受苦人的光荣！”对呵，不知谁说了这句中大家听的话，可不是吗？从来受苦人没这样被政府抬举过，现在时势是不同了。你们听马主任的话多么亲切：老百姓积极生产，政府还要奖励你们。

阳光照着鲜红的锦旗，那是专员公署送给我们的劳动英雄的，他是“移民模范”，认字的告诉不认字的。巨幅的画像吸引穷汉们向往延安、向往南路，那里有土地，那里有好日子在等待着你。不必介绍了，大家都认识他，他就是给地主马润瀛家安伙子的马丕恩，前年他还是住在杨家沟大路边上一个烂窑窑里的穷汉，现在，让我们在他的画像前举行“河岔区马丕恩移民运动大会”。

坐下吧！300 多人统统坐下来，静悄悄地听继堂[①] 讲话。听他讲这新鲜的故事。不用怀疑，继堂是咱们一县的行政首长，他曾经是制毡的工人，他当过杨家沟的乡长，河岔区的农会主任、参议员，现在他是县务会的主任了，他是从我们人民中出来的代表。他知道这里的情形和老乡们心里的话。他要我们学习马丕恩，到延安、到南路去过好日子。

---

① 继堂，即米脂县务会马主任的名字，也是杨家沟人，因他在马姓辈数小，所以一般人家姓马的长辈叫他继堂。

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说："金屹崂、银屹崂、死活不离咱个草屹崂！"乡亲们，何必这样保守呢？草屹崂有什么值得你的留恋。受苦人自己可以去创造金银屹崂呵！南下一年后，包你置回新的来。你怕下去没有熟人而感到生疏吗？不会的，下面村子里我们绥米人可多着呢！他们早在下面成家立业了。再不会白费劳动和收获，会使你高兴，受苦人到处都是家，只要你日子过得好。你怕下面的老户欺负你或是怕你的负担会加重吗？不，决不，今年边府林主席和李副主席已经下了命令，政府要帮助你们，发动老户来救济你们，为使你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三年内的移民不收公粮。

"对"，农民马润华问道："下南路的盘缠怎办？""盘缠可向县务会去借，但是大家又觉得从区上到县务会又得多走一天路，那么决定向区政府去借。路上还有移民站招待食宿。"又有人在问了："下去后怎办呢？""那么你可以领了移民证去找下边（指南路）的政府帮你解决。你要土地、籽种、农具，如果你没有亲戚朋友帮忙，那么政府可以借你钱去买，分给你荒地，打下的粮食完全归你，既不要你交公粮，也再不要给任何人交租子了，而且开荒的土地所有权也归了你，下一分苦就是一分收获呵！庄稼种得好，政府还要奖励你。""那么咱还有三两垧自地怎办呢？""对，这些问题也要解决，我们可以在乡上组织个移民委员会由大家来照顾你的家属。你的自地可以租给别人。你可以安安心心的下去生产。""乡亲们，现在正是咱穷汉翻身的日子，大家早点谋虑谋虑吧，不然，南路的荒地也有开完的一天。这话也很对呀！如果到时候，你想要下去也来不及了，这只有使你产生无补的后悔，赶快想想定当吧！"

有的人在点着头，有的人盘算着本村上那几户可以走南路。他们完全理解了马主任的话，他们又注视到马丕恩的奖像和鲜红的锦旗。"对，咱家去好好谋虑谋虑，向马丕恩学习！看齐！"

冯山是马丕恩在杨家沟安伙子时住的邻居，现在和马丕恩过去的命运一样：租住着一孔烂土窑，婆姨娃娃五口人，就凭他一人

揽工来糊口，日子早已过不下去了。他的哥哥在延安做木匠，过年时回家来早就和冯山说过："马丕恩在延安的光景可美得呔！"

"呀！马丕恩走延安生活改善了！"冯山的心早被勾引住了，但是婆姨家总是拖拖拉拉的，还有什么舍不得娘家啦！还有冯山也没有下定决心。今天他俩参加大会回来，夫妇俩人一条心了。

"好，咱们决定走延安！"冯山夫妇邀我进了他们的窑洞，谈述他们未来的新计划：延安柳树店有着冯山的亲戚家，住的问题可以解决了，粮食也可以暂时借吃。和亲戚家伙种 20 垧山地，又准备开上 5 垧荒地，再向政府贷款添置些农具，10 岁的娃娃给人家拦羊，8 岁的娃娃在家照顾 2 岁的小弟弟。冯山的婆姨呢？她和一般的米脂妇女一样的细气，她还没有受过劳动的训练，种庄稼的事情显然不能够胜任，但是她自己也作了这样的打算：除了做饭和缝洗衣服外，在家纺纺棉纱，喂两口猪，这是能办到的，在院子附近栽上几棵果树，也是一点副产收入。这样计算下来，虽然顶不上马丕恩的生活，但比现在总强多了！

我们的眼前共同呈现了一幅美丽的田家乐园。这是理想的，但是劳动可以保证它的实现。

"妈，咱们到延安去吃捞饭了！"10 岁的娃娃放下了他的一碗稀糊糊，投进了他妈的怀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鲜明的印上了渴求吃饱的理想。

"到明年，你们可以丰衣足食了！"我祝福着冯山夫妇新计划的实现。并向他们告辞。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17 日）

家庭会议

（1943 年 3 月 17 日）

魏希文　田方

李树厚是郝家桥的一个佃户。今年一月，他响应政府号召，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生产。出席这会的，有他的大哥、四弟、侄儿，和他的婆姨、兄嫂、弟媳 7 个人。李树厚自己当主席，说："政府号召我们发展生产，家家都开家庭会议，计划今年的生产，今晚我们商量一商量，今年男的怎样种庄稼，婆姨家怎样纺线线。我们一家 12 人，弟兄四个，老三前几年参加了八路军，现在家中连侄儿还有 4 个劳动力，自地租地一满有 62 垧，还有大小驴各一头，小驴今年也能送粪了，大家发表意见，今年应该怎样来生产？"

老四叫李忠贤，听了二哥的话接着就说："今年开始我们 4 个人就分好工，一个擂粪，3 个人连驴赶上都送粪，送上几天后，如果地里壤气好，就两个带大驴耕地，一个人带小驴送粪。一个人点黑豆，点的黑豆地好锄，又容易着苗。如送粪赶上耕时，剩下一个人，就溜崖掏畔，假使壤气不好，就两个人耕地，两个人打圪垃，随耕随打，不打过，几天以后就费工，而且不容易出苗，要把土圪垃打碎才肯长苗，在春上清明前上午送粪，下午耕地，清明过后上午耕地下

午送粪。14岁的娃娃给我们送饭。”

老二接着又说：“我们的地年年腰崖掏畔，今年还有没有腰好崖，还要腰，每垧地上都要打水坝拨水沟，不让山水冲坏了庄稼，每垧地的崖崖畔畔都要作得尽尽的，不让拦羊娃娃糟蹋庄稼！现在我们的租地权有了保障，地作好，粮食多收，就是自己过好日子，今年我们62垧地，一定要增加出垧半地来，每垧地要作到增加细粮二升，这样，打上四十来石粮，除去出租交公粮，就能把日月闹美了！”

老大平时不大爱说话，现在也说起来了，他听了政府叫大家要把作务闹的细法，和多种棉花洋芋的号召后，很持重的说：“种庄稼要赶时，草要多锄，随下雨后就锄地，要把湿土锄到庄稼根根上圈住，这样就耐旱。今年60几垧地里，谷子10垧要全部按种，谷地都空翻过再按，这样，就不怕风磨，虫蛀，颗颗也能多打了！棉花去年补了一垧半，收净花15斤，今年要种3垧，要多上粪，多锄草，婆姨女子帮助打卡抹油条，收上它50斤，全家就足穿足用了！听说多种洋芋好，我们今年（指去年）种一垧，明年（指今年）要种两垧，一人就有5分多地的洋芋，收下洋芋省粮食，还能防防灾荒，洋芋地也要空翻过，多上粪，今年粟子锄五铲，棉花锄六铲，其他庄稼都锄四铲。”

老大的话全家都听进了，于是当场就具体分工：

老二本事大，捉桨耕地。

老大年较老，拿粪点籽。

老四力气大，腰崖掏畔打土圪垃。

侄儿年纪小，打土送饭拾净谷根。

还有，庄稼如果早作上，再抽出一人一驴出去运盐贩粮，赚些钱来作零用。

老二又主张入股和村里人合作推粉，抽出剩余的劳动力去帮助推粉担水。这样，就能多喂猪赚利，又多得猪粪上地，大家也同意了。

汉子们种庄稼的事情商量完了，婆姨们也发表意见了。大嫂子说："我们妯娌三人，过去作生活还有些不大好。比如不论大小生活，都一起来作，互相客气着，有些小生活上，你也动手，我也动手，就浪费了。所以我的意见，今年我们三人也要分下工。比如三个人作饭，每人一天轮流作，谁作饭，零碎生活也归谁作，两个小娃娃每天一早起，就把衣服给穿上，交给咱九岁的女娃引上。这样，我们就能经常有两个纺线线，一个作饭和零活，作好后也可以纺线，去年没分好工，三人只纺了 22 斤，今年这样计划好，就能纺上 45 斤，自家穿一半，给合作社纺一半，还可以挣到石几斗米哩！"

老四的婆姨说："对！咱们三个人纺 45 斤，一人纺 15 斤，大家打赛赛，看谁纺的快，纺的细！"

老二的婆姨也说："谁纺的多，谁就穿好，大家纺的多，大家都穿好，心里也痛快！今年我们妯娌三人，有两个会织，老四家今年也要学会织布，如果线子少的时候，两个纺一个织，线子多的时候，一个纺两个织，我们有三个纺车，一架机子，二个人织布时，就向人家借一架来使唤！"

三个婆姨都点头说："对！"李树厚说："今天的会开美了！今年我们的生产一定能闹的更好！"

会议就这样圆满的结束了。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17 日）

劳动人民的旗帜

——记警区模范党员、劳动英雄刘玉厚同志

郝家桥的人都说刘玉厚是个好劳动的人。是不是还有别的人呢？那末他们就会首先把刘玉厚给你介绍以后，再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的确，郝家桥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个二流子，全是优秀的劳动人民。而刘玉厚却是劳动人民中光辉鲜明的旗帜，他照耀着郝家桥射出劳动的光芒。

人们说刘玉厚的好处有：勤快、忠厚、俭朴、奉公、孝顺。

如果不大爱拉话的老乡，那么他就对你翘起大姆指说："反正刘玉厚样样都好！"但是大多数人，总爱告诉你关于刘玉厚的许多故事，好象夸耀他们自己的光荣一样。

刘玉厚的每垧地里上粪12袋（大垧——8堆——的上16袋）。但是粪堆在自家的院子里，而地呢？却是还在6里路外，于是他每天当东方发出鱼肚白时，就背着80多斤的粪筐送粪上山，要在这6里路上来回5次，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他才回家休息。如果统计起来，那么刘玉厚每天就背粪400多斤，来回60里地。因此，同样的一垧土地，他比别人总是多打"斗二八升"。刘玉厚的52垧土地中，除了10垧自地在村内以外，42垧租地尽是离

家这样远，难道他租不到附近的地吗？“咱要吃饭，别人也要吃饭呀！”所以刘玉厚总是租了些下南路去的，或是别人不要种了的门外地，宁可自己多下些苦工。这样才能使他“把打下的粮食吃到肚里舒舒服服的。”

在他的家门前，放着一大堆足够一间石窑的石头。这是他的长期打算，他准备日子过得好些时，就再增加一间石窑，因此就在冬里农闲时，到几里外去搬集了这一大堆石头，已经是两个冬的工夫了。石匠似乎是他个人的一种副业，他家里存着小米、黑豆、高粱等的石仓库，以及窑前平滑而整齐的石阶，全是他在农闲时的劳作呀！在冬里，他到西川炭窑去拉炭，从冰冻的大理河上拉两回。就足够他家全年的燃料，再不必上市场用高价去买炭了。他的叫明鸡似乎也和他的主人一样的勤快，天刚微明，他就把主人叫醒了。比别人都醒得早，刘玉厚就提着筐筐拾粪去了。只要稍微闲暇的日子，他就背上百来斤的干草进城去卖。反正，一年四季的白天，除了下雨（下小雨也要去拾粪）的日子外，就很难在他家里找到他。

1938年人们把他选上了郝家村的保长，他就担负起征收救国公粮的任务。他说：“这是咱们过新日子的开始啦！人家既然把咱选上，也就得替大家做些事情。即便自己没能力，也可以和大家商量行事。”于是刘玉厚就整天忙于公事——征粮了。郝家桥18石公粮的任务，最后还差几斗，刘玉厚就首先把自己原来应出的公粮（2斗）上加了5升。人家都说刘玉厚自己出的够多了，这几斗可以让别人来分配，而刘玉厚却回答人家说：“咱们等八路军来这里也等久了，尔格八路军来保护咱们，多出几颗颗算个甚！？”刘玉厚拿他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全村人们，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公粮任务，大家没有一句闲话，只说他办事公平合理。从这次办公事中，他体验到“和大家商量行事”以及“自己的模范行动”，就是办事成功的保证了。

那年当保长（即现在的行政村主任）不是脱离生产的干部，的

确是误工的“差事”，尤其在征粮时期，刘玉厚准备上山秋翻地，好在明年多打几颗颗。可是整天紧张地工作，白天是没办法照顾到自己，于是他趁秋天的月光上山翻地，直到午夜月亮下山时，才回家睡上几个钟点，明天一早，又赶办公事去了。他不觉疲倦地努力干着，从此，“刘玉厚打夜战”的好评，也在郝家桥传开了。

约莫干了半年多保长，第二年选举时，他又被选为乡议员了[1]。接着，减租法令下来了，“这就是给穷人谋虑能过日子的好事嘛！”于是刘玉厚给人们言传着“两个政府不同啦！这个法令就是给了咱们小米子。”他的话是那样轻快地流进每个人的耳里，并且也就成了大家的行动。所以郝家桥的减租，早在那年奠定了一个基础。直到现在，刘玉厚还是保地减租委员。去年腊月的退租（地主多收部分），以及郝进理家 5 垧租地，若不是他召集“大家商量行事”，那么今年早就被人家典去种上了。

刘玉厚以身作则，积极奉公，以及“和人家商量行事”的民主精神，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和尊敬。同时，他也不忘关心生产的积极性，刘玉厚是公私兼顾的。

绥德南关的小食摊很多，可是从来没有哪个小贩能把他所卖的羊肉饺或油糕之类的香味，换取刘玉厚口袋里的钱。最多，进城一天吃馍馍两个，如果他的干草卖不出去那就只吃一个够了。你说他肚小吗？或是他为人吝啬吗？那是冤枉他的，刘玉厚还有“大肚驴儿”的浑名呢！吃一顿够半升小米。村上穷人实在没办法的，刘玉厚也慷慨地帮人家斗二八升粮。他进城只吃两个馍馍，这是只好充充饥，回家来就和家里人一样有啥吃啥，他的俭朴是有完全正确的理由：“咱俩个老人受了一辈子苦，还没享到福，咱也忍不住一个人吃好的！”的确，刘玉厚是个孝子呢！63 岁的父亲眼看他勤劳艰苦地奠定了家业，弟兄三人也和爱相处，集体劳作，从来没吵过一次架。几年来的减租，使刘玉厚置进了几垧地，增加了 30 来垧租地，自家原喂的一头老驴外，又和人家合喂了半头牛。3 年来，刘玉

厚又给他的大弟弟成了亲，他的大儿子也娶了媳妇，一家就此兴旺了，老人家的晚年，也更得到了慰藉。

这个以刘玉厚为首的劳动家庭，一家人都终年不息地跟刘玉厚一样的劳作着。老母、妻子、弟媳、女儿，他们的劳动力发挥在纺车上和捻线锤上，缝新补旧的衣着上，烧饭煮水的饮食上，以及猪鸡狗猫的照顾上。二弟刘合厚今年24岁，整天跟刘玉厚一起背粪、扶犁、播种、打土坷垃，14岁的三弟长厚在家拣籽、擂粪——把粪擂成细末末，然后才上地——上山送饭送水。15岁的大儿放养10只大羊、7只羊羔，还拿了小镢头顺便砍柴。就是刘玉厚8岁的娃娃，也提了小筐筐沿路拾粪了。他的老父亲去年还上山种地，但在冬天把腿跌坏了，现在只得呆在家里，可是他仍凭他健全的两手帮助轧草，修理农具，老人家看到全家人都劳动，以及他自己的劳动习惯，也不管儿孙们的劝阻，而以"动动手"为其乐事。

刘玉厚今年计划在他的52垧土地上，要深耕7次，每垧地（谷地除外）要上粪12—16布袋，锄草3—4次，谷子地要改撒种为按种。要溜崖掏畔，他从各方面来想法，要增加5石粗粮。即使他的租地离家这样远，也必须尽量发挥他的劳动热忱。他高兴着三弟大儿快近成人了，劳动力将增强起来。今年多打了粮食，那么家里的老驴不顶事了，就需要换上一头草驴，和人家伙喂了半犋牛，也要改为独喂，这样52垧地的务业可以更细致，粮食也可以更多打些，今年秋后村上还有一批人下南路，他们的地还可以分租几垧下来。家里婆姨们要增加一架纺车、一架织布机，妻子今年要学会织布，使一家人自穿自织，犁铧要换新的，鸡娃羊羔多下几只。这些目的达到后，门前自己背了两冬的石头，也可以雇几个匠工把新窑砌起来。

刘玉厚快踏进丰衣足食的日子了！

刘玉厚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朴素的劳动人民。你看他在那天晚上参加的"好劳动人会"吧：刘玉厚蹲在黑角落里，一满没言语，

众人都在嚷着："唯有刘玉厚才够得上劳动英雄的资格，"于是刘玉厚被拥到炕上来坐，人们嘈杂地赞颂着，上面下来的同志还拿了笔，问长问短地记在本子上。"这是干什么呢？"刘玉厚从来没有准备好来应付这样的场面呀！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就是人们所要学习的模范，他的额头淌下了汗水，平时他坐惯的炕，这时也显得别扭起来。

在第二天暖和的清早，太阳刚刚冒出山顶，支部书记带了刘玉厚来见地委习书记，刘玉厚是多么兴奋呀！习书记对于这样一位优良品质的劳动人民产生了高度的热爱，在他还没有知道刘玉厚是同志以前，他就那样亲切的发问了："你是共产党员吗？"

"咱是！"刘玉厚笑裂了嘴："呃！你是住在'九真观'一地委住处一的习书记？夜黑里你们来时，咱一满没知道，刚劳动回家，人家就催咱来参加开会了！"

习书记的目光，集中在刘玉厚身上了：

"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们党就更有办法！"习书记拍着刘玉厚宽阔的肩膀，然后又紧握着刘玉厚带着泥尘的粗手。

"咱什么也解不吓，只解下受苦，党要咱们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嘛！"刘玉厚是那样朴素，但又这样坚决地拥护了党的号召。绥德县委书记在郝家桥生产动员大会上，向着全村劳动群众，公布了：

"刘玉厚是共产党员，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现在共产党要老百姓过着丰衣足食地好日子，大家就可以向刘玉厚学习！"

但，大多数人们几乎近于迷惑了，可是又恍然大悟了："呀！刘玉厚原来是个共产党员，怪不得他是这样一个好人，咱的确该向他学习呀！"

郝进理睁着圆大的眼说："咱和刘玉厚同住一村几十年，到今年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那年咱们在保政府一起办公事的时候，咱也就早觉得这人好的恶[2]！"

(1)当时的选举，老百姓和村干部都认为改选就是“轮差”，所以第二年选保长时刘玉厚被选下，但因人好，又选作议员。

(2)“好的恶”即“好的厉害”或“好的很”的意思。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 年 5 月 18 日）

农作法的模范

记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张家圪塄农作法

（1943年5月19日）

田方　汪洋

改良农作法及提高劳动热忱，同样是发展农业增加粮产的主要条件。延家川为本县农作法最好一区，而该区二乡张家圪塄，尤为全区之模范。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及宣传部长汪洋同志二人，特赴该村搜集材料，以便供各区具体领导生产的参考，此项材料现已整理完毕，县委决定于5月整风前，派县级大部分干部再度下乡具体领导生产，拟定该村为本县之生产模范村，号召各地向该村学习。兹将张家圪塄之农作法介绍如下：

一般情况

从绥德东行80余里，地势渐高，到张家圪塄之最高蜂，即可望见60里外蜿蜒的黄河，及晋省之吕梁山。全村除623垧山地外，别无平川地，土质并不肥沃，但是土地革命后，由于农民勤劳细微的

经营，产量逐年增加。全村共56户，278人，内劳动力60人，半劳动力20人（平均每个劳动力可有耕地9垧）。由于各种形式之劳动互助，细心务业，按去年平年年成，全村共收种粗粮511石5斗，平均每垧地打8斗2升（去年绥德一般收获量为每垧地打5斗左右）全村除负担公粮19石细粮外，平均每人尚余有粗粮1石6斗（其它洋芋瓜菜等尚未计算在内），村中张满忠、卜安仁等9户的收获量尤多，计每垧地可打粗粮一石，而收获最少之卜云福每垧地也打了5斗。“劳动不好收获少”已成为他们的耻辱，二流子更无法立足，全村男耕女织之劳动热忱亦不亚于分区生产模范村郝家桥。村民张满忠、满孝、满圣等，虽年皆60多岁，仍如年轻人同样积极生产，现该村中农成份已占80%以上。

农作法

当进入该村耕地范围时，即可望见与别地迥然不同之新气象，劳动人民已在改造地形改变地质之阶段，凡各地各种不同的农作法，已成为他们“艺术品”的制作荟集一地了，全村土地犹如一座精制的农作法展览室。

一、摇崖——将陡崖摇成斜坡，除增加耕地面积外，且崖土肥沃可增产量，他们说：“生土好比年轻娃，又能吸雨又劲大。”据谈：摇崖生土要注意安排，第一年要多上粪，大大充实滋补地力（如小孩奶量充足），先种荞麦、蔓青、老麻子，因此种作物易在生土长出，如此第二三年不上粪亦可，无论种的任何作物，可保两年吃饱饭。

二、拍畔——在山坡底垫土作畔，离地面高约二尺，沿着弯曲的山崖地形，到处可见齐整光流的地畔，畔面边沿呈高圆形，除防止山水下冲外，且能将山上冲下的肥土积储，可使庄稼长得更好，远望犹似嵌在山崖的镶边。

三、打坝和控窖——这是防止山水下冲时冲坏耕地的办法，凡

山地水道，从山顶到山底，均筑有约二尺高五尺长的土坝，或挖下四尺深的水窖，可使山水缓流而下，错综整齐的点缀在每个土山的水道上，像战场阵地的工事建筑，抵御着破坏耕地的敌人——山水下冲。

四、按种——这是他们久已习惯的作法，在他们听到撒种的作法时，已经视为惊奇的偷懒法了。这和别地所说："撒种易见苗，按种收不了！"成为相反的理论，但经验证明，一垧地的按种，就比撒种多打三五升。他们不嫌麻烦地在山地的斜坡上，用撅头一个个挖着交错的"钵钵"。这样，长苗不乱，锄草容易，而且按种生根结实，不易被风刮倒，吸肥力强，粮食也就容易多打了。

五、深耕——他们说："五谷吃土，越深土越厚，好劳动，一定要深耕六寸土。"因为他们熟悉：深耕一寸耐旱五天。对别地所说深耕生土不长粮，他们也认为是偷懒的说法。他们的经验证明："不是深耕生土不长粮，只怪土块没碎晒太阳。"因此他们深耕以后还把土块打碎晒太阳，让土壤吸收阳光，能暖土耐寒。

六、锄草——全村最少锄四次，五次六次的现已有13家，甚至有的还用手拔，因为手拔可连草根拔起，可抵三次锄草。他们说："天旱要锄地。"这话并不是说雨后不锄地，而是除了雨后锄地固然重要外，天旱尤其需要锄地，因天旱地里水分尤为可贵，莠草锄去后，可使水分更能为庄稼吸收。他们明白：多锄一次草多长二升粮，至于锄草时配合扎苗，圈土，更是他们必然的劳作。

七、施肥——由于该村牲口不多，离大路较远，所以畜粪较少，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施肥，尤其是高粱地、洋芋地、棉地，每垧地都特别加施几斗黑豆，煮熟后作为肥料，因为已早得出"花去一个本，赚足三倍利"的事实结论。

八、翻秋地——在夏田收割以后，一般的都空翻一次，有几家还翻两次（而别地连一次也不翻），因为他们的经验证明："翻与不翻，4垧地的收成相差足足有一担（石）"。甚至还有个别农户，先用

老镢掏，普遍扬粪以后再空翻，这更是别地少有的作法了。

九、早耕，按时下种——首先举一个例子，即可证明他们对农时的遵守了：占全村土地五分之一的夏田，他们都在清明节以前全部耕作完了（别地一般的夏田都在谷雨前种完，早晚时间相差半月），因为夏田如果不在清明前种完，就会影响到秋地的细作。

介绍老劳动英雄张满忠

张满忠，现年 61 岁，父亲时代家里连一块擦屁股的土都没有，凭本人 14 年的揽工，勤劳节俭一直到现在已有 23 垧地。凭着他老劳动和 21 岁的大儿子，全家八口人都个个丰衣足食。去年庄稼瞎了，他家地平均每垧九斗。今年除了多种一垧棉花外，秋夏田还和去年差不多。预计如果今年是平年，每垧平均可打一石三。

今年他给他的儿媳二斤棉花，让她自动“倒转”（“倒转”，即纺线买花循环流转的再生产），总之要供四个人穿，年底需要 1000 多元的染线也要赚出来，他的老婆年时纺了 25 斤花，今年让纺 30 斤。

他的负担是村里的头层层，占全村十八分之一，从来没有迟交过一个时辰、说过一句怪话。

村里人家婚丧大事，一“求奔”他，他都乐意相助，但对自己“上义合镇三十里地，没买过一个饼子吃”。他在清明节的早晨，被选为全乡劳动英雄，他笑咪咪地说：“劳动也当英雄，活了一辈子啦这是稀奇的事……”但当笔者询其与刘玉厚和后生挑战，比赛作务庄稼时，他笑着说：“这咱能办到，多打粮食，公私都好，有我一天，我就劳动一天。”

他还有一个小儿子，今年才 11 岁，但劳动的事情都已解下了。笔者与其父拉话，他在旁边插嘴，话都很中肯，在行，这不能不是老头的教养之功。老子说：“遭下我这老子你不得闲吓”；儿子弄抚着

衣角说："劳动就会过好光景！"

向后生们挑战

——老英雄张满忠的挑战书

我虽然是个61岁的老汉，但作务庄稼我还不服气青年；凭着我50年劳动的经验，我满有信心和你们比赛三年。

我有什么本领敢这样自信呢？

一、"我能苦干，拉长干"：两半夜[①]不睡，一刻钟也不闲，别人一垧多打五升粮（细粮），我打一斗不慌忙。

二、"全靠我巧安排"：用粟子圈成墙，防止排牛牛伤高粱。阳背地调整清，早迟田分得明。

三、"把地当儿子来务艺"：土翻六寸深、草锄多次，拍畔、摇崖、挖窖、打坝……。一块地都不让它瞎。

纺织，植棉，副业生产，我另有计划。

如果你们敢应战，信交报社给我转，今年7月派人来参观，我招待你们吃白面。

张满忠

张家圪崂村民公约

一、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

二、不吸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

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

四、多上粪，仔细按，人畜变工，大家方便。

---

① 即前半夜人家回家休息了，他还在地里劳动；后半夜别人正在熟睡，而他又上山生产去了（背土、担水、送粪）

五、秋地翻，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
六、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疋，自织自穿。
七、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树木，不许遭践。
八、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
九、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也暖。
十、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
十一、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
十二、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众惩办。
此公约已交该村识字班熟读，并打算写在粉白墙上，百姓熟记
（非土地革命区可添一项减租问题，其他项目则普遍采用。）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 年 5 月 19 日）

心　声

（1943 年 8 月 16 日）

“吃吧！吃吧！这是咱们刚打下的新麦面，这是咱们自己做的酱、醋，这是自己榨的青油，这是刚炒下的芝麻，这是……同志，吃，吃，别客气！”郝进秀老汉端着一满盘的面片儿和调和，喜裂着嘴，满心欢喜地招呼着。

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刚从地里收夏回来，各人背上一大捆麦子放到麦场上，郝老汉正在擦着汗，他的孙子就跑来说：“爷爷！爷爷！今儿上边公家人下来，在咱村上说现在顽固分子又要打边区了！郝老汉是早知道这件事的，他在前天到合作社称棉花时，就听说现在时势又紧张了，但是，八路军已经坚决表示要武装保卫边区，保护边区老百姓。他的心也就宽下了，不过有一种说不出的仇恨和怒火，总是冒在他的脑里，不知道到那里去发泄才好。两天里，他老是教训他的儿孙们：

“还不操心动弹！想想咱们的日月，是那些人给咱们的，再不操心动弹，还对得起公家么！？”现在他听得有上边公家人在村上，马上吩咐他的儿子们打场，又立刻叫媳妇们把刚碾下的面粉赶起面片儿来。自己跑到村主任那里，要求请今儿上边下来的公家人到他

家里吃饭。

现在，丰美的一餐，好像一家人会餐似的满饱地结束了。郝老汉拿来了两支亮闪闪的铜旱烟管，点上了灯台后就燃起旱烟，他已经抽了几口烟像要拉话的样子，但又不知从何谈起。我只是向他这么随便提了一句："郝老汉，你家的新麦面比城里铺子里的面还好吃，软软柔柔的；调和也美的很！"

郝老汉立刻好像得了什么启示似的，他捋着胡子，会意地笑裂了嘴。

"呀！好同志，这还不是你们到了这里后，给咱们吃的么？！"

这话使吃了老百姓好面的我很不好意思："咳，老郝，这是你们自己终年劳动得来的，怎么是公家给你们吃的呢！"

于是，老郝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从过去说到现在，从陈旧的痛苦的回忆，说到现在美满的日子，他的心里是充满了对于压迫了他几十年的白军的仇恨和对于使他翻了身、抬了头的八路军的热爱。

"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每年打下的麦子就不是庄稼人自己的份儿，夏租起码去掉一半；头年秋颗颗（秋租）没交完的，收夏后再补交。再，收夏前青黄不接时，早就把麦子抵了去借高粱黑豆来吃完了。这样，辛勤的收夏、打场，打下来的麦颗颗尽是别人的了，同志，你想还有咱们的份么！？"庄稼人只有种麦子的份，没有吃麦子的份呀！同志，你解开么？那个时候，咱们受的是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食，咱的苦劲儿，齐给他们榨完了。租子是年年交不清的，从朝廷，衙门，直到民国时代，一个模样。咱老子替人拦羊、揽工租地种，生下咱弟兄五个，劳动的人一多，勉强买进了几垧自地，但是家业大了（人口多），婆姨娃娃尽是吃饭的人，租子交不够，两年三年又把自地典卖完了。咱老子死下来连一镢头埋身地也没啦！唉！同志，在过去，租子还要送到财主家，背得满身酸骨溜溜，财主家连一顿饭也不会留你吃，这倒还没什么，要是租子交不清呀！财主家的掌柜下来讨租时的神气才吃不消，那些人也穿的洋袜子，双梁鞋，拿了

棍棍棒，到你家里来眼睛乌溜溜，东张西望，有粮盘粮，有牛拉牛，没牛拿镢头，要不然，明年的地就撩手。同志，还有怕人的事儿，穷人最怕打官司，坐牢监，这些事儿使咱穷汉误工，损钱，又伤身。咱永世没忘记：还是咱老子手里，向城里马财主家借了两吊钱，隔不到几年，连本带利就要 30 吊，咱老子有什办法呢？官司打到县衙门，人家马财主是个秀才，有钱又有势，在县老爷那里说上几句，衙门里传差的就下来了，打发了酒钱，拉到衙门里，县老爷就拍案打骂，非迫着偿还不可，咱老子卖地典窑，总算还了二十吊，事情暂时搁下了，可是剩下的十吊钱呀！又害了咱后代，已经是民国年间了，马财主的儿，又拿了帐本本到县政府里告了咱一状，和咱老子时一模样，咱坐了牢，给了白洋，可是这笔帐还没勾销。唉！咱早曾谋虑着：咱们庄稼人总是没法翻身了。

“是民国二十四年吧！咱听说闹起革命来了，崔家湾、义合这些地方都闹红了，咱满心等望闹到咱这搭里来，可是那些白军把咱们拉去修寨子，就在咱们后沟沟的山峁上，把刘实的 19 垧好地一满糟踏了，年轻后生们逃的逃了，跑去当红军的当了红军。剩下的老汉娃娃，也被拉了去受皮鞭，吃耳光，白军把咱庄上烧完了吃穷了，他们什么也不管就走了。狗孙们的恶运终于到了满盈的日子，咱们的救星共产党八路军来了。”

郝老汉结束了他过去痛苦生活的追忆，又燃上了旱烟管，舒展了紧锁的眉头，多皱纹的脸上，呈现了老境中得到幸福的欣慰。他尽一切力量要想表达出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激。

“同志：咱庄稼汉拉话满没头绪，一讲起，总是从自己受到的好处拉开来。可不是么？你给咱谋算一下看：咱原先租种的 30 来垧地，欠下的旧租不要说，就是年年打下的也交不够租子，可是你们一到这里，第一年就实行减租减息，民国二十九年前欠租一律免交，先把咱后代的担子卸下了，咱老子手里欠下的马财主这笔老帐，也全部勾销了，同志，咱真是浑身轻松的，各家大小都谢天谢地

谢八路军。第一年的租子虽没减缴，咱也少交了三石几，冬里就给咱的二小子引过了媳妇子；第二年四六减租还帮尖，咱少交了四石几；咱就买进两垧，又典进了四垧；去年对半减租下来，咱又买进了三垧，还制了三套新棉袄。现在一共就有了九垧不要交租的土地了。去年咱把五垧高粱黑豆地改种了冬麦，今年打下来平拉四斗多，公事上规定"秋田改种夏田不交夏租"，因此咱除卖去几斗，称几斤棉花来给婆姨家纺花织布外，就藏起来留下自家吃了。同志，你说这些不是你们来了给咱们的好处么!？好同志，现在咱们穷汉才算有了翻身之日，咱在谋算再隔三五年，像咱这些人，就蛮能自种自吃不求人了。现在咱们穷汉也是眼睛有了光彩，眉头挺开了，也能抬起头来见人说话了。咱实在欢心的过余啦，早想找个上面下来的同志拉场知心话。

郝老汉实在是兴奋了，他捋着胡子，躺在炕上，闭了眼睛聚了一会神，追索着旧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而现在却是新鲜的现实，他要告诉我，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的感想。他现在被选为参政员，他的侄子是乡长，前村一个曾经是替人拦羊的青年后生，现在也当了村主任，他们经常在一起互相讨论着村里的工作，办理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今年更为了发展生产，他也忙着订农户计划，组织变工队，现在，他虽则已经是五十开外的老人了，可是他仍像壮年人一样，天天和他的儿子们一齐上山劳动，因为他知道："现在多劳动一份，就是自己多收获一份!"

郝老汉的眼前刚掠过那些凶蛮的白军，他又联想起那支老百姓的队伍——八路军来了。

"你还能说出天下再有像这样好的队伍么!？黄河线上守了六年，没有让日本鬼子过来一个，咱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他们保护了咱们，他们拼了性命，还要自己劳动生产，咱们这里地少人稠，满没荒地，但是这些弟兄们把咱们几代没开过的"屹连连，屹崂崂"（小块土地）也都种上了，只要能长草的地方，都给他们种上了美美

的瓜菜，还有捻毛线啦，打毛衣啦！赶牲灵啦！背米背炭，一满自己动弹，这都是减轻咱们负担么！还有，咱活了这么大年纪，也从没有见过，去年有一班队伍下来，就帮助前村收割了百来垧庄稼；今年政府号召种棉，前村上的老百姓“冒种”了好几十垧棉花，他们满没种棉花的经验，可是队伍上一下来，就帮助锄草的锄草，打卡的打卡，现在花儿长得可美啦！同志，那里有这些好队伍？又能打仗，又能作庄稼，作的比咱庄稼汉还在行！同志，咱总算没枉活这大把年纪，后辈儿更能享福了！

“好的事儿可多啦！咱满没记性！”郝老汉在思索着。的确，这三年多来由他亲自经手的，亲眼看到的或亲耳听到的好事太多了，尤其他当了参议员以后，经过他参加讨论和亲手办理的事就不少。比如今年春上集股开办合作社的事情，他解开了上边下来的同志讲的道理后，不用说他自己的股金，就是他这一议员小组内的12户人家，也都被他鼓励得“利利洒洒”的交出了股金来。人们都相信他，说他是解下理性的公正人，这村上无论是老汉、后生、婆媳、娃娃，总是说“咱们的郝老四——郝四叔或四大做人帮尖，说话有理，办事公道。听了他的话没亏吃！可不是么！现在的合作社办的可好啦！婆姨女子们四五天纺上一斤特等线，就可以挣到四升小米了，好纺手一个月挣上斗几升、两斗几都没问题，合作社一办，咱们一个婆姨女子也能养活一个两个人了，这都是咱公家办的好事呀！

郝老汉除了平时和村上人拉拉这些事情外，从来没这样一起把这些事情有条有理的讲过，不过熟悉的事讲起来也很乖，没有需要他费什么周折考虑，可是，接着这场知心话以后，谈到顽固分子进攻边区这件事的时候，郝老汉脑海里便涌上了沸腾的义愤和无名的怒火。他没多说什么话，他只是睁大了圆圆的老眼，捏紧了多茧的老手，迸裂出他对于那些凶手们的愤恨，慈和的郝老汉立刻变成了似乎要撕裂那些吃人野犬的斗士，他眼前闪烁着几十年来的牛马生活；三年多来抬了头的翻身日子，而现在：“这些家伙们又要

想来糟踏咱们吗？他们又要想把咱们拖回到过去的日子吗？”郝老汉想着，想着，再也想不出顽固分子们的恶心肠是为了什么。

“共产党救了咱们，八路军保护了咱们，边区老百姓过了好日月，这些家伙们就看不舒服吗？”

“让他们来试试吧，咱老汉就不放过他们！”郝老汉又在追忆他过去所听说的：“红军游击队光凭矛子、镢头也要闹起革命来，而且还要赶跑那些白军。现在八路军从日本鬼子手里把洋枪大炮也夺了不少过来，咱们老百姓虽不能打仗，也能给部队送粮送草，担饭送水，站岗放哨。现在咱们有吃有穿，有枪有炮，还怕他们么！？”

村子上响遍了保卫边区的吼声，自卫的红缨枪擦亮了，大刀磨快了。

19日在绥德举行了万余人的抗议进攻边区的大游行，郝老汉拿着“誓死保卫咱们的边区！”的大旗，走在游行的队伍里，他是那样兴奋，那样坚定。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8月16日）

公共卫生训练班的学习

（1943年8月16日）

5月间，由于当时任务的迫切需要，卫训班很快的聚集了19个学员，开始第一期训练，学员们都来自边区各部队的卫生机关。他们中大多数有了10年以上的革命历史，是有丰富经验的部队卫生工作人员。但是，出于平时片面强调技术训练，长期的忽视了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以致他们中有许多同志虽然掌握了医疗技术而不能诊治自己的思想病，19个学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思想上非常混乱。

李志中同志说："我开始对于这批学员，实在感到头痛。"但是总卫生部苏部长告诉他："你能够把这批学员领导得好，以后工作就容易做了。"于是李志中同志就抱着信心接受了这个任务。

根据创办的目的："改造学员思想与作风，使之高度发挥全心全意为士兵及群众服务。"开始是在5月开班日时即布置了党章学习，总的精神是强调从实际出发，以毛主席思想分析个人思想的毛病。但是两个星期过去后，并没有得到好的反映，有的人说："党章内容大致翻了一遍，这些道理都懂得。"有的人说："毛主席思想终究是毛主席的思想，那能每个人都成为毛主席?!"落后的学员互相

以感情拉拢形成小集团讽刺积极分子，一时歪风压倒了正气。

总结两周初学的经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思想上有着严重的毛病。而在领导学员的方法上，干部没有参加到学员小组去一起学习，没有及时告诉学员的方法。因此每天规定的党章学习时间内，有的下棋，有的阅读技术书籍，有的索性睡觉。

5月21日开始学习土地政策，但很多学员们总觉得卫生人员与土地政策无关。李志中同志便联系党章总纲中关于农民的基本问题，参考毛主席著作《湖南农民运动报告》和《共产党人发刊词》，利用晚上时间给大家讲解中国革命的动力，革命长期性，土地改革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意义等。学员们听了觉得很有兴趣，有人参加革命10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道理，于是大家热情地展开了讨论，每个人脑子里常为个人打算的时间，被那些革命道理占有了，他们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吹了熄灯号以后，还躺在床上谈论目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许多人回忆他们幼年时被地主压榨得贫困的家庭生活，以及抗战中他们在敌后艰苦的斗争，于是大家都感到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解放日报第二版也爱看了。过去曾经认为农民斗争地主是反常现象的文印员（富农成份、教员出身）现在也懂得站稳革命者的立场去看农民了。

20天土地政策学习后，又接着进行反贪污腐化的教育。好几个学员曾经犯过这个错，但是他们一贯毫不在乎，甚至拍桌子拒绝反省。李志中同志又以《甲申三百年祭》及《太平天国》中的故事给学员们讲解。有的学员开始体会了自己的毛病，但又觉得不大好意思当众说出来，甚至有的自己觉得毛病严重而要求进党校去好好学习。李志中同志便以他在总卫生部学习党章中被批评及自我批评的经验告诉大家，秘书朱朝政同志也以身作则地当众反省他过去享乐主义思想的危险性，在干部带头影响下，有的学员便开始反省自己了。

8月中旬，上级又委派鲁生同志去担任协理员，加强政治学习

的领导。徐老、苏、傅院长、周泽昭大夫、联卫教育股王股长也给大家作了几次报告。根据学员们的思想动态，提示他们改造思想的重要，学员们制订了学习计划，并发动了友谊的学习竞赛，鲁生同志经常找学员们个别谈话，告诉他们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在学习《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一章时，叫他们对照个人参考《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的修养》。于是每天相互间严肃认真的检讨与批评代替了私人感情拉拢的小集团。小组会上，有的人愧感交集地淌下眼泪，有的人听了别人的反省而涨红了脸色；甚至在静静深夜，静躺在被窝里痛恨以往的过失，考虑着目前应该如何努力学习，今后应该如何全心全意为士兵、为群众服务。

他们都进步了。感谢着领导上的帮助。但正如李志中同志和学员们所说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这仅是个开始，真正的，彻底的改造还在今后行动中。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 年 8 月 16 日）

移民问题

（绥德分区模范村郝家桥调查之四）

（1943年11月15日）

一　过去的移民情形

几年来，郝家桥走南路的移民，已经有23户了。过去，他们没有土地，他们没有办法在家乡继续生存下去了，他们是雇农、赤贫者，单是一个具有劳动力的光身汉，跑向南路去创造他们新的生活。就由今年春季经过移民运动中宣传动员而走南路的8个移民来看：郝进智、郝思动、郝锡富、郝光勤、郝光竞、郝进堂、郝锡伍、王加有。他们过去是靠揽工为生的雇农，其中除郝进智有一垧多自地，别人都没有土地，8人中除郝进智、郝思动、王加有3人已有妻子外，其余5人就都是光身汉了。又从刘家渠（郝家桥三个自然村之一）侯姓13户的材料来看：其中因无土地早已走南路的就有7户，到西川揽工的一户，留在家乡的只有5户了。根据过去郝家桥的移民情形，从中可以看出：凡是没有土地的雇农、赤贫者，就应该

是移民的主要对象。当我们发动移民时，这些人最容易接受我们对他们的宣传动员。下面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比如，仅有一个妻子和半垧山地的雇农侯裕康，当他替人家打了几回短工，又把自己半垧山地种上了洋芋、南瓜，奶了粪，打好卡，锄了几次草以后，他就背上铺盖和老镢头，到西川老君殿替人揽长工去了。当我们看到他这种情形，就向他劝说，到西川去揽工不如下南路去开荒好的理由后，他仅仅提出没有下南路的盘缠，和妻子在家的生活困难问题。于是我们帮助他借了250元路费，并且介绍他的妻子去合作社领花纺线，每月也可以挣到斗几升小米。问题解决了，侯裕康就毫无顾虑的走向南路去了。

上面所说的移民下南路后，当然是增加了地多人少地区内的生产生力军，同时对移民本身，也取得了迅速发展他们经济的基本条件。但是在地少人多的绥德分区来说：这些移民南下后，对于这里的“地少”问题，还没有起什么 作用，因为他们原来就没有土地，或是很少土地的人，他们下去以后，这里的土地仍然是分散在许多农民手中耕种着（这“分散”两字是指的土地使用权的分散，而不是说土地所有权的分散），绥德分区的人口和土地的比率，还是一与二之比，就是以耕地面积相当多的郝家桥来说，每人平均只有三点一五垧土地（全村土地2137垧，677人），这也就说明了这里“人多”的问题，还需要以“大量移民”来解决。同时，在地多人少的地区无数荒地也是需要“大量移民”的劳动力去开垦，如在郝家桥全村，单靠揽工为生的雇农几乎是没有了，那末这“大量移民”应该移谁呢？那些人应该作为移民呢？因此，这一步调查和研究移民的对象，便是“大量移民”的初步工作了。

二　移民对象的研究

根据前面所讲，在尚有雇农存在的地区，当然仍以他们为主要

对象，但在郝家桥这样地方，雇农已经没有了，那末移民的对象，就要转向贫农方面了。但是贫农中也有上、中、下的分别，由于他们经济条件的不同，因此就不能把整个贫农阶层，都作为移民对象。我们从刘家渠的 20 户贫农中（该村共 27 户，尚有小地主一，富农一，中农五），以 6 户三种不同的贫农来看，他们是否可以作为移民的对象：

贫农阶层	姓名	劳动力	人口	耕畜	土地				共计土地	每人平均
					自地	死租地	活租地	伙种地		
上	刘排厚	三个半	十三	1	一〇垧	一八垧	〇	三六垧	六四垧	四．九垧
上	刘永山	一	四	3/1	四	五	〇	一〇	一九	四．七
中	侯定康	一个半	七	〇	〇	〇	〇	三〇	三〇	四．三
中	侯之俊	一	三	〇	一	二	〇	九	一二	四
下	刘敦厚	一	八	〇	二	四	九	三	一八	二．二
下	刘树康	一	三	〇	一	〇	〇	五	六	二

从上述 6 个贫农看来（每阶层以人多人少两户为例）他们耕种土地的绝大部分是租伙人家的，今天在我们减租政策的扶植下，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经济地位会逐步上升，但就现实的条件（土地、劳动力、人口）来看，他们发展的缓速是不同的。如上贫农刘排厚、刘永山两户，他们略有自地，劳动力足够，还有耕畜，耕地也足够耕种，差不多每人平均有五垧土地。而中贫侯定康、侯之俊两户，则全部收入靠伙种地，虽然他们每人平均也可得四．三垧和三．三垧耕地，但收入中还要以 40%（伙种地依四六分计算）分给主家。下贫农刘敦厚、侯树康两户的耕地太少了，他们每人只得二．二垧和二垧，何况差不都是租伙地。现在从他们实际生活的收支计算中，便可以明显的看出那一阶层的贫农，应该作为移民的对象。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上贫农在平年收成的情况下尚有余粮。如

刘排厚因近几年减租的帮助，两年内典进了五垧地（包括在他的十垧自地内），如果年成好收入多，他可以把余粮更多的典买进土地（典地每垧约合细粮四—五斗，买地每垧约合细粮一石二斗——一石五斗）。像这样的上贫农，他每年可以增加自地，也就是逐步减少封建剥削，而使他向自耕农（中农）的方向发展，他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发展的条件，因此，就不能以他作为移民对象了；同时，像样的上贫农，他自己也是不愿意走南路的，他们几年来实际生活的经验已经使他们领略到，自八路军到后，减租政策替他指出了发展的道路。但是中贫农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虽则同样在减租政策的帮助下改善了生活，但是由于他们土地很少，经济上想发展也就不容易，因此中贫农就可以作为移民对象，但同时又由于中贫农每年的缺粮时节，只要临时替人家打几个短工，或临时向人家借一些粮食，就解决了问题。由于中贫农在他原来的家乡是可以过日子，就使他们不大愿意离开家乡，所以中贫农虽然是移民对象，他们在接受我们移民宣传动员的行动程度上是比较差的，也即是动员中贫农移民时，需要我们下更大的说服解释工夫。而下贫农就成了“大量移民”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缺粮多，即使他出卖了他在全部农时中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即所谓揽一犋工，就是每六天中给别人作二天工），可以挣到七斗小米的工价，但仍然不能解决他全部的缺粮，几年来他们已知道下南路去改善生活的事实，就容易吸引他们向往了。

余或缺		余二、四石	余·五斗	缺八斗	缺三斗	缺四·七五石	缺二·二石
耗	共计	一九·七石	八·一石	九·八石	四·二石	一一·二石	四·二石
	公粮	三斗	一斗	○	○	○	○
消	牲口料	一·二石	四斗	○	○	○	○
	年用全食	十三人共一八·二石	四人共五·六石	七人共九·八石	三人共四·二石	八人共一一·二石	三人共四·二石
量	共计	二二·一石	六·七五石	九石	三·九石	六·四五石	二石
	夥种地	收十八石分出七石二斗得十石八斗	收五石分出二石得三石	收十五石分出六石得九石	收四·五石分出一·八石得二·七石	收一·五石分出六斗得九斗	收二·五石分出一石得一·五石
收获	活租地	○	○	○	○	收四·五石分出一·三五石得三·一五石	○
	死租地	收九石交租二石七斗得六石三斗	收二·五石交租七·五斗得一·七五石	○	收一石交租三斗得七斗	收二石交租六斗得一·四石	○
	自地	五石	二石	○	五斗	一石	五斗
姓名		刘排厚	刘永山	侯定康	侯之俊	刘敦厚	侯树康
贫农阶层		上	上	中	中	下	下

注：此表计算标准——以粮食收支计算，其他副业收入及其他杂支等概不列入。收获量项内每垧地均以平年收粮五斗（都是粗粮计数）算。死租地租额为三斗，对半减租（即每垧地交租一斗五升）。活租地为三七分、伙种地为四六分为标准。消耗量项内每人全年食用均以粗粮一石四斗——此数系依一般贫农生活水准，以一家大小，吃的细粮、杂粮搅合平均计算的。牲口料（驴吃的）系以全年在冬季费料三分之一计算的，其余三分之二大都喂的草料，故未算入。

三　秋后是不是可能移民

“大量移民”是全边区增加粮产的有力保证，“大量移民”是绥德分区独有的艰巨任务，抓紧每一可能移民的时机，深入动员广大贫苦农民，使他们踏上丰衣足食的经济地位，就是完成我们党所给予“发展生产”中主要任务之一。那末秋后是不是“可能移民的时机”呢？我们调查了过去的移民情形，今后的移民对象，以及征询了移民对象，这一工作虽则也经过了不少麻烦和周折，也提出了困难的问题，但最后的结果，是得出了除了一般的困难问题外，“秋后可以移民”的初步结论。

曾经有的同志说过：今年春季移民走晚了的已经过了时间，秋后移民在时间上将为更晚；有说今秋下去后吃粮更多，粮食问题需解决；又说农民秋收后有了粮食，就不想离家；又有的说农民辛苦了一年，就想在家美美的过一个年等，因此，秋后不能移民。

秋后移民是有困难，但这是可以克服的。比如：

（一）时间问题——在春季发动移民时，大多数农民对于一年的计划，已早在腊月到翌年正月元宵节之间决定好了，即一般移民对象，已决定给谁家揽工，也有先收用了工价；有的已讲好租伙谁家的地，或另谋别的生计等，但在秋后，则庄稼已收割完毕，也就是农民已经结束了他一年的劳动。因此，时间是有利于发动移民的。秋后下去的时间约在10月下旬，到土地结冻（11月中旬）时尚有半月多，在这时间正可开秋荒，如以2千个移民劳动力开秋荒10

天；每天每人一亩半计算，则共可开秋荒 3 万亩，对延属分区明年发展农业将是一大准备力量，土地结冻后，则可将劳力临时转移到各种短工方面；待至明春解冻，就可以立即动手春耕和春开荒，不至于有春季移民时间稍晚即影响农时的缺点。

（二）粮食问题——一般农民（即移民对象）整个生活中最困难的时期，大都在青黄不接即秋收（或夏收）之前的时期，而在秋收（或夏收）后，则不论多少可以收下一些粮食，如果这些粮食吃到明春，就所剩无几或已完全吃完，故春季移民的粮食问题，非有待于开荒地区的政府或群众来帮助解决不可。而秋后移民，就可以拿他自己打下的粮食，带去作为初下南路时的基础（因绥德粮价贵，南路粮价贱，故可以在此卖出，到南路后再量米吃），然后一面开荒，一面打短工，粮食问题就可以接着自行解决了。

（三）打短工问题——有的贫苦农民为弥补其入不敷出的缺额，所以就在秋后农闲时期，出外替人家打短工（如翻秋地，做土木工等），但在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的绥德分区来说，工价是还不及缺乏劳动力的南路的。同时，在此替人家打短工，只能在弥补缺额，暂时糊口方面起些作用。下南路打短工的作用，却是准备明年迅速发展的基础。

（四）气候问题——春季移民时间如在 3 月间气候稍暖和时动身，则下南路后就妨碍农时，在家还要闲呆着吃粮，为照顾农时而及时动身，则气候尚是寒冷，一般移民衣被单薄，四五百里路的行程，就受到相当威胁，尤其捎带家眷的移民，妇女儿童们的行动更为不便。而秋后移民时间，则气候尚是温和，行动方便，下南路后，粮贱柴多，也不至如绥德分区缺乏燃料而取暖困难。

至于一般农民因秋收后，尚有吃粮而苟安的心理，或希望在家过年等，就要我们以深入的解释来说服他们，并可以他们几年来苟安生活，仍不能饱暖的实际例子来证明。

四　秋后移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工作方式方法

和春季移民一样，帮助移民具体解决问题，灵活应用各种方式方法，是发动移民的有力保证。下面所讲的，除第一项是秋后所产生的间问题外，其余各项大都是根据春季移民工作经验，和此次在郝家桥组织秋季移民中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一）组织帮助移民秋收变工——为了使移民争取时间早下南路开垦秋荒起见，就必须发动群众帮助移民，在秋收时组织劳动互助。这里一般秋庄稼如：谷子、糜子、高粱、洋芋、南瓜等的收割时期，均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之间（阳历），其中收割较晚的是谷子（在10月上旬），而黑豆收割时期最晚，要到10月下旬，如果要待全部庄稼收完后动身南下，那末接着就是11月中旬的结冻时期，移民下去后就来不及开秋荒。因此必须抓紧时间，主要作物发动变工队帮助收完后，黑豆即可留下，让变工队代割，移民即可携带粮食南下（可在绥德出卖后到南路再买粮吃），如有黑豆等晚收作物，收割后可交其家属，或将黑豆换成钱以后捎寄移民亦可。但一般庄稼的秋收期，则尽可能使之提早完成，而移民即可于10月中旬动身南下，能于结冻期前争取十天到半月的开秋荒时期。好在一般移民在家耕地不多，又因秋庄稼成熟时期一致，收割容易，只要发动群众变工帮助，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二）组织移民两次变工——一般贫农以上的移民，大多在家稍有几垧自地或租伙地，因此可发动他的亲友和他变工。如郝家桥刘家渠有侯姓五弟兄，就是组织了这样的移民变工，今举述如下：

侯树康：家有一妻一儿，自地一垧，伙地五垧，可全家移民。

侯定康：家有50多岁的老父母，还都能劳动，父耕母织，可各抵半个劳动力；有一妻、二女、一儿，伙种地卅垧，妻及长女（13岁）均能纺特等线。家属留在家中，本人南下。

侯世康、侯应康：兄弟尚未分家。世康有妻儿各一，应康16岁未婚，全家四人，弟兄二人均为全劳动力，有自地六垧，伙种地十五垧，因耕地不多，故单由世康一人耕种，应康给人家拦羊，全家不移。

这四家五弟兄，都是亲伯叔兄弟，住在一起，组织移民变工的办法是：树康、之俊的自地租伙地，都让给世康弟兄耕种；定康的卅垧伙地除留下部份让其父耕种，以外就归原主解伙或转伙他人，其家属亦托世康弟兄照顾。到每年收获季节后，移民三弟兄和世康弟兄均各按成分配（以土地及劳动力多少来计算）。同时，在移民三弟兄下南路后，也组织了变工，下去后，三人一起开秋荒，树康、之俊的妻子在家轮流作饭送饭，秋荒开完以后，三人一起另找短工，所得的工钱共同使用。明年开春解冻后，三人就一起动手春耕和开荒，并准备向政府合借耕牛贷款购牛一头，共同使唤。像这样的两头变工，一方面可照顾了老家的祖产——房屋、土地和家属；同时使世康弟兄获得多量耕地，而移民三弟兄更可以在南路迅速发展。经过这次在郝家桥帮助他们组织以后，他们都感到很满意，甚至连各家的妇女，也很高兴，愿意同下南路，认为今天的政府是真正为人民谋算的。

（三）照顾家属和帮助路费——如前所述（过去的移民情形项内），侯裕康的妻子和路费问题，我们帮助他解决以后，他就毫无顾虑的走向南路去了。所以除组织移民变工由移民自己解决问题外，如有的移民家属无人担水砍柴，就需要村中群众来帮助解决，这工作最好由村主任来负责发动群众和移属变工（如男劳动力和移属纺织针线工相互变工），或和优抗工作配合进行，发扬乡亲间的互爱精神，反正移属在一二年后，移民在南路奠定了基础，就可回家把家属接到南路，那时，因移民对帮助他家属的乡亲，一定是非常感激的。

（四）利用具体的“马丕恩”，进行宣传，广泛开展马丕恩移民运

动——我们这次在郝家桥，就遇到了一个“马丕恩”，给予我们移民工作的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的事实是这样的：

几年以前，从郝家桥起身下南路的侯生智，人们还清楚的记得：他家很少的土地早由父辈被地主的剥削而典卖完了，侯生智带了妻儿，背了破锅铺盖和老镢头，从邻家借了四升小米，离别了郝家桥的乡亲们。相隔的日子并不长远，现在，侯生智的小儿春富伴着他的母亲，来探望故乡的老祖父老祖母和亲友们了。年青人带着他在南路丰衣足食的饱满精神，酱色的脸庞，雪白的土布短褂，黑裤，他坐在人们钦羡的眼色中，闲谈着新鲜的现实生活：“尔格，咱在南路有七十来垧自地，两头牛，一头驴，两匹马，雇了两个长工，咱哥哥担任村主任，村上十七八户人家，从绥米下去的移民，几年来就占了够半儿，咱哥哥就一满替他们忙这号事：腾窑洞啦！调剂粮食啦！借镢头，锄头啦！有时还要到乡上帮助他们借耕牛贷款，今年边区政府林主席又下来一道公事，说移民三年不交救国公粮，一定要执行，呀！那样好的公家，真的使咱们过去的穷汉，一个个都翻了身，尔格不说咱天天吃的馍馍，面条、捞米饭，就是刚下去的移民，也不会吃你们这些东西了，糠窝窝、嚓嚓饭，一满没人吃了，要就是喂猪用，二大！四娘！你们要相信呀！尔格公家就是要咱们老百姓过好日月，而且谁过的好，公家还奖励他。你们听咱言传吧！咱家住在延安南区梁家沟，就在杜甫川进去，翻过大山就是吴家枣园，那里有个吴满有，公家奖劝他是全边区劳动英雄，新年里到处欢迎他，还为了他制歌，闹秧歌舞，延安可闹得热火朝天，公家要咱们庄稼汉向他学习，他是个富农，就是要咱们都成为富农，尔格，谁个不晓！那个不知！还有一个米脂下去的马丕恩，听说下去只有两年，日月就闹美了，尔格也吃开啦！公家号召咱们绥米的穷汉们快下南路向他学习。真的你们都是好劳动，但是没过好日月，就是有了劳动没处使唤，这里地稀人稠，公家没办法把南路的荒地搬上来给你们么！尔格公家一片好心意，为的就是要你们过好日月呀！你

们一搭下去后，梁家沟不就像郝家桥一样么?!”

“唔！唔！唔！”

“对！对！对！”

于是，侯树康、侯之俊、侯定康也谋算下南路了，移民变工的问题也商讨而组织起来了。郝家桥的人们都知道了几年前的穷汉侯生智，现在比本村的富户们过的日月还好。

有的人说：马丕恩是米脂马家园子的人，马丕恩就是他一个，对别地没大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了解，在绥德分区各县的每个农村里，可以说都可能找出像上述那样具体的“马丕恩”来，因为事实上过去不少移民下去后，在边府优待移民的政策下，都一个个翻了身。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注意发现以及利用作有效的宣传。过去有的同志，只听到了个别的片面的反宣传，说移民下去也要交公粮，仍旧过不了好日月等，就以为这便是移民工作的最大障碍，而对于下去后翻身过好日月的例子，却没有去注意和利用。简单的事实可以证明：如果真像反宣传所说，那末为什么几年来都有移民自动南下呢？

（五）希望延属分区党政的帮助——为有效的组织马丕恩移民运动，除前述在绥德分区各农村，随时注意和利用自南路回来的移民进行宣传外，更希望延属分区各级党政，在当地发动大批“马丕恩”回来发动乡亲移民，为争取时间使秋后移民南下开秋荒起见，最好发动“马丕恩”们在秋收前来绥德，他们的庄稼也可以组织秋收变工队帮助先割或代割，到绥时并可组织他们贩运粮食的运输队，使他们既能回来组织移民，又能回家探亲，且可贩粮赚钱，解决路费，“马丕恩”们回来时，南路当地政府可调查其所籍区、乡政府后，写给介绍信，这样就能使他们回来后和此间区乡政府取得联络，而配合进行更有效的宣传和组织。

（六）反对破坏份子——根据春季移民工作经验，破坏份子一定乘机散放谣言，说什么“移民就是扩兵”、“南路水土不好，婆姨生

不出娃娃”、“移民也要交公粮”等等无耻谰言，我们必须追根究源，坚决作斗争，以便顺利地展开马丕恩移民运动。

此外，如对移民对象的妻女，给以深入的说服解释，使她们不牵累丈夫的下南路，而且鼓励丈夫下南路。以及移民想在家过年，和秋收后有粮就苟安等心理，也必须帮助克服。

五、几句宣传口号

下面这些话，是在这次郝家桥和移民对象们谈话时，被点头称是，而表示接受的，比如：

（一）由于某些农民的家乡观念和保守性关系，他们不愿离开家乡，因此说：“金屹崂、银屹崂、撩不下咱个草屹崂”。那末我们可以说：“草屹崂、穷屹崂、赶快下去垒个金屹崂！”或“边区到处都是家！”

（二）有些农民还没有改变旧的观念，以为“受苦人”命该“受苦”，因而说：“受的是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食！”那末我们就说：“只要劳动好，日月该过好！”或“边区就是劳动者的家！”

（三）有的农民想下南路，但迟疑不决，或者家中还可勉强度日，再拖拖拉拉，我们可以说：“早下南路早翻身！”

（四）有的农民婆姨拖住丈夫，不让丈夫下南路的，即可笑话她们：“男子汉利利洒洒，婆姨家拖拖拉拉！”或说：“好婆姨在家纺线织布，好汉子南路开荒生产！”此外如“下南路，吃饱饭，穿暖衣！”以及“南路粮贱柴多！”等口号都可以视机会适当的提出来，鼓动他们下南路的信心，引导他们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 年 11 月 15 日）

刘玉厚的光辉

“好！好党员，好同志，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们共产党就更有办法！”

在今年春耕时，习书记亲自下乡具体领导生产，发现了刘玉厚同志，就非常兴奋地这样夸奖他。

在刘玉厚的劳动影响下，从郝家桥以至全警区群众的生产运动展开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年来，模范党员、劳动英雄刘玉厚同志的光辉业绩。

贯彻减租政策

还是在刘玉厚没有被发现以前，他已经是郝家桥减租会的检查委员，他就积极地担负起了群众给他的任务。他号召郝家桥的共产党员要贯彻实现党的政策，于是，在他家里开会，大家一起讨论，进行调查。去年全村就减去了一百多石的租子，佃户们的生活改善了，有的典买进了土地，有的娶进了新媳妇，有的换上了新棉袄，有的不会青黄不接了。

郝进理的五垧地被地主家无故抽回了，刘玉厚就发动了减租会的力量要了回来。

早在今年夏收以前，刘玉厚就觉得去年的活租和伙种混作四六分的不合理，他特地进城到政府询问："今年怎样分交活租租子？"当他知道三七分的分法后，就回到村上传开了。虽然他自己61垧耕地中，只有一垧活租地，但他知道村里被地主欺骗，把活租混作伙种的租户却有不少，因此他非常关心活租的分法，他说："在今年秋收后，要着实操心把减租搞彻底！"

今年夏收后，郝家桥的一个寡妇刘英珍的两垧出租地，租户要减租，就影响了寡妇的生活。刘玉厚就根据政府的法令，提出了公道的意见，劝租户少减一些，并且还照顾了刘英珍三分之一的麦秸。

积极负担，帮助穷人

1940年春，刘玉厚就在村中群众的拥护下，选任为新政权的村主任，他是多么的兴奋呵！他经常告诉村里人说："过去咱们等着望着红军来，现在八路军来了，咱们就该拥护他！"第一年，他就担任了艰巨的征收公粮任务，他首先交了2斗，来推动大家踊跃交粮，最后的尾数，他又增交了5升，影响大家完成了任务。去年，如果按照累进率计算，他只需交3斗5升，而刘玉厚则交了4斗。今年春上500元的运盐代金，他背干草进城卖了几回，就一次交完了。7月时局紧张时，他除了号召大家起来武装自卫外，他又以1斗5升麦子，作为当时备战用的军粮，而全村紧急动员的18石麦子，也在他影响下胜利地完成了。他理解到：现在我们有毛主席领导下的党，比前强大了，有老百姓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就该好好的拥护他！"

今年夏天锄草时，村里郝玉秀老汉的腿疮溃烂不得动弹，家又穷，如果不锄草，地就荒了，有人提出了这件事以后，刘玉厚就首先捐出了1升麦子救济他，全村在他影响下共捐出了2斗1升5粮

食，郝老汉的贫困，就此而得到了解决。

春耕时，穷汉马双泉的地耕不及了，刘玉厚就把他的耕牛，义务借给马双泉用了 4 次，刘玉厚还经常督促他好好劳动，叫他耕得深，多锄几次草，马双泉在刘玉厚的积极有条有理和督导下，也大大的提高了生产热情。

努力生产

今年春上习仲勋同志奖励了他以后，他就很坚决的拥护了党的号召，他说："咱什么也不懂，就懂劳动，党号召咱们要努力生产，那是容易的事么！"但是并不是如他所说的容易事啊！他这话里是充满了刚毅的劳动精神。现在，让我们看他是怎样勤劳的进行生产：刘玉厚今年在他 47 响耕地（共 61 响，内有 14 响废地没有上粪）上，施上了 600 袋粪（每响平均 13 袋）；他的废地锄草 5 次，高粱、黑豆锄 4 次，其他的最少也要锄 3 次，棉花、瓜地锄了 7 次。他深耕 6 寸，他的谷地 8 响溜了崖，麦地翻两次，他的地边都砍了畔，山上都挖了水窖。为了进一步提高他的产量，他又准备了半响地，学习刘培润的农作法，这半响地上他要上粪 12 袋，操心务业。但完成这些数字，是充满着无数的汗和劳动力。他 600 袋粪的四分之三，要背到离家 6 里外的土地上，刘玉厚背着 80 多斤的粪，翻过山头，爬过水沟，一步步地鼓着劲、淌着汗，从天刚透明，直到太阳躲进西山，这样来回 5 次——60 里路，400 多斤粪才上到地里。夏收了，秋收了，他又从这 6 里外的土地上，一把把的庄稼割成几大堆，他又一捆捆地背回家去。他知道集体劳动的效率会提高，于是他和他的妹夫、叔伯弟兄组织了 5 人的变工队，每晚上他们共同计划着明天的劳动。

刘玉厚和自然的力量作坚强的搏斗，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的土地是远在门外的瘠地，是别人不要种的地了，他才从地主手里租

种下来，他从来不愿争夺农民之间的土地，他说："我要吃饭，别人也要吃饭，有饭大家吃才对！"就这样，近村的好地就挨不到刘玉厚了，而刘玉厚凭他充沛的劳动力，操心经营着这些瘠地。今年春耕后刚种上夏田，气候突然变寒，庄稼冻了，有的人吐出了消极的呼声："唉！乍作过了，乍没办法了！"可是我们的刘玉厚毫不犹豫地下了决心："不要紧，翻起来重作过！"

8月里雹子打坏了他30垧庄稼，使他整个的收获减损了三分之一，当他家里人为此而感到伤心时，而刘玉厚却更坚强的勉励和劝慰了他的家人："没关系，政府有减租法令，咱们能吃上就行，好在今年的老麦收的还可以，4亩棉花也顶上庄稼5、6倍，今年冬里多劳动些，婆姨家多纺花织布，三弟好好揽羊，家里开上粉坊，大家努力推粉，多喂猪！明年一开春，咱们又有办法了！"

改善生活

这是他自己劳动的成果。由于他一贯的劳动热忱，和几年来减租政策的扶持，刘玉厚家的生活改善了：3年来，他替他的二弟、大儿子娶进了两个媳妇；他买进过两条驴子，去年他又典进了4垧土地。经过今年的努力，刘玉厚的财富又增加了：

谷子5石5斗，高粱3石5斗，黑豆5石5斗，麦子4石，豌豆1石，扁豆1石，糜子6斗，绿豆1石，芝麻1斗，洋芋25袋，南瓜400多个，棉花25斤，除去4石3斗租子，足够全家一年的吃穿了。

买进了25斤棉花，婆姨女子们纺成线，织了8疋布。

原来由他三弟给别人揽的17只山羊，现在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7只绵羊，5只山羊，今年开了粉房，又喂了1头母猪，3头肥猪，7只猪娃，还有5只鸡，今年受奖得了1头牛。

由于财富的增加，刘玉厚又给他三弟定了亲，今年6月已经送

了财礼，明年2月就可以把弟媳妇迎进门了。他又准备好了明年三弟结婚办事的东西：1石软米做糕，8斗麦子，3斗缸豆，3斗小豆做面做馍，杀1头肥猪，还有两疋布给新弟媳缝被子。

刘玉厚已经踏进了丰衣足食的日子了！

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是刘玉厚同志以他光辉的劳动取得的。他是劳动人民的旗帜，是共产党员的好榜样！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7日）

绥德分区改良农法作

（1943 年 12 月 29 日）

绥德分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农业组，讨论今后改良农作法问题后，确定改良方向，主要的分为：选种、翻地、施肥、播种、锄草、防虫、修地七大项。兹分述如下：

（一）选种

推广狼尾谷的试种、缩小干捞饭谷的播种面积——绥德分区农作物中，主要的是谷子，谷种共达三十多种，但过去一般农民大都沿着习俗，对选择籽种不大注意。如最普遍的干捞饭谷，一般农户只取其米好吃的一个特点，种的很多，但经多年传留的籽种，已降低了品质，这种捞饭谷最容易遭受虫蛀之害，且不耐风磨（即易被风刮受害），光华农场试种成功的狼尾谷，今年经专署农场的积极推广，和各地农户的试种后，已获得极好的成绩，在这次生产展览会上，每个劳动英雄，和数万参观农民，对狼尾谷一致赞美，并热望政府发给籽种。狼尾谷的优点有：种子长而粗，结籽多，颗子大，打的粮食多。它和一般谷子不同的特点是：（一）不怕虫蛀，即使蛀

了也能出支苗结穗；(二)耐旱；(三)不怕风磨，结籽坚实；(四)穗子长毛，雀儿不啄；(五)日月不大不小(即成熟期适当)；(六)适合于本地的气候和地质。因此，大家决定明年以各地劳动英雄为中心，由政府散发与调剂籽种，积极推广试种面积，以便将来普遍种植。而干捞饭谷，必须有效的缩小面积，但明年因狼尾谷种尚不能普遍传布，故本地谷种中的其它好谷，如卡白谷，大红谷，白留沙谷，红留沙谷，红龙爪九谷，倒巴垂谷，也可以调剂种。其中白卡沙谷适宜于土地少、粪多的农户，它的好处是：不怕虫蛀、米颗大、打粮多，出草多，日月小(即成熟早)。而大红谷，白留沙，红龙爪九谷好处是谷秆粗而硬，也不大怕虫蛀，米颗多，打粮较多。

山地多种黄谷高粱，少种红谷高粱——红谷高粱因日月小可以早吃，但是易遭"排黄牛牛溜"的害，而黄谷高粱日月虽较大，但"排黄牛牛不溜"，颗子大，味香好吃。此外如黑、白谷高粱，日月也大，没有黄谷高粱好。又有牛卵色高粱，则适宜于地少粪多的农户，糖高粱也可以倡导，五十根高粱可熬一斤糖，一亩地的高粱可熬八十斤至一百斤，获利大，选种时要注意甜的：(一)叶子的茎带灰色(不甜的是白茎)；(二)白花，开花时不分次序；(三)穗子直，红赤色；(四)秆子上多白粉。留种的高粱，要在结穗时带上纸套子，共带九天即可，否则容易变种。

粟子要种白硬粟和瓦灰软粟，前者米颗大，日月小，后者是"八米二糠"出米多，此外如大黄粟子出粮多，口紧(结实)不易脱，不怕风刮，但日月较大。而红、黑粟子，品种不好，但日月小，在跌年成时可以补种，老百姓称之谓："救命庄稼"。

连架扇黑豆最好——结得多，打得出，日月不大，种的最普遍。此外如大白黑豆也好，能作豆腐，煮干干饭好吃，作米馍馍，这种黑豆也打得多，但日月大，皮厚。

麦子要算老红麦——皮薄，日月不大，推面多，种的普遍。

选种要在地里收割时选好，因收割时一朴一朴容易注意和发

现好种。如割完后到场里选，一大堆就难选。选好后保藏时，要注意不让烟熏和水气蒸，不要放在煮饭的窑洞里，而要晒干挂空。

(二)翻地

第一要细耕——深耕多耕固然好，但是绥德分区畜力极少，尤其是缺乏耕牛，一般农户因土地少，牛的吃量大，只会耕地，用处少，所以多喂毛驴，毛驴除了耕地外，还能驮炭，贩盐，驮水，拉磨，送粪，吃的量也比牛少，但毛驴力小，最多能耕五寸深，又由于地少，一般贫农喂不起，大多是几家伙喂一头，共同使用，因此多耕也比较困难。在这样具体情况下，首先就应提倡细耕。刘玉厚在今春谈的"怎样耕作？"是很正确的，兹摘录如下：

"深耕不一定耕上八寸一尺深，五寸六寸也是不差甚，主要的却是不要留下空板凳，意思就是要细耕，一壕一壕靠得紧，而且要直又要匀。"

怎样细耕呢？(一)桨子、铧、人和牲口都要配合好，手臂执桨要用劲，使得稳，脚步要踏方块形∷，和牲口脚步的速度要配好，不要太快，这样，牲口不熬，地又耕好，耕时要直、密、匀。(二)必须组织变工，没牲口的农户，或缺少劳动力的农户，要有计划的配合好——人变驴、驴变人，即能节省劳动力，又能使耕作细致。

第二要展开秋翻地——在寒露和霜降之间，每天早饭后，太阳晒过一会就翻，翻后要耙，使土厚而绵。秋翻地的好处：(一)集肥，可将秋收后的谷叶豆叶等翻入土内作肥料；(二)耐寒；(三)防虫，留在作物根内的虫仔翻出后可以冻死；(四)易吸水分，秋雨，冬雪的水分容易渗入土内；(五)省工，便利明年春耕。但有人提出："秋收中时间顾不上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有待于组织变工，因一般农户的变工，大多着重于春耕和锄草(因必须按照农时，时间迫切)，而秋收时就各管各了，如果秋收变工组织好，即可将节省的人

力进行秋翻地。因此，明年要着重组织秋收秋翻变工，作到秋田的三分之一要进行秋翻。

（三）施肥

施肥多，是保证庄稼茁壮，和提高产量的最好办法，今年在政府提倡多上粪的号召下，一般农户大都作到每垧十二袋的施肥量，如能进一步增加，更为有利。刘培润的每垧地上粪六十多袋，收获量也比别人增加到十倍以上（还有其它深耕细作的原因）。但粪土有限，地多的农户就很困难增加，因此今后应在制造肥料方面多加注意和倡导。制肥的办法："一种是积粪，一种是造肥。

积粪——即在猪、羊圈和牲口栏内增加粪土，如驴粪儿稀就可以填土，即可以使之干燥而驴不生病，又可以使驴粪中的草渣沤烂带土成粪，但驴粪在春天最干，因此需要洒水后再填土。猪圈内可以倒入垃圾，切碎的嫩草，便猪踩烂成肥料。驴粪也可以混入猪圈，使之发热，提高粪的壮力。同时猪睡觉处的土也要常换新土，一方面可使猪睡的舒服容易长肉，同时又可以把粪土倒入尿内增加粪土。

造肥——（一）用刺藜沤肥，一背（约 80 斤）可顶十布袋粪；（二）用烂草、柴灰沤粪；（三）骨灰，用各种动物的骨头晒干烧成半灰，用磨碾成灰末即成；（四）拾鸡粪、鸽粪，这两种粪最肥，鸽粪一颗可顶一颗黑豆的壮力；（五）旧炕土和窑皮土也能沤肥，尤其是煮饭窑内的窑皮土很肥；（六）设驴毛厕，尤其在绥西，米脂的大路上，因驮炭贩盐的牲口往来很多，可以多设；（七）大路上的路土，因经往来牲口践踏，带的肥气很大；（八）打庄稼的场土，留下的根叶等灰土，也可以扫集作肥，尤其是小麻叶和黑豆叶因有油性最肥；（九）杀猪宰羊等的脏水，和米汤水等，及动物肚内的肠子等污物也可沤肥；（十）稠煤油。

发展粉坊事业，推粉可以用豆渣喂猪，猪粪即可肥田，沙滩坪石家洼合作社，在主任安锦成（模范生产工作者）的领导下，群众即纷纷以绿豆、驴、猪娃、磨子、坛子、锅等入股，因入股后即有购买猪粪的优先权，此种合作开粉坊办法，今后可以推广。现分区各地一般私人开粉坊的也很多，但因资本大，都只有富农或富裕中农能办到，一般贫农难以办到，所以由合作社来领导和组织的办法，是很好而可以实现的。

此外，以黑豆碾碎作肥，也是很好的，过去有人舍不得（或是买不起黑豆），其实很值得的，如以三斗黑豆上一垧棉田，以市价计4千5百元，可多收净花15斤左右，以最低限度多收10斤计算，就可以顶上细粮一石，所以用黑豆作棉田的肥料，是值得提倡的。

配料——分为两种，一是粪土和作物的配肥，一是粪土之间的配肥。分述如下：（一）羊粪适合于一般作物，而以上麦地为最好；（二）猪粪上高粱、洋芋地为适宜，豌豆最好；（三）驴粪如不经制造，最适于水地；（四）狗粪适合各种作物，上瓜地最好；（六）柴灰不适于高粱，因柴灰性凉，高粱性热。易生黑穗病，但甜高粱和豌豆、洋芋地可上柴灰，可助长糖分和淀粉；（七）人粪最宜浇蔬菜地；（八）鸡、鸽粪上粟子谷子地为最适宜；（九）稠煤油适合于各种作物，尤以麦子为最好，可防虫蛀；（十）米糠、麸皮适合于棉花、小麦。在粪土配肥方面要注意：羊粪不能配毛粪，毛粪可配驴粪，驴粪可倒入猪粪圈内沤肥，毛粪内不能渗入泔水，而驴粪可与羊猪粪配，狗粪可与人、驴粪配，人粪可与羊粪配，如每垧地单上驴粪12袋，只收六斗，如配合猪、羊粪（各四袋）后即可收一石二斗，又如每垧地单上狗粪十二袋，可收一石二斗，但和人粪驴粪配合上，每垧也能收一石，因为狗粪少而贵，故可分开和人、驴粪配合上。又如单上人粪12袋，每垧只收八斗，而和羊粪各半配合后上地，每垧即可收一石。此外如在秋后以老麻油拌麦籽密封储藏后下籽，也可增加产量。又各种粪土蓄肥时，要注意勿使散发热气，可用泥坑土窖埋葬，

使粪土易于发酵，增加壮力。

（四）播种

各种作物播种时间及下种数量：

豌豆——要种的早，所谓“耕在九里，打在斗里”，时间在惊蛰后清明前，最好在开冻时就耕好。每钵下籽七颗，每堆下籽六合。

春麦——在春分跟前，每堆下籽半升。

扁豆——清明跟前，下籽不能太稠，每堆二合即够。迟豌豆亦于同时下籽。

黑豆——清明前即种，清明后鸽子出窠，就要啄吃豆籽，按种黑豆每钵点两颗，每堆五合。

谷子——坡洼地种早谷，过谷雨即下籽，平地迟谷在立夏后芒种前下籽，每堆下籽二合。

高粱——立夏以后即种，每堆下籽三合半。

棉花——谷雨前后十天，雨后即种，最好在谷寸后立夏前下籽，太早气候还冷，不易出苗，太晚了就是“过了四月八，有花没圪塔！”结不出棉桃，如果当时不下雨，最好“摘钵钵种”，每钵加半杓水下粪，渗透后掏松下籽十二三颗，不会影响产量，每亩下籽六斤至八斤。

粟子、洋芋，在芒种跟前下籽，洋芋每堆籽种 25 斤，川地壕种粟子每堆一合半，山地按种糜粟子一合。

接着便是“压伏——初伏前——荞麦，二伏菜，三伏种的好白菜！”

最后，在白露跟前即种老麦，如系重槎麦地，每钵下籽十五颗左右，一堆下籽七合半。调槎的新麦地可少下籽。每堆地平均下籽七合。

有的农户地少粪多，则可比一般播种时间稍晚些。因粪多早

种，徒然多长柴草，迟种可结实有利。

播种方式

分区播种的方式分为耧种、按种、壕种、犁种、表粪种、盖粪种、撒种七种。其中以前三种为好，而撒 种最不好，犁种、表粪种较为一般。种麦子粪多则盖粪种比表粪种为好。耧种生三根、按种生二根、撒种生一根。但耧种只宜于平川地，要有木制的耧子——现使用的农户很少，今后宜多多推广。撒种可省工，但是有乱长苗，生根浅，易被风刮倒，吸肥少等缺点，为播种中最粗劣的一种方法。盖粪种麦易捉苗又耐冻，长的均匀，先点籽，后盖粪，可多收粮食。壕种也好，但只能在平川地适用，故按种的方法可多多发展，一般山地坡洼地能适用，尤其是谷子，麦子更要按种。按种出苗整齐、扎根深，吸肥大，庄稼壮，产量也可增加，每垧可比撒种多打三五升粗粮，且不易遭风刮虫蛀之害。按种要三人，一人掏钵，一个娃娃点籽，一人盖土打结实。两人亦可。但按种的土地事先必须翻过，才能使庄稼长根，如果硬插地（未翻过的）就不宜按种，只能撒种，但撒种时要看壤气，壤好或壤气干则种的稀易于锄草和留苗，要改良播种方式，必须多化功夫，绥西、米脂西区和清涧撒种较多，今后要注意提倡按种，平川地要提倡耧种。（关于耧种的方法和好处，请参看本版 12 月 12 日所载《耧——下籽的农具》和 12 月 22 日载《再谈耧的用法》两文。）

（五）锄草

“早锄、多锄、细锄”，这是锄草的基本精神，但具体应用，必须按照庄稼的生长程度和天时来确定，而锄草技术方面，也需要注意细法，刘玉厚对锄草的说法是很正确的，下面是他讲的话。

“锄草时候脚踩稳，左右开弓不乱动，一步一步要匀称，不让松土踩成硬土块。靠近苗根的莠草要动手拔，不要连根带草一锄头。

初次锄草就拨苗，瘦苗去掉留壮苗，二次锄草要围土，不怕风刮连根倒，三次锄草遍地浮皮锄，同时也要带围土，四次锄草也要遍地翻，最好仍旧带围土。总之，多锄多围土，粮食能多收”。

至于锄草的时间方面，各种作物中尤以谷子需要早锄，所谓“粟搜两耳，谷搜针，”即谷苗长出寸许时，就要锄草，迟锄则根就荒（其它作物也一样），如刘培润的锄头次草，在谷苗未出土前就锄了（按种谷子，有一定地位，不致因未见出苗而锄断苗根），因锄草的主要作用，除了锄掉莠草，使苗充分吸收养分外，还可以松土，使作物的根容易生长，而且还可以调剂肥气，锄开已被吸去肥气的土，锄拢新土。所以“多锄”，并不是一定有草才锄，或草高才锄，无草或小草也要锄，因为等到长了草，地里的养分就被草吸收了，所以要作到“一月锄三次，百草都要死！”那就更好了。

锄草发苗时要注意：稀谷、足棉、稠黑豆、豇豆要留的稀，所谓“卧下牛还嫌稠！”小豆要留稠。

除上述外，“天旱锄草”和“伏里紧锄”，可说是整个锄草问题中抓住中心的两个要点。

一般人只以为雨后易长草，因此要雨后锄草，有的人在天旱时不锄而等雨后锄，这是不正确的。“锄头底下有水”“越天旱越要锄”这是正确的，因天旱，锄后土松，一下雨庄稼的根容易发展，雨后锄草，草根还能复活。所以要作到不让地里留下莠草侵占庄稼养分，如果天旱不锄，则久旱后下雨很快，一下雨莠草长的比庄稼还快，而且刚在雨后土很软不能锄，过几天，土地多的就来不及，草就长高了，地也荒了，如像今年夏季天旱，就有许多人因没有“天旱锄草”而吃了亏，故今后必须加以注意。

伏里天气最热，土里的热度也最高，作物的根生长最快，所谓“庄稼长在伏里”即是此意。同时莠草也最容易生长，因此在伏里加紧锄草，一方面锄草，一方面松土，庄稼就能欣欣向荣，所以说：“伏里锄三次（七天一次），一垧谷子打二石！”“伏里紧锄”也是能多打

粮食的一个要诀。

(六)防治虫病害

虫的种类有:蛀虫(蛀谷子),排黄牛牛(溜高粱),油汗(吃棉花叶和菜叶),路虎(吃各种作物的嫩叶,特别是对棉花、豌豆有害),毛毛虫(吃洋芋、棉、菜的根),蝼蛄(蛀根的地虫)等。此外还有吃庄稼果实的鼠类,如兔鼠子、格狸等。病的种类,主要的有黄疸、黑疸和黑穗病。

防治的方法:

蛀虫——(一)要选好种,如狼尾谷,白卡谷,大红谷,白溜沙谷等谷种,因谷种坚硬,能耐虫蛀,特别是狼尾谷虫蛀后还可以支苗长穗;(二)秋收后进行铲谷根,拾谷槎,收集后焚烧,把藏在谷根、谷槎中的虫籽撤底烧死;(三)秋翻地,其作用除了增加肥气和耐寒,节省春耕时的功夫外,还可以将蛰伏土里的虫翻出冻死;(四)锄草时将有虫蛀的草或苗铲除烧掉;(五)种沟条地和坡洼地可以减少虫害,因坡地翻的比平地深,虫子已深埋而死。

排黄牛牛——这种虫不单吃高粱,别的作物也要吃,因高粱皮薄易咬,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高粱开花时如适逢雨水多,花末粉凝结后经风媒介虫籽而生虫,所以如去年有些迟种的高粱,因避过了雨季,就没有遭害。此外如黑壳高粱多毛可减少虫害,又高粱地周围可多种粟子,因粟子谷硬不易生虫。而少种谷子,因一般谷子也容易生排黄牛牛。

油汗——又名蚜虫,繁殖力最高,一年能出 39 代,一虫可下仔 47 个,天旱或雨水过多均容易产生。防治方法,可用旱烟叶(一斤)泡水(一桶)手搓几次,泡(开水凉水均可)一天一夜后,盛在盆内,把有油汁的棉叶浸过,即可致虫死命。此外用柴灰(因多碱性)洒在叶上也可治油汗,但其效力比烟叶水较差。

路虎——这种虫要吃植物嫩叶，它从枣树、果树、瓜叶吃到棉花。防治的办法：(一)棉地要选择，不要靠近荒坟、野草、树木、河畔，因这些地方易产生路虎，河畔风大，易吹来路虎；(二)加紧锄草，因路虎也要吃嫩草，故锄去的草要带到远处烧掉；(三)发现有路虎的地方，夜间在地里点灯，灯下放水盆，路虎见火飞来，就可扑灭它。

毛毛虫——发现后，割一把新鲜的嫩草，放在有毛毛虫的地方，虫即集中在草上，等它集中后就把草取去烧掉 。

蝼蛄——这虫主要的钻在地里吃作物的根，防治法，可有下面几种：(一)用石油拦籽下种；(二)麦子用老麻油(加些地药)拌过下种；(三)在农历二三月间，总之在端午节前任何一天都可以，早起不见太阳时(天气凉)烧火熏烟可以窒死蝼蛄，但作用小；(四)伏里用红洋烟花泡水浇地(详见下述)；(五)锄草时随发现随手拔去被窒的作物并消灭之；(六)秋翻地冻死它。

鼠类——可在洞口灌水或熏烟捕捉之，或挖土用石头压均可。

病害——黄疸、黑疸主要长在麦子上，黄疸出黄粉，黑疸出黑粉，这些粉末就是病菌，长黄疸病的麦子，颗子长不大且不饱满，而黑疸病更厉害，在麦苗不高时就生此病，也有在麦熟时染上，幼苗时得此病，叶子卷起就死，即使得病迟的，也长不出穗或长不出麦颗，所以说"黄疸收一半，黑疸全不见"。黑穗病长在高粱和玉米上，作物长到出穗子时，在穗子上，秆子上或根底里，长起小疙瘩，逐渐长大成为黑色，也有黑粉，容易随风飞开传染到别株上，或落在地上种子上，到明年还要生此病。这几种病害的防治法：(一)选择好穗，并将籽穗晒干，不让发霉或烟熏；(二)在地里发现病害时，即将作物砍下烧掉；(三)砍下的作物如要喂牲口时，必须把病害处去掉烧毁，否则牲口吃了也要害病；(四)病害的不能留种；(五)调槎种，防免遗传到明年。

此外还有几种防治病虫害的药物，可以在事先准备，兹分述如

下：

红洋烟花——一种野生植物，长菊形的小黄花，绿叶长形，夏季开花，在伏里采集，晒干后碾成粉末，碾时人的鼻孔口腔要用湿手巾包住，否则就要中毒，碾好后入罐密封保藏。使用法有两种：一是将籽种拌麻油再拌些粉末，然后下种；二是将粉末撒入粪内上地（多少随便，越多越好），其功用不但能有效杀虫，且可增加粪土的壮力。

黑矾、地药——这两种在店铺内可买到，有毒性，似砒霜。黑矾加入毛坑后，可将蛆虫完全杀死，粪上地后也可杀虫，且很肥，一桶毛粪加上一合黑矾（约四两），能种一堆地，可打一斗粮，种高粱为最好。黑矾每斤约四合（目前市价每斤550元）可种四堆地；地药不能配合毛粪上地，因毛粪能溶解地药的药性，故与驴粪等配合为宜，使用时先将地药碾碎成末，碾时鼻孔口腔要包湿手巾，以防中毒，籽种（最适宜于种麦）最好在秋后先用老麻油拌匀（约一两麻油拌一升水）上罐密封，在下种前取出再滚上地药末，一堆地约五合至七合的籽种可拌五钱药末，拌药末时要注意随拌随下种，拌药时间不能过久，也不能拌的过多，一垧地（八堆的）可上四两（第一年可少上，每垧约二、三两，可逐年增加到每垧四两），下种时拌一堆种一堆，不能一垧种籽都拌上地药然后下种，以防麦子受凉性过多而影响出苗，随拌随种，遇土即化，而起作用。地药每斤约2000多元。这两种药物的功效很大，即能杀虫除病害，且能节省粪土增加高产，故今后宜多加提倡。（注）稠煤油、煤油的沉淀物，和籽种拌匀，也可杀虫增肥。

（七）修地

修地的作用，可以增加土地面积，积肥，防止山水等，其种类有：摇崖、溜崖、拍畔、挖水窖、打坝等。在分区以吴堡及绥德接近吴

堡如张家圪垃村延家岔等地，修地最为细致，葭县及米脂东区次之，而绥西、米脂西区、绥德西区和清涧等地的修地很不注意，今后宜多多加以倡导。

注：地药黑矾是山西产品，现绥德不多，如要加以提倡，可请物资局事先设法买到。这二药对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功效很大。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 年 12 月 29 日）

棉花打卡！

·争取完成350万斤棉花

（1944年6月27日）

“收不收棉花、打卡上说话”，这是几年来边区植棉工作实贵经验之一。今年，全边区305万亩棉田已早适时的下种了，但如何能保证350万斤棉产量以完成边区棉花的全部自给呢？打卡就是一个主要的困难。今年边区雨水多，棉苗长得好，但油条也长利快，如果不打卡，棉株专长枝叶，棉桃结得迟；边区降霜早，就会严重影响棉花的收成。因而，今年必须提早打卡勤打卡，才能阻止棉株专长枝叶，促使棉株早长担子，早结棉桃，并使棉桃早裂开。

怎样指导棉花打卡？以及如何把打卡技术适合各地具体条件？这便是当前打卡工作中两个要题。

首先必须指出：往年某些领导机关，认为只要完成植棉亩数和下种任务，随后即可放任群众自流，这种错误观点必须纠正。比如去年延安县的两个植棉指导员，在打卡期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庆阳卅里棉区对棉花打卡，只是一般号召，各级干部不认识油条，学会的又不下去指导棉农，有的干部指导不切实，有的地区过了打卡

时间才下去指导，因此有的棉农说："你们讲的是好，可是我们早已把棉花打糟蹋了！"但是，也有许多好的例子，是值得各地尤其是新植棉区领导上学习的。比如陇东分区专署及各县各级多数干部，首先亲自学会打卡，再下去指导棉农。分区派到各县指导植棉的有七人，而各县区的村干部也总动员起来。单就曲子一县下去实地指导的干部即达180人，连中学生和小学教员也纷纷参加这一工作。从庆阳川到曲子川一带的棉田，打卡都很周到，棉花就比往年早开一个多月。老百姓也说："往年教打卡只是嘴上说、干部自己也不会，咱们更不懂，今年这一来，可把棉花种美啦！"

在指导打卡时，特别在新植棉区，和气候较冷的西地区，我们要注意有许多棉农，往往为贪求多结棉桃，结果却裂不开而减少产量。但只要我们能用算细帐的方法，耐心的给以解释，也是可以说服的。比如具体说明：一个棉桃如能裂开，就有四分净花。以最少计算，每桃二分，每钵六桃，每亩千钵（本来每亩可有1500钵，恐不足苗，以千钵计），就可收八斤净花。好的地区每亩可收十斤以上，如果以全边区棉亩平均计算，那末，专门的目标——350万斤，是不难实现的。

但是，更要注意的，许多棉农不懂得打卡技术。有的把卡枝打得太多，而影响棉株的生长，甚至停止生长；有的不能辩别油条和担子，乱打一气，结果打了担子，留下油条；或是先打了顶却没有抹去胎叶；有的油条打得太晚，担子留得太多，拐枝拐卡长得很长，不打拐头，不摘正干上的老叶子，以致白费养料，影响棉桃的生长和成熟。"

那末，究竟应该怎样打卡呢"？1943年印发的"棉花打卡图"已经介绍了，但是，我们必须好好研究不能机械当作教条来看，要按照各地的气候、土地、肥料、发育的情况及有否虫害等具体条件，而是活的运用。比如在东地区大川里，阳光充足，粪土丰富，气候暖而霜季较晚，那末就可以留下五、六个担子，每个担子留三、四个棉

桃，在中伏（大暑）前后打头。而在西地区和阳光不足，土质不良，粪土缺乏，气候冷而霜季早的地区，就少留几个担子（约二至四个），可以提早到初伏打头。同时，虽在同一地区，而川地与山地，阳地与背地，也有很大差别。

今年雨水，就要提早打卡，早抹胎叶和油条，棉苗长到四五寸时，就可抹去胎叶，油条一出来就立即去掉。一般的打头也要提早些，特别在西地区及气候冷，阳光少，地质坏，技术差的地区，更要提早到初伏时打头。在打卡时候，干部一定要到地里去给群众教，打得不好，就会把棉花打坏，比如打卡时最好用刀子或剪刀，不要剥伤棉株或动摇棉根。打卡时间，也要选中午太阳最晒的时候，可使枝条伤痕易干，否则，阴雨天或有露水的早晚时间，都不宜打卡，免得枝条伤痕漏水而难干。

现在夏至刚过，小暑未到，正是开始打卡抹腿的时候，我们希望各地领导，迅速及时具体布置这一工作。从打卡这一工作上，争取350万斤棉花！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6月27日）

绥德分区文教会中的几个中心议题

（1944年8月22日）

民办学校问题

现分区已有民校22处，约可分下列四个类型：（一）执行新教育方针下的新类型，如高家沟变工合作的民校，该校系在群众吃了没文化的大亏后自发产生的，由民选的理事会自己管理，有在变工队中抽出的专任教员高怀山，教育对象除以儿童为主外，并有妇女及变工队员。其学制有：大娃娃半日制，小娃娃全日制（农忙时由理事会决定放假），妇女及变工队员输流隔日制。教育内容均切合群众实际需要，如识字、开路条、记帐、写约、算术、读报、讲劳动英雄故事等。该校已成为高家沟的文化堡垒和俱乐部，是村主任的办公室，纺妇、变工队员的会议处，同时又是全村清洁卫生和文化活动的主要领导和组织者。故大家认为高家沟民校，可为今后发展民校的好榜样。（二）社会教育类型的，如米脂杨家沟、姬家石沟、白家

沟、刘家湾等民校，均是从原来的识字班或读报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对象对儿童、妇女、男子并重，无专任教员，由乡文书、本村知识份子，或附近小学教员，每天抽出一定时间义务教授。教育内容亦较简单，大多仅识字读报。惟较原来的识字班读报组人数增加，分班和上课时间、地点、纪律等，较有条理。如杨家沟民校，由本村知识份子马汉成抽出时间来当教员，每天早上教娃娃，晌午时教妇女，晚上教青年男子，主要是教识字及读报，有时也请附近扶风小学的教员或同学教唱歌，或请乡长乡文书讲政策法令和劳动英雄故事。这种民校，在一般已有识字班读报组的农村里，也可以进一步普遍建立。(三)旧普小类型的，如以葭县崔家河底民校、子洲马家沟、吴堡深砭民校、绥德崔家湾民校等，因受旧时办学正规化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等方面，仍有脱离群众老一套的现象。(四)私塾类型的，如清涧高柳树村等7个私学及子洲安家岔私学，虽是群众自发创办，但教员大多是边区私塾的老秀才，区乡政府又没有注意领导，因此教的内容，仍是含有封建意识的千字文、百家姓、杂字等，管理学生仍用打骂制度，整天呆在课堂死背死诵，一无其他活动，以致学生逃学现象很严重。大家认为：对于上述第三第四类型，今后政府应加强领导，使之改造成为真正切合群众需要的民校。

国民教育问题

目前分区共有完小260所，中小21所，普小150所，共学生11400余人。大会讨论中心，主要是如何使现在的中小、普小逐渐由公办转向民办或公私合办。开始讨论时，个别教员认为这仅是经费问题，恐怕群众难于接受，经大家讨论后，才清楚认识到，民办公助乃是执行新教育的具体方针。主要问题，在于检讨过去方针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民办公助，即在于如何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

问题。对此，大家在会中都有反省，有的说过去教育的内容不合老百姓的需要，有的说教学法不好，有的觉得自己的普小可以转为民办，只要少唱一台戏，经费就能解决。结果统计全县普小可转为民办的，共有21处。米脂民丰区姜新庄中心小学，决定由本校分出一个教员去办民校，把一个学校变成三个，这个办法也得到群众的拥护。

至于新教育方针提出以来，分区各校执行的情况，也获得初步成绩，主要的是提高了学生们对劳动的认识。学校和劳动生产结合方面，除解决了学校经费自给外，且大大改变了过去生轻视劳动的视点，并和家庭结合，也更加密切了，学生回家帮助生产，也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如绥德实小女学生雷秀山，以她参加家庭生产的实际行动，改造了当过18年二流子的父亲。学校和社会结合方面，如绥德实小女小的校内儿童，组织校外儿童识字、唱歌，使绥市五百多个失学儿童，也能受到教育，并产生了刘佩珍、刘广等模范例子。如刘佩珍仅仅在两个月时间，就教49个娃娃认会了160个实用的单字，唱会了18个歌子，还将报上的“怎样讲卫生”、“杨巫神害死人”等消息讲给大家听；她还教儿童们自己学会再教给家里人。此外如米脂女小办的妇女识字班，进行拥军优抗。印斗桥岔小学教员，带领学生调查减租后的佃户生活，使学生们具体了解了减租政策下农民生活的改善情况。至于学校学生参加秧歌活动，配合政府工作向群众宣传，和各校召开家长联欢会等，更是普遍进行。但一般学校在课程、教材、学制、教学法等改造方面，还缺少新的创造，以致产生三大结合和教育内容不够密切的现象。

社会教育问题

社会教育方面，大众黑板和读报识字运动已普遍展开，尤以绥米两县最为发达。大众黑板已在乡政府或普小所在地广泛出现，在

农村中艰苦工作的乡文书、小学教员，正团结着农村中的知识份子，积极参加各种社教活动，并联系生产组织（如变工队、妇纺小组、拦羊娃娃等），进行生产卫生教育，如组织变工队，改进农作法，防治庄稼病虫害等，都起了很大作用。抗战报上的拾谷槎、捉路虎，治蝼蛄等，和群众报上的医治畜病，清洁卫生，破除迷信等，均在各地读报组的推动下，在农村中普遍实行了。如绥德四十里铺区三乡王家桥，在乡文书贺汉德领导下，组织了 172 人（儿童、妇女、变工队员）的识字班，他给读了抗战报上捉路虎的消息后，当夜即组织了捉路虎队。全乡因而捉了一斗 八升路虎。绥市大众黑板报上登着招领失物的启事，和批评不卫生的居民等，均受到大家的欢迎。米脂卧羊中心小学办的大众黑板上，登了一个治羊瘟的药方后，搭救了一百多只羊。吴堡识字班创办人任逢叶，5 年内由一个村子发展到 85 个村子，由 21 人发展到 1701 人，其中有不少人已识了 5000 字。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22 日）

工农干部当了完小教导主任

——记子洲第五完小教导主任马守韩同志

（1944年11月8日）

马守韩同志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文教会上报告他担任完小教导主任的经验。这个问题虽不是改造完小的主要问题，但他在执行新教育方针中，使教学和实际联系这一点上，提供了实贵的材料，并且说明了在文教工作中，工农干部和知识份子的合作，就会产生应有的成功。

从行政工作转到教育工作

马守韩同志是绥德吉镇区人，今年31岁，小时念过四五年书，15岁开始受苦14年，因此他说："学的一满荒废了，两手只知捏镢把把，颤得笔也捉不定了。"1940年绥德分区建立新政权，他被群众选择为吉镇联保（区）的联保主任（区长），后来历任绥德县田庄、义合、辛店等区区长，1941年曾到行政学院学习，今年正月由专署分配到子洲县工作。子洲县根据专署新教育方案，为了使教学和实

际联系，并适当调换行政干部和教育干部的工作，所以全县五个完小，就分配了三个工农干部去担任完小教导主任，马守韩同志就分配在第五完小。

开始碰到的困难

由一个工农干部出身的同志，去担任完小的教导主任，显然是个“外行”。开始时，马守韩同志心里也发着愁：“一满解不吓，怎能搞教育工作呢？”但是他却坚决的踏上了这个新的工作岗位。首先，在一般教员和学生中，对新教育方针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还存在着轻视工农的思想；再，大家对于教育历史上尚未有过的新措置，总抱着怀疑：“为什么今年上级派下一个外行来当教导主任呢？他能担当起这个工作吗？”因此，有的人看不起他，有的人故意为难他，有的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有些学生故意出算术题考问他。在教员分配课程时，大家故意把音乐课要他教，全校公民课也要他教，学校生产也要他领导，伙食也要他管；但马守韩同志抱着一个决心：“组织上分配那里就去作，干不了的就在实际中学！”

转变了大家的认识

五年级学生姜挹粹，出了一道退括弧的算术题来考他了，马守韩同志很费力的总算答中了。可是这还不够，接着又来了一道考题，马同志只得告诉学生：“你去问算术教员吧！”这一回学生算胜利了，但是学生挨考的日子也接着来了。有一天国文教员不在，请他代出五年级的作文题，他就要学生写一张路条，完小的五年级生，竟没有一个人会写，学生只好请教他。后来在学生生活检讨会上，姜挹粹和旁的同学都承认轻视马教导主任的错误。

马同志不懂得歌谱子，可是他对许多陕北小调很熟悉，他从群

众报上找到了《骑白马挂洋枪调》的全家福，《刘志丹调》的好消息，《打黄羊调》的收夏歌，《张生戏莺莺调》的锄草歌，《绣荷包调》等等教学生唱，得到了学生和当群众的热烈欢迎。马同志在过去实际工作中，对于政策法令是熟悉的，于是他就把《施政纲领》、《十大政策》、《租佃条例》、《婚姻法令》等等，作为公民课教给学生，并且还联系当地发生的实际问题来讲解。比如有一次区上闹着一个离婚案件，马同志给学生讲了《婚姻法令》和解决办法，学生起初还不信，偷偷地到区政府去问，结果却证明了马同志讲的完全正确。于是学生们把自己家里发生的问题，也来请教马同志了。学生李荣堂来问马先生，家里要抽回典出去的典地，有什么办法？马先生也给他说明了，连李荣堂的父亲也感激不尽。

学校生产种八垧地，要提粪、掏地、下种、锄草，别的先生说："只要我有劳动观念就是了，何必要我提粪、掏地呢？"他们觉得提粪经过街上难为情，还说掏地没镢头。于是马同志就首先担粪过街；没镢头，他到老百姓家帮助老汉老婆铡草喂料，老百姓高高兴兴的借镢头给他。学校里生产热情提高了，马同志又领了大的学生到地里，教给他们下种、锄草、奶粪、打卡的方法。一个学生家长乔老汉说："以前这些娃娃大人也使唤不动，尔刻他们放学回家。还要拾粪回来，马先生教的真比过去好得多。"

学生乔平安的父亲有病，家里的豌豆没人挽。马同志给同学们说明情况后，就有50多个学生都愿意去帮助乔安平。一个早上，就把两垧豌豆给挽好了。学生王月英家里来人叫他请假回去割麦，学生会一号召，又去了50多个同志帮助割。王月英没误课，而且麦子也很快割完了。从此该校在裴家湾群众的影响就增大了。

今年学校生产的蔬菜，70多个起灶学生也吃不完，马同志和大家商量，决定给贫困学生拓贵珍、拓葫菽的家庭送了两百多斤，并且给本街抗属拓巨银家里送了一担。当地群众拓治祥说："旧社会里饿死人也没人管，现在学校对念不起书的娃娃家里还有帮

助。”

有时学校里伙夫忙不过来，马同志就帮他担水作饭，伙夫的积极性提高了，饭菜也作得好了。起灶生中有些娃娃，晚上睡觉还要尿床，马同志半夜起来，给娃娃盖被子，叫醒他们起来小便，学生张树厚尿了床，马同志还帮他晒被子，还有拓亮儿病了，他也亲自照顾，病好了，娃娃的祖父把娃娃送到学校，交给马同志说：“尔刻咱一满放心了，你教乖了娃娃，还照顾得那样周到！”

在马同志的影响下，全校教员对执行新教育方针也注意了，5位教员都曾经轮流带了学生下乡，进行实际教学，他们每次下乡四、五天或一星期，自带粮食，帮助群众订农户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识字、读报，宣传清洁卫生，帮助区政府调查模范村毛家河等。由于半年来实际教育，学生的水准也比以前提高了。今年有四个距离毕业还短半年的学生，投考米中都被录取了。

自然，马守韩同志的工作还不能说是已经尽善尽美了，他还需要继续在工作中学习，尤其需要文化上的学习，这样才能使他所领导的完小更进一步向前发展。但是他已经给这个学校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打破了教员和学生们对工农干部的轻视与怀疑，这个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8日）

文教工作中的两位老先生

（1944 年 11 月 9 日）

（一）教育界前辈马次峰先生

马老先生今年已经六九高寿了，他从米脂到延安赶了 500 来里旅程，兴奋的来参加边区文教大会。他理解到：服务教育界 35 年，对于新教育方针，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他毫无倦意的参加每次大会或小会，提出办学的经验和问题，和代表们共同讨论研究。在每天紧张的会议生活中，他还仔细阅读解放日报，研究时事。

教育界的 35 年——马先生故居安徽桐城，祖代素以读书传家，父辈迁移陕西米脂，家庭贫寒，除住屋数栋外，别无财产土地，自幼攻读，17 岁进学，由秀才补修为廪生，18 岁起即自立私塾教学。光绪二十年甲午之役后，老先生目睹满清政治腐败已极，民怨沸腾，思想上即受影响，开始和同盟会携手。乃于光褚二十七年和先进之士合力创办盘龙公学，主张革政治、雪国耻、废八股、办新学、讲白话、反迷信，以教育学生。老先生又认识到，要使青年思想进步，除教以正规课程外，还要辅以现实的新知识，乃从北平办运

印刷机回米脂，在校内创办“日日报”。老先生对于贫寒青年无力入学者，则以免费，或从家庭经济中抽出贴补帮助，当时像盘龙公学这样新式的学堂，在全国也是不多的。但这个学堂，是处在封建统治势力的压力下，绥德州知州屡以银两接济，企图把老先生的盘龙公学接为官办，老先生始终置之不理。而当时新旧教育的斗争，更显著的表现在和科举、八股等旧教学的关系上，当时有些守旧士绅攻击老先生，说他办新学，讲白话，是“离经叛道”；说他反迷信，夺庙产——盘龙公学是庙址，是“天主教徒”；又说他是外来客户，侵占地方教育势力，宣传革命，是“危险份子”，因此群起而攻之，老先生几遭暗害。盘龙公学办了11年（光绪廿七年到民国元年）毕业学生共达200多人。辛亥革命后，老先生又相继在甘肃凉州师范、凉洲中学及榆林中学，瓦窑堡女校等执教约9年。大革命时代，在榆林井岳秀部政治处任常务执行委员，竭力宣传国共合作，及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联工农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因反动军阀不听老先生之忠劝，乃辞职回乡，民国廿四年任米脂女小教育主任，后任校长，于去年调任米脂东小校长。

参加文教大会——马老先生参加大会后，对文教工会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尤其关于教育方面。他说：“边区政府的新教育方针，实在是中国教育历史上的新倡导，教育界同人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否则是很难执行的。”他对完小教育的意见，认为像米脂东小女小，学生绝大部份是城市居民的子女，家庭多经营商业或工业，毕业学生大部升入中学或经营工商，因此城市完小和乡村完小不同，高年级课程应注意和中学衔接，这样，如有部份不能升学的，也要使他能为社会服务。

教育子女参加革命——马老先生长子马云程同志，是陕北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在北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害，次子翥秋，现在米中任教，三子健翎，现任民众剧团团长，四女凌波现在边区文协工作。据健翎、凌波二同志谈：“我们能有今日，父亲所给的教育和

影响是很大的。”老先生虽家庭贫寒，儿女成群时，几乎难于糊口，但他始终对升官发财之图，是深恶痛绝的。老先生对当时的《东方群众》，《顺天时报》等进步书报，非常珍惜。他常以正气和先进思想教育子女，勿以富为荣、贫寒为耻，且主张家庭民主自由，不让女子缠辫裹脚，准许子女社交自由，对子女参加革命，则尤加鼓励。故凌波同志于16岁时，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云程同志在革命工作中，因无钱接济家中，见老父困守家园，心中颇为难受，而跪哭求恕时，马老先生常以大义慰勉，并以自身决为真理奋斗，而鼓励子女为革命努力。

（二）刘凤舞先生捐地办学

早在土地革命时代，刘凤舞先生就是一位拥护革命的先进者，当时葭县倍甘区一带，常常被白军占领，革命同志和红军战士的活动很困难，刘凤舞先生就凭他对革命的热诚，把革命同志招待在他家里，做秘密工作，供给吃饭，接济子弹，帮助红军打白军。现在米脂的一科长郭文华同志和葭县的二科副科长张文实同志等，在土地革命时代，都曾经得到刘凤舞先生的帮助。

新政权建立后，刘先生拥护政府的政策法令和号召，在减租、生产、拥军等运动中，他总是积极的一个，附近群众都说他性格和平，为人公道。他有八九十垧地，部份自种，部份出租，他的租佃户都觉得他不是一个剥削穷汉的人，因租佃关系很好，他在群众中也有威信。

今年8月，刘先生参加了绥德分区文教会议，听到大会发动民办学校的号召，就当场表示捐地十垧，作为民乡学校的经费。会后，他回家开办，腾出了自家的窑作为课堂，教员就是他和他的儿子。他们父子俩虽然只是粗通文字，但是老百姓现在也只要求识些字，写写算算就够了。他们不知道怎样办学校，教的人只知道把自己的

认得的字，一个一个教给学生，先写在纸本本上，再在沙盘上或石板上一笔一笔的教，讲讲字的意思，就没有旁的课程了。他们没有礼拜天，教员学生也没有耽误生产，每天早上和中午，刘家山村15个娃娃，都到刘先生家上课——认字、写字，上罢课，就上山的上山，拦羊的拦羊，砍柴的砍柴。刘先生的学校虽然很简单，但是刘家山的老百姓都很高兴，他们说："没误生产，又没花钱，我们娃娃能认上字了！"

刘先生是葭县县参议会议长，今年52岁，因为路远，交通不便，没来参加边区文教大会，但是他曾提议过：希望各地士绅和富裕之家的知识青年，积极的参加文教工作，共同努力，来消减边区的文盲。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9日）

开展灭虫工作

这篇文章是根据绥德分区的情况而写的。
对于其它地区，这一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
——《解放日报》编者按

（1944年11月20日）

去年绥德分区的谷子被虫蛀了，根据专署的调查，全分区363076垧谷地。按每垧少收一斗半谷子计算，去年共损失54400多石。而今年比去年虫蛀更厉害，据该分区各县来人谈："蛀谷虫已蔓延各地，今年谷子收成只达二、三成。"子洲县苗家坪区调查：全区耕地面积17600多垧，谷地7783垧，占全部耕地面积44%，但今年有半数被虫蛀后，只能收获平年的五分之一（约一斗二三升左右），且有个别人家，或个别村子的谷地全被蛀完，颗粒不收。绥德四十里铺六乡傅家沟农民李玉华等3人，因谷子虫蛀而移民南下，12日到延安找工做，据他们说："绥米一带因今年虫蛀跌年成，下南路的人家很多。"李玉华今年种谷七垧，有三垧被虫蛀的没收成，还有四垧，每垧也只能打二斗多。又据绥德县最近的统计，全县

96000 垧谷地，每垧因虫蛀而少收四斗计算，共损失 38400 石谷子。如此，则全分区今年因虫害，估计将损失 145230 石谷子，这实在是一个可惊的数目呵！很明显的，蛀谷虫成了我们发展生产中的一个“大敌”。

回忆去年 6 月间，绥德谷地发现虫蛀，但当时缺乏方法和经验，又加反动派要进攻边区，我们忙于“自卫动员、制止内战”的紧急任务，因此去年没有抓紧进行消灭蛀谷虫的工作。后来由于领导上的注意研究，分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也提供了宝贵的防虫灭虫经验，各级干部深入群众搜集各种方法，和调查虫害损失，今年春耕前，专署也指示发动了“拾谷槎运动”，也向群众宣传选种和调剂籽种，也指示了锄草时注意除虫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对于这个“大敌”——蛀谷虫的严重性，还认识得不够，我们远没有把灭虫这个任务列为发展生产的重要工作之一；没有把灭虫造成全分区的普遍群众运动；没有把防虫灭虫的各种好办法好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没有把这个任务和订农户计划、和改良农作法、和组织变工队等工作联系起来；没有把一切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和蛀谷虫进行决斗。因此，今年蛀谷虫更加繁殖和蔓延，更严重的危害到分区的生产运动。

这两年来，我们的各种建设飞速进步，我们的工作越复杂，也就越需要具体和深入解决。

蛀谷虫虽是一条小小的虫仔，可是它却损害了我们 10 多万石谷子，如何消灭蛀谷虫的问题，已经成为今天绥德分区 52 万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对于谷子防虫、灭虫的方法已经很多了，总计共有十四种：(一)拾净谷槎，烧净谷槎；(二)选好种，不种干捞饭谷；(三)调槎种；(四)种坡洼地或沟条地；(五)掏钵钵安种；(六)谷地带种黄芥；(七)下种时拌和地药或黑矾；(八)存冬雪拌谷子下种；(九)溜崖拍畔，去尽杂草；(十)提倡沟洼地迟种；(十一)谷地疏散

种；(十二)锄草时注意拔除虫蛀的谷苗；(十三)烧净虫蛀过的高粱秆、玉米等；(十四)提倡秋翻秋耙等(这些方法及其好处，均在本报陆续介绍过)。我们必须把这些方法告诉每个老百姓知道，让老百姓自己来掌握这些和蛀谷虫进行斗争的武器并且要组织男女老幼，努力消灭蛀谷虫。

关于这，太行劓蝗的经验，是可供我们学习的。作者并愿提供几点意见，作为参考：

(一)建议分区党政，颁发联合指示，按时节发动各种防虫灭虫运动。

(二)建议分区、各县、各区、乡大小报纸和大众黑板，按时宣传防虫灭虫的办法和成绩，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分区并可出版消灭蛀谷虫通俗小册子，作为冬学和乡村干部冬训的教材之一。搜集材料编写秧歌剧，由文工团及各学校秧歌队利用集市、庙会、及春节活动，深入群众宣传动员。

(三)建议分区各级党政，具体规定奖惩办法，号召全体人民，和党政军民学，一齐动手，消灭蛀谷虫，和蛀谷虫争粮吃。

(四)破除群众中的迷信观念，彻底消除以为虫蛀是"天数"、"命运"、"虫神爷爷"等观点。以谷槎中的蛀虫向群众进行实际教育。

(五)在防虫灭虫运动中，发扬群众间团结友爱互助精神，克服各管各的保守观念。发动个人和个人、各户之间、各村之间、各地之间、各区之间的竞赛。说明"一家虫蛀害大家"的道理。

(六)建议分区各区乡，设立领导灭虫运动的群众组织，由行政负责人、劳动英雄或积极份子等负责，以便及时督促检查，进行奖励或批评。

(七)建议分区各合作社，有计划的到瓦窑堡一带购买黄芥籽；分区贸易公司设法购买地药、黑矾，以便转卖给各地群众应用。

最后，就目前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一)如政府的减租法令及

公粮任务，亟须作切实的调查后，迅予公布；(二)现在已有些移民南下，如何安置他们临时找工谋生，或由移垦区设法安插，或由各工厂招收，也要政府或工会来解决；(三)对受虫害较重的贫穷农户，当地政府须发动群众调剂借粮或救济粮，或组织各乡各村的信用合作社贷予款粮，解决吃粮困难。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 年 11 月 20 日）

今年冬季移民工作

（1944 年 11 月 28 日）

近来，在延绥道上，和延安市一带，经常可以见到三五成群的农民，他们朴实的脸上罩满着风尘，背上背着简单的铺盖卷，只要你问他们一声，就可以知道他们是绥德分区下来的移民，他们会告诉你："今年上边的庄稼收成不好，谷子虫蛀的厉害，下南路来找活做。"他们都是强壮的劳动力，在边区，凭他们的劳动，可以到处过生活，到处为建设边区而努力。

绥德分区全人口为 52 万多，耕地面积仅 135 万多垧。一遇歉收，人民生活即受影响。这几年虽有上万移民南下，但对绥德区地少人多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故大量移民，必须抓紧时机积极进行。今年冬季移民比往年更多，下来的不仅有石匠、土木工人或其他手工业者，且有大批农民南下。据米脂高家沟民办学校教员高怀山同志谈："全村原有 33 个劳动力，要移的有 24 个，村里只留下 9 个劳动力了。"事情是这样的：高家沟全村 50 户，只种地 500 多垧，内有两百多垧种谷子，今年虫蛀后，每垧平均只收两斗多，而且还有 300 多垧租地要出租子，全村有 261 人，生活就很困难，因此他们要南下，以冬季生产来补充收入。

冬季移民下来作什么事呢？据移民英雄汪丕应谈："冬季移民比春季移民好处多，尤其今年上边歉收，如明春下来，吃粮就发生困难。今冬南下，可以先找好地方，打窑洞、刨梢准备明春开荒，或打短工（每天除吃尚可赚1400元，合三升多小米），或烧木炭（四个人烧一万斤，能赚二三十万元），或砍柴卖（延市缺乏燃料，每斤柴价值卅元，一人一天可砍七八十斤）等。如几个人变工下来，更可以分工进行，一面以副业生产维持生活，一面准备明年开荒，这样，今年冬季可以把基础打下，明年一打春，就可以动手开荒。"

但冬季移民是有困难的，根据过去一般反映：（一）如有的认为冬季下去没事作，吃粮困难；（二）有的认为一般农民秋收后有了粮食，就得过且过，不想离家；（三）又有的说农民辛苦了一年，就想在家过年；（四）有的说冬季移民的婆姨娃娃怕冷，行路不便等等。不过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尤其在今年说来，情况更和往年不同。如第一个问题，已由上述汪丕应的谈话中答复了，冬季下来是有事作，有粮吃，如吃粮实在困难的，也有政府可以发动当地群众调剂借粮。至于第二第三两问题，由于歉收，大家都已看到，不能得过且过。并可进行解释说服，使大家了解，早下南路早翻身的道理。至于移民婆姨娃娃的问题，冬季移民最好不带，待明年有了生产基础后，再回去接家眷不迟。今年冬由于歉收的影响，绥区许多移民，现已自动南下，但是在领导上对有些问题仍须注意。

据建设厅高厅长和延属分区曹专员谈：过去移民工作，由于工作方式不好，如有的区乡政府命令发动，规定各地移民任务，分配数字，而使工作中产生了些毛病，如宣传固定，强迫命令，乃至强调依赖政府反感不满。所以今后移民工作，要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下进行，而政府不下命令。但对移民的帮助，当仍本着边府移民政策来作。

今后，上级政府虽然没有命令规定任务，但是我们为了适当的调剂绥德分区"地少人多"的基本问题，为了发展全边区的经济建

设，对移民工作，仍须视为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工作之一。抓紧任何时机，对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尤其像今年绥区歉收的情况下，冬季移民更要积极推动。比如子洲瓜园区发动冬季移民，便是一个好例子："该区发现了一个从南路回家的移民常存业，就根据他本人所说的，广泛宣传冬季移民的好处：时间充裕，不致手忙脚乱，且可进行冬季生产。群众了解后，报名南下的很多，区府已将他们组织起来，并通过他们再扩大动员，计划今冬移300个劳力南下。"

在宣传动员方面，要克服"宣传固定"、"强迫命令"、"依赖政府"等简单方式，多多采取具体领导的方式：如深入了解群众生活实况，调查移民对象，通过从南路翻身回家的移民、劳动英雄、积极分子、亲友关系等，进行说服解释；帮助移民解决困难，组织移民家属生产，解决移民留下的土地租佃关系及债务问题，如不准随便撤动移民租地，缓还债务，使移民南下安心生产。贫穷移民无吃粮或路费的，也可发动群众调剂救济或借贷。此外，在延属分区有计划的发动南下翻身的移民，回去宣传号召，组织乡亲南下，也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经这两年绥区移民工作经验，关于组织移民问题，是需要提出来的。在去年，大多是经过宣传动员，确定对象后，即由移民自动起身南下，有单身的，有带家属的，有三五成群的，但是多无组织。在这样情况下，有的移民因困难不易解决，或中途发生变化而动摇不走，有的南下后找不到地方而返回老家，领导上对移民工作的调查，也难于确实统计。所以今年春发动移民时，即提出要有组织的南下，而第一批汪丕应移民队，即达280余人，在汪丕应移民大队影响下，绥区各县移民工作，大多采用此法，三四十人、七八十人或百多人，成批成批的有组织移民。当时领导上并发动欢迎欢送，吹鼓手、铁炮、秧歌队、负责同志亲自出城迎送，招待吃饭，送粮送菜，移民运动的确搞得很热烈。过去对移民认为"穷汉们"没办法的事情，后来大家都觉得移民很光荣，是穷人翻身争取丰衣足食的好事

情。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组织移民，也是有缺点存在，比如沿途移民站没法招待食宿，路上容易发生问题，南下后，因延属分区村庄小，给成批移民调剂窑洞、粮食、工具等，也很困难完全解决，使部分移民不能完全满意。因此，今后可以组织小规模的移民两头变工，以村为单位，凡有移民三五人或七八人即可组织变工，他们一方面可以和本村亲友组织变工，他们一方面可以和本村亲友组织"并地变工"——如三人可种四人的地，抽出一人移民——，同时，和一起南下的移民组织变工。这样，移民家属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便可由变工队设法解决，南下后，变工开荒更可提高生产效率，作饭烧水，担水送饭，可变工札工，或捎作其它副业均可。这样小规模的组织变工南下，既可相互团结互助，又易于行动和安置。

最后，目前在绥区农村冬季工作中，如检查农户计划、冬学、自卫军冬训、减租、征粮或征收农业税等，都可以同时配合宣传动员冬季移民。但这一切，都必须是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进行，坚决反对摊派数目和强迫动员的方法，因为事实证明，强迫动员是不能巩固的；甚至对积极移民工作开展有妨害。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 年 11 月 28 日）

练兵两月

——边区部队练兵综合报导

（1946年1月26日）

清脆的军号声冲破严寒的静寂的清晨，边区各地人民的军队，立即从营房紧集到他们各自的练兵场上。西北高原刺骨的冷风侵袭着灰棉军衣的人们。但顷刻之间，在他们红黑壮健的脸孔上冒着热气，甚至满身淌汗。手榴弹穿过寒风在空中呼呼地飞来掠去，闪烁的枪尖白刃在迅速有劲的劈刺，杠架上的人翻着各式花样，这里还有20多斤的石锁、七八十斤的石担在和人们厮拚，独木桥、平顶棚、木马、靶场……各种练武的场合都挤满着人群。如果在月明之夜，练兵场上还可以找到散落的人群在操练，也有的在黎明前点灯作瞄准射击的练习。已经两个月了，他们从早到晚在锻炼着。

两个月中，他们已经得到了多少成绩呢？从目前各部队普遍举行的测验、检阅、竞赛和演习中可以看到。“战卫”团曾经演习实弹射击，“前声”连获得了光辉的成绩，全连机枪射击百发百中，平均打了21环，神枪手曹玉春三枪29环，胡思德等四人各打28环。警七团的技术、体育测验结果：优胜的五连投弹平均43.45米，全团

有5人各达60米以上，最高纪录的八连刘进高竞投68.8米。九连郭仲义、贺世仲以22秒钟武装通过全部障碍。他们还有大三套翻铁杠、武装并腿或分腿过木马等精彩表演。警九团六连举行了擂台比武，优秀的投弹手均在50米左右。警三旅各团先后进行的夜间袭击或防御的演习，更充分表现了他们的沉着、迅速、勇敢、机智的战斗精神，他们熟练的以苦练出来的技术应用于各种战术上。的确，两个月来，各部队无论在技术或战术上，都有了显著的成绩。

从已经收集的材料中，告诉我们关于获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里首先具备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是：人民的军队有着"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目的，他们是边区人民民主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军队内部具有丰富的民主生活，使他们养成为一支有自觉纪律的坚强队伍。战士们都能了解：只有提高自己的本领，才能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保证国内的民主和平。他们知道：在中国国家民主化的前夜，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国家的兵"。这也是我们部队政工人员值得骄傲的成就。

在全体指战员们一致的思想基础上，于是他们根据了过去两届练兵的经验——必须有事先的充分准备。比如关于练兵用的工具和练兵中饱暖的生活保证。早在秋收时期，他们就修筑练兵场、制造各种练武器械、砍柴、织制毛衣、毛袜、毛手套，并且还屯积了他们自己劳动所获的白面、菜蔬以及自己养的猪和羊，这些物质准备，保障他们能够兵强马壮的练武。接着，几乎每个连队、连、排、都订了练兵计划，他们根据自己原来的基础，拟订了练兵中奋斗的目标。前一时期，各部队又成立了培养练兵骨干的组织，如"红星"部的教导大队，五旅的轮训队，警一旅的干训队等。这批练兵骨干也要经过紧张的苦练，以便掌握技术回去领导大家，因而他们更需要学习练兵中的领导方法，比如怎样帮助练兵中的典型人物（或单位）以推动一般？如何照顾练兵中的体弱战士？练兵中的支部工作及俱乐部工作的具体内容？军政工作怎样配合？练兵中的文化学

习，以及部队内部关系等问题，都是练兵骨干的学习内容。

获得成绩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具体表现练兵中部队民主生活的群众路线。他们执行了毛主席所指示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方针。在练兵场上，他们依据不是官或兵，而是具体的本事。只要那个战士能够看出他的指挥员的动作有不对的地方，他就可以立即指出来纠正，任何一个战士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可以得到大家的拥戴。比如“战卫”团“前卫”连的战士于英和张文明劈刀技术很好，连部就让他俩担任劈刀教练，于英根据他几年来劈刀的心得吸收过去刀法的精华，另编了一套新刀法，操课时，指导员和排长们也跟着大家一起学。警三旅的“练兵联手”运动已成为“兵教兵”的好榜样。他们各找相好的对象，根据各人的特长和缺点实行互相帮助。通讯连四班的牛世良和王荣华结成联手，由牛教要领，王教文化，早晨互相叫起床，互相帮助勤务公差，一起习体育，共同研究战斗时的互助办法。由于联手们相互帮助的热情，激发了联手之间竞赛和整个部队的练兵热潮。

部队首长的亲自负责和内部关系的团结，也是推广练兵的一个因素。比如“胜利”部的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每天早晨都参加直属部队的早操，有时更在天没有亮以前，就出发去检查数里或十里外的营连练兵情形，营连干部普遍参加早操和直接指挥操课，总支书记亲自喊口令，指挥团直早操，因此战士们的情绪更加起劲，天不亮就闻声相约起床、燃起火堆练武。“战卫”团“前遣”连的干部和战士关系，亲密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他们相互间体贴爱护，因而大大提高冬训学习情绪。如九班副安文汉跳木马跌晕了，七班长和九班长马上把他扶起，一二排的同志们也停止了游戏，跑去问长问短，有的忙着在伤处抚摸，背到窑里又给他用热手巾敷伤处，连长回来时不顾点名就去安慰他，并嘱咐他好好休息。“前遣”、“前卫”两连，由于伙夫关系的亲密，改了伙食。“前卫”炊事员有为战士服务的思想，因此他们能积极想办法改善伙食，每顿饭

有干稀两种，饭谱花样多：黄米干饭、黄米馒头、花卷、蒸糕等调换着吃，他们切菜很细，大部份炒的吃。因战士们很高兴，经常帮助伙房做饭、担水、练兵时也更加起劲了。

边区部队不仅在冬季时专门练兵，就在平常即使是劳动生产的空隙中，他们也尽可能利用时机去温习上届练兵所学的技术。比如"黄河"部一营从去年春耕到秋收没有间断过投弹。二连三排生产时上山带着手榴弹投上去，回来时又投下来，他们还学习了怎样在绝壁上向上投弹的方法。一连生产中休息时间，就把投弹当成娱乐。

最令人兴奋的：我们边区部队是有文化教养的军队，在冬训中不只练武还学习文化、他们约有30%时间享受政治文化教育。这里可以听到雄壮的歌声，可以看到战士们演的戏，战士们买的书；他们已经不以消灭文盲为满足，而且进一步要求读报纸、写通讯、乃至为他们自己办报；他们不仅认会几个字，而且会写信，懂得一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常识。部队的医务工作者，也在努力地为增强战士的健康而工作，他们要消除和预防疾病的发生，更使得战士们了解清洁卫生的重要。这里可以看到一幅"兵营学校"的风景：

"起来，不愿意作奴隶的人们，拿我们的生命，争取我们新的自由民主，团结到了最需要的时候……"这支歌声经常洋溢在三旅八团的操场上课堂里。过新年前，"战卫"团各连战士日夜赶排着《保卫和平》、《两亲家》等短剧。三旅《塞锋报》的《战士的画》已经出版到第五期，从画里可以看到他们练兵竞赛大会上的场面，可以看到他们练兵中的官兵关系。各地的宣传队、剧社同志们，正在深入连队开展部队文艺工作。

部队新闻工作者，也在努力地为兵服务。目前以反映练兵为中心内容的部队油印报纸就有十多种。全边区部队可以读到联政编的《部队生活》报，各旅团有《塞锋报》、《勇敢报》、《部队工作》报、

《战旗》报、《猛进》报、《战屯》报及《边防战士》、《前哨》、《胜利》等报；而更为可贵的、各部队几乎普遍的建立了黑板报，三旅九团五连自《李文奎班》开创，每个班都有一个《练兵小报》，全连有47个战士写稿，真正作到了“战士办报战士看”。他们为推动写稿情绪和学习写稿方法曾经举行过“通讯展览”，战士们拥挤着参观各报登载出来的部队通讯，从中研究这些稿子被刊登的原因。这种方法极大地激励了战士们的热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月26日）

“国家的兵”及其它

——延安各界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侧影

（1946 年 2 月 5 日）

“国家的兵”

大会场上，教导旅九团四连的指战员们，背着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步枪和机枪，融汇在千万群众的欢腾中，但是，他们另有更深的感觉，那是由于他们以八年的亲身流血搏斗，换来了和平与民主，很多战士挂过彩。他们都是来自辽远的平西北——宣（化）、涿（鹿）、怀（来）、涞水、房（山）涞（水）涿（州）、宛平等地。过去，他们都是炭工和农民，现在成了人民的子弟兵。曾经转战平西、平北、冀东和晋西北等根据地达六年，到边区后，又进行了两年的生产和练兵。今天——从战争转入和平的一天，四连同志们向记者追述了八年的战斗经过。他们参加过下述几个主要战役：“1938 年冀东密云沙峪战斗、1939 年 11 月的房山南北窑战斗，1940 年宛平张家庄战斗、涞水韩庄战斗、涞水龙儿窑战斗，以及百团大战中的上下河（宣

化县)战斗,1941 年反"扫荡"中的涞水八里塘岭战斗……这一切,都清楚地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曾把偏僻落后的涿州野山坡群众组织与教育成为最坚强的人民抗日的部队。一排长郭继承曾经在 1938 年的沙岭战斗中挂彩掉队,后来又在敌占区化装乞丐返回队伍,现在在秧歌队中扮演"推小车"中小媳妇的陈凤亭,生动地谈着百团大战中歼灭敌人的经过,抗战最坚苦的 1942 年,部队执行了精兵政策,但是战士小个子张进友仍旧返回了部队,他说:"我要跟着八路军坚决抗日!"现在他还常常回忆当时跟着部队不愿回家的情景。

他们今天又想起了战斗中倒下的战友,尤其残酷的是,1941 年反"扫荡"中的涞水八里塘岭战斗,为了掩护军部的转移,敌人猛攻不下而施放毒瓦斯,一个排的战友只剩下了一个;韩庄战斗中歼敌 40 多,但是他们的政治处主任也牺牲了。在庆祝和平声中,他们不禁为殉国的战友而哀悼。

当他们转展调到边区整训时,到达驻地才休息两天,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三天就扛起镢头上山生产。另一件值得记忆的事:在连部姜玉昆同志的领导下,仅仅以 12 块白洋的基金,建立了连队的家务。经过两年练兵,他们的军事技术提高了——过去只是凭英勇和力气和敌人拚命,现在他们懂得了许多技术的要领,他们渴望在整编后接受新式武器的装备。全连的文盲已被消灭,能写信,读报,现在他们自己办了一个"练兵小报"。

今天,战士们表演着平西北风味的"推小车",歌唱着人民军队的胜利。盟国记者特别把他们摄进了镜头。在大会上,他们听着朱总司令的讲话:"拥护军队国家化!"不断鼓掌拥护,因为他们的八年的英勇抗日是为着自己祖国的利益,为着人民的利益,从来就是为国家的和平与民主而战斗,他们早就是"国家的兵"。

长者之言

这些日子，每当飞机的马达声由远及近的在延市上空萦绕的时候，高斗垣老先生总是带着关切国家大事的心情立即从炕上起来，站在清凉山头上瞻望。这位被四书五经消磨了青春的前清秀才，今年已经是76岁的花白胡子老人了。他的外甥张光裕是南关乡乡长，今天一早特地来告诉他，开庆祝大会的消息，这位老人不禁喜出望外的激动地说："久盼的和平终于实现了！"

毛主席从重庆回来，签订了"双十协定"，他曾经有过最大的喜悦，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又进攻解放区了，于是，他那极度喜悦的心情又沉浸在暗淡的忧虑里。

这次，政治协商会在重庆开会，他同样的关心着时局发展，他曾向人们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者，民心也！"——"民为贵"。共产党处处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依据，所以处处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前几天，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度飞回延安，——这位在西安事变时，奔走和平的国家民族的功臣，一谈起来，高老先生不断点头称是："好！这次又是周恩来……"

"唔，毛主席好比北斗星，他引导着人民从暗夜走向光明！"高老先生称颂着兴奋而充满信心的笑了！

高老先生身上穿的青灰布短皮袄，还是大前年林主席送给他的，共产党敬老尊贤的思想，他是钦佩，他以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生活中度过他的晚年而感觉骄傲。

个个健康，才能建国

在新成立的西北医校秧歌队里，记者偶然访问了一位名叫郑

英的队员。

这位秧歌队员的化装，骤然看到会使人忍不住发笑，使人联想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但是此刻，他却极其庄重的对记者说：“我是第一次扭秧歌，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和平民主大会。原来我没打算扭秧歌，后来一听说政治协商会已开成功，我就立即向秧歌队报了名。”

他又说：“和平一来到，我们医校的担子也加重了，我们要配合和平建设时期，加紧研究医学，减少老百姓的疾病死亡，个个健康结实，这样才能好好生产，好好建国。”

这时另一些秧歌队员也围拢来，讨论起时事来。有一个满脸涂着灰油彩的队员用谨慎而有信心的口气说：

“和平是实现了，民主和建国还得努力争取哩！”

河南老乡的争论

人们都参加大会去了，今天新市场后沟这一排铁匠炉都熄火了，听不见往日钉铛钉铛的锤铮声，但是，在和暖的太阳光下，有几个穿短袄的面色黧黑的铁匠工人正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什么，仿佛在争吵一般……。

“东走西移故乡难离——还是回去好！”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在说。

“在边区，吃得饱，穿得暖，生意又发展，回去干什？”另一个青年人在不同意地说。

这是长兴炉伙计杨金银在和瑞兴炉掌柜杜明编在争论着回河南的事。

最近回河南看老家的人多起来了，杜明编也想回河南看一下，他的家在河南孟津，隔一条河就是八路军所在地的济源。他来延安，已经8年多了。故乡的田园已经荒芜8年了——但他还是永远

思念着那一片祖先遗留下来的土地。

杜明编常常到豫忠成修理铺打听国事消息，豫忠成的掌柜李安斌也常常给他读报，他知道如今的世事大大的好转了——全国都要实行和平民主了！

“回去也好，不回去也好——只要全国认真实行和平民主，俺们不是就可以把河南建成边区一样的好吗？”这个 14 岁的聪明的小学徒徐俊斌的话，把争论着的双方都引得笑了。

“民主！和平！全国人民在光明中奋斗前进！”秧歌队的雄壮歌声又过来了！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 年 2 月 5 日）

访问参议员

（1946 年 3 月 30 日）

“共产党决不包办”

赤水参议员李仲仁先生在国民党区淳化县教育界服务了 18 年，前年才回到赤水。去年普选中，被选为赤水县副议长及候补边区参议员。

去年，是他活了 44 岁第一次亲历民主选举。他说：“在国民党那里，选举是圈定、指派、贿赂。在边区则是要选谁就选谁。”

他说：“去年普选开始，有一桩事使他发生了一点误会，随后就消释了。”在选举边区参议员前，赤水中共县委会曾提出了 5 个候选人，（其中 4 个为无党派人士，1 人为共产党员）提供群众选择，并说明群众尚可自由提出，李仲仁先生发生了疑问：“共产党主张民主选举，就应该让老百姓自由提候选人，为什么要先提呢？”

李仲仁先生说：后来老百姓也提了很多候选人，也把我提了出来；候选人不单发到全县去，让大家自由选举，结果提的 5 个人，就选择了两个。这事，我的疑惑，终于被事实打消了。

李先生微笑的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员，也被选上了，我才相信：共产党讲民主，决不包办。"

真民主和假民主

两届连选连任的淳化县副县长房文醴参议员严肃地叙述了一件事。

去年腊月，国民党区商县西乡六保刘家庙选举联保主任，上头指定了3个候选人，其中有一个叫赵立三，是一个刮地皮、害百姓的老联保主任。老百姓投票了，一个都没投他，召集会的人无理的说："没选好，不算，要重新选。"第二次老百姓又没给姓赵的投一票，召集会的人恼了，就说："不选了，还是赵主任当上！"于是老百姓都散走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民选'"，亲历了边区民主生活的房老先生幽默地说。

坐在旁边的关中中心区议员张自强先生补充说："这里还有一个笑话哩！去年9月里，中部县北乡选省参政员索性就只提了一个候选人。四圣村的张学让是中部县一个中学的校长，他到省里活动了一下，省里就要县长保证把他选上。后来开始选举了，也不召集群众，只是由联保处聘请了几个人去投票，路村40多户人，只去了三个舐沟子的人，就算把省议员选了。

张议员在边区当过乡长，领导过边区的民选，他发问："像中部那样选举，一不报告历史，二不报告工作，提一个，选一个，这叫啥民主？国民党的民主只是句空头话。"

年青的老人

八一老人高愉庭先生是那样的高兴，微笑着回忆他在上次议

会闭幕时所说的："别时容易见时难，……我恐怕是不可能再和大家相见了。"但是，现在仍然那么健旺的赶来与会。而且他还那么骄傲的口夸说："一路上，米脂到延安5百多里旅程，我不需要他们——同行议员——的照顾，每天早起还得走上十来八里，旅途起居比他们还利洒。"马继棠议员也赞扬这位老人精神实在好。姬伯雄议员走到清涧石嘴驿时得了病，老人又把他的架窝子让给姬议员坐了。

另外，更有一种热情鼓舞着这位老人，因为上次议会上他曾说过："我不睡在炕上等着死，我还要和各位、和边区150万人民和全国同胞一块奋斗，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而现在，事实并没有辜负老人底愿望，我们的抗战终于胜利了。"这是胜利后的民主盛会，这是边区开始和平建设的盛会。我还活着，我还走得，怎能不去参加呢？"因此，亲友们无论怎样的劝说，都阻止不了老人对延安的向往。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3月30日）

悲！愤！

（1946年4月18日）

洪流　田方　漠冰
午人　普金　铁夫

送挽联的行列

“本报特写”昨日上午1时，议员们组成的送挽联的行列由南门外供销处出发，后面跟着5个民间吹鼓手，那个吹着唢呐的老年人——张好学，把自己心中的悲愤断续的吹出来。他是一个当了20多年的吹手，送过许许多多的死者，可是他说没有一次使他像这次感动，他说：“叶军长他们为咱老百姓死，给他们吹唢呐都是光荣的。”在这送挽联的行列后面，走着55岁的延市卫生合作社老医生杨关甫，他是途中自动参加的，边走边擦着眼泪，他手执的花圈由于他的双手的颤抖而摇晃，花圈内的“功于民族，永垂万世”的八个大字上都染上了泪水。蒙民们用自己的文字写着挽幛，他们写着：“沉没了慈航，使我们悲哀；发扬起民主，慰先烈英灵！”参议员尔计巴图低垂着头走着，到陵场时，他去逐一地察看了一切安排，他说：“我们活着的人为你们的落葬虽是尽了一点心，但是担负起

你们未完的工作，在今天才是开始。”

热泪盈眶缝葬衣

十四号是星期日，当被服局干服组工人，为死难者赶缝葬衣的时候，手里拿起衣料，要照身躯高矮裁衣的时候，独如看到死者遗尸，更直接的感到悲伤，有的心胆跳得平静不下来，有的热泪盈眶几乎看不清楚针线的穿引，大家抑制着哀思在赶缝，特别是吴士云同志，一面缝一面向大家叮嘱：“他们死了，我们还是要裁得整齐，他们穿上合适，也算表示了我们悼念的意思。”他们一点不草率，连制服裤子的插手口袋也同样来夹缝上，全组12位工友，两天就赶缝起17套棉制服，17套衬衣，17床被子和褥子，17幅睡枕。他们赶工的速度，正如工会主任黄振声同志说的：平时一组一天就只缝五六套制服，可是17套就在星期日一天赶起了。张炳耀同志回忆起半年前为王若飞同志量衣服的情景：这是去年王若飞同志将同毛主席赴重庆前几天，张炳耀同志还记得清楚，是九月的一个晚上九点，他骑马去到枣园，当时天边下小雨，若飞同志正忙开会，可是对量衣来的工友，很客气的握手，让坐让茶。还恳切的说：“天气不好，路上不好走呢？”最后因天晚了，专派车把他送回工厂。想到这里，张炳耀拭着眼泪，说：“若飞同志对我们工人的爱护，这不是个人的友谊，这是阶级的友爱。”

献一棵最大的花树

桥镇乡的女天主教徒聚集在童贞女的石窑里，大家忙着扎纸花，女教士张崇一先生提议：“我们多扎些玉贞花献给他们，因为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忠贞不贰，他们应该享受我们的崇高的尊敬。”男教徒提议：“按照最光荣的标准，献给他们一颗最大和最好的花树，

立即女教徒们就默默地接受了这意见，大家动起手来。在昨日一大清早，他们就派李生秀先生赶进城去补买纸张和白绸，准备再送一幅大的祭幛。

新市场的杂货铺掌柜，50多岁的成怀吉，几日来心里充满了悲伤，他和杜明海、杨红义等人商量要献上一篇祭文。虽然他的眼睛有些花了，腿也有些硬了，但是他却一连走到市政府和市委去了，又到处找人帮助他写祭文。他不识字，但是心里却有着不能不说出来的话。

万民同吊

文化沟口的商民们，这几天每个人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12日那天晚上当他们从读报中听到黑茶山飞机失事的消息以后，各人回到自己店铺里哭了。哭的最厉害的是大众理发馆的掌柜李浪贤。

李浪贤是四川人，1932年就参加了人民军队，因在抗日战争中负伤，于1939年退伍。他痛惜自己几个领袖的遇难，更愤恨反动派破坏民主、和平的恶毒阴谋。他说："我们在前方流血拚命打败了日本，中国才说要得到和平，反动派又要捣乱，我们的领袖为了维护和平，千辛万苦的奔走努力，以致遇难……"

他跑到区政府要了一块黑纱，缠在自己的臂上，然后他又约了本乡的十几个退伍军人和几家店铺，缝制了两幅挽联，又做了两幅花圈，他们正在设法找吹手，准备把它们送到烈士们的陵前去。其中有一幅挽联上写着"万民同吊"。

他说："我们这些领袖死了，不仅边区人民悲痛，全国老百姓都悲痛，我们要努力完成他们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我把自己的家务搞好，再帮助别人建立家务，全边区的人都团结好、建设好，领导全国实现和平民主，他们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死，我们要把和平民主实现

来纪念他们。”他的老婆说：“我们的领袖死了，想什么办法，也不能再活，我们不管大人小孩都要加一把劲，使中国老姓都翻了身，来报答他们。”

李浪贤说，尸体运来了，他一定要去亲自看看才安心。

尽咱们一点心意

祭场和陵场上，拥挤着成群的群众，他们为了安葬自己的伟大战友，自动赶来做工：修墓穴，扎祭坛……。

尹家沟的52岁的王仁义老汉，家里正在揭地，但他宁肯叫牛站下，也要跑来参加。他一面用锹铲土，一边低着头又在沉思，他自己对自己说：“这些人都是给老百姓办大事的，死了实在可惜！”接着他又像很生气的说：“反动派没心肝，和平了老百姓都喜欢，你为啥偏要独裁打内战？！”他这样大的年纪，却一直弯着腰在挖土，他说：“这是尽咱们一点心意。”

商会会长王克温先生，每天领着商民去修扎祭坛，常常在月夜里才回去。他说：“飞机失事的消息在市场传开以后，大家都难过的没法说，连山上小孩子也关心的到处传送消息。”他说现在商民们都在赶制花圈、挽联、许多人还在抢着订吹手。他又说：“我们要更努力，共尝甘苦，跟着共产党为和平民主奋斗，这些首长活着时给老百姓办大事，我们把一份小事弄好、也就用这点心意回答他们。”

七十老妇哭哑喉咙

在修陵的群众中，有三个泥水工人是亲兄弟，他们的名字靳老三、靳老六和靳老七。

他们的老家是河南，1942年因受不住国民党的剥削压迫及灾荒的威胁，全家28口人一起逃来边区。在我党政帮助下，几年来已

经建立了丰厚的家务。4月13日他们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后，想到共产党给他们的好处，全家人大哭。70多岁的靳老太太，哭泣着说："我活了70岁，没见过像咱共产党和边区对老百姓这样爱护，这样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打算，我这一家人，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打救，早就没有性命了，如今日本打败了，中国该和平了，那知道反动派那些狗养的，不顾老百姓死活，只想剥削老百姓血汗，不让老百姓民主讲话，回想在河南时我们受他们的那些罪，与咱边区比真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这些领袖为老百姓利益死了，这是咱全中国老百姓的损失，咱老百姓一定要为他们带孝，我要告诉老四（靳来川）老五（来江）（他们现在八路军中工作）要好好的在八路军美美的工作，把反动派消灭才能过安生日子。"靳老太太，连哭三次，连喉咙都哭哑了。她们全家送了一幅挽联，一个花圈，靳老三弟兄三个，便自动从20里外的延安县刘万家沟跑来参加修陵工作。他们说："咱们把墓修的结结实实的，报恩吧！"

水有源、树有根

"水有源、树有根，同志，没有共产党咱们穷人怎能翻身！？"乔秉忠，手擦在胸口，似乎急着要把几天来梗在心坎里的话掏出来。他一早起，花了11万元买了八尺白细布，要请人把他的意思写出来，挂到死者的追悼大会上。在绥德分区议员小组住的客栈里，乔秉忠找到了他，老乡安参议员旅亭，商量办理这件心事。他真诚淳朴告诉被感动的人们：

"我是子洲双湖峪人，过去租种人家的地，整年劳动，下来倒四、六分，差不多都给了地主，自己吃不饱。共产党到了子洲，就实行减租，我的日月比前强了些。后来共产党的县委书记马义同志劝我下南路，我相信他的话，到了延安。"

仅仅4年多，乔秉忠由于政府商业政策的扶植，边区银行曾给

他贷款30万元，他从一个花生摊，发展到现在拥有1000万资本的小字号——永兴和。他说："我的好日子和共产党分不开，听到共产党首长的牺牲，心里实在难受。"他眼睛有些湿润。乔秉忠虽然不知道死难者的历史，但是他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不那样谋害老百姓，他们就不会这样冒着风雨而牺牲。牺牲那么多大人材是多么可惜呀！"但是他又很有信心的说："只要老百姓和共产党始终在一起，千千万万的人里又会产生那样的大人材！"

王老妈妈让出寿木

旧城乡王礼法的母亲，68岁的老妈妈，将她20年前做下的老寿木让给遇难的叶挺将军等同志，16日那天，天刮着风沙，下着雨，她见一群背着衣包的新四旅士兵走进门来躲雨，她急忙喊儿媳妇去烧开水招待，她因为把新四旅误听作新四军了，她拉住一个战士说："我们旧城乡的百姓都早早买好香、表，我明天把娃娃都引上、到飞机场给你们叶军长去烧纸，叶军长为咱们百姓事死得真可怜，我人看不到了，骨灰也得去看啊！"王老妈妈眼泪汪汪地说："叶军长这次回来，可以见一下毛主席，很喜欢的，一家人团圆了。就说'几年，我在坐禁闭，我要和毛主席谈谈大事呀，'那晓得坐飞机竟遭了大祸，我们老百姓听了真真难过呀！"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4月18日）

记八一老人高愉庭

（1946 年 4 月 24 日）

“在延安，青年人当然完全是年青的，甚至老年人也都变得年青了。”这是一位外国新闻记者说过的话。你若不信，那末只要你来和几位年老的边区参议员接触几次，你也就会产生同样的感觉。这一届边参会中最高龄的八一老人高愉庭议员，就是这样一位“年青的老人”。

他经常对人们谦逊的说：“年老了，脑筋旧了。”但是听他讲的话，或是知道他身世的人，就会觉得高老的脑筋里却装着许多新思想。

下面是关于高老的几个故事：无论谁到过米脂的，只要你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那里中年以下的妇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她们差不多都有一双天足，健康的、自由自在地行走着。下面就是关于这事的经过。

远在清光绪卅一年间，就是我们现在这位高老他看到封建的统治者，硬把她们的足缠成“三寸金莲”。高老在当时就看不过去了，于是就发起组织“放足会”，在他的亲朋友好中吸收会员，每个会员有义务劝说其家中的妇女放足。从那一年开始，积年累月的，

一劝十、十劝百，从城里到乡下，从这村到那村，已经缠上的被解放了，穿上了不大相称的文明鞋，女孩子们从此就避免了这种封建毒害——缠足的痛苦。

高老对地方教育事业的建树很大，他曾一手创办女子小学，筹建北门小学，就教东门小学。其中尤其值得记载的是关于女校的成成。30多年来，它已经为陕北教育了数百名女知识份子，直到现在，3百多学生的米脂女校已经成为边区唯一的女子学校。这个功绩是与高老分不开的。现在，高老捋着髯须，叙述着这段可贵的过程：

“民国三年，在这偏僻的陕北，女孩子长到10来岁，就不能出头露面的走街了，人们对女人评判的标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女子上学念书是多么艰难的事啊！但是我觉得男女应该平权，女子为什么不应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呢？”于是他便设法交涉到盘龙山庙产的收入，在文庙后边的僻静处修建了三间校舍；聘请老先生当教员。好不容易才劝动了六七家开明家长的女子入学，开始教认字、写字，得到了家长们的赞许，女学生增加到10多个，民国七年聘请了一位从北平求学回乡的女士担任教员，课程增加了“女子修身教课书”，刺绣、唱歌。于是学生又增加到30多人。米脂女校的初期，总算这样顺利的过去了。但是接着讲下去的时候，却使高老感到一种痛恨和愤怒：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军阀在陕北到处搜捕革命份子，恐怖的空气笼罩着米脂，反动军阀特别注视那几个学校。讲到这里，他的眼里充满着怒火，他告诉我说：“有6个……6个刚从学校出去的年青人，被抓去在十里铺枪毙了。”那时候，反动军阀眼目中的知识分子就是“危险分子”，而举办女子教育的“高愉庭”，也就被它们怀疑了。学校也因此大受影响，女校只剩下几个学生了。但是老人并没有被吓退，他还要坚持下去。反动军阀因为顾忌到他终究还是士绅阶层场面上的人物，也不敢加害于他。高老凭藉他当时的身

份，曾掩护了他的儿子和其他革命者的活动。高老感到光荣地回忆说："大约是民国十七年吧！现在我们的边区财经办事处主任贾拓夫同志，当时因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而隐藏在我家一个多月，我家有一个地窖，可以让他躲着作事。"

这位老人的家庭，是一个革命的民主的家庭。老人自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一家人除了和他八一齐龄的老夫人，和大儿媳妇料理家务，以及几个幼孙外，大儿任职区文书，二儿现任边府教育厅中等教育科长，二儿媳参加新闻工作，两位孙子一在边区医院学医，一在七里铺汽车队学习。老人见到儿孙辈均能为人民服务而喜悦，至于儿孙们选择工作岗位、择偶婚姻事，他也从不加以干涉或包办，因为他的家庭教育从来就是："不求升官发财，但求服务社会。"

这样一位正派、公正、热心社会建设、赞成民主的老年人，米脂人民在1944年6月间便把他选为县参议会议长及边区参议员。从此他对地方人民的事业更加关心了，虽然已是耄耋老人，每次米脂群众集会都要亲自参加鼓励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他觉得发展生产使人人饱食暖衣，真是一件大好事，于是他也捻起毛线，庭院里也叫家人种起菜来，他告诉人说："像咱们那样不劳而食的人，真是对社会有愧！"他认为减租减息是很应该的，因为他知道："地主单单依靠佃户交租过活的日子应该过去了。"他荣任县议长后，就订了一份报纸，虽年老眼花，每天总得化半天时间细细阅读。他可以清楚的告诉人们关于时局形势的现况和发展过程，也更加认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和人民事业的光明前途。几年来边区民主建设的成就，鼓舞着高老赶来参加还个民主盛会。在边参会开幕的前一天，高老进入会场参观布 置的情形，他抚摸着黑绿色的讲台，踏上淡赭色的主席团台阶，欣赏那台边摆设着初春茁长的花草，红布白字的标语，鲜红的旗帜……一切都使他感到那么亲切可爱。他是那样兴奋的告人说："我有信心活下去，看到边区建设得更好。"他对

于米脂县的议会工作，也率直的提出他的意见说：

“地方人士为地方办事，也要众人齐心，大家动手。但是米脂的常驻议员大多各有兼职——如米中校长马济川，东小校长马次岭等，因此议会工作不免受到影响。以后要使常驻议会起作用，就得有经常工作，设立办公处和秘书，经常和各乡人民代表取得联系，了解人民的意见，常驻议员最好每年定期抽出时间组织几次参观团，轮流到各区乡去征询民间意见。这样，上边和下边有了联系，议会就可以随时提出应兴应革事宜，供给政府参考采纳，乡村自治建设好了，县的自治就有了基础，也就可以把全边区建设得更好。”

老人捋着雪白的髯须，似乎在憧憬着这块新中国的雏型——新民主义的边区，将推行到全中国去，于是老人微笑了。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 年 4 月 24 日）

教育家马议员济川

（1946 年 5 月 13 日）

“马校长”，这是人们对于服务教育界 20 年的马参议员济川的尊称。他长着一表学者的仪容：椭圆形的脸下飘着一撮髯须，他的背有点驼，谈吐缓慢，多深思熟虑，平时就爱沉默寡言，他为人正派，秉性耿直，一手楷书，也如其人一般的工整。

22 年以前，他跨出了北平师大的校门，感染着“五四”运动中的民主、科学思想，走进了教育界之门。其中，除了“九·一八”前夕被统治者以“马济川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拘留 10 个月（判处徒刑两年），以及曾任兰州西北新闻日报编辑共约两年时间外，马校长就没有离开过朝气勃勃的青年学生。从他开始执教于榆林中学起，直到现在的米脂中学，在他的民主思想教育下，培养了许多陕北的革命战士。

1925 年，大革命开始，马校长担任了陕北革命知识份子活动中心——榆林中学的教务主任，他继承了榆中的革命传统，在同学们的思想激荡下，给大家讲解李大钊同志等的社会科学著作。现在他还清楚的记得。比如：“从经济上接受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科学人生观序言”“辩证唯物论公式”……。

“那时我们听了这些社会科学知识，是多么高兴呀！”民众剧团团长马健翎同志回忆着说。

健翎同志正是当时榆中的学生，由于他俩的师生关系，所以我们的谈话更显得亲切，健翎同志谈：“当时榆中同学在马校长的启蒙下，情绪兴奋极了、无论上什么课，同学们都要求他讲社会科学。”他把一个一个同学的名字记起来，他们曾经在一起接受马校长的教育，而现在都坚强的站在革命的岗位上。

榆中同学们在陕北革命高潮下，被社会科学的思想武装了，于是学生运动从细小的反对学校伙食不好的斗争，发展到与落后教职员及学生的斗争、反对学校不良制度的斗争，甚至敢与地方军阀部队冲突。直到1927年春，陕北革命的领导者和马校长带领着榆中同学走上了街头，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大　下，举行了“陕北各县各界代表大会”，而马校长则是大会主席之一，他们叫出了响亮的口号：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军阀拉丁派差……会后，榆中同学们走进了工厂、农村、军队。各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工会、妇女协会。甚至在军阀井岳秀的部队里、修械所里、毛织工厂里，也发现了榆中同学的活动。

从此，马校长也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之一，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常被怀疑、被控告、被辞退。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教育工作。抗战后，他回到了自己温暖的故乡——新民主主义的陕甘宁边区。

20年来，他从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兰州男子师范、女子师范，直到现在的米脂中学，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近年来，他从过去的经验基础上，又充溢了“为人民服务”的新教育思想。于是，现在他深深的体会到，应该怎样为人民培养出一批能干的人材。米脂人民相信他，付托他代表大家来参加这个民主大会。

马校长最关心着改进边区的教育事业，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有百年大计，用大力来培养人材，他很沉静而有系统的谈述他的意

见："就以米中同学来说，一般的政治思想水平，几年来的确大有进步。但是由于他们在小学时的程度低，中学的程度还不能令人满意，所以目前我们首先要着手加紧培养和提高师资，除现有师范学校外，各中学也可以依条件设立师范班。在学习期中，更要注意联系群众的实习，只有使他们懂得把课本和实际经验去结合，才能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而对于教员在政治上、物质上的待遇，也要尽可能的给予提高，使他们能安心工作，提高对边区人民的责任心。这样，小学质量提高后，中学生的程度也可以随着提高了。"

在本届边参会上，马校长和霍祝三等议员合提的"加强干部教育改进工作作风"议案。以及他和杨和亭等议员合提的"加强县长及专署科长以上干部学习，以便精通业务"等有关教育的提案，都已在大会上通过。现在马校长已荣任本届政府委员之一，我们可相信，马校长对于边区教育事业，将更会以充分地发挥他卓越的智能。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 年 5 月 13 日）

日记的一页

（1946 年 5 月 16 日）

在旧日记本里，我找到了 1942 年的一页日记：

“9 月 20 日，　博古同志报告”

那时候，正是西北局发布“关于解放日报的决定”以后，报社决定派一些同志到各分区去，加强采访工作和健全通讯网。在我们出发以前，博古同志给我们作了一个报告。

读着这一天的日记，立刻可以回想起来：

在我们编辑部办公室前的院里，五六十同志围坐在他的四周，他吸着卷烟，闪亮的眼睛不断移动着，当他注视着你的时候，就好像特别亲切而和善地在叮嘱你。他告诉我们：“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的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底一部份。”

他指示我们要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一定要在工作中挤出时间去向群众学习。”

“尊重地方上的领导，在工作中求得人家的信任和帮助，”他说：“这是你们下乡的工作任务之一。”

接着，他讲了写什么？怎样写呢？

“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在平凡的群众里去找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事物。”

“浮光掠影、走马看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刻的了解事物，才能浅出地把它反映出来。”“写作的形式和文字要打破老一套的格式，废除新闻八股；要写出老百姓的语言，但是，我们要反对庸俗的通俗。”

“多写群众活动，多报告具体事实，少发表空洞的议论。”

最后，他特别强调培养地方通讯的问题时说：

“我们不仅是带了笔自己去写，更需要培植当地的通讯员；只有依靠广大通讯员，报纸才能有群众基础。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本身业务。我们必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细心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除了现有的知识分子通讯员以外，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

“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上去采访，千成不要像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要像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今天在全边区各地党委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拥有一千多通讯员的通讯员网，就是根据当时他的指示建立起来的。

博古同志还再三叮嘱过我们：“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他在3年多以前说的这些话，我将永远把它铭记在心头。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5月16日）

谈米脂小型合作社

——访问建设厅合作科郝丰田、王耀德二同志

（1946年6月1日）

建设厅合作科的同志，经常在一起考虑着：今后的合作社究竟怎样办？提出一些什么具体办法供给各地参考？……。虽然，合作科曾经检讨了1944年6月召开的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后，所产生的偏向及经验教训，而一连串具体问题，仍在他们的思考中盘旋着。

今年2月间，合作科副科长郝丰田和王耀德两同志专门到米脂调查民丰、印斗两区的小型合作社。这次回延，给他们带来了信心，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真正是群众自己所办、适合群众要求的合作社。他们回延后，即将调查材料整理成册，记者即根据其材料并前往访问，他们觉得那些材料和经验，是可以介绍出来，供给大家参考研究的。

他们在那里共调查了17个小型合作社，那些合作社大多是粮

食信用合作，其中也有兼营生产与消费合作，它们分散在各个村庄里，股金并不多，17社一共只有股额粮食55石、黑豆12石、钱700多万元，但是，它们却在1500个(户)社员中，帮助了312户解决了各种困难。那些合作社干部都由群众自己选举，其中除少数略取米津或以身份股计算外，大多数为义务兼办。那些合作创办于1943年或1944年、他们曾经经历过1945年的歉收和日寇投降后金融波动、物价猛跌的波浪，在各地多数合作社遭受严重影响或倒闭结束声中，米脂的那些小型合作社仍然稳健的站立在农村中，起着它们应有的作用。

"根据当地老百姓最迫切需要的，也是最容易办好的来办。"这是1944年米脂县委关于合作社问题的研究时就指出的。当时米脂老百姓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

米脂地少人多，粮食不足，许多人往往在青黄不接时需要借粮，区通过农民自己的粮食信用合作，即可避免高利贷的剥削，比如：印斗区一乡印斗村的县劳动英雄闫明彩，1943年10月在村农会会员大会上，发动大家集粮成立信用合作社，他提出的理由是："减租减息以后，一般地主都不愿意放账，即使有一两人放账，利息相当大，我们为了解决自己的吃粮困难，不吃"驴打滚"、"挖钵子"的亏，我们可以自己来集股办信用合作。"当时该村的减租工作做得很好，农会会员都得了减租的利益，于是当场就你三升、我五升的，53户农会会员就集合了九斗六升小米和七斗三升麦子。他们借粮的利息，只规定每月每斗为三合利(一般的私人放款利息为七、八合)。

其次，由于米脂土地集中，农民缺乏土地，减租后地主出卖土地，但农民经济力量不足，他们便通过信用合作，在集体互助下向地主购买土地。如印斗区七乡杜家崖窑村、在1942年以前全村自种地不到50垧，其余大多是租种民丰区高庙山地主常有义的地，

减租后，地主即提出要卖地，3年中，该村农民向地主买进土地200多垧。但同时，由于农民以粮食买地，就影响了吃粮更加困难。比如农民杜良德原有6垧地，1944年冬买了五垧半，1945年春吃粮就困难了，向合作社借了三斗麦子，三斗米，夏收时本利还清；同年5月他又买了三垧地，到7月吃粮困难，又向合作社借了五斗麦子、三斗米，收秋后如数归还。因此杜良德不仅单纯的解决了吃粮困难，而且，更由于增加了8垧半自地而更加积极的生产了。信用合作社给予杜良德的经济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此外因劳动力多，需要合作社组织副业生产。如民丰区刘家岭村接近炭窑，合作社就组织有驴户贩炭。比如该村艾丕令和别人伙喂一头驴，要贩炭没本钱，向合作社借了一斗半米后，就解决了问题。民丰区远志山的纺织传习所，由合作社放款作纺织资本或购买工具；高福禄借粮一石多进行家庭纺织，盈利100多万元。印斗、民丰两区社发花收纱共达3000多斤，给纺妇们挣了130多石小米工资。

多数小型合作社为贫穷户解决了婚丧疾病中的经济困难；去年秋时，因庄稼被冷子侵袭而影响收成，贫穷社员即可抽股或取回红利，以解决吃粮困难，如此，它又产生着备荒中的义仓作用。

那些合作社在群众需要中产生，因此它没有强迫摊派入股的现象，它们根据自己的力量，从经济上团结起来，为自己解决着迫切的困难，减少了中间人的剥削。

“要坚持和贯彻由群众办、为群众办、让群众放手办的方针”这也是1944年米脂县委关于合作社方针的意见。一年多来的经验证明，群众在他们自己的经济组织中，是最会掌握民主权利，也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办好合作社。而这些小型合作社，正是最密切联系着基层群众的经济利益。

办合作社时，群众还举出自己所熟悉而信任的人来负责、而被

选的合作社干部，也最容易了解本村群众的需要，他们能够忠心耿耿的为本村人民服务。比如高家岭粮食信用社的艾芝兰、艾绳前、艾芝元等，积极为村民服务。两年来，他们把原股额四石二斗，帮助了18户贩炭运输者增加了收人，又使合作社增加了五石多利润，而他们自己却不取任何报酬。同时，群众又容易直接监督合作社干部的不良行为，比如民丰区磨石沟合作社主任高仰山和染匠共同贪污染料等，不久即被群众发觉在撤换斗争时，高承认错误并赔还贪污款项200多万元。

合作社的举办业务、存放款的利息、期限、对象等，都可以直接由社员们民主公议。比如印斗村的农会合作社，于1944年2月间开始放款时没有经验，只凭个别的口头传说就发放，知道早的人先借到、借粮数也没有规定，只放了6个人，存粮就很少了，后来的人没有借到。于是就宣布停放，5月间将放粮全部收回并召开社员大会(非社员亦有参加)，讨论放粮办法，先由需要借粮的社员报名借粮数，由大家根据合作社存粮多少和借粮户的经济情况，决定每个人应否借，或应借多少。此外如期限、利息、手续等，也经大家议决遵照执行。

在这样民主自由的经济合作中培养了廉洁奉公的干部，他们能够更加具体了解群众的需要，更好的为群众服务，成为米脂人民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一环。它们不讲究形式上的铺张，实事求是的，有多少力量作多少事。同时也使群众更加直接地深切体会到合作社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但是，米脂小型合作社的发展，也曾经产生过偏向和缺点，在1944年广泛发展的初期，全县小型的农村合作社共达137个，大多集中在民丰、印斗两区，甚至一个村里有农会的、妇女的、儿童的几种合作社，使力量过于分散而办不成事，有的地方也有摊派股金现象，有的集股后还没有决定举办什么业务，而一般的因开始初

办，基础薄弱、缺乏经验，不免产生很多缺点，又加去年领导上有些放任自流，许多小型合作社便在自生自灭中渐趋消沉。

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也发现急待改进的几个问题，比如合作社干部中，由于个别投机商人和不良地主的参加，而发生贪污违法等现象，没有服务群众的观点；干部待遇不平衡，“作好设奖，作坏不罚”，使得有些人不愿意任职；有的合作社本身办工厂，而不组织群众生产，结果合作社赔本又没有为群众服务；一般的都缺少很好的制度、章程，合作社没有公积金、公益金，因而影响它建立长远的基础。而在今后发展中，除了各级行政上的指导和帮助外，更需要有自下而上的比较大的合作社，在业务上和各小型合作社取得联系和帮助组织计划。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 年 6 月 1 日）

光华农场参观记

（1946 年 6 月 17 日）

杜甫川里一片宽广的川地上，正试验着和繁殖着各种各样优良品种的庄稼、蔬菜、果木和鲜艳的花卉。种菜英雄黄立德被调在光华农场的农业试验组工作，他正和工人们在一起移栽甘蓝苗，清凉的井水从辘轳上绞出来，流入平整的园地。农场场长贺寿山同志和农试组组长金平同志，引导着记者参观他们劳作的成绩：

“燕八一一”、“燕一五”、抗旱谷的新谷种、产量特多的马齿玉米、优秀的美国白皮洋芋、肥大的黄金烟叶……都长出了茁壮的绿苗。果圆里齐整茂密的苹果树上，已经结上了不少的小果实；葡萄藤攀缘在架子上，也结上了累累的小珠珠；还有桃、杏、梨、枣、……成行的排列着，它们中有的已经被分派到各地老百姓的土地上去了。我们欣赏着香艳的芍药、牡丹、月季红，清癯的白菊，秀气的麝香石竹，……我们在伏地丛生的草莓地前停下来了，场长摘起一颗颗淡红色的果实，让我们尝试它甜里带酸的美味。在有规则的图案似的菜畦里，正长着绿嫩的玻璃生菜，番茄、甘蓝、菜豆……。它们——庄稼、蔬菜、果木、花卉来自边区各地农村，它们也有由从广东、广西、四川、西安等外地远道来此，更有的坐了飞机从国外带到

这里。经过试验培植后，它们中有的已经适合于这西北高原的水土，而生根开花传下了他们的籽种。它们将从这200多亩川地上，散播到边区各地，为边区人民增加粮食和营养。老百姓熟悉杜甫川，杜甫川里给他们传来了良种。

贺、金二位热忱的带着记者参观新型的水井，设备周到的温室，他们告诉记者关于每种作物的来源、试种的结果和它的利益。

农场5年来(1940年——1945年)的总结中开头这样写着："一切工作多半是从摸索中吸收经验教训及与老百姓交换意见得来的。"它开创时的目的，仅是为了病员、婴孩及体弱的干部需要牛奶营养而办的一个牧场，附带着进行部份试验研究工作。1941年为了集中技术人员的力量，边区农校的农事检验场合并到农场。1942年工合苗圃也归农场领导。此后农场规模略具。就分为农艺、园艺和畜牧兽医三部门。于是它就以配合边区农业建设及改进农业技术为目的，规定了为边区人民服务的任务。但是这确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比如在开办后的两年中，他们还缺乏工作经验，没有工作中心，也不知道什么品种可以在边区推广，五花八门的品种都进行了试验。畜牧方面也是进行了各种家畜的育种工作。直到1943年开始，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了中心任务，经过他们试验成功的各种优良品种，就逐步推广到农村了。今年，在各分区已经繁殖的良种基础上，农场又通过建设厅发放了良种狼尾谷20石(可播种92000多亩)。马齿玉米20石(可播种4万多亩)，美国白皮洋芋15000斤(可播种1300多亩)。糖紫葡籽可供1500亩播种，黄金烟叶可供1万亩播种……。畜牧兽医方面，如繁殖滩羊、供给牛奶，制造青贮草、牛瘟血清的试制成功，都在困难的物资条件下，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正如贺场长所说的："过去由于对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所以农场的技术研究和提高，没有很好的和老百姓的经验联系起来，以致它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大。"为了克服这

缺点，他们将在下半年分派人到各分区去，了解农村情况，总结群众经验。

几年来，他们搜集了本地的外来的品种共有三百多种，经过试育淘汰，到去年为止，真正能够在边区推广的，保留下数种了。比如谷子试验的结果，狼尾谷是最好、产量最多的一种。后来又新来了"燕八一一"，"燕一五"，和抗旱谷三种，产量比狼尾谷还要多，尤其是抗旱谷更有早熟、搞旱的物长，平均每亩产量有一石〇四升，所以它很有发展的前途。如果各分区都能设立农场，那末经光华农场试验成功的良种繁殖工作，会更有效的通过各级干部，更直接的深入到农村中去。

场长又谈着关于畜牧兽医组的工作情况（该组组长是姜恒明同志），现在农场有 18 条奶牛，每天可以供给 300 磅奶量，它们使延安 5 百多位老弱、病员及首长们，适当地解决了保健问题，但是牛奶的消毒，除了订户自己煮沸消毒外，还待努力研究改进的。畜牧兽医组在 1942 年以前，也曾经着重畜牧试验工作，他们饲养过美利诺羊、西路羊、黑紫羔羊、草地马、黑燕片驴、关中牛。这些工作因为不能获得成绩而逐渐放松了。直到 1942 年，边区境内兽疫流行，他们的工作重心就移到兽医方面，那一年的牛瘟自富县开始，经甘泉、延安、安塞等地转到靖边，兽医防疫人员紧张的下乡工作，1943 年 7 月农场开始制造牛瘟血清，并进行防治工作，而牛瘟血清和疫苗的制造，也是他们有仪器药物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比如没有柠檬酸纳，他们就用玻璃棒搅血液使不凝固，没有自动注射器，就用手压灌肠器来代替。1944 年底他们已制出了高度免疫血清一五八、二三〇CC，和疫苗一〇四、一一五 CC。治好了 103 头病牛，预防注射的犍牛 3019 头。

农场的同志们牢记着去年年底西北局召开的农业座谈会的总精神，"改进农业技术，是今后边区生产运动中极重要的工作。"习仲勋同志也常亲自到农场去给他们指示鼓励，他们认识到他们工

作的重大意义，他们得到鼓舞，他们能在这里静静的、安心的、愉快地工作着。姜恒明同志是盐城人，过去曾在中央大学专修畜牧兽医；金平同志是河南渑池人，过去曾在兰州国立西北技专毕业，他们两人都是去年从重庆一起来延安，参加了光华农场的工作。现在他们更亲切的体会到，他们所学的理论和技术，已经在这块新民主主义的土地上，为边区农民服务了。不过，贺场长告诉记者，现在农场的同志大多是外来干部，虽然他们都能安心工作，而我们更要注意培养地方干部，而干部的调动是需要政府及时帮助解决的。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 年 6 月 17 日）

地主欺压佃戶无理抽地
县府处理租佃纠纷不妥

（1946年7月14日）

庆阳市决定目前以保佃为中心

《本报镇原讯》王如东、张世俊报道：上月19日本县召开区书、区长联席会，检查减租工作，发现地主无理收回土地的现象很多，甚至为收回土地而殴打佃户。会中并检讨了县府处理的土地纠纷案件亦不妥当。当即决定今后必须严格执行减租条例并继续进行查租。兹将事实概述如下：马渠二乡梁塞子地主张发瑞，共有600多亩土地，均租给别人种。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拔了张发瑞家一个壮丁，张叫佃户王宗义出壮丁顶替，允换给长期租种权，王家壮丁当了8年兵去年回来了，今年春天张发瑞却无故要收回土地，王不给，地主便拉马到王的麦地乱踏，王宗义老婆惠彩英在田里锄麦，看见后即前去阻挡，张发瑞便把她打成重伤。以后张又把牛吆到王的春麦地里乱踏，王去挡牛，又被张打了一顿。张并骄横的说："我把他打死了，就当不要梁塞子的地了。"同时张并长收王租子四

石二斗二升，又到县上去告佃户，县府不调查真情，就写信批评区级干部照顾不善。

孟坝三乡二村地主林汉三，要收回佃户路姓地 13 亩，路姓已经种了几亩胡麻，地主又重在该地种了小豆，捣乱佃户生产，后经政府调查，才把地退给佃户。马渠三乡三村地主虎归山，想收回租给路生连地 150 亩，他以为佃户没有钱买地，就提出要卖地，根据法令，佃户有买地优先权，路生连准备卖粮买地时，他又不卖了。四乡三村地主虎济清，共有 1000 多亩，这两年共长收租 19 石，佃户算帐要他退租，他便躲避不理。三乡三村地主何自兴，去年强迫收回佃户郭发久地 70 亩，但收回的地现在还荒着。

孟塘三村佃户王述杰，租种张国祯土地，今年春天王已把粪送到地里了，张无故要收回土地，两人去县上诉讼，司法处书记员不调查研究，即要王述杰把地还给地主。佃户说："我已经把粪送到地里了，还了地我就没地种了！"而书记员却说："你可以把粪拿出，倒在地畔上，快把地还给张国祯！"后来区级干部看到这样处理不适当，又决定要地主把地退给佃户种。七乡西壕村佃户段荣租刘仲言的地，也被书记员这样判决给地主了。郭发久租地主何自兴地 70 亩，经县上判决让地主收回，但地主收回让地荒着，县府却不管，气的佃户说："政府说不让地主无故收回土地，又把地断给地主了，不知是什么道理。"综合上述情形，联席会上决定：无故收回的土地一定要退还佃户，如果地主真正地不够种，可以酌情退地双方照顾。地主长收佃户的租子必须退还，如以后再打佃户，定要严重处理。地主卖地，佃户可以合伙买，合伙种。现在佃户种地，因为溜崖掏畔，土地面积比过去增加了，双方应另订新约。

（编者按：这些决定是否妥善，请看本日本版短评。又，由于佃户改良土地而扩大耕地及其他的利益，在佃户租种期内应归佃户所有，只有地主投资改良土地方可酌加地租。）

《本报庆阳讯》庆阳市最近检讨及布置查租工作。据各乡反映：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地主无理收回了大批土地。如地主田玉亭、田长吾，前年秋为要抽地，借口全部出当给驻军，一次即收回三乡田家城10家佃户72亩土地，但驻军仅种了一年，他即将地大部收回。北关地主陈翔初，亦于去秋陆续收回陈学华地10亩。又如三乡地主李义，近将佃户张存孝住窑收回，并声称麦收后即全部抽回土地(26亩)。该佃户虽气愤不平，但因过去领导上注意不够，佃户仍畏惧地主，不敢公开和地主讲道理。其他并发现某些地主单方增加租额。在上述租佃问题发生时，乡干部多认为没办法，而放任下去。干部无信心，放松领导，佃户怕地主，只得忍气吞声，致使租佃纠纷仍严重的存在着。故市府决定目前应以保障佃权为中心，地主无端抽回去的土地，须退还原佃户耕种。目前将首先解决地主田玉亭、田长吾无理抽地并发生的纠纷。(于淮阳)

(编者按：保佃必须以减租为基础，地主抽地，主要就是不满减租，故也有地主长收租子的事，因此只有在贯彻减租的条件下进行保佃，才符合于农民的利益。)

短评

对镇原查租工作的意见

从镇原县的查租工作报道中，可以看到该县领导上已经注意到严重存在的租佃关系问题，并且在讨论解决的办法，这是很好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该县某些地主相当狡猾，他们想尽各种方法，利用各种手段欺压佃户。而过去县府处理这些租佃纠纷案件上，还缺乏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与切实为解决佃户疾苦的群众观点。

再：从他们这次讨论今后办法中，也可以看出有些问题还欠妥

当：比如地主张发瑞不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叫佃户顶替壮丁，且在新政权下亦无故收回佃户土地，故意破坏佃户生产，甚至殴伤佃户，像这样破坏政府减租法令，破坏生产、侵害人权的地主，是应该按照政府法领令，给予严重处罚的。但该县仅决定："地主应还给佃户长收租子，以后再打佃户的话，定要受严重处罚。"至于以前地主打了人如何处罚？今后如何保障佃户的佃权和人权呢？却没有进一步的讨论和更合理的处理。又比如关于地主要收回土地的问题，他们也只是决定"酌情退地，双方照顾"，而按照边区土地条例21条所规定却是："出租人依法收回租地时，应顾及承租人生活。……"所以无论按情按法，这种含糊不明确的态度，是不妥当的，这会给某些地主留下无故抽地的借口，和妨碍佃户佃权的保障。

最后，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该县没有深入的检讨过去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为什么处理不妥当？干部思想上有些什么原因阻碍着？特别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今后办法上，没有好好研究如何去启发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自己起来向某些顽固地主说理，坚决要求减租、要求保佃、要求保障人权，并以此教育地主，使他们了解到减租政策是合理而且必须彻底执行的。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7月14日）

新疆归来同志访谈

（1946 年 8 月 3 日）

盛世才的阴险

现在他们已经回到了延安，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对于残害他们的刽子手的仇恨。

抗战初期，当全国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盛世才这个蛰居在中国西北角的土皇帝，更加假惺惺地加强他的“亲苏外交”，再向延安聘请一批干部，去装饰他的进步面貌。其它各地进步人士也真诚的跑向新疆。他漂亮的说：“六大政策，是马列主义在新疆的具体运用。”但当希特勒匪帮扑到莫斯科大门的时候，盛世才立刻把他的“六大政策”翻成“反苏反共”，他称心称意地打算着和希特勒会师西伯利亚，但他恐惧周围的人都会反对他。

于是，为新疆人民努力服务了 4 年的我们的同志，被盛世才捕进了牢狱，那是 1942 年 9 月 17 日的事。

不忘刽子手的仇

这里只介绍一下李宗林同志，他曾经担任过新疆日报的编辑长。他和其他的七八位同志，在1938年那年由延安去迪化，那时新疆日报报馆仅仅有三四间平房和几张办公桌，印刷机和铅字都陈旧不堪了，报纸印刷出来只见一堆堆黑墨迹，它的内容更不必谈了，原来办报的人，虽然也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但是他们只知道通过新闻界的桥梁达到当官的目的，而李宗林同志他们，却是肩负着为新疆人民服务的重担，他们人数虽少，而几乎从国际国内地方新闻的编辑，撰述时评社论、采访联络，直到校对和打纸版，都由他们几个人和新疆几位进步人士担负，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着。外界进步通讯社有了联络，新疆的通讯、发行网建立了，从苏联买来了新式的印刷机和铸字模，还帮助培养新疆的地方干部。于是一个近代化的日报便传布在新疆的各个偏僻的角落。但是，他们得到的后果怎样呢？盛世才把他们逮捕了。李宗林同志，在牢狱的折磨中，神经受了很大损伤。我访问他的前一天，他曾经发过病，他手脚抽搐，或拳打脚踢，怒骂法西斯特务，事后，全身软弱，骨痛头胀，痛苦不可言状。

一条心，一个声音

62岁的苏妈妈——已故的苏兆征同志的夫人，同样遭受着国民党法西斯份子的迫害，在新疆坐了4年监牢。她告诉我，统治者曾经派它的爪牙，想从这位年迈的老太太身上，找出办法击破他们同难者的一致行动，但是法西斯分子们失败了。苏妈妈以广东口音谈述她对答那些鹰犬的几次审问。

鹰犬们装着和气，给倒茶、递纸烟，露出笑容：问："老妈妈，送

你到原藉去，好吗？”

答：“不，我要回老家。”

问：“噢，对，那末送你回广东去吧！？”

答：“不，我要回延安，延安是我的老家！”

问：“延安，你不怕共产党和八路军吗？！”

答：“是，他们都很好！”

鹰犬们无可奈何，恼怒地挥着手：“滚！下去！”狱卒将苏妈妈拖入牢中。

三四岁的孩儿们，不幸地，在这中国阴暗的角落里长大。但是，他们也懂得，用他们的小歌喉唱出：

“……小小的娃娃也要坐监牢，吃也吃不饱住也住不好，锁上两重门儿不许跑；小小的八路也要讲道理，反对用野蛮，要求回延安，你看我长大起来了不起。……”

他们，129个，一条心，一个声音：“要求回延安，回到我们革命者底故乡！”他们在窒息的牢狱里，怀念延安——他们拚出壮烈的声音唱着：

“让带锈的铁门更加锁紧些吧！我只要热血未凝，一片赤心，永远归向延安！”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8月3日）

公共卫生训练班

（1946 年 10 月 16 日）

今年三月间，总卫生部、联防卫生部、“红星”部卫生部合组了一个“卫生考察组”，到部队里去作典型调查，发现了因方针问题而严重地阻碍着部队卫生工作的发展。

那是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团，他们在抗战中曾经多次打垮数倍兵力的敌人。但是“医疗考察组”从该团 585 人的体格检查中，证实每个战士平均得过四种传染病，特别是疟疾、痢疾、伤寒、感冒、结核、麻疹及肠胃病，而传染病又占死亡的半数，战士们都生了虱子，但他们中很多人却认为虱子是由人体的肉皮里生出来的！有的人漠然地对待可怕的蛔虫，而且说：“人吃五谷，哪能不病?!”“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很显然，部队中是太缺乏卫生常识的教育了。但是部队卫生机关呢?他们的工作也繁忙而艰苦，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下，药品器材极端缺乏，而许多病人却等待着治疗，过去卫生工作的方针如果能以“预防为主”，那末，情况也许会好些：可惜没有这样做。

为此，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在苏、傅院长领导下，决定创办公共卫生训练班。其目的在于提高在职医务人员之技术能力，授以预防

医学及公共卫生的技能；改造学员的思想，使之全心全意为士兵群众服务，并加强其预防为主的观点。5月间，便配合着党章学习开始第一期训练。

李志中同志给我上面这个概括的印象后，便领着我去参观他们的具体设施。

这是一所灭虱的房子，里面分室隔开，有脱衣、交衣，淋浴洗澡，蒸汽灭虱锅，干烘灭虱炕，治疗台和穿衣间。可以想像到，一个生虱子的人是怎样舒适愉快的走出这屋子。在此，李志中同志告诉我一个可惊的故事："1944年××部因虱子的媒介普遍发生了回归热，他们用全部生产基金买了"六〇六"，依然治不好，病者占满了几个医院的床位，所有的医疗队都出动了，而结果还是死亡了100多人。"但是一个旅是完全有力量建筑这样一座灭虱间，可以避免这样严重损失的。

我们又参观了不同式样的垃圾箱，改良的水井，干净的厨房……。

在环境卫生实习场里，有适合于兵营、工厂、学校、机关、市集、农村的各种环境卫生的设施，以各种模型罗布在一块院子的地上。有厕所、便池、焚化炉、炉渣井、垃圾坑、储粪池、陷蛆井、沙滤桶、沉淀缸……。马教员又带着去参观他的环境卫生实验室，这里有各种实物显示着灭蝇、灭蟑、捕鼠、消毒等方法；有各种改良厨房、厕所、猪圈的小模型和图例。以及饮水消毒箱，预防注射箱，简易治疗箱等等。

所有这一切建筑和设施，都是学员们在实习中亲自动手建设起来的。

卫生化学科主任翁远同志在他的实验室里，和我谈述着他和学员怎样在研究边区各种地方病，比如关中、陇东、南泥湾、金盆湾一带流行的柳拐子病，吐黄水病等，他们从中研究着"人与水"的关系，由于水不知剥夺了多少人的健康和生命，由于水，不知减少了

多少劳动力。他们于是开始在延安东、南、北三区实习，检验了9000多人饮用的18处井水和泉水、并向各单位提供改良的办法。

李志中同志又给我解释了参考室内挂着的各种统计图表，据说徐老曾来参观这些图表，他觉得很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延安市附近13个村子在一年内死亡的人数中，因患传染病而死的占47%。这些人是完全有可能用预防而避免早亡的。

他们又给我翻开了学员们四个月来学习进程的记录、笔记本以及两次测验（包括卫生化学和环境卫生测验）中学员们的卷子。这一切给人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由于党章学习与技术学习紧密结合，他们的进步是很快的。相信他们将会有效地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6日）

关于联系实际

（1946 年 10 月 24 日）

问

我们现在开始重新学习党章，大家都知道要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但是怎样来联系实际，我们发生了争论，我的意见是：我们要面向实际，从实际出发、就是说首先要检查我们工作中的优点、缺点，找出其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也就是说首先检查工作与改进工作，而后检讨与改造个人思想，对工作应有总结，对个人应有鉴定。但有位同志说："像你这样说，那我们就干脆检查工作，为什么还要学习党章呢？"他认为首先要学习党章，因为党章是我们党 24 年的经验总结，我们不了解党章，党的原则，就没办法同实际去联系。我说："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这些就是党的原则，我们的思想与工作都可以根据这些原则来检讨改进。他说，那我们难道就不学习党章以及看书看报吗？他还说像我这样说法只能把今天的工作作好，将来到外面就没办法作好工作，甚至就没有办法去作工作，因为不懂党的原则。我认为他是教条主义的学习，好像是想记些条文，所谓联系实际只是顺手

牵羊，精神上还不准备彻底检查工作。他认为我是轻视文件，轻视党章。这就是我们争论的问题，希望编者给我们指出一条这路。

（张放猪于本报行政区）

答

张放猪同志：

你们的争论很好，这种争论就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你强调检讨工作，那位同志强调学习党章，都有道理，也都多少有些片面性，各执一端，当然谈不拢来。我们学习党章，是要把党章和工作联系起来，因此那位同志的意见，可以作为你的意见的补充。应该好好学习党章，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但是学是为了用，不是为了别的；是用毛主席思想作为武器来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检查应有总结，也就是说应该把检查的结果、经验加以分析，再把党章中有关的部分来联系起来研究，看有些什么心得；拿这种心得去改正和指导工作，看有些什么效果，以后还可以再回到党章来检查，来研究，看又有什么心得；这样，用党章来指导实践，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又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然后再提高到理论……这样一次比一次丰富，即有了进步。这点意见你们看对不对？

（编者）

如何联系实际

目前各部门党章学习都在积极进行。在学习方法中，首先发生的是关于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今天除了个别部门正纠正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外，可以说大多数部门是基本上掌握了这个正确方法。但是，究竟"联系"什么"实际"呢？这个问题有些同志的认识上，却是比较模糊的。近来，各部门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上虽有不同，可是有一些部门的同志，在生活问题上，特别对总务工作的联系比较多。固然，吃饭穿衣也是实际问题，总务工作没有做好，就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各部门负责人和全体同志都应该关心和帮助把这工作作好，总务工作的同志，尤其对这一工作的责任心和制度上加以检讨，从而依照具体条件来改进工作（这也可以说即是总务部门所需要联系的实际问题）。但我们更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正处于战争的环境，所需要解决的更重大的实际问题很多，有些同志如果斤斤计较于一些生活琐事，不仅他个人需要从思想上加以检讨，而且对于整个工作的改进是非常有害的。因此，领导学习的同志，应该善于把大家引向联系到对于本部门目前工作最有迫切关系的问题上；要从大家提出的许多问题中，找取与分析中心的与关键的问题，比如怎样紧缩机构，充实下层，灵活制度，加强每个人的工作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以适合备战的需要，便是当前的重

要问题；有些部门干部不安心工作，有的工作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或有个别铺张浪费的现象，那末我们便可以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除了由于平时忽视干部思想教育的原因外，在领导作风上，是否还存在官僚主义或事务主义？在业务方针上，是否还有偏差？在机构与制度上，是否还欠妥善或不够缜密？……。只有把党章学习联系实际于主要的基本的问题上，才能进一步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

（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 年 10 月 24 日）

第三篇

转战陕北

拉开陕北战场的序幕

——西华池遭遇战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对我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后，改变为重点进攻战略，集中其两部主力，在东部由徐州略取鲁中烟台地区，西部略取革命圣地延安，打乱革命神经中枢，然后以钳形攻势夹击华北，与我解放军进行主力决战。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集中其多年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优势部队，妄图一举攻占延安，歼灭我西北野战军。1947年2月间，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环境的延安紧张起来了。清凉山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已经进行了战斗动员。

范长江的教导和习政委的欢迎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发出命令："为了统一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行动，着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三旅组成西北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派谁去当随军记者？当时，报和社的领导人廖承志和范长

江，考虑到我平时就是负责部队的军事报道，和驻军各部的通讯员有较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我在担任绥德分区记者期间和习仲勋比较熟悉。因此，就决定派我担任野战军的随军记者。行前，范长江对我作了正式谈话。范长江是我于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国际新闻社工作时期的老领导，根据他长期从事战地记者的丰富经验，对我的谈话既语重心长，又严肃而亲切。他说："你初次当随军记者，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生活上做好随军记者的充分准备。思想上必须明确树立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心；组织上一定要服从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和新华社总社的双重领导，并尊重部队各级政治部门的指导，取得各级组织的帮助；生活上务必作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甚至不怕牺牲的精神准备。"领导上分配我担负首任随军记者，使我感到无尚光荣，加上长江同志的谆谆教导，更使我满怀信心。我背上背包向南郊野战军总部报到，习政委热情而亲切地欢迎我随军采访，还让作战参谋给了我一套十万分之一的边区南部军事地图，教给我查阅地图的方法，使我颇有一种初当随军记者的新鲜感。因为有了它就可以及时了解战场形势和部队行动方位和去向。习政委又安排我随独一旅行动。因为常驻绥德的独一旅，从旅长王尚荣到部队通讯员和我都有过直接接触，和大家相处就会自然而融洽。

部队经过原关中分区又折向陇东进发。当时作战指挥的意图是，向西出击，以牵制敌军延缓进攻延安的时间。没有料到的是，在3月4日那天，侦察兵突然发现，陇东重镇合水县的西华池，刚被胡宗南的四十八旅占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场遭遇战的由来

按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战略部署：首先要夺取我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关中分区，即敌人所谓的"襄形地带"。它象一把尖刀直

插国民党关中地区，成为胡宗南的心腹大患，早想侵占到手，只因时机未到，不敢轻易进犯。现在既已决定大举进攻延安，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已成当务之急。

习仲勋早从1936年就担任关中分区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历时5年，深知这一地区在军事上今昔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以一当战争爆发，他就早已部署当地驻军主动撤离，军民坚壁清野。当胡宗南决定其所属各旅向"囊形地带"合围时，扑了一个空，一无所获。于是，胡宗南乃转而以控制边区侧翼为由，又令其整编四十八旅和二十四旅转攻我陇东分区首府庆阳，谁知进入庆阳，立足未稳，胡宗南忽而又急令其部队进犯延安。如此往返近千里，疲于奔命，四十八旅即回师宿营西华池。而四十八旅从1943年起，一直担任这一线的封锁任务，长达3年之久。西华池则是陕甘宁边区合水县一个边陲重镇，是陕甘两省物资集散地，商业发达、市场繁荣、物资相当丰富，敌旅长何奇早垂涎三尺，此次取道西华池，正好实现他抢劫粮食、掠夺物资，大发一笔横财的梦想。因此何奇一进西华池，只顾命令其部队抢仓库、拉牲畜、派民夫、大肆搜刮，根本顾不上派遣部队进行警戒。何奇一贯自夸毕业于日本士官炮科，是胡宗南手下强将，骄傲跋扈；加之，何奇进驻西华池后，当地绅商各界殷勤招待，召开欢迎大会，满街张贴欢迎标语，百姓夹道欢迎，商店照常营业，茶楼酒馆，座无虚席。何奇毫无戒备之心，神情泰然，他认为陇东共军只不过一个三五八旅和少数地方部队，不足挂齿。

3月4日晚，我野战军指挥部当即命令各旅向西华池合围，深夜11时展开猛攻，炮火连天，响彻云宵。

初访前线

5日拂晓，我从独一旅驻地赶到指挥部采访，见到习仲勋、张宗逊、廖汉生等首长正在军事地图前研究分析敌情，作进一步战斗

部署。据习政委谈，这是一次遭遇战，敌我双方事先都未发现对方行动，都缺乏战前充分准备。现在敌军既已被我包围，就应当下决心歼灭它。当时廖汉生副政委正要到前线检查部署战斗，习政委当即要我和廖同到前线采访。走出指挥部窑洞，出门就上坡。由于初次参加战斗，部队尚未给记者配备马匹。廖汉生见我气喘吁吁地爬坡，就让我揪住他坐骑的马尾巴，就很省劲地上了坡顶，那是一片广阔的高原。廖汉生让我前往主攻部队采访，他一扬马鞭飞奔而去。我沿着军用电线前行。一路之上，但见整装待发的第二梯队，情绪激昂，精神抖擞。直到攻击前沿阵地，我停了下来。由于彻夜激战，白天双方都在调整部署，战场比较沉寂，只见后勤部队输送弹药给养的骡马和运送伤兵的担架来往不绝。待到中午，敌人支援它地面部队的空军才到，由于四十八旅已被我打的七零八落，龟缩镇内，阵地陕小，它要低飞空投粮弹，又怕被我击落，所以空投很难准确，不少弹药粮食落入我军阵地。入夜又闻枪炮声大作，而且双方喊话声不绝于耳。敌四十八旅是胡宗南的劲旅，旅长何奇就是所谓"胡宗南的四大金钢之一"，顽固反共，连队都有严格的政治督导。我所在部队塬下就是敌人一个据点，是由一个连队控制的地坑窑洞大院。这个连队虽已被我军包围，我喊话："缴枪不杀！"但它就是不投降，甚至破口辱骂。我军虽已踞高封锁敌人外出，但无法向窑内敌军射击；而敌人只能抗御对它的正面攻击，却无法冲出窑洞对我反击。我军即使抛掷大量柴火对它火攻也未能制胜。直到深夜，我军忍无可忍，乃在火力掩护下，由多名战士身系绳索吊至塬壁中部打洞，再埋置炸药引爆，才消灭这股敌军。直至天明，我军主力突入西华池镇，大街中部北段被我军占领。四十八旅旅部和它的两个团失去联络，旅部直属队伤亡过半。旅长何奇束手无策，约 11 时，何奇被我机枪射中大腿，流血不止。他才命副旅长万又麟电告胡宗南求援，不料胡宗南复电指责何奇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贻误大局。何看完电报，长叹一气，闭目不语，随后一命呜呼。至此，我

已予敌以歼灭性打击，毙敌旅长何奇，歼敌1500多名。时敌援军渐近，我军即主动撤出西华池。

习政委派我重返战场采访

战后我随军后撤返回指挥部时，习政委找我谈话。他说这次西华池遭遇战十分残酷。志大才疏的胡宗南手下尽是些刚愎自用之辈。他们敌不过我军，但对老百姓的暴行令人发指。你可以去西华池作一次采访，揭露敌人的兽行，以激发我军民同仇敌忾。习政委派了一位保卫科长和两名战士与我同行。当我们进入西华池战场，见到我打扫战场的部队正在为牺牲的战士制棺埋葬；进入镇内，但见满街东倒西歪的店铺门板和墙壁上，到处贴着“欢迎何奇旅长”、“欢迎英勇善战的四十八旅全体将士”等红绿标语，被我军炸塌的窑洞里，可以见到满脸灰尘被强震波窒息的敌军尸体；街道上不仅有敌军遗弃的大批尸体和伤员，惊人的是有很多一批批二三十人一串被捆绑的老百姓倒毙在血泊之中，甚至包括当时出头露面欢迎蒋军的绅商各界知名人士。怎么回事呢？据我访问当地幸存的老百姓说，当天四十八旅进驻西华池时，的确，谁也不知道有解放军到来。西华池是我陇东分区毗邻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谓“红白交界地”，当地绅商各界善于应付国民党部队，发起了一个热烈的欢迎运动，而且还杀猪宰羊，大摆筵席。不料正当酒醉方酣之时，四周枪声大作。四十八旅已被我军包围，而敌人则以为这是当地绅商各界人士暗通解放军，故意设置的圈套，于是就不分青红皂白，屠杀了大量无辜。特别是敌副旅长万又麟见何奇被我打死后，眼看其旅部即将覆灭，乃采取最残暴手段，命令两门美式重迫击炮朝我军方向盲目乱射，不管该地区尚有他自己的部队、商民、百姓、伤员、民夫等人性命，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其中不少燃烧弹，打中成片民房，顿时火光烛天，人喊马嘶，烧死烧伤大批人马。我打扫战场部

队把四十八旅遗弃的伤兵一律收容救护，轻伤者愿意回家可以自愿回家。当我采访完毕归队时，整个部队已经奉命星夜赶回延安。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

这又是一场鲜为人知的序幕战

人们都知道，西北战场第一仗是1947年3月25日由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青化砭伏击战，是役歼敌三十一旅2900多人，生俘敌旅长李纪云，但对十天前的西华池遭遇战却鲜为人知，史料也少有记载。应当说，这是西北野战军和胡宗南部队在西北战场作战拉开的序幕，也是我军首战告捷的一役。但是由于当时我军对大兵团作战缺乏经验，对临时组合的多个旅集团军统一指挥尚属首次。当我军包围西华池敌军后，本当同时发起进攻，但有的部队却尚未到位，致使敌人有喘息时机，临时调整其部署，以致战斗时间较长，达两天一晚30多小时，没有全歼敌人，自己也有较大的伤亡。事后习政委曾向彭德怀司令员作过检讨。彭总则慰勉有加，说明这是首次大兵团作战，既缺乏经验、又是偶然爆发的遭遇战，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这也是今后自卫反击战展开的一次实战演习。

3月16日，中央军委在保卫延安作战使命中指出：陕甘宁部队中的野战部队（初称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部队（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同日，毛泽东主席令彭德怀为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3月23日，习仲勋发布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坚决勇敢的精神和猛打猛追的战斗精神，消灭敌军31旅。西北战场的一场自卫反击战，从此便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

1995年4月—5月写于北京

（原载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业务》1995年第4期）

转战陕北中的范长江

1991 年 1 月，为纪念范长江同志逝世 20 周年，我应《中国记者》杂志之邀，写了一篇《忆范长江的道德修养》。主要记述了在抗战初期、解放战争初期和建国初期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受到长江同志在道德品质教育的几个片断。由于叙述的时序较长，篇幅有限，不免比较简略。现在，趁出版《范长江纪念文集》的机会，就长江同志转战陕北时期，我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作一点补充。

那是 1946 年的 11 月，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已经相当紧张。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长江同志把他原任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和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的工作，移交给接替他的梅益同志后，辗转到了延安。他被分配到清凉山，担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协助廖承志社长领导新华总社的新闻报道工作。这是我和长江同志在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从国新社分手以来的第一次重逢。相见之下，自然非常亲切。当时长江同志十分重视战时的军事报道。他决定由新华总社采访通讯部组织了富（鄜）甘（泉）前线采访队，由刘祖春、海稜担任正副队长，采访队成员还有张潮、蓝钰和我，并有报务员、译电员携带发报机随行。由于形势变化，采访队很快返回延安。此行为时虽短，但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实习。

1947 年 2 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南调兵遣将，进犯延安，延安进行了自卫反击的战争动员，中央机关准备撤离延安。清凉山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领导正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战时体制的安排，在后方建立第二线工作点的同时，还要布置到前线的采访任务。长江同志根据我平时分工搞军事报道以及和部队通讯员联系较多的情况，分配我到西北野战军当随军记者。在出发之前，他找我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根据他长期从事战地采访的实践经验，他教导我说：

首先要从思想上坚定地树立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念。他鼓励我随军解放西安后和新华总社会师北平；同时，在组织上一定要服从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和新华总社的双重领导，并且尊重部队各级政治部门的指导，取得各级组织的支持和帮助；而在生活上务必作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准备。

长江同志的谆谆教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是他使我这个第一次担任随军记者的年轻人，在极端艰难困苦乃至非常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始终保持着蓬勃朝气和胜利信心，并且顺利完成军事报道任务和前线分社的领导工作。

就在这次随军采访中，我结交了野战军的指战员中几位情深谊长的战友。1992 年 4 月初逝世的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罗坤山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年罗是西北野战军三五八旅的一位团长，由于我长期随团采访，在多次紧张的战斗中学习他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使他对我也留下了“一个不怕枪子的记者”的印象。近几年来，我们相互交谈国家经济建设中一些问题，很是融洽和亲密。每念及此，无不回忆起长江同志当年的教导。

在转战陕北四百天的历程中，我曾有两次在靖边县青阳岔和米脂县杨家沟和中央直属四大队（新华社工作队代号）相遇。战

友们在战地相逢，分外亲切，而长江同志作为四大队队长，每次总要听取前线记者的汇报，充分肯定他们的成绩，同时指出其缺点。当时我因自己写的战地报道常被编辑删改过多，而产生不满情绪，长江就用他自己的亲身体会，对我进行循循善诱的教导。他说，包括他自己写的文章，“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中央同志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传阅研究之后，毛主席又加以一丝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实在可怕。这种‘一挥’的作风，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作风。”

长江同志在同我谈话时，曾提到在转战陕北期间，四大队曾发布了一篇以《志大才疏的胡宗南》为题的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它以犀利讽刺的口吻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自己的志气，真是大快人心。这篇文章就是经过周恩来、陆定一等同志亲自审阅修改而成的。

长江同志由此亲切地感受到：中央领导始终以压倒敌人的气概、惊人的镇定，研究敌人的错误与缺点，不断出奇制胜，转劣势为优势；中央领导还运用了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坚持动人的工作作风。长江于 1947 年 9 月 11 日关于在陕北坚持工作的情况给总社廖承志社长和社委会的信中，深情地阐明他的亲身感受，表达了他对党中央真挚的感情。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谈及：“……更重要的，我们获得了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终压倒敌人的气概。……其次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第四，科学的工作方法。……第五，动人的工作作风。……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

这封信曾发表于 1991 年第 1 期《新闻业务》。我已把它作为

重温长江谆谆教导的座右铭。

（原载《不尽长江滚滚来》第 182 页—185 页，
群言出版社 1994 年 3 月。）

习仲勋与彭德怀的战斗情谊

解放战争年代，作者曾经长期在西北地区从事地方和随军记者的工作，50年代初起担任习仲勋的秘书达9年，曾经几度接触到彭德怀、习仲勋两人交往的情形，并为这两位气质相似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真挚情谊所感动。这里回忆的仅是他们长期相处期间的一些片断，但人们不难从中品味出一些意味深长的人生哲理来的！

在转战陕北中相知日深

习仲勋与彭德怀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把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一批陕北革命领导干部从“左”倾机会主义者迫害下营救出来，当时，比彭德怀年轻15岁的习仲勋，就跟随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西征好几个月。从那时开始，彭总那种外表严肃而内心热诚、对同志真挚关切之情，给年仅23岁而已饱经“左”的创伤的习仲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7年2月，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陕甘宁边区。2月10日，中

央军委决定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三旅组成西北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2月18日召开了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发表讲话，号召全边区军民动员起来，坚决打垮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当时，我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随军记者，立即奉命前往延安南郊西北野战集团军总部报到。习仲勋政委热情而亲切地欢迎我随军采访。

我军经关中分区向陇东进发，当时的指挥意图是，向西出击，以牵制敌军延缓进攻延安的时间。没有料到的是，3月4日晚，侦察兵发现，陇东重镇合水县的西华池，刚被胡宗南的四十八旅占据。这就爆发了一场敌我双方事先均未发现对方行动的遭遇战。由于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又是我军初次组成的集团军，尚未取得大兵团联合作战的经验，仓促应战。经过3月4日、5日两夜一天长达30多小时的恶战，虽则击毙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歼敌1500多人，但是，我军以优于敌人4倍的兵力，却没有全部歼灭敌人，我军也有较大伤亡，只打了一场消耗战。5日拂晓，我军主动撤离战场后，立即奉命星夜赶回延安，参加保卫延安之战。当时，身为集团军政委的习仲勋，因西华池战斗没有打好，心情沉重，深感不安，以为定会受到彭总的严厉责备。可是当彭总见到习仲勋时亲切地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前的侦察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没有打好，部队有些伤亡，不要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么！"一席话，使习仲勋和其它指挥员如释重负，立即振作精神，投入了保卫延安的新的战斗。

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部队中的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及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统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在全军中威望很高。而习仲勋则是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与边区党组织、边区政府和边区人民关系密切。由他会同彭德怀指挥边区部队作战，更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

3月18日，胡宗南部队兵临延安城下。习仲勋于当天下午赶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彭德怀和习仲勋再三催请毛主席早些撤离延安。直到黄昏部署完毕，毛泽东才走出窑洞，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又伸出一个指头对彭德怀说："你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不用三年就可以收复延安。"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王家坪坐汽车经飞机场向东北转移。接着，彭德怀面交习仲勋一件毛泽东的亲笔指示："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彭、习当即对第一纵队指挥员安排了战斗任务，了解了延安各机关群众疏散转移情况，同前方各部门首长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指挥意图。此时，敌军已迫近延安，枪炮声清晰可闻，敌人炮弹已打到城东飞机场，从王家坪往东撤的路线已被截断。大家又催促彭总早走。然而彭总仍镇定自若地说："我们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大家心里才稳当！"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彭总把手一扬说声"走！"才率领指挥机关全体成员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悄然离去。

习仲勋深有所感地说："出人意外的这条小路，平时没有人注意，而是彭总散步时调查过，并亲自踩过好多遍。可见，这位久经征战的老军人的深谋远虑和军事观察之细密。"在敌情相当危急的情况下撤走时，彭总一边徒步行军，一边还轻蔑地嘲笑四面八方摸来的敌人："不要看敌人这么疯狂，赶得我丢了老家，还要走夜路。我看么，黄河那边的阎锡山是瓮中之鳖，眼前的胡宗南又愚又蠢，是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至于马步芳、马鸿逵之流，小丑跳梁罢了。他们倒霉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彭总远望着延安左前方远山上敌人烧起

的火堆，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的。延安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从撤出延安到光复延安仅仅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里，彭、习大军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到外线反攻三个阶段，很快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战斗情谊日益深厚

彭总由于忙于指挥作战，考虑战略战术问题较多，习仲勋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群众，宣传政策的工作，每到一地，总要召集地方干部座谈，向干部群众宣传西北野战军打胜仗的好消息，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在转战陕北期间，全边区组织两万多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传递情报，配合主力军作战。彭总深深地感到，战争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当彭习两人交谈时，彭总不止一次地分析我军不可战胜的根本原因。彭总经常强调："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边区是个穷地方，但边区人民是我们的铁桶江山。"而彭总正是从这个角度、在战争环境的考验中来观察了解习仲勋，多次向各级指挥员表扬习仲勋并号召大家向习仲勋学习。彭总说："习仲勋同志是陕北老区的一位老同志，他和边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就值得大家学习。"陇东、三边战役结束后，部队在靖边作短暂休整时，彭总深有所感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刘景范同志熟悉边区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

彭、习大军两位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一致、密切配合，应当说，也是西北战场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撤出延安到光复延安，从解放西安、解放兰州到解放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区人民

政权的日子里，在那艰苦而又漫长的岁月里，习仲勋跟随彭总共同闯过了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彭、习两人的战斗情谊日益深厚。当大西北全境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不久，彭总身上硝烟尚未散尽，又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在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窥视我新生共和国的危难时刻，再一次临危受命，于1950年10月，彭德怀在古城西安和习仲勋等老战友们热情话别。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抗美援朝战争。

从抗美援朝到庐山会议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为了筹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动员新闻记者参加。当时我正担任西北新闻局新闻处处长，深感自己义不容辞，毅然报名参加。西北五省区各族各界代表27人，组成慰问团西北分团，由团长李敷仁率领。西北分团出发前，习仲勋书记找我个别谈话，对赴朝慰问应注意事项作了亲切的指示。他还给彭总亲笔写了慰问致敬信，言词恳切，要求彭总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务必保证安全、多多保重。习书记要我贴身携带此信，赴朝后面呈彭总。西北分团到达天津，和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总团及各大区分团会合。总团在天津经过一段时间的组合与学习，于"五一节"前夕抵达朝鲜我志愿军司令部仁川驻地——一个废弃的大铜矿，洞内到处滴水，非常潮湿，地铺下垫着坑木，常有积水。我想到习书记用西北局名义赠送给彭总的虎皮褥子，该是多么必要呀！习书记替彭总考虑的多么周到呀！我给彭总面呈了习书记给他的慰问致敬信，彭总当即让我带回口信，对老战友习书记表示感谢。5月下旬慰问团即将离开朝鲜，彭总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当时彭总愉快地应我所请为他摄影——"中国

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半身像，抗美援朝胜利结束以后，在《解放军画报》上整页发表。彭总身躯魁伟，面露微笑，沉静而坦然自若的神态，曾给广大读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当我完成赴朝慰问返回西安，我即向习书记转达了彭总向他答谢的口信和赴朝慰问的艰险历程，以及彭总接受我的专访和摄影的经过，深得习书记的赞赏和鼓励。

1952 年 7 月间，习仲勋书记提出调我当他的秘书。从此，从中共中央西北局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国务院，我为习仲勋当了 9 年秘书。此期间，习仲勋和彭德怀同在中央机关工作，相互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1958 年 9、10 月间对西北几个省区的考察，他们虽未同行，但是他们对于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的一些看法是一致的；1959 年 6 月底，习仲勋和彭德怀同上庐山，在盘山公路的半山腰停车休息，两人并肩俯览江汉平原大好河山，以忧国忧民的共同心理，对当时三面红旗中"左"的错误同发感慨，也相信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可以在毛主席领导下克服"左"的错误。上了庐山，彭习同在西北小组，共同对"左"的错误发表合情合理的意见，我当时作为小组秘书，记录整理了他们的发言刊登在大会的《简报》上。没有料到的是会议进行了半月后，彭德怀唯恐大会即将闭幕但问题尚未解决而直言上书，触怒了毛泽东，以致遭到不应有的错误批判，从而作出了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错误决定，把庐山会议原定的反"左"转向了它的反面，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的运动。庐山会议的过程，已为众所知。我这里要说的，主要是当时习仲勋内心焦灼不安的心情。因为他和彭总对当时国家整个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在毛泽东盛怒之下，又在一些极"左"思想的人物、特别是林彪、康生之流的煽动下，与会者都要表明态度，甚至要求写出书面发言，他既要我代拟批彭的发言稿，又说不出任何根据，我更无从执笔，最后，他只对我无可奈何地说："算了！我随便说

几句算了！”这简单的一句话，充分表露了习仲勋当时十分难受的心境。

习仲勋自己挨整与复出

庐山会议后，祖国大地在反右运动中越反越“左”。直到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那次会上，在极“左”思潮的氛围中，毛泽东根据康生的诬陷，把习仲勋从早年曾赞誉为“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荣誉上，贬成了“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的反党分子。并把彭德怀写的申诉书和习仲勋的问题，一并定为“掀起一股右倾翻案风”。从而把在中国人民革命长期斗争中锤炼出来的两位铁骨铮铮、忠心耿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整落下台。

好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在和国内外一切敌人斗争的同时，在和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已经锤炼了克服自身错误的能力，尤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邓小平思想理论指导下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又重新恢复了生机，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习仲勋复出以后，一贯以朝前看的精神，顾全大局、宽宏大度、不计前嫌；一贯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积极进取的精神，热诚拥护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相继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副委员长，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习仲勋协助胡耀邦，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纠正“左”倾错误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原载《同舟共进》1996 年第 3 期）

第四篇

赴朝慰问

我敬仰的彭德怀

从这张照片谈起

这张照片是1951年5月我在朝鲜前线访问彭总时拍摄的；1952年3月《解放军画报》公开发表。彭总身躯魁伟、面露微笑，深沉而坦然自若的神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到朝鲜前线访问彭总、为彭总摄像的记者很多，为什么就选用了我所拍摄的这张照片？彭总十分严肃，难得一笑，为什么在紧张战斗的朝鲜前线却面露微笑？面对这张照片，根据我多次接触彭总的印象和回忆，使我想到当时这一微笑，乃是会心的微笑，是藐视敌人、胜利在望的微笑，是真理在手、具有自信的微笑。

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特别是文革中"四人帮"对彭总的诬陷，《解放军画报》上那张彭总的活页照片，已经全

部被销毁了。直到1992年春节期间找到了解放军图片社资料室的李贤光同志，经他耐心的帮助，才终于找到了这张亲切而熟悉的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当年解放战争从西北战场开始认识彭总、历次战斗中接触彭总、解放西安初期的访问彭总、直到抗美援朝前线受到彭总的接见，以及庐山会议期间对彭总的所见所闻，都涌现在我的眼前，由于我还多年当过习仲勋的秘书，和彭总直接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所以有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还是值得记叙的。

相见于青化砭战斗

1947年2月，战火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全面展开。新华社领导人廖承志和范长江决定让我到西北野战军担任随军记者。

3月19日，胡宗南23万大军侵占延安。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西北野战军两万多人在青化砭设伏。这是条南北走向的大川，确实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3月24日，本应是敌人到达的预定时间，可是，我们整整等待了一天，也不见敌人踪迹，有的指战员怀疑情报的可靠性，或者以为被当地群众泄漏了消息，乃至产生不耐烦的情绪。彭总却坚信敌军一定会来，而且，相信老区群众决不会向敌人告密的，他认为敌人孤军深入，有所顾虑。他再三强调部队要耐心等待，严格隐蔽，注意保密，决不能松懈斗志。第二天一早，我们再次爬上山头，只见彭、习等首长正在隐蔽在山头上的指挥所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此刻，敌三十一旅正沿川底的公路浩浩荡荡的来了，我们看到走在头里的敌人连机关枪、小炮上裹着的枪衣、炮衣都没有卸掉。正当我们屏息观察的时候，突然间，山头上我军信号弹升起，伏击部队陡地跳出隐蔽地带，从东西两侧以排山倒海之势往下冲杀，在腾滚的硝烟中，吓懵了的敌人已乱作一团，狼奔豕突，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三十一旅直属队及其九十二团2900

多人全部被歼灭在这条十里长的川道里。旅长李纪云个子高大，慌乱中换了一套士兵军衣，很不相称地混在乱军之中，又加上他喜爱的狼狗始终跟随他的左右，所以很快被俘。

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只我一个随军记者，显然已不适应客观要求。野战军政治部领导要我回后方请新华社总社设分社机构，携带拍发新闻的电台等设施，以加强对西北战的报道；同时又委托我协助政治部敌军科长张光天带一个排的战士，押送李纪云和三十一旅尉级以上军官 40 多人到后方基地。

行军路上，最使李纪云感动的是，我们每到一地宿营时，当地群众对我们燃放鞭炮，载歌载舞，送肉送蛋，亲切慰问。夜间，我和李纪云同睡一炕，在彻夜长谈中，他承认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同时，他又十分感慨地说："彭将军真是体贴我啊！这次出发，他把我这个败军之将，作为战场起义人员看待了。现在我才明白他的善德。唉！跟他在战场上还是死对头呢！"后来听说，李纪云不久就参加了我军工作。

5 月，当我重返部队时，西北野战军在彭总指挥下已经取得了羊马河、蟠龙的胜利。5 月 14 日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有 5 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

忠实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

三战三捷后，敌军龟缩到延安地区。彭总报请毛主席同意，我军引师西向；进击马步芳、马鸿逵的陇东、三边，再围攻陕北战略重镇榆林，诱敌北上，力求在运动中聚歼胡宗南主力钟松的三十六师。

果不出所料，当我向榆林进发时，蒋介石、胡宗南即令榆林守军坚守待援，急调延安地区胡军 8 个旅分两路向绥德、葭(佳)县急进；另以钟松的三十六师组成援榆"快速兵团"，轻装日夜兼程，限

期进抵榆林。

当时我军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在榆林城南五里屯凌霄塔下的隐蔽出发地准备攻城。我夜间曾和任世鸿团长同上凌霄塔观察敌情，只见在城墙四周和城内高地燃烧起堆堆篝火，彻夜严密防守。一次任团长观察到兄弟部队攻占了东南高地，他要我和他一起率部趁势攻城。当我们猛冲到城南时，由于没有重武器掩护，终于被迫撤出战斗。彭总下令挖地道到城墙下埋设炸药进行爆破，虽炸蹋了几段城墙。也因无重火器配合未能登城。此时，北线东胜国民党军紧急南下，钟松的三十六师也已北上横山，逼近榆林，彭总鉴于攻城已不可能，即下令于8月12日撤离榆林。彭总却抓住钟松的"孤军冒进"，迅速集中我军主力，在钟松必经的沙家店待敌。

8月20日拂晓，我军分两部分别包围三十六师及其援军一二三旅。彭总当即发出歼敌动员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全军振奋，斗志昂扬。钟松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下，化装乘夜暗逃跑了。经过激战，20日黄昏，我军已消灭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多人，俘敌旅长刘子奇。

沙家店大捷，西北战场从此由被动转为主动，8月23日彭总主持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亲临祝贺。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

接着又进行了清涧战役，活捉了师长廖昂。

廖昂是个反共老手，本是1936年11月红军西征中彭总手下败将。10月10日晚，彭总曾派员携带亲笔函进城对廖昂劝降，要他及时放下武器，可作战场起义将领予以对待，廖昂却想援军解救，拒绝投降。

廖昂被俘后，彭总曾找他谈话。他却一味埋怨胡宗南指挥不当。彭总说："你们的失败，是人民反对你们，士兵厌战！"谈话后彭

总留廖昂吃饭，警卫员端来一盆面条。廖昂却惊讶地说："早就听说副总司令生活俭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真是名不虚传！"彭总沉下脸说："这样的饭还不好吗？老百姓还吃不上这样的饭！我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败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谈话后，廖昂不禁连声赞叹解放军，称颂彭总为英明的将领。

彭总智唱空城计

1949年春季，我野战军正在黄龙山区进行整训，西北野战军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新华社也正式成立了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我受命担任前线分社副社长（社长由一野政治部宣传部长兼任）。此时，我前线分社开办了新闻训练班，培训新闻干部进城后如何开展工作。一天，应我们申请，彭总在一野司令部接见了我们。他背着手边踱边谈，诙谐地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哟，看那个《红楼梦》可不要老盯着宝玉、黛玉、悲悲切切、缠缠绵绵、卿卿我我；要多看看那个刘姥姥。这个土老婆子才有意思呢！没进城想进城，一进城就花了眼，丢人、现丑、出洋相！"彭总一边说，一边还比划着刘姥姥又憨又俗又贪的样子，笑得开心极了。事后不久，彭总就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为进城作准备的中共第七届二中全会去了。我们才开始理解他这一席谈笑的深意。

在黄龙山区，不论我们自己或者敌人都知道，光靠一野现有实力，是无法解放西安的，只有等待华北十八、十九兵团解放临汾、太原，经过休整，西渡黄河编入一野以后，才有实力解放西安。

5月中旬，一野发动陕中战役，相继解放高陵、三原两县，逼近咸阳，并强渡渭河，20日我先头部队不费一枪一弹轻松地解放了西安。原来我支援解放太原后归建的两个旅渡黄河时，给胡宗南的探子发现了，胡宗南以为华北兵团过河了。他的20万大军就仓皇

弃城西逃。彭总命令王震兵团司令员率三五九旅向西猛追，一直追到宝鸡。当时我军从潼关到宝鸡，八百里秦川仅有3万多人，战线拉长了，后方十分空虚，彭总命令王震三五九旅停止追击。胡宗南发现上当，立即掉头对我进行反扑。三五九旅且战且退，敌军已压至咸阳，西安城内枪炮声已清晰可闻。

就在这紧张时刻，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通知：彭总紧急召见。我匆匆地赶到设在西大街建国公园内的一野总部，心里沉甸甸的，在这种情势下，怎样挡住潮水般淹来的敌人？怎样保住西安？彭总见我要谈什么？有什么奇策呢？

我来到一幢老式而考究的平房里，一进门，看到张宗逊、闫揆要、甘泗淇、王政柱等首长早在等候。

“哦！记者来啦！”随着一声招呼，彭总从里屋出来，边走边笑，轻松自如。他不谈正题，而是背着手踱来踱去，极有兴趣地讲起了《三国志》中的“空城计”。讲到得意处，就放慢速度，用那双浓眉下的大眼睛朝我诙谐地笑笑，带有几分幽默，几分诡谲。讲完了，又用奚落的口吻说：“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是个花花公子。我们欢迎他进西安，西安有的是羊羔美酒，漂亮姑娘多得很！”我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可《空城记》在彼时彼地能成功，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

“大道如青天，欢迎他们进来么！”说罢，彭总便信步走了。

我一时纳闷，彭总不是要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吗？怎么没头没脑地讲了一阵就这么走了。

“首长，彭总要给我谈什么？”我莫名其妙地问甘泗淇。

“就谈这个！”甘主任点了一下指头。

刚才我光听彭总说说笑笑，竟没有记下一字。经甘主任这么一点，才恍然大悟，定了定神，把刚才彭总轻松的说笑如实写好。新闻的主题是一野前线指挥员发表谈话，欢迎马继援进西安。语调保持了彭总的风格，谈笑风生，如有百万雄兵在手一般。新闻经彭总过

目，就送西安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翌日晨，又在《群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城外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了，隔天，西安全城沸腾，鞭炮连天，鼓声雷震。钟楼附近，人山人海，连树上都爬满了孩子。人们欣喜若狂，欢迎星夜赶到的华北兵团。看到荷枪实弹，雄赳赳、气昂昂开向咸阳的队伍，人心落定，喜上眉梢。接着传来咸阳大捷，我军一举消灭了马继援的骑兵主力。

7月下旬，又取得了扶眉战役大捷，消灭了胡宗南主力四个军43000多人，西北战场从此大局已定。

赴朝慰问访彭总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为了筹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动员新闻记者参加。当时我新婚不久，妻子又怀孕在身，但在抗美援朝大义激励下，毅然报名参加。西北五省区各族各界代表27人组成慰问团西北分团，团长李敷仁、副团长亚马、曾震伍。西北分团出发前，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找我谈话，对赴朝慰问应注意事项作了亲切的指示。还亲笔给彭总写了慰问致敬信，要我赴朝时面呈彭总。到天津集合后，总团廖承志团长从各分团抽调成员组成总团部，我被分配担任总团的宣传组组长。

“五·一”前夕，慰问团抵达志愿军司令部仁川驻地——一个废弃的大铜矿，洞内滴水很多，非常潮湿，地铺下垫着坑木，常有积水，可是包括彭总在内的志司的同志都长期生活战斗在这里。

“五·一”节晚上，志愿军总部为慰问团举行欢迎晚会。会上，彭总和廖承志团长分别致词，在军乐声中献旗献礼；我给彭总面呈了习仲勋书记给他的慰问致敬信，彭总让我带回口信，对老战友习书记表示感谢。在朝鲜期间，慰问团团员和文艺工作者分别到各战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各部队，以及朝鲜各工厂、农村进

行慰问演出；工青妇各界分别举行各种座谈会。中朝人民满含热泪相互拥抱等等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5月下旬，慰问团即将离开朝鲜，彭总应我的请求，进行了单独的访问，就在矿洞内一间简朴的指挥部里，详细阐述了前四次战役的巨大胜利和第五次战役的战略部署。我迅速地作了笔记。访问毕，彭总又愉快地应我所请为他摄影。

人们心目中的彭总可能是威武、粗犷、严肃、少露笑容，特别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现代化装备，如何战而胜之？确实使彭总费尽心机。那次彭总谈的是第五次战役部署，这次谈话，也是打算利用公开的新闻报道，有意微露战机，声东击西，佯装在西线渡汉江南进姿态，实际我主力部队已东移，达到了围歼敌主力的目的。所以那次彭总的访谈录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遗憾的是当时我在天津所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访问记”送到新华社总社后，编辑认为：文章虽未提名彭德怀，但从谈话的气魄、风度、口气、特点，也会被敌人猜到是彭总。唯恐泄密，未被采用。

当彭总在百忙中和我畅谈第五次战役部署时，当我们共同回忆起西安之战彭总笑谈“空城计”的往事时，我们又都忍不住会心地笑了。那笑容，从那张照片上深刻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不知庐山真面目

1959年6月间，我正随习仲勋副总理等一行，在河南、陕西调查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存在的问题。6月27日晚，陕西省委给习仲勋转来一份急电，要求习仲勋赶快返回北京转去庐山开会。当我们回到北京，国务院秘书厅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下，提出不少意见：认为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规律看，现在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太急太猛；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对，“小土群”可以不

搞，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以不提，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帐，也应算经济帐，全民大炼钢铁赔的钱可以买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政治也会影响不好。“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这些观点正好和我们豫陕调查所得观点基本一致。因此就让秘书厅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材料，由习仲勋带上了庐山。

6月30日，我随同习仲勋从九江乘车登上庐山。上到半山，在一个转弯的开阔处，前边的汽车戛然一停，下车的正是彭总。习仲勋也跟着下了车，这两位老战友又相聚了，他们了望江汉平原一片鱼米之乡，共发感慨。由于1958年秋季那次西北考察，彭、习虽未同行，但一前一后所到之处大体相同，所持观点基本一致。这次虽是中途相见，自然都有共同语言。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想起当年陕北战场青化砭山头上，习仲勋把我亲切地介绍给彭总，彭总热情地表示欢迎后，他俩又忙着观察敌情、指挥战斗，那劲头和今天多相似呵，我心里倍觉亲切。

上得山来，按分配各住各处，夜晚观看毛泽东所点的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与会人员看得皆大欢喜。

7月2日上午举行政治局常委会后，传达毛泽东所说的“现在天下太平，四方无事，这次请大家上庐山来开个神仙会，半天开会，半天游山玩水，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还传达了毛泽东早有准备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宣传、综合平衡、体制、协作关系、公共食堂、学会过日子、三定政策、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团结等19个问题；以及他所概括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本估计，更使大家思想落实、心情舒畅。会议开始，按大区分组讨论那19个问题。彭总和习仲勋同在西北小组。我们当秘书的轮流担任小组会的记录。会议开得轻松活泼，问题讨论得广泛深入，并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大跃进等等的经验教训。中央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在各小组会上发了言。彭总在西北小组会也讲了

几次。他从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习海瑞精神受到鼓舞，坦率地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但是脑子也发热了一点。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他还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些，农业产量有浮夸成份，全民办工业值得怀疑，大炼钢铁出了不少问题。他指出"对待错误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责任人人都有，包括毛泽东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他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要让人敢于讲话，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不能由个人决定。不搞集体领导，只由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这些话当时在我们看来也都是正常的，远比平时随便议论温和的多。习仲勋带来的国务院秘书厅所写的材料，经报送周总理转报毛泽东后不久便印发了庐山会议简报。当我把这个消息通过长途电话告诉了国务院秘书厅的同志后，大家很受鼓舞。的确，当时会内外都认为这次庐山会议可以认真彻底地纠正"左"的错误了。

这样美好的日子大约过了十七八天。会议原定召开半个月，但还没有要闭幕的样子。一天早饭后我去看望顾明（当时任周恩来的秘书）。他沉重地告诉我，说昨晚上总理讲："现在庐山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么多中央委员竟身在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还在那里游山玩水！"我把这个消息向习仲勋透露后，他也开始感觉到某些不正常的气氛，从而倍加小心了。

原来彭总因鉴于会议将要结束，对于如何用综合平衡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还没有提出根本措施，他心中十分忧虑。他想如果由主席再强调一下，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但7月13日他往访毛泽东时，因毛刚刚睡下而未能晤谈，于是改为写信，不料毛泽东收到彭总信后十分震怒。当然，这时仅在政治局常委中表露，大多数人还蒙在鼓里。会议按各大区混合编组进行讨论，从会议的简报中陆续看到彭总意见书中提到的"得不偿失"、"小资产阶

级狂热性”等刺激人的话。但有的同志认为这些话虽则重了些，但整个意见还是积极的。以后又传闻毛泽东要大家好好读读战国楚宋玉所作的《风赋》，好像当前的形势已经从“青萍之末”刮到了“土囊之口”。总之，整个空气已显现紧张，再也没有人去游山玩水了。特别是7月21日张闻天的长篇发言，他以鲜明的态度，极言直谏，完全支持彭德怀的意见，甚至提到了“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样尖锐而敏感的话，这就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于7月23日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甚至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那样一类过去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敌对性的话语。从此，过去支持彭总意见的人，也人人禁若寒蝉了。随着7月26日毛泽东批发了对李云仲信（这是一封很有见解和代表性的信）的批示，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党内党外右倾活动有组织的猖狂进攻之势。这一来，庐山形势急转直下，会议的讨论又转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人表态和彭德怀、张闻天等划清界限。

这时，习仲勋曾要我帮助他起草一篇批判彭德怀的发言稿。但是，不仅我根本无从着笔，习仲勋也没有任何根据来批彭，因为好多观点他们本来都是基本一致的。最后习说：“算了，我随便讲几句吧！”

8月2日宣布正式召开中央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张闻天一封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的信。还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文章，介绍那位文学侍臣以骚赋名篇为楚太子治病的方法为张闻天“治病”。林彪、康生等人就乘机上纲上线。林彪把彭德怀定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康生把彭德怀、张闻天比作布哈林，说他们企图改换中央委员会、想改换主席。会议的高温升到了大爆炸的程度。经过几次紧张的集中批判，定下了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军事俱乐部成员的种种罪行。8月13日下午彭德怀在全体大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但他最后仍明确表示：“竭诚拥护党中

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8月14日的大会由黄克诚作了检讨，至此，彭、黄、张、周定为反党集团，受到全国公开的批判。8月16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通过了全会公报和两个决议后，总算“圆满闭幕”！

从此，把原定以反“左”作为庐山会议的主调，推向了它们反面——“全党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倾”斗争席卷祖国大地。从此，越反越“左”，一步一步地终于导致了那场历时10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

8月17日，全体与会人员下山到九江飞机场，以15分钟为一次航班飞返北京。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微山湖西侧高空，一场暴风雨迎面袭来，全部飞机中途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里就餐，整个食堂桌桌满座，唯独彭总孤零零的一人一桌吃饭，没有一人和他同桌共餐。上山下山，此一时，彼一时，有如隔世。从此，1952年3月《解放军画报》上那张彭总的照片就完全消失了。

令人欣慰的是：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彭德怀的冤案也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彭总在全党全军中的崇高地位。威而不猛的彭大将军永远在微笑！刚正不阿的彭总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原载《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

中朝人民在一起

在慰问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一条标语：

“从战斗中成长与巩固起来的朝、中人民友谊万岁！”

由于志愿军的英雄事业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中、朝人民的友谊，是那样的深厚、真诚、感人。我们从人类这种最崇高的友谊中得到教育，深深感觉到伟大祖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志愿军、是最可尊敬的。

的确，事实就说明这个道理。

跨过鸭绿江的第一天，宿营在平安北道宜川郡深川面一个农村里，房东姓赵，老大娘的丈夫早年去世了，儿子参军了，身边只留下一个女儿叫做赵庆烈，就在本村当小学教员，她家前面、左右的房子都被敌机炸成瓦砾堆了，赵家自己的房子也被震得有些歪斜了。这样的主人和这样的景象，看来总觉得有些惨淡。何况我们又是刚从幸福的祖国过去的第一天。可是她们都照样坚强而有信心的生活着。老大娘照样在门前地里劳作，或在家里纺棉花，女儿也照样和小学生们在进行战时教育。我们在司机李成福同志的翻译帮助下，不多久，就和她们惯熟了。在彼此谈话之间，经常提到“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将军”，于是我们把毛主席的像片送了一张给

她们，母女二人是那样的高兴，赵庆烈把像片轻轻的按在她的胸口，亲亲的叫着：

“毛泽东！毛泽东！”忽的她又跑到门口挥动像片高喊起来。另两位女教员黄淳英和田福女也进屋来了，她们都那么热情的争看着这张像片，我们只听懂她们从内心发出来的深湛的敬爱的声音。

“呵！……毛泽东！”我们又从她们的表情和比划的手势中，看出她们在为毛主席的健康而快乐。老大娘在和司机李成福同志交谈着，我们听不懂，只看到李同志在老大娘诚意请求下，无可奈何的摸出了他自己的一张像片，圆圆胖胖的脸，头上戴着一顶东北式的狐皮帽子，顶年青而有精神的，他自己只带了这么一张。可是老大娘听说李同志早在去年就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服务大队，又讲得一口满可以的朝鲜话，就硬说他像她的儿子，她不管李同志同意不同意，把像片拿上手，亲亲的看了一眼，就往口袋里塞。

……

第三天，我们到了平安南道安州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在那里，我们遇到的一群热情的朝鲜孩子，他们唱“东方红”、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们还唱了许多朝鲜歌，跳了许多朝鲜舞来欢迎我们。关于这件事实，我已经写了一篇“朝鲜孩子们的心”，专门介绍过了。这里我所以又重新提起它的理由，主要是觉得那种从战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中朝人民友谊，已经如此深厚的刻印到朝鲜偏僻农村里的孩子们的心灵中，实在是太可贵了。而且到过朝鲜的同志，都已经认为这种情况是普遍的事了。

到平壤，在和朝鲜妇女界的座谈会上，有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金顺，和女盟中央组织部、国际部、文化教养部各部部长，有朝鲜人民军政治总局的妇女模范工作者、女战斗英雄、女游击队员，有来自工厂的女劳动英雄，来自农村的模范军属，有女校长、女议员、女判事……。她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平凡的战斗任务。在足足四个钟头内，我们听取了她们关于敌军暴行的控

诉，以及朝鲜妇女英勇斗争的报告。野兽般的美国侵略军，特别对于朝鲜妇女、儿童的蹂躏和屠杀，简直是不忍说、也不忍听。正如李金顺副委员长最后致词时咬着牙所说的话：

“我们朝鲜人民正遭受着世界人类最深重的灾难，但是我们朝鲜妇女今天已经没有眼泪了，我们只知道仇恨敌人，我们只知道和敌人斗争！”

她停了一会儿，吞下了一口唾沫后又说：

“因为我们确信，在伟大中国人民的援助下，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因此，那怕我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便有了力量。特别在今天这样的场面下，我们能够在亲爱的中国姐妹们面前，控诉敌人给我们的灾难，表达我们的战斗决心，又听到亲爱的中国姐妹们亲切的慰问，热情的鼓舞。我，已经感动得实在再没有话可以说了。”

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闪出了泪光，我看到坐在她邻座的我们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刘清扬副主席的眼圈也红湿了，我一个一个挨着看去，三十多位中、朝姐妹都流泪了，有的朝鲜姐妹已经抽搐得颤动了。但是我看她们不是因为悲痛而哭，而是在一种深重的灾难中，对于挺身而出援助朝鲜人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感激，以及她们自己那种坚强勇敢的决心，对于还须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最后胜利的信心，互相交流出来的泪水。这时，翻译同志已经沉默了，我也忍不住只得暂时离开会场。但当我二次进入会场时，她们——中国、朝鲜的姐妹们，两个两个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她们的泪水互相滴湿在彼此的衣裳上；她们彼此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们彼此都懂得对方的情感；她们脸亲着脸，心连着心。那种人类的爱，和这种爱所产生的中朝人民团结的力量，谁也不相信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所能战胜的。

在一次慰问朝鲜人民军某部的晚会上，时间开始是在下午 8 点钟，晚会程序经过了人民军同志至欢迎词，慰问团同志致慰问

词，人民军同志致答词，慰问团同志献旗献礼，人民军同志献花，以及人民军音乐协奏团的演唱，慰问团文工团的杂技表演，已经是午夜3点多钟了，接着，又开始了招待客人的丰美的宴会，朝鲜的糖，东海岸的鲜鱼和咸鱼、鸡、蛋、肉、啤酒、汽水，在战争中准备这样丰盛的宴会，的确是不太简单的事，但是，朝鲜人民军同志尽可能把他们最好吃的东西用来招待代表团。于是，“为金日成将军健康干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为中、朝人民军队的胜利干杯！”“为中、朝人民深厚友谊干杯！”“为中、朝人民最后胜利干杯！”干杯！干杯！胜利！胜利！热情越来越高涨，时间也越过越飞快，三点半，四点，四点半，室外，眼看着天快亮了。但是中、朝兄弟在一起，谁也不觉得困倦，谁也不愿意离开。忽然，人民军一位同志起立说：

“让我们的宴会再继续30分钟，让我们在一起多留30分钟。因为我们朝鲜人民军不仅能够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起，为着反对共同敌人而并肩作战，今天还得到中国人民派来的代表慰问我们，我们觉得太光荣，太可贵了。我希望：在人民军历史上这样可贵的30分钟里，让我们多干几杯，让我们尽情的狂欢！”

于是，又一阵高呼：

“中、朝人民胜利万岁！”

“中、朝人民深厚的永恒友谊万岁！”

像这样的场面，在每次慰问中都能遇到，只要中、朝兄弟在一起，总是那么热情、亲爱，临别时，又总是那么依依不舍。

在我们要离开平壤，将到志愿军部队去慰问之前，慰问团代表和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局领导下的招待员同志们，一起举行了一个联欢会。会上，宋振波局长讲的话，是那么深刻的印在我的心头。他说：

“我曾经和一位从战争开始一直战斗到现在的人民军战士谈过一次话，我问他在战斗中是怎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时候，那位

战士回答的很简单。他说：只要想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几个字，我便有了百倍的勇气去克服任何困难。这充分证明了朝、中人民亲爱团结所产生的力量是如此之伟大。

“只要有我们朝鲜，只要有朝、中人民并肩作战的胜利，我们便可以保证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制造的灾难不会延烧到中国，我们一定要把这灾难扑灭在朝鲜。”

“由朝、中人民鲜血凝结起来的深厚友谊，将如长白山、鸭绿江一般永恒不渝。让将来的诗人、作曲家和所有的和平人民，都来歌颂我们这种可贵的友谊吧！”

（原载《胜利属于中朝人民》1951 年 10 月）

金刚山的烟斗

慰问平壤某工厂的节目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朝鲜劳动党工厂支部委员长金秉元同志代表全厂工人给慰问团赠送了一包纪念品。这是该厂在抗美斗争中一位光荣殉难的工人的遗物。这位工人叫朴锡均，是这个工厂前任的劳动党支部委员长。金秉元同志介绍了这位烈士的斗争历史，还叙说了遗物中一个烟斗的故事：

烟斗是用金刚山树根雕刻的。金刚山是朝鲜最美丽的地方，甚至全亚洲也是闻名的风景区。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分内金刚、外金刚、海金刚，那里有奇峰峻岭、悬岩绝壁、急泻奔流的瀑布、五光十色的花木、茂密的处女林、古朝鲜的建筑……。但是，1945 年‘八·一五’以前，这里从来是专供有钱阶级、日本统治者游玩的地方，‘八·一五’以后才成为劳动者休养的区域。共和国颁布了劳动法，在 1946 年的 7 月 5 日，老工人朴锡均第一次到金刚山休养来了。他叼着金刚山树根雕的烟斗，欣赏着祖国美丽的风景，当芬芳的烟缕飘出烟斗的时候，他闭目沉思，深湛的回忆起他在‘八·一五’以前三十多年的劳动生涯，以及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往事，也愉快的想到‘八·一五’以后幸福的日子。

在织袜工厂、在点心工厂，日本资本家从来没有让朴锡均舒适的生活过。幼年，他就成了日本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廉价劳动力。他

8岁进入工厂，便不能自由回家了。一年只得到一次微薄的可怜的工资。因此当时朝鲜工人称这种吃不饱饿不死的工厂叫做'第二监狱'(第一监狱是政治监狱)。朴锡均长大了。他受不了这样的压榨，于是便参加了国内各种地下的抗日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检举、投狱、酷刑等残暴政策下，他始终坚强不屈地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直到苏联红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才随祖国的解放而获得了自由。他加入了朝鲜共产党，更加发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性。他协助农民分配土地，他领导工人推行国家劳动法，做了许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1946年2月组织上分配他到工厂工作。由于他的生产量经常超过责任量而被荣选为模范工人。接着，又担任了劳动党的工厂支部委员长。他积极的向党与非党工人宣传肃清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残余影响。他自己努力生产，更积极地鼓舞全厂工人努力生产。

朴锡均从金刚山休养回来，和工人们在一起，还是叼着那个烟斗。当烟斗喷出烟缕的时候，他便会想起美丽的金刚山，想起解放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他爱烟斗，爱金刚山，爱工厂，爱自己的祖国。他的劳动热情更高，向工人们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积极性也更高。工人们热爱他、尊敬他。

解放5年来，随着工厂的发展，朴锡均看的很清楚：工厂是自己的，国家是自己的，应该把她建设得更美丽、更幸福。于是他团结全厂工人，鼓励全厂工人，一面重新建厂、一面发展生产。全厂工人逐年增加，到去年战前，工人总数已由日本投降时的36人，发展到1400人。不足龄的童工，以'工厂的儿女'名义送学校学习去了。工厂里盖起了宽敞的厂房，修起了技术学校和宿舍，有俱乐部、有运动场，一切工人福利在逐步增加。年青的朝鲜工人把劳动当作自己的享受，因此即使在战争爆发后，他们仍在热情的劳动。原拟在1950年12月止完成的两年生产计划，到去年8月14日，就完成了110%。战时，在敌机轰炸下，生产力反而从战前的93%提高到

99%。上工率还超过了10%。因此，全厂工人得厂长奖的100人，得共和国产业省奖的10人，得最高人民议会功劳章奖的3人，这3人是：金玉顺，现在担任着工厂某部的指导员，少先队竞赛班的班长，唐云实，去罗马尼亚出席国际职工会议的林春花，在祖国战争爆发后，已经参加了人民军。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年青的朝鲜工人热情建设他们祖国的图景，也看到这个工厂所有工人的荣誉，更看到了优秀的劳动党党员朴锡均同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成果。

正当年青的朝鲜工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在去年10月，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了平壤。敌人破坏了平壤所有的工厂，留在地下坚持对敌斗争的朴锡均同志也被捕了。敌人要他供认劳动党的地下活动和地下组织，敌人一切阴谋诡计都失败了。于是把朴锡均吊在树上，用铁丝穿通他的鼻孔，割去了他的耳朵，砍了他的手指，用铁棍打他，用枪刺戳他，用利刃割下他身上的肉。去年11月15日，朴锡均同志为他的祖国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敌人在朴锡均同志身上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最后，失败的还是敌人。平壤——英雄朝鲜的首都，终于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下光复了。

工人们回到自己的工厂来了，重新收拾起被敌人破坏的机器，重新掩埋了被敌人残杀的亲人——朴锡均烈士的遗体，擦干眼泪，整顿工厂房舍，布置防空设备，修理各种机器。于是，轮带又转动了，产品又出来了。工厂某部刚在十几天前——4月初被敌机轰炸，当天修理，第二天继续生产，照旧恢复原产量96%。

金秉元委员长悲愤而坚强地介绍了朴锡均烈士的殉难经过以及目前全厂工人坚决的斗志，最后他还要求向慰问团代表交待几句话，他说：

请你们告诉伟大的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工人弟兄们："我们朝鲜工人就是这样的和敌人作誓死的斗争。因为我们懂得，没有祖国的独立与自由，就没有我们的幸福；因为我们知道，在伟大中

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援助下，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原载《胜利属于中朝人民》1951 年 10 月）

第五篇

忆延安

回忆延安《解放日报》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由共产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勒令封闭。我经组织介绍，从重庆经洛阳和西安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于8月间辗转到达延安，被分配到当年5月创刊的《解放日报》，担任采访通讯科编辑兼记者。报社地址在清凉山，社长博古，总编辑杨松、余光生。当时，采通科不到10人，科长是郁文，后来他调到《晋绥日报》担任领导，便由杨永直继任科长。我在采通科以编辑工作为主，除处理通讯员来稿外，兼作采访工作。那时，县、区、乡通讯员很少。夏天，洪水暴涨，延河水位上升，南关外通讯站的邮递员不能过河投递邮件；冬天，冰雪封山，交通邮递受阻。每到这时，我们做编辑工作的同志，便要出去采访。我们沿着延河的东岸和北岸，往北经王家坪到杨家岭；往东经飞机场到桥儿沟、柳树店一带去采访机关学校有关学习、生产的动态新闻。有时，一个记者一天要写五六条新闻，才能填满"边区版"的篇幅。由于报社无人参加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会议，又很少基层通讯员，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很难知道，所以很难写出受读者欢迎的好稿子。

当时，在延安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外，还有《边区群众报》。此外，延安以外各专区的地委也大都有机关报，如绥德专区

的《抗战报》、三边专区的《三边报》、陇东专区的《陇东报》、关中专区的《关中报》等，延属专区因为已有《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所以没有办报。各专区的报纸除《抗战报》是铅印的以外，其它都是油印或石印的四开小报。由于稿源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也从专区报纸上选录一些重要的新闻在《解放日报》上转载。

我从 1941 年 8 月起一直在边区从事新闻工作，直到 1949 年 6 月由担任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社长任上调到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为止，前后历时 8 年，亲身经历了《解放日报》社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等重要事件。

1942 年，我党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解放日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4 月 1 日《解放日报》的宣告改版，也可以说就是延安整风运动伟大历史作用的直接体现。

一、《解放日报》为什么要改版？

1942 年 4 月 1 日，《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的社论，对报社以往的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社论指出：《解放日报》"没有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社论最后特别检讨说："对于边区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全面的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社论列举的这些缺点，具体表现在当时报纸版面的安排上，即：一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内，而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却只占四版的上半版，下半版则是副刊。任何重大新闻报道，一律按上述安排"对号入座"，就连当时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次报告的新闻，也只能在三版左下角一隅。所以，整风学习一开始，读者对《解放日报》就提了很多批评和建议。他们批评报纸"立论空泛"，"同日常工作与生活联系太少"等等；希望报纸今后能"密切联系边

区建设的实际”，“帮助解答每天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党中央根据毛主席于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也一再指示《解放日报》，要克服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观主义作风。据此，《解放日报》编辑部多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形成了报纸改版方案，又在《致读者》的社论中，宣告了《解放日报》改版的开始。

改版首先要解决的是：党报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如何实现？在《解放日报》改版当天发表的《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致读者》的社论中，在《解放日报》于这年9月发表的《党与党报》的社论，于1944年2月发表的《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以及其它几篇社论中，先后明确提出：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在《致读者》这篇社论中，还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党报所必须的品质”为：第一，要贯彻坚强的党性；第二，要密切与群众联系；第三，要洋溢战斗性；第四，要增强组织性。这就明确提出了以党性原则为首的办报方针。《解放日报》并根据毛主席于1942年3月在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全党办报”的指示，通过一篇题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的社论，直接向各部门的干部和党员提出了要求：“请你们也记着，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这也是你们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大家来动手动脚，我们的报纸才能办得更好”。

1942年9月，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兼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西北局为此发出了《加强〈解放日报〉工作的决定》。《解放日报》也配合这一决定发表了《党与党报》的社论，着重从党的领导的角度谈了帮助党报的问题，强调指出：如果只是依靠少数编辑、记者的意见和兴趣办报，“那就一定党性不纯，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1945年5月，《解放日报》在《提高一步——纪念本报创刊四周年》的社论中再次强调：“毛主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以及批评与自我批

评，“同时也是报纸的作风”，“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所有这些，都是党的报纸所必须具有的本质。

二、《解放日报》改版后的新气象

《解放日报》改版第一天的头版头条，登载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关于减征公粮4万石，公草1000万斤的决定。这件关系全边区百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从这一天起，《解放日报》整个版面作了调整，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即：一版，以解放区消息为主的要闻版；二版，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国际消息版；四版；综合副刊版。这样，大大扩充了报道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篇幅。改版两年后，《解放日报》编委会又提出了进一步调整版面的计划：一版，要闻及战况；二版，生产、政治、战斗通讯；三版，国内消息和副刊；四版，国际新闻。这两次调整版面绝非一般技术性措施；而是反映了《解放日报》编辑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它使报纸的报道同客观实际结合得更紧密了。特别是第二次版面调整时，恰值延安整风进入全面铺开阶段。于是，《解放日报》突出地增加了对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英雄模范事迹和劳动竞赛情况的报道，这对提高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紧密联系实际，《解放日报》所发文章也逐步树立起新的文风，对废除党八股文风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这同时，《解放日报》还下大力抓了记者和通讯员队伍的建设。报纸改版后不久，博古在一次报社编委会议上，谈到通讯员工作时提出：今后这项工作从批稿子，看卷子转到组织工作方面去，《解放日报》随后也发表了《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论述了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报纸不仅需要有能干的编辑和优秀的记者，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陆定一也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对于新

闻学的基本观点》的文章，指出："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广大通讯员相结合，"是《解放日报》建设报纸的路线和方针，又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组织为依靠，我们就可以办出一张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为了培养通讯员和记者，报社除通过所发社论和文章进行思想指导外，还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合编了《新闻通讯》专刊。以加强对通讯员的业务指导。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到 1944 年 11 月，全边区通讯员已近 2000 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 1100 多人。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地方消息总数的二分之一左右。这就使《解放日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大加强了报纸和实际以及和群众的联系。

1942 年 9 月，《解放日报》社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我们采通科扩大为采访通讯部，从鲁迅艺术学院调来了近 10 位同志担任记者，部主任相继由缪海稜、丁浩川担任，以后还从地方上调来担任党政领导的裴孟飞当部主任，报社还先后在延属、绥德、三边、陇东、关中 5 个分区设立了常驻通讯处。一批青年记者被派往各分区《解放日报》通讯处工作。我和另两位同志被派到绥德分区。行前，社长博古和我们进行了热情的谈话。他说：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尊重地方上的领导，在工作中求得人家的信任和帮助。这是你们下乡工作的任务之一。

接着，博古又讲了"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说：

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在平凡的群众里，去找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事物。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入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地把它反映出来。写作的形式和文字要打破老一套的格式，废除新闻八股，要写出老百姓的语言。但我们也要反对庸俗化的通俗。

博古特别强调地讲了培养地方通讯员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不仅是带了笔自己去写，更需要培埴当地的通讯员；只有依靠广大通讯员，报纸才能有群众基础。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本身业务。我们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细心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除了现有的特约知识分子通讯员以外，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

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

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上去采访，千万不要象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要象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

最后，他再三叮嘱我们：要做一个新闻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天职。

博古接见后，“到群众中去！到实际工作中去！”成了我们响亮的口号。不久，我们满怀激情告别了延安，分赴各个专区去了。

三、报纸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1942 年 9 月底，我们一行 3 人来到了绥德，直到 1946 年调回延安。在 3 年多时间里，我在绥德专区各县农村和通讯员一起，对整风学习、大生产运动、劳模人物、减租减息、民主选举、移民运动、文化教育、保卫边区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采访报道，同许多通讯员、农民交了朋友，学习了许多活的知识。当时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对报纸宣传工作很关心，经常了解我们通讯处的工作情况，帮助通讯处解决具体问题，让我们参加地委有关会议；最使我难忘的是 1943 年 4、5 月间，我参加了习仲勋带领的一个调查组，去绥德县郝家桥调查。调查组的成员还有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长邹文宣，宣传干事梅行等同志。下去之前，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经过学习，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认识到进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

策的基础。之后，我们遵照这一精神，到郝家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围绕大生产运动这个中心，根据绥德地区人多地少的特点，调查了移民运动、组织变工队以及锄草、夏收中的农作物和劳动力组织等问题。调查方式灵活多样，有分有合，有时和农民一起劳动，边干边谈。边区劳动英雄刘玉厚就是在调查中发现的，是郝家桥群众在一次由习仲勋同志主持的调查座谈会上把他推举出来的。就这样刘玉厚的名字很快从郝家桥、绥德县、全专区以致整个陕甘宁边区传开了。我除了结合农时报道了刘玉厚和郝家桥的模范事迹外，还在《解放日报》上相继发表了《劳动人民的旗帜》和《刘玉厚的光辉》等通讯。

关于移民问题的调查，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延安以南地区人少地多，而绥德地区则是人多地少。为了合理调剂劳动力，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陕北群众素有"下南路"的历史习惯，发动组织开展移民运动。历史上陕北一般的雇农、赤贫者常因没有土地、无法生存，只得下南路去开荒种地。边区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后，农民生活相应地得到了改善，但广大贫农的生产力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生活还相当艰苦。所以，经过边区政府的鼓动和奖励，经过各级干部的具体组织，广大贫农响应政府号召，向南路进军，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荒地。为了在整个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开荒运动，我们就移民对象，他们在生活、生产上可能和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了一次周密的调查。经过调查，了解到贫农中，唯有下贫农劳动终年，解决不了全家吃粮问题。对他们来说下南路移民是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生活的最好出路。在明确了移民的主要对象后，我们还明确了需要帮助他们筹划路费，准备口粮和衣被等等问题。就在从郝家桥调查结束回到绥德后的不久，我草拟了一份关于在绥德专区开展移民工作的方案，送仲勋审阅，得到了他的赞许，并让我和地委干部一起，参与具体的移民工作。在组织发动过程中，我陆续写了米脂县开展移民工作等新闻报道，和《马丕

恩在召唤》等通讯。1944年春，佳县李增正率领的移民大队，扛着红旗，唱着《东方紅》民歌，路经绥德去延安。绥德专署杨和亭副专员专门主持了热烈的迎送晚会，移民们即席编唱了多首陕北民歌。我当时兼任地委《抗战报》和《解放日报》的主编，参加了这次晚会，并请记者陈柏林采写了一篇《移民歌手》的通讯，详细介绍了《东方红》的全部歌词，发表在《抗战报》上。虽然歌词内容确实含有陕北农民朴素的感恩思想，但在当时却也真实地唱出了陕北农民心里的话。

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了六七年。1947年保卫延安自卫战争开始时，我被任命为《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派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随军记者，从此，告别了延安。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8期第37—46页
1988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声播蚕桑女，名扬花木兰”

一个“延安的养蚕姑娘”的人生际遇

甘露，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一个普通的女学生。40年代，在她似锦年华时就名震延安，因为：她能演唱梅派京剧“玉堂春”、“花木兰”，屡屡获得满堂掌声；她曾经是著名诗人肖三的夫人，因此，经常是当年毛泽东家中的座上客；她在陕北从事推广蚕桑事业，毛泽东曾赞誉她是“我们的养蚕姑娘”。她身材修长、风姿清秀、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正直豪爽。可说是当年延安青年女性中的佼佼者。

她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她的少女时期，正处于祖国危亡之秋。她经历了难于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奔向了延安；她有幸的是，每当处于关键时刻，总是碰到好心人为她引路；她和肖三情缘的种籽也在这个时期就埋下了。她和肖曾经有过恩爱的“模范夫妻”生活。当她还是30岁的少妇时，和肖三发生了婚变。她还是在痛苦中奋力拼搏过来了。她的中晚年是在谢筱迺的爱抚中、儿女长大成人的温馨家庭中度过的。她67岁的人生道路曲折而坎坷，锤炼了她的坚强意志。她不愧为一代坚强女性。

1943年，我是作为延安的解放日报记者派驻绥德地区采访时

认识她的。当时她受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的委派，到绥德地区来推广蚕桑养殖业，并在吴堡、清涧两县选点试验、推广新蚕种和新法养蚕，以及培养妇女养蚕能手，取得显著成效，曾经获得绥德分区专员的表扬和吴堡县政府的奖励。1944 年冬，在毛泽东、陈云、林伯渠等参观"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的蚕丝展览室，甘露向他们汇报边区发展蚕桑事业的成就时，毛泽东曾高兴地称赞她："你是我们的养蚕姑娘。"

因为我和甘露都是浙江海宁蚕乡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我曾积极帮助她在解放日报上进行发展蚕桑事业的宣传报道。

以后，我留在陕北、直到担任第一野战军随军记者。甘露、肖三于日本投降后和女作家陈学昭同去华北；以后，又和丁玲、陈明夫妇同到河北省阜平县。我们的联系就一度中断。直到 50 年代初，我担任了习仲勋的秘书，由西安调来北京，才知道她已经和肖三离婚。原来，她俩的结合和离异，还有那么一段曲折难言的经过。当然，我是同情她的；对她后来的爱人、能干的谢筱迺也印象很好。因此，当他俩结婚时，我曾到荣宝斋买了一幅齐白石画的"牡丹花"画卷作为礼物祝贺他们；还帮助他们邀请习仲勋（40 年代绥德专区的老上级）夫妇在北京在青海饭店参加了他们的婚宴。

50 年代中期，丁玲因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案而受到不白之冤，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其间，丁玲回北京要求其原单位发她一本《毛泽东选集》而被拒绝。甘露同情丁玲，要我为丁玲找一本毛选，我满足了她的要求。我们对这事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使丁玲犯了错误，怎能不让她学习《毛选》呢？对这件事，甘露是愤愤不平的。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发动批判彭德怀以后，国家逐步陷入了极左的狂潮，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急剧下降，机关干部生活同样受到严重影响。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干部每月定量标准下降到 27 斤，副食供应更难保证。我们一家由于身体

比较瘦弱，还容易度日，而甘露一家大小都是高大身材，饭量较大，就难于果腹。因此，每当星期天带着她的小女儿去我家作客时，我们再困难也得使她们吃饱肚子。临走时还得送她们几斤节余的粮票。那时候“做衣难”，谋划我家4个小孩的寒衣就十分着难。甘露联系群众面广，她可以在她家所在居委会内找家庭妇女，帮助我家缝制寒衣。缝新的、补旧的，一包包带去又送来。当时，我经常患神经性头痛，甘露介绍我去协和医院找神经科谭教授诊治；我爱人延玉珍的妇科病是她介绍去找林巧稚诊治的，而且都由甘露陪同前往。当我们夫妇于1961年8月奉调陕西工作。她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时，她那满含热泪夺眶而出的情景，实在难于忘怀。

经过“文革”浩劫，70年代中期，我和老伴曾两次到北京看望老朋友，总是借住她家的小屋，我们互诉各人所受的劫难、人世炎凉的体会，自然感慨万分。

1978年8月，我被调回北京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任职。我和甘露之间的交往就多了。当时她家住在东华门，每当我们去王府井，总要到她家歇歇脚，问个好。而且她总要用家乡口味烧鱼相待，用胖头鱼头炖汤，鱼块红烧，又叙叙国事、家事、大小事。那几年，几乎每当新年到来之前，她总要送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精美挂历。1981年下半年，我有机会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她家住在党校的宿舍区，她对我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无不积极相助。她爱好养花，经常受到她赠送的名贵花种。

1982年4月的一天，甘露跑来找我，说广西人物画家刘宇一在北京举行个人画展，其中一幅《良宵》，画的是1950年中秋国庆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联欢晚会上与柳亚子和诗的史实。描绘了50多位当代中国名人欢聚一堂的宏大场面，受到普遍好评，当时美术界权威人士江丰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赞《良宵》为扛鼎之作；但也有些人有不同意见，认为此画是“给共产党拍马屁”，因而不能送进人民大会堂展出。甘露是支持江丰的意见的。因此，她要

我帮助联系，请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去参观评论一下，习仲勋很快表示同意。4月28日下午，在刘宇一、江丰、甘露陪同下，习仲勋一行去王府井美院展览室参观。只见这幅《良宵》油画上，皓月明媚，宫灯高悬，毛泽东微微弯腰，捉笔待书，名人们在庭院中吟诗作画，品茗弈棋，畅叙攀谈，一派升平景象。画面气势恢宏、构图饱满和谐、人物细腻逼真、色彩华丽典雅。这本是画家在经历"文革"浩劫以后，表达了人民对50年代国家赢得祥和日子的怀念。确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而珍贵的一页，怎能说是"给共产党拍马屁"呢？当然，细心观察画中并不是没有毛病的。经过这次习仲勋对画家的鼓励和指点，又取得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推荐，《良宵》作了认真的修改，终于在1988年送进了毛主席纪念堂内举办的"中国名家书画珍品展"上展出，并由纪念堂留作珍藏。在毛泽东诞生100周年之际，画家应纪念堂之约，另行绘制巨幅《良宵》作为永久陈列，而原画由画家取回，交由香港拍卖行拍卖，于9月份以底价300万港元拍卖，突破了中国在世画家作品价格新纪录。令人遗憾的是，甘露没能见到她为之奔波的这幅名画的好结局。

1987年5月间，她患病住院，我带了一束鲜花到协和医院病房探望，只见她原来硕长而颇有风度的身躯已经相当消瘦了。但我不懂得她害病的严重，总以为她会慢慢好起来的，不料过不多久，她的病情发展到急性尿毒症引起脑出血，终于抢救无效，于5月24日上午逝世，还只67岁。8月6日我去八宝山公墓礼堂向她遗体告别。参加告别仪式的生前好友有700多人。正如画家黄苗子的挽联所题："声播蚕桑女，名扬花木兰"，概括了她晶莹明亮的一生。

甘露，原名蒋德良，于1920年1月出生在海宁县硖石镇，父亲早逝，家境贫苦，9岁上学，为免费生，1937年夏，甘露在"蚕校"毕业，正值"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年仅17岁的她，不随母亲外出避难，而和同学们一起挤上难民船过钱塘江到

浙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2月，在丽水县碧湖镇考上了当时省政府教育厅举办的“战时青年训练团”。原来上海抗日演剧团的肖崑（肖三的妹妹），任中队指导员。她们相识后交往甚密。

毕业后，他随肖崑到金华“中华全国战时难童保育委员会浙江分会”工作。

“保育会”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总会名誉会长是宋庆龄，副会长李德全，邓颖超等中共党员均为常务委员。浙江分会由省主席黄绍竑夫人蔡凤珍任会长，肖崑任秘书长！戚铮音任副秘书长，甘露和戚、程同住一室，在交谈中又得知戚、程二人都是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到金华的。她们给甘露介绍革命圣地延安的情况。对于她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促进作用。

她随戚铮音走遍了肖山、余姚、诸暨、绍兴等县，沿途宣传战时保育难童的意义和前途。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收容了303名在敌人的炮火和敌机轰炸下丧失了父母、从1岁到13岁的难童。1938年8月，日寇已侵占杭州和浙西各县，并将渡江侵犯浙东，情况十分危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商定，把浙江省的难童保育院迁往长沙。由戚铮音、程为昭组织护送大队，包括甘露在内共12个保育人员护送，日夜兼程，花了三天三夜才安全到达长沙。时张治中的大女儿张素我为湖南省难童保良院院长，把浙江难童安置在一个小学校内。1938年10月，广州沦于敌手，张素我匆匆安排保育院撤离长沙。经过十多天，历尽艰险，才到了沅陵。甘露在这偏辟而安全的山城里安排好家乡的难童后，决心踏上去延安的征途，到重庆去找八路军办事处。

11月，甘露带着保育院发给她的20多元“遣散费”，来到重庆。不料因未带任何介绍信，“来路不明”而未被接收。这时她那20多元遣散费已花完，无法前往西安。当她徘徊在重庆街头之时，突然遇到了杭州蚕业讲习所的俞筠蠲老师。师生异乡相逢，自然倍感亲切。这位可敬的俞老师为了发展蚕桑事业而抱独身主义，政治上

同情共产党，称赞八路军英勇抗日，支持进步青年。当她了解甘露的困境后，就介绍甘露到她领导的四川省丝业公司西充蚕种场工作，帮助她积蓄路费后再到西安去陕北。甘露在蚕种场工作期间，俞老师给她买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籍，更加鼓励了她早日去延安的决心。1939 年 11 月，她已积蓄了百余元路费，俞老师又帮她开具了四川省丝业公司去西安探亲的证明公函。凭这公函，甘露闯过国民党宪兵的层层盘查，终于到达了古都西安。当她跨进了七贤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时，又是因为没有介绍信而被婉言谢绝，但好心的接待人员王平告诉她，可以写信给延安的同学或朋友，请他们介绍她去延安。这时，甘露想起了往日的好友肖崑就是著名诗人肖三的胞妹。她就写信给肖三作了自我介绍，又托西安新华书店的安克成把信转寄延安的肖三。到 1940 年 3 月中旬，接到安克成的信说："家中来信，要你速归"。这一暗示，真使甘露欣喜若狂，终于在 4 月 16 日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的第三天，她见到了肖三。肖三当时在延安文艺界抗日协会。初次见到甘露，就激动万分地说："盼望已久了，真担心你被关进国民党的集中营，现在好了，到家了！"还说："你是我妹妹的好友，也就是我的妹妹了！"

历经磨难的甘露，此时面对已经 43 岁的肖三，就像对待自己仰慕的兄长一样，倾心地叙说了她的家庭、经历以及她爱好声乐、京剧，想到"鲁艺"学习的愿望。肖三静听后说："先不要去'鲁艺'，可先到中国女子大学去学习马列主义，以后再学别的。"并给甘露送了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她回去好好学习，然后送甘露下山。半山上遇到一位中年女同志，经肖三介绍："这是丁玲同志，这是我的妹妹！"由于甘露读过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丁玲也成了她的良师益友。

在"女大"渡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学校生活，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国革命史和党的建设等课程，初步树立了革命人

生观。学习期间，甘露被选为俱乐部副主任（主任是丁雪松，我国第一位女大使），下设声乐小组和京剧小组，邀请“鲁艺”的音乐家郑律成和潘奇担任声乐小组的教员；邀请“鲁艺”平剧院导演陶德乐担任京剧小组的教员。每天下午到“女大”俱乐部上课。在1940年秋为庆祝“女大”成立一周年，和1941年为纪念“三八”妇女节，京剧小组演出“四郎探母”和全本“花木兰”，导演指定甘露饰演“花木兰”，从而“花木兰甘露”的美名便在延安传扬开了，肖三当然更加为之倾倒。

当时，甘露在中央党校礼堂演出“花木兰”时，由鲁艺戏剧家阿甲和音乐家金紫光伴奏。当她舞枪时不小心失手，她沉着敏捷地拾起继续表演毕，毛泽东登台和她握手时说：“你很勇敢呀！”

从此，肖三对甘露更增强了爱慕之心，经常要甘露为他抄写书稿。甘露写得那一笔潇洒飘逸的好字，有如其人，肖三十分喜爱，又经常指点她如何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进步小说，如何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肖三住地文化讲和甘露学习的“女大”，两个山头遥遥相对，只有一条延河相隔，中间还搭有一条小桥。晚饭后双方下山散步就可以相见。如此往来几个月，纯结无暇、美丽善良、朝气蓬勃的甘露，使这位革命诗人的浪漫激情日益强烈；而甘露对肖三也由敬仰感激之情，进而萌发了少女初恋的梦幻。双方年龄的悬殊阻挡不了彼此间感情的与日俱增，相互间都感到对方的吸引力。但正在这时，在莫斯科的肖三的苏联妻子叶华带着孩子，于1940年10月来到了延安，回到了肖三的怀抱。此时，甘露清醒地把叶华当作自己的嫂子，热情地帮助叶华料理家务，使叶华逐渐适应延安的艰苦生活。

1941年7月，“女大”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工作。甘露响应党的号召，以一技之长为边区人民服务，报名要求到边区政府从事蚕桑工作。当时边府因无蚕桑专职干部，因而这项工作尚未开展，从甘露来到建设厅农业科以后，边府林伯渠主席曾对她说：“事在人为

么！你来了，我们就可以把边区的蚕桑工作开展起来！”1942年秋末冬初，遵照林老的指示，组成“边区蚕桑考察团”，任命甘露为团长，一行三人来到绥德地区。

甘露理智地退出了与肖三的感情纠葛来到绥德工作，这使肖三颇受感动。肖三给甘露的信中写道：“自从1940年秋叶华来华后，你顾全大局，决定忍让，这，你处理非常适当、大方、贤惠，我完全了解你，并十分感佩你！”

当时，我在绥德和甘露接触中，丝毫看不出她有任何沮丧的情绪，只见她正朝气蓬勃地为蚕桑事业而努力工作。意想不到，在延安的肖三和叶华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发生矛盾，双方都怀疑对方与异性朋友（包括外国朋友）发生不正常关系，感情出现波折，到1942年，发展到了感情破裂而分居。1943年11月，经请示党中央，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叶华和肖三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叶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苏联去了。

叶华离开延安以后，肖三对甘露一往情深，要求甘露回到他的身边。经肖三向中央请求批准，将甘露调回延安。这时甘露的心头，又涌上了难忘的初恋憧憬，在肖三和叶华离婚一年后，甘露，同意了肖三提出结婚的要求。1944年10月，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贺龙、王震、李富春、肖劲光等领导人，热情地参加了肖三和甘露的婚礼。毛主席回忆起当年16岁的毛润之和13岁的肖子璋（肖三的号）在湘乡东山学堂同学以来长期的战斗友谊，在给肖三祝酒时语重心长地说：“子璋啊！祝你和这个中国的养蚕姑娘白头偕老！”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和西柏坡先后生了两儿子：铁塔和甘平。孩子给了他们无比的幸福和欢乐。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勤劳能干的甘露，把肖三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安排得妥妥贴贴；甘露还同时照顾丁玲、陈明夫妇的生活。在这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重要历史时刻，甘露先后在张家口的晋察冀行政委员会交际处、接待

了被国民党暗杀的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先生的家属，和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等国际友好人士；在西柏坡村参加过中央研究室领导的土改工作。在工作之余，一面抚育幼子，一面做好两家人的后勤事务；还要帮助肖三抄写《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书稿。肖三也很爱孩子，尽量抽空帮助甘露给孩子喂饭、洗澡，逗孩子玩乐。周恩来同志曾当众表扬他们为"模范夫妻"。

肖三常带甘露拜访毛泽东。毛主席也总是热情招待，留他们吃饭。毛主席很喜欢孩子，有时就让警卫员叫肖三、甘露带上孩子搭上毛主席的吉普车去野外散步。

1949 年 1 月下旬，肖三参加了周副主席召开的一次会议后告诉甘露：平津快要解放，中央决定委派叶剑英、彭真负责接管北平，需要 500 名干部参加接管工作。希望现任工作能够离开的同志自动报名参加。甘露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非常激动，考虑到当时土改工作已经结束，两个孩子也有托儿所和保姆照管，可以参加接管工作。在征得肖三同意后报了名。

就在那年的 1 月 26 日清晨，她和领队张文松等 6 人，坐上敞蓬卡车向北平进发；28 日深夜抵北京西郊青龙桥，向彭真同志报到后，彭对她说："你是搞农业的，就分配你到军管会的农林水利处工作。"29 日凌晨，甘露随叶剑英等 20 多位干部分乘四辆吉普车，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们，分乘两辆敞蓬卡车，组成先遣指挥分队向市区进发。沿途欢迎群众人山人海。当时以彭真为首的北平市委就暂设在东交民巷德国大使馆内，车队开进了这个大院。次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

甘露到农林水利处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对接管的几百名科技人员行登记造册。及时分发人民币，让大家欢度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后来农科院一些专家们对甘露风趣地说："我们那时原以为要欢迎一位很神气的共产党大官，没料到迎来了一个穿一身粗布棉衣、背了个背包的女八路！"

4月初，肖三带了两个儿子从西柏坡来到北平，他奉周副主席之命，和钱俊瑞一起负责组织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无暇照顾两个幼儿。为此，甘露只好离开农林水利处的工作，调到肖三所在的文艺界，参加当时周杨和沙可夫正在筹备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处工作。4月底，肖三随中国代表团经莫斯科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5月25日回到北京。当天周副主席又委派肖三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延辰150周年纪念大会。肖三又匆匆地去了莫斯科。

7月1日，是解放后第一个党的诞辰纪念日，在先农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由朱德总司令作报告，文代会全体代表参加。领导上分配甘露负责照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等著名京剧演员。素来爱好京剧的甘露，当然尽心尽力地执行这一光荣任务。7月9日夜晚，大雨下个不停，甘露像往日一样正伏案细心校对肖三所写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一书的第三校清样。她哪曾料到，离家出国一个多月的肖三突然冒雨回家，他带来了已经离婚的叶华和两个儿子，并说他们已经在莫斯科同居了。

善良的甘露做梦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前才收到肖三于5月4日从莫斯科写给她的信中还是这样说的：

“……她（指叶华）在这里生活很苦，虽然孩子安顿了，但她简直无家可归，收入少，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因此她愿意去中国作事，同时愿带立昂、维嘉回国，这我很赞成。我告诉她，她去中国，你不反对。她表示感激你，并且再次声明：决不妨碍我你的家庭生活，决无‘挖墙角’之意。她只愿立昂、维嘉两个孩子感觉到有父亲能经常见面，她和我也只维持同志和朋友的关系，她就满足了……”

5月25日和平代表团回国当晚，肖三还对甘露说过，叶华向甘露发誓，决不破坏肖三和甘露的家庭生活。

天真的甘露非常相信肖三的诺言，也很同情叶华的处境，同意肖三把叶华带来中国。当肖三应邀于6月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诞

辰150周年纪念大会前，甘露曾要求和肖三同行，并取得周副主席的同意，但肖三却对甘露说："你去了，叶华就不能来。"因为他和叶华都没有把二人离婚的真情告知苏联当局。所以苏方一直将叶华当作肖三的妻子看待。也只能凭这一点，叶华才能来华。肖三又向甘露保证："叶华和孩子来了，把她安顿在东北，工作、生活有保障就可以了！"甘露信以为真，为了成全叶华来中国，她就不再要求和肖三同去莫斯科。5月30日夜，周副主席和肖三谈话，再三叮嘱肖三注意不要发生意外，既自找痛苦，对党的影响也不好。要肖三即使把叶华母子接来，也只能放在哈尔滨等地，不能来北平。肖三答应了周副主席，保证不发生问题。同时，李立三也和肖三谈话，要他把握自己，不发生意外，肖三也答应了。

当那天深夜肖三带着叶华母子冒雨回家时，甘露仍把叶华母子当客人招待，为他们做饭、烧洗澡水等等。本来，肖三和甘露居住在二楼里外两间卧室，而此时肖三把叶华母子安排在里屋，自己到外屋抱着甘露痛哭，向甘露坦白了他和叶华已经同居一个多月。表示既离不开甘露，也离不开叶华。说他很痛苦，请求甘露原谅。甘露好似被晴天霹雳炸懵了，痛苦地感到肖三欺骗了她，欺骗了党中央领导，异常痛心而愤怒。当时正在举行文代会的工作人员，第二天看到叶华出入肖三家庭的异常现象而有所议论，甘露羞于被辱，但为了照顾到党和肖三的威信，没有诉之于法，而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来到肖三家，听取了甘露的申诉，严厉批评肖三欺骗党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说："今天到了中国就要说中国话。"（意即要按中国的道理办事。）并明确指示肖三，立即将叶华母子送去大连。

叶华母子去大连后，肖三始而苦苦哀求，继而以他要参加国际活动、在中苏友协工作为由，日日逼迫甘露同意和他离婚，让他和叶华复婚。这极大地伤害了甘露的感情。为了维护党的威信，维护自己共产党的尊严，也照顾到肖三这位老同志的影响，甘露没有上

诉法庭，而是向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中组部和中直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申诉，请求中央教育肖三。为了避免争吵，同年8月中旬，自己带着小儿子甘平去上海看望母亲。不久，肖三又把叶华母子从大连接回北平。甘露在离开肖三以后，在各位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和众多好友的帮助下，逐渐冷静下来，认为肖三再也不值得她留恋了。同意和肖三离婚。1950年9月，由朱德亲自向肖三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意肖三与甘露离婚，与叶华复婚，并给肖三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后来，肖三几次给甘露寄去孩子的生活费，都被甘露坚决退了回去。

甘露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是，正像她自己的名字那样，她是纯洁无暇、晶莹剔透、光明磊落地做人；而且，关心他人，团结同志、急人所急、热情诚挚地对待他人。她并不因受肖三感情上的挫伤而倒下。相反，她更加坚强地面对人生，正当她30年华之时，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三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际贸易促进会联络部。此时，她和联络部部长谢筱迺相识、结婚，1955年生了小女儿谢立安。“大跃进”时期，她被下放到北京市轻工业局，协助局领导在原有基础上创建包括一轻、二轻的轻工业局，在筹建了包括工艺美术、挑补绣花、日用化学、皮革皮毛，食品酿酒、造纸、服装、儿童玩具等八个研究所，为这些行业以后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大跃进”期间工作过于紧张疲劳，引发了妇女血崩病而住院治疗。病愈后又改调国务院所属的外文出版局工作。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她被剥夺了分工管理毛泽东著作外文翻译出版的工作权。造反派成立“甘露专案组”审查后，又把她下放“干校”劳动改造3年。1982年离休。

由于感情上的沉重打击和工作、生活中的操劳，使她的精神和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曾因急病而进行过三次抢救性的剖腹手术。她拖着虚弱多病的身躯，在曲折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拼搏，她的一生是平凡而明亮的，无论对待工作和生活，她总是顾全大局，从不

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和发扬延安时代女性的优良传统。

（原载《炎黄春秋》1996 年第 4 期）

难忘的人民医院

——忆延安中央医院和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

人的一生如果得了重病，而被某个医院给你精心治疗、恢复健康，那将是永生难忘的。我就经历过两次，而且都处于艰苦困难的历史时期。这两次住院前后相距30年，却又是一脉相承——继承、发扬延安精神的两个医院。

第一次是1947年3月，陕北战场的开始阶段，在敌我力量十与一之比的悬殊条件下，当第一仗青化砭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作为新华社西北野战军的随军记者，既要回后方向新华社总社汇报工作，要求增设分社、增派记者；又奉命配合西野保卫科长带一个警卫排押送被俘的敌军旅长李纪云以下约40名军官带回后方。在此之前，当年2月初我就随军南下参加了陇东西华池战斗，紧接着又随军挥师北上参加延安保卫战。这次又满怀首次胜利的喜悦心情，一路之上，对李纪云不断进行争取教育工作，经过五天行军，到达绥德，把俘虏向后方交接完毕，并找到新华社总社的同志以后，就一身轻松，如释重负，第二天就随总社同志西经子洲县向靖边县的

青阳岔中央驻地进发。

三月间，陕北还是寒冬天气，狂风大作，飞砂走石，行军到达子洲县府所在地双湖峪，已经疲劳不堪，又加衣被单薄，第二天黎明起床，就浑身发烧、头昏眼花，无力支撑行动。那时候的陕北农村，毫无交通工具，所有的毛驴牲口已全部动员支援前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经总社带队人刘祖春同志直接找当时同在双湖峪宿营的周恩来同志请示，承周副主席批准，为了照顾从前线回来的记者治病，从他的驮运队中抽调一位马夫和一匹马，把我送到西面 80 里石灰岔的中央医院。这时中央医院刚从延安撤出，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已改称第一后方医院。当傍晚进入一孔大窑洞的急诊室后，我就处于昏迷状态，满脑子全是紧张激烈的战斗之梦。翌晨苏醒过来之时，我却睡在一孔老乡的草窑里，刚好置身一人，底下垫着厚厚的麦秸，自带的棉被，小窑门是柳条和麦秸夹编的，尚可抵御风寒。洞内虽然无法站立，却可以背靠窑壁休息，这就算我的单身病房。每天既有医生护士查房、量体温、号脉搏、送药，也有炊事员按时送饭、送水，当时给我治病的主治医生是李冰同志。

原来我害的病是相当严重的猩红热，咽喉肿痛、有红点斑疹、发高烧。当时药物奇缺，经急诊时打针后，连续服用磺胺类药物，总算渐见好转。由于我于 1942 年 2 月间在延安《解放日报》当记者时，曾经采访过中央医院，写了《记中央医院》，报道过它的事迹，对医护人员及后勤服务人员说起，还比较熟悉；又加他们很想听我介绍前线战斗故事，所以和大家相处十分融洽，受到很好的照顾。大约住院一月就病愈出院，出院前两天，炊事员还给我炖了一只母鸡，让我补养身体。事后每每想起这件往事，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同志的照顾，如果没有中央医院（第一后方医院）给我及时治疗，精心护理，也许我已早离人世了。

第二次是 1976 年 5、6 月间，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后期，我作为所谓的“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爪牙”以及《陕西日报》副总编的

“走资派”，遭受持续 7、8 年紧张激烈的批斗殴打、残酷折磨，自不待言了。特别是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原来是蘑菇种植房）居住 8 年后，我患上了胆结石和胆囊炎，这种病发作时间的剧烈腹疼、发高烧、呕吐、痛苦不堪。所幸的是，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门诊时，遇到主治大夫钱学贤医师，他给我认真诊断并表示深切的同情，让我住进了四医大一院的内五科干部病房。当时同住院的还有原陕西省委书记舒同同志，著名作家柳青同志，有原甘肃省委副书记薛宏福同志等等，都是文革中被揪斗的对象，真是同命运、共患难的同病难友。但四医大的领导和医护人员都是十分同情我们，细心检查诊治，并享受高级干部病员的待遇。平时，病员和医护人员谈心交友，亲如家人。特别是大书法家舒同同志给同诊室病友和医护人员题赠墨宝，尤为珍贵而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正在我们住院期间，也是我国遭受大灾大难之时，继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相继逝世；再加上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全体病员和医护人员，既共同沉痛哀悼，又采取紧急措施，预防地震，调整病房，保证病员们绝对安全。1976 年 10 月，是粉碎“四人帮”，从而结束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喜庆日子。说来也奇，我们多数病员在和四医大的同志们共同欢庆这一伟大胜利后，就病愈出院了。临别时依依不舍之情，到今犹历历在目，有的同志到今还保留着亲密的联系。

没有料到的是：1992 年 12 月 19 日，赵炎、安存虎二同志来访，才知道原来延安中央医院，也就是现在西安的四医大附属医院的前身，难怪他们仍然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的医德、医风和医术，深受广大伤病者所欢迎。他们送我一本《延安中央医院——第一后方医院纪事》，其中选录了我于 1942 年 2 月 12 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记中央医院》一文，并要求我再写一点回忆文章，我当然乐于应命。

写于 1993 年 1 月 12 日

（原载《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第 361 页—363 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9 月。）

“八·一五”在延安

8年抗战，既漫长而又艰苦；胜利的到来，是那么突然而又令人如此激动！

1945年8月14日深夜，作为中共中央新闻信息中心——延安清凉山的新华社电台首先抄到几家西方通讯社和苏联塔斯社的电讯：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15日颁发诏书向全国广播，停止作战！中国人民8年浴血抗战终于胜利了！

清凉山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总领导博古，及时地把这一胜利喜讯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编辑部夜班同志们沸腾了，通过当时最快捷、但并不太多的传播方式，分头打电话告诉了各党、政、军机关，各群众团体、工厂、学校。顿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延安山城振奋了，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响彻夜空；堆堆篝火在各个山腰熊熊燃起。延安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我从清凉山上编辑部的窑洞前向南眺望，只见南关外新市场口一片火光，人们在一阵阵锣鼓声中欢快地扭着秧歌。我兴奋地奔下山去进行现场采访。但是，原来城东的延河桥已被山洪冲垮，好在北岸正有一只渡船待开，我搭上渡船过河，一口气快步跑到新市场口，但见诗人柯仲平正高举火把，率领他所领导的边区民众剧团的男女团员们，一边唱着他们自编的欢庆胜利的歌曲，一边扭着快乐的秧歌；

此外，来自东、南、北三方的秧歌队，也陆续地聚集到新市场口的广场来。人们彻夜地跳着舞，整个山城的灯火彻夜不灭。

当时我兴致勃勃地返回编辑部时，已是8月15日凌晨。新华社已经向全国发出了《新华社延安十五日晨急电》，称："日本政府已接受美国国务卿贝纳斯代表美、英、中、苏政府送达东京之照会所规定的投降方案。"8月15日《解放日报》还同时发表了苏联塔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所发的胜利电讯。整个延安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工厂国旗飘扬、万众欢腾，纷纷准备庆祝游行，买鞭炮、扎彩灯、绑火炬、张灯结彩，杀猪宰羊，准备聚餐。各单位的黑板报、墙报，都用红色大字报道这一抗战胜利的喜讯和日本鬼子狼狈投降的漫画以及诗人们的即兴诗。

《解放日报》还发表了谢觉哉赋诗：《抗日战争胜利》："8月15日复仇节，8月15日胜利天。伏尸流血五千里，尝胆卧薪一百年。虎待全擒须扫穴，鱼还未得莫忘筌。拼将福祉贻孙子，嘉岭山头看月圆。"

是啊！延安人、清凉山人并不因胜利而冲昏头脑，人们的头脑特别清醒，因为他们始终怀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因为他们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社长博古随时保持着和党中央的密切关系。当8月上旬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红军出兵东北，在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援和配合下，势如破竹，消灭了日寇主力关东军68万人。而美国又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日寇败局已定，德、意、日三国全面溃败，这一喜人形势大大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

正当我们准备迎接胜利之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却命令各地日伪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缴械投降；不准我坚持敌后艰苦抗战的军民享受胜利果实。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壮大自己，借用美国给他的援助，然后再返过头来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屠杀人民。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

充分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因此，就在8月13日和16日，由毛泽东写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既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

50年前“八·一五”的延安人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

50年后“八·一五”的中国人民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头脑也是清醒的。

（原载《中国财经报》1995年8月13日）

第六篇

人民的忠实勤务员

——习仲勋

人民的忠实勤务员
——习仲勋

从1943年春到现在，我和习仲勋同志的交往中，无论在绥德、延安、转战陕北，还是解放初期在西安，以至到北京9年当他的秘书，以后到宝鸡、西安、重返北京；无论朝夕相处，还是天各一方；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习仲勋同志总是我的领导，我的良师益友。50多年来，不论走在平坦大道上，或者历尽坎坷曲折。他的为人，他的品格，始终保持着人民的忠实勤务员的本色。人生几何，能在革命历程中和这样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交往半个多世纪，确是我的幸运。

说来有缘，从40年代整风运动开始，在绥德初次相识于危难时刻——在"抢救运动"中，他实事求是地处理我和海燕的关系，就对他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从此，结下了以后长期交往的情谊；转战陕北期间，我作为彭、习大军的随军记者，体会到习仲勋对彭德怀的战斗情谊是怎样形成的；光复延安后就聆听过他对新闻工作要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报告，印象至为深刻；西安解放后他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我作为报道他"人民的忠实勤务员"的专访记者，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习仲勋是怎样和刘志丹一起，在和

"左"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受他委托我赴朝鲜向彭总转达慰问致敬信，致使彭总接受我的单独专访；直到1952年6月我被调任习仲勋的秘书，从中共中央西北局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到国务院，无论在机关工作，或跟随他外出调查研究、参加中央会议；和他朝夕相处9年整，更加深了对他的认识；以后，他建议我到实际工作中去加强锻炼，调任了中共宝鸡地委副书记，仍然受到他的关怀和鼓励。没有料到的是，1962年9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康生诬诰为"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的莫须有之罪，使他磨难达16年；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被株连为"参与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爪牙"，和他分别挨整，同遭劫难。我曾被整得休克过3次，幸运地从死亡边缘活了过来；1978年习仲勋复出、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我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曾到广东农村调查，聆听过他对广东实施特殊政策的初步设想；他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期间，我因离休后作出些贡献而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曾相继向他报送我的作品成果，说明我没有辜负他多年来的教诲，使他得到宽慰，也受到他的鼓励；1990年，他鉴于有些人写西北党史存在的不正之风，曾多次找我面谈撰写西北党史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一度曾希望我回到他身边工作。遗憾的是，1991年夏，他突然犯病。他的夫人、儿女以及我们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深感抢救习老史料的任务很紧迫。1992年3月，由习老夫人齐心同志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转达了习老病前重视整理西北党史和西北老同志史料的意见。中央办公厅报送中央领导同意，请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同志牵头，吸收有关省委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人，组成了"习仲勋文选及革命生涯编辑委员会"，由陕西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负责。我有幸受命担任第二编辑组组长，和范民新、曹振忠等同志共同负责，编辑《习仲勋革命生涯》一书。3年多来，在编辑过程中，使我从众多作者来稿中增加

了对习老崇敬心情；加上我近年来深沉的回忆，50多年的风风雨雨，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随他走过黄河、长江，上过秦岭、庐山；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斗转星转，苍海桑田。如今我们都已鬓发苍苍，儿孙绕膝；往事悠悠，说不完、道不尽。他既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一生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坎坎坷坷的革命生涯中，不止一次地遭受不白之冤，但他能顾全大局，强忍委屈；他襟怀坦白，始终对党、对祖国抱着一颗至诚之心；他为人质朴厚道、正直无私，待人诚恳，和群众心连心；他一贯实事求是，从不整人，不搞"左"的一套，却经常帮助他人平反冤假错案……。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让他那种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之正气，永远保持人民忠实勤务员本色之正气，成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领导干部的风范。

初次相识于危难时刻

1943年在延安，由康生直接导演了一场所谓的“抢救运动”。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抓了很多“叛徒、特务、汉奸、托派等坏人”。1944年经过甄别，证明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抗日爱国、热爱共产党的知识青年，他们一一得到平反，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名誉。这中间发生了一起震动延安的所谓“海燕事件”，这是延安“抢救运动”中一个值得深思的小插曲。作者当时亲临其境，正是习仲勋同志帮助我解脱了极其沉重的包袱，实事求是地处理了我和海燕的关系问题，给我这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3年初春，陕北绥德县城，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我站在兴隆巷半坡那座小洋楼的晾台上，眺望城区天空，只见灰蒙蒙的一片，心境十分烦闷。当时，整风运动从学习阶段转入审干和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正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解放日报驻绥德通讯处的负责人海燕和他的妻子林坚，双双逃出边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当即下令通缉特务分子海燕夫妇。我作为通讯处党小组三人之一，对此，自然免不了要作出交代检查。当时唯恐牵连的紧张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一天早饭后不久，仲勋同志突然来到通讯处办公室。这里原来是国民党退役旅长、民主人士刘杰三先生的小别墅，在那时的绥德

是比较阔气的。仲勋同志谦和自然、平易近人，随便赞赏这座小洋楼的建筑后，顺口说："这可不能随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

我们初次见面的谈话，自然地是从海燕夫妇逃跑事件谈起。经过的情节我很清楚，我便如实地向仲勋同志作了汇报。

那年的二月间，《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同志来电报调海燕回到延安。半个多月以后，林坚疑虑地问我："我和海燕过去离别三天就有书信往来，怎么这次他到延安这么久还没有来信！？"我认为当时通讯站寄信全靠步行，从延安到绥德500多里路，遇到刮风下雨，有时可能耽误，稍等几天就会收到海燕来信的。可是她仍然很怀疑地说："这次他回延安以前，绥德文艺界一位朋友告诉他，说延安的"抢救运动"已经开始捕人，作家吴奚如就被捕了。所以那天晚上，海燕半夜里都从睡梦中惊醒的。是否他回延安后也被捕了？"我认为林坚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正说话间，通信站送来了一卷3月10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拆开一看，当天第二版整版篇幅发表了海燕所写的"安塞劳动英雄杨朝臣"的长篇通讯。我说："海燕在安塞采访去了，又写了那么一篇大文章，当然顾不上给你写信了！"事实完全消除了林坚的顾虑。隔天后，海燕又从延安发来电报，要求调林坚回延安。在一般情况下，夫妇调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对此，地委组织部已经同意，还托林坚捎带一包干部材料转交延安西北局组织部，我也帮助林坚打点行李，雇了脚户送她动身。

岂知林坚从绥德南下，海燕从延安北上，在清涧中途相遇，夫妇两人一同在宜川地区走出边区向国民党统治区逃跑了。作为《解放日报》的名记者海燕成了被通缉的特务分子，在绥德这么一个小城市里震动是不小的。

海燕是怎么个人呢？他是四川人，出身地主家庭，大学生，活动能力很强，很能写文章。但是他自恃很高，容易和别人闹矛盾。据说他原在延安留守兵团总政治部工作时，就和总政领导人关系闹的很紧张而调离的；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会期间，他

为了争取与会记者的待遇问题而发动记者们向参议会提出要求改善待遇的提案。当时是作为违纪问题而受到报社组织的严肃批评。

仲勋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对这事件大致有了个底，当即向我表示："你和海燕夫妇只是工作关系。他们的逃跑与你无关，你可以照常安心工作，并协助党组织继续查明他们的问题。"仲勋同志还让我搬到地委宣传部院子办公，为我创造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当时，地委机关报《抗战报》主编，和抗敌书店经理都被集中到整风训练班学习。仲勋同志要我继续做好解放日报本职工作以外，还要我兼职代理《抗战报》主编和抗敌书店经理的职务；并让地委宣传部调了绥德师范高年级的四位优秀同学，协助我收发文稿登记、誊写稿件、跑印刷厂校对等技术性工作。

我从原来背负政治包袱，到党组织领导人的信任和重用，心头的顾虑消除了，工作积极性自然很高。身兼三职的工作照常运转，绥德地区各项报道在《解放日报》上持续不断；《抗战报》继续出版；抗敌书店正常开门营业。在仲勋同志亲自带动下，机关生产也搞的热闹，纺毛线、熬硝制炸药、二郎山上种土豆、无定河边种花生等等，整风生产两不误。

海燕夫妇逃跑以后又怎么样呢？不久，他们首先把那包干部材料原封不动地寄到了西北局组织部；到重庆后，海燕立即找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同志作了交代检查。董老鉴于他交代检查比较清楚，曾经让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安排他协助党组织做一些统战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和考验，说明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在全国解放前夕，党又派他到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他还主编了一张《周末报》作为掩护。全国解放后，他又受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委派为民生公司宜昌港务局副局长。50年代中期，他从武汉作家协会来北京，找到董老和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同志协助他恢复了共产党员的党籍，并且为董老写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海燕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年轻时的毛病和他的才能一样的突出。由于康生搞极“左”的一套，使他蒙受冤屈。海燕逃跑后也自知错误，但这又是环境迫使他采取的下策。好在党在运动后期实行了正确的甄别政策，使海燕最后得到了公正的结局，并且为党做了很多工作。而习仲勋同志能够在当年康生正搞极“左”一套之时，实事求是地处理我和海燕的关系问题，不仅使我个人当时免遭厄运；同时，也是仲勋同志一贯实事求是抵制极“左”政策的一部分，这是40年代曾经在绥德地区工作过的同志们一致的共同体会。

（原载《炎黄春秋》1994年第2期）

他带我到群众中去

1943年5—6月间，为了开展绥德专区的劳模竞赛，推动大生产运动，仲勋同志要我参加了由他亲自率领的绥德郝家桥调查组。调查组成员有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长邹文宣、宣传部干部梅行、专区妇联干事张力等同志。行前，仲勋同志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当时，陕甘宁边区根据延安以南地区地广人稀和绥德地区地少人多的特点，和陕北人民以往"下南路"的习惯，以及配合南泥湾驻军三五九旅推行朱德总司令屯田政策的需要，已经相继多次颁发有关移民工作的指示，和对移民的优待办法，边区政府还特别奖励了米脂马丕恩、马杏儿父女移民劳动英雄，大张旗鼓地在全边区开展移民运动。边区政府实际上已把移民运动作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把它作为加强军民团结、巩固边防的双重战略措施。由于我曾经对移民问题作过多次报道，所以仲勋同志就分配我对移民问题专作重点调查。在调查组的会议上，仲勋同志具体介绍了当时的绥德专区在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刚从国民党何绍南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边区政府在这里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生活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但是，广大贫农阶级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

全的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贫苦农民南下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幸福的新生活。但是，仲勋同志又提出：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发动移民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人。他就南下的移民中存在什么困难以及发动宣传组织移民工作的方式方法，又作了具体的指示。

我在郝家桥行政村的刘家渠自然村的20户贫农中，按生活状况选择了上、中、下各两户贫农家庭进行调查，发现他们虽然都属于贫农阶级，但由于各自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不同，对于响应移民号召的积极性也各不相同。比如，上等贫农每年稍有余粮，可以逐步发展为自耕农（中农），他们就不能作为移民的对象。中等贫农每年青黄不接时，虽然还要外出打短工，临时挣上斗儿八升，度过春荒，但只要日子过紧一些，他们也就不大愿意远离家乡下南路，要动员他们移民很费劲，需做更多的说服解释工作和更多的帮助条件。唯有下等贫农们，他们虽然每年需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替别人打工，但仍然解决不了全部吃粮问题，他们亲身感受到只有下南路移民才是从根本上改善生活的最好出路。因此，大量移民的主要对象就是下等贫农。只要稍作动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他们就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南下移民。确定移民对象后，还要根据农事季节，选择适当时机，帮助他们筹划路费，携带口粮，准备衣被等等。我对这些实际问题都进行了细密的调查，并以《移民问题——绥德分区模范村郝家桥调查之四》为题，撰文发表在1943年11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在挨户调查中，我发现许多家小孩子患有脓疮、头癣、红眼等疾病，我向仲勋同志汇报后，他让我回城里带些来苏儿、碘酒、仁丹等一般药物，让我根据卫生常识，给这些孩子治病，我让这些病孩的母亲把水烧开、晾凉，帮助孩子洗澡、擦药水、滴眼药。在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中，居然治愈了好几个。当时农村里不知道新闻记

者是干什么的，都以为我是医生，因此我还结交了好几位贫农朋友，以后每当他们进城赶集，就很随便地到地委机关来歇息，聊天，寄存东西，有时还同睡一个炕上，他们还经常带着鸡蛋、南瓜子、杏子、沙果等给我们尝尝。在亲密自然的交谈中，农村的情况、问题及农民的要求和意见，也就及时地反映上来了。

从郝家桥调查回绥德不久，我草拟了一份在绥德地区开展移民工作的方案送仲勋同志审阅，得到他的赞许，并让我和地委干部一起参加参加具体的移民工作，在组织发动过程中，我陆续写了绥德地区移民工作的新闻报道。1944 年春，佳县农民李增正率领的移民大队，扛着红旗，唱着他们自编的《东方红》民歌，路经绥德去延安。绥德专署杨和亭副专员专门主持举行了一个热烈的迎送晚会。我当时兼任地委《抗战报》主编，参加了这次晚会，并请记者陈柏林同志采写了一篇《移民歌手》的通讯，同时发表于《抗战报》和《解放日报》。

（原载《新世纪领导者》1994 年第 6 期）

和邓宝珊早有交往

偶得一本《发展》杂志，对《甘肃第一任省长邓宝珊》一文颇感兴趣，我知道习仲勋与邓宝珊将军亦有多次交往，印象深刻，兹述如次：

40年代我们在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期间，虽则四面受到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马（步芳）军队的包围，但是我们仍有相对和平的安全感，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边区北线邓宝珊和我们党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关系。1943年6月间，邓宝珊有意违抗蒋介石令他绕道宁夏赴重庆的旨意，而故意从榆林出发，经绥德、延安再赴重庆。当时习仲勋为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曾专门为邓宝珊组织当地群众和机关干部数百人出城，在无定河畔、永定桥头夹道欢迎。习仲勋和当时任抗大四分校校长的徐向前等策马到远郊相迎。当时我是延安《解放日报》驻绥德地区的记者，曾受习仲勋书记的指示，访问下榻在开明绅士刘绍庭家中的邓宝珊，他愤愤地表示了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不满情绪，热情地拥护中共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这篇访谈发表在当时的绥德《抗战报》上。建国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邓宝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彭德怀和习仲勋联名致电欢迎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合作共事。1958年，我国推行“三面红旗”中过“左”

行为初露时，周总理指示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组团到西北考察期间，邓宝珊在“邓园”设家宴款待习仲勋等一行，当时我担任习仲勋秘书，也曾随习和余心清一起赴宴，有省政府秘书长沈求我作陪。邓宝珊平易近人，宴会开始前，请我们每人先尝一段新玉米，用作酒填。他不主张豪饮，建议慢慢品酒。席间，他对当时甘肃已经出现的“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共产风”已有微词。这引起了习仲勋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对正兴建的“引洮上山”工程表示怀疑，共同感到不安。翌日，邓宝珊不顾年迈，亲自陪同习仲勋去武威、张掖两地区考察，中途还参观了正筹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基地和玉门油矿。到敦煌后两人共同听取了县领导人关于“一县一社”办大社的经验，以及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托儿上学”十大包的措施，并一致指出当时实行这样的措施为时过早，当前不宜推广的意见。邓宝珊还陪同习仲勋参观鉴赏了敦煌莫高窟。

（原载《发展》1995 年第 6 期）

报纸宣传要适应迅速发展的新形势

——习仲勋谈新闻报道

1948年4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一年一个月另三天以后，在我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大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弃城南逃。革命圣地延安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时，我作为新华社的随军记者，在参加了历次战斗、特别是扭转陕北战场局势的著名的沙家店战役后，又经过清涧、延川、延长等战斗，胡宗南部队仓惶南逃之时，我被调回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又重新回到了亲切的延安清凉山。

早在1943年春，习仲勋从关中分区调任中共绥德分区地委书记时，我是《解放日报》驻绥德的记者，曾多次对他进行采访，并随他一起到农村进行调查，受到他的教育，印象很深；在转战陕北过程中，我是新华社的随军记者，又受到他的关怀和教导，深深感到，他对党的新闻工作十分重视，常有亲切的指示。光复延安后第一个“九一”记者节（那是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批进步新闻工作者倡议的），当时担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应邀发表了重要的讲

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对新闻工作如此系统地、有针对性的讲话，并记录了他讲话的全文。回忆那次讲话，时间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仍然感到这次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讲话开始，他就表扬了当时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自义合会议以后，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1948年1月间在绥德义合召开那次会议，正是习仲勋抵制和纠正当时康生推行土地改革极"左"路线的一次关键性会议。《群众日报》由于"它能够在党的路线指导下，发挥了党报的作用，联系了更多的群众。……不是讲空话，而是能够给群众解决问题。……这就是群众日报今天所走的正确道路。"但是，习仲勋感到报纸还难于适应胜利发展的新形势。的确，当时革命战争迅速推进之下，暴露的政策性问题很多、很复杂，为了把报纸办得更好，他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七点意见：

第一，应加强对记者和通讯员的政策思想教育，报道要系统、有中心、有分析。当时报纸的通讯员包括工农兵通讯员，和各地党政军机关干部和领导人，政策思想水平很不一致。而当时新解放区像土改等政策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不懂政策是办不好报纸的。他批评当时"报纸上的零碎消息多、片断事实多、现象罗列多。不能对一件事或一个运动作有系统、有中心、有分析的反映，不能使记者对一件事或一个运动看出它的发展和全貌。"因此，他要求报社的编辑部经常钻研业务，提高写作能力，并对通讯员经常进行思想政策和工作方针的教育。

第二，编辑工作要和领导机关的研究工作相结合。他认为要求报纸有系统、有中心、有分析的报道，光靠记者采访是不行的，因为记者不了解各个部门的专业，不熟悉各个部门的全盘工作情况，但他们有联系广泛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而领导机关的研究工作则是经常对其本身工作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和总结检查，如果和报社记者的采访报道结合起来，则可一举两得，对双方都有利。因此，他又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报社主动联系，通过报纸推动工作。

第三，报纸要加强对部队活动的报道。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武装斗争是党领导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军事斗争的胜利，就表示着革命的基本发展，一切革命活动的集中表现”。当时，我从前线调回后方，负责军事方面的报道。他的这一指示，是对我们的工作一个十分有力的支持。

第四，报纸要克服新闻报道和边区实际相脱离的现象。他批评了当时报纸着重于远的、大的、和别的地区的新闻，而不重视本地区实际问题那种好高骛远、夸夸其谈的作风，作为一张地方报纸应予以切实纠正。

第五，报纸要结合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比如当时党中央提出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下，很多复杂的政策性问题，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不能各行其是，所以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是当时全党一个严重问题。但是，报纸上反映很少，没有起到党报代表党发出号召、促进各地坚决贯彻执行的作用。

第六，教导记者要克服肤浅、夸张和粗枝大叶的作风。作为一个好的党报记者“切忌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听到一点就动手写稿的‘客里空’作风。写作上的夸张作风是极其有害的。”他举例说：“《群众日报》8月31日前线通讯‘重伤仍然杀气高’一文，描写一个战士受伤后自己用手巾塞住伤口止血的情景。可是却写成‘好像堵塞一个水渠似的’。试问：“象堵水渠那样止血还能活着吗？这种不恰当的形容，反而损害了英雄的形象。”

第七，要用全面的观点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优良传统作风之一，是改进工作的有力武器，但运用不当就会发生副作用。比如有的地区原来工作中的缺点，经领导上检查出来以后已经改进了。报纸还要去批评指责，这就不对了。党报的批评等于代表党委的意见，要公平合理，要严肃负责。

我们听了报告以后，报社还组织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大家深深感到，他这个报告非常重要而及时，

充分说明，报纸宣传一定要体现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在这以前，报纸也曾一度受到康生在晋绥地区推行极“左”的土改政策的影响，作过一些错误的报道。由于西北局于1948年1月召开义合会议，习仲勋书记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报纸宣传及时得到了纠正，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习仲勋于1948年1月19日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毛泽东于1月20日立即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习仲勋当时对新闻工作及时提出的意见，都是有针对性的。而改进报纸工作，无疑地同时也会促进地方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改进。讨论时，对第六条中所说描写“重伤依然杀气高”的那位记者，在这次大会上受到批评，认为即使受到深刻的教育，而且也没有点他的名，但思想上震动很大，面子上十分难堪，还有点情绪。经过大家诚恳的帮助，特别是我作为军事报道组组长，甚至包括编发此稿的编辑同志，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接受一次教训，我们都作了自我批评。主要理解，身为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对党报工作的关怀和爱护，对改进我们的工作是大有帮助的。1948年冬我又受命再上前线，负责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的工作，习仲勋这次谈新闻报道问题，也是一次思想武装。

初写习仲勋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3人分别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当时西北新闻界的领导人林朗，根据记者中对这3位领导人平时比较熟悉的关系，分配毛岚采访彭德怀、莫艾采访张治中，分配我采访习仲勋，以便写出人物介绍，在报纸上报道。

我撰文的题目是“人民的忠实勤务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习仲勋副主席”（见1950年1月20日《群众日报》和《人民日报》）。访问时由当时西北局秘书长黄植陪同，由习仲勋面谈了两次，我起草的文稿，经黄植帮助修改。我认识习仲勋是1943年2月，他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时，所以1943年以前的那部分，基本上是由黄植帮助找了不少档案材料加以充实。那年，习仲勋的革命历史已有23年了，他的斗争经历相当丰富，要在3000多字中比较全面地写出他的革命生涯和他的特点，也是一件难事。但在对习更为熟悉的黄植帮助下，还是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恰如其人。

重读这篇访问记，可以看出：当时年仅36岁的习仲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一个从群众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1. 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作风；2. 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

求是精神；3. 擅长统一战线工作；4. 重视民族宗教政策。而且，他在实践中对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执行得那么自然而和谐。我所接触过的认识习仲勋的人，大都有此同感。我惊奇地发现，43 年前我初写习仲勋的特点没有错，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的这些特点发扬的更加鲜明而丰富。现在只举其要点略加回顾。

（一）他的第一个特点，正如习仲勋的老战友、当年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长王泰吉所说的："仲勋是农民老汉老婆们的干儿子"。是的，习仲勋是农民的儿子，但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把他早已锻炼成为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成长的快，成熟的早。他 13 岁就在家乡富平立诚中学参加了共青团，为了反对校内反革命分子开展学生运动而被捕，在监狱斗争的考验中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出狱后就转入农村地下工作和农民交朋友去了。他 18 岁就领导了"两当兵变"，在渭北苏区开展游击战；19 岁——21 岁就担任了陕甘边游击队政委、陕甘边苏维埃主席。1935 年 12 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吴起镇，毛泽东才从左倾路线设置的监狱里把他和刘志丹等 100 多位陕北革命干部挽救出来的。习仲勋在这些任期内的艰苦斗争中，始终和群众在一起，就象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如果脱离了群众，革命斗争就要失败。由于习仲勋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所以他的这种群众路线思想作风，直到以后漫长的后半生中更加发扬光大。

（二）他的第二个特点，由于他善于体会和坚持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所以他总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作为决定工作方针政策的最高原则。1933—1934 年间，当陕甘党内关于红军的统一与分散的问题、创造根据地问题和肃反问题发生原则争论时，他总是站在代表正确路线的刘志丹一边。有更多人知晓的是：1948 年春，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发生过"左"的偏向时，习仲勋就坚决主张不能动中农的原则。他向干部们反复说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和抗战时期新区情况基本不同。平分土地是为了消灭封建与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而在已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中农

已经成为农民的多数时，再去平分中农的土地，那就会有80%的农民反对，所以是错误的，对发展生产极为不利。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及时纠正了边区土改的"左"偏，并顺利地转入到生产运动。我们党在相当长期"左"的错误中，有人误以为他右，其实正是他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他这种珍贵的品质也是和长期遭受"左"倾路线的迫害分不开的。他和一些熟人相处时，有时脾气比较暴，但在争吵过后很快就淡忘了，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整过人，但他曾经帮助不少人平反冤假错案。他常说："只要你考虑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你就会忍受艰难困苦，你就会坚持英勇斗争，许多问题，你也就会想通了！"他就是用这种精神来对待他自己所经历的坎坷的。所以早在1942年底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嘉奖习仲勋的题词，就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三）他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从来就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早在1943年他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时，由于当时绥德地区刚从国民党何绍南的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没有经过土地改革，他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民主人士霍祝三、刘杰三、刘绍庭、张哲卿等人的关系相处很好，甚至和尚未解放的前榆林国民党驻军邓宝珊将军也有地下秘密的统战交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中，各项事情，他都以谦虚、诚恳的民主作风和党外人士多次反复协商，唯恐稍有不周。他和副主席张治中将军长期亲密团结合作，更是突出的范例。他牢记毛泽东早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的指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他经常告诫共产党员："如果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觉得自己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不积极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不虚心学习，其结果都是违背党的政策，办不好革命事业的。"所以，当他从西北调到中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

期间，他和各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各民主党派、非党人士以及知识分子在进行更高层次、更为广泛的交往中，无不坦诚相见，亲如家人。因为他始终明确：我们共产党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党的基本政策，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坚定不移、永远不变的。

（四）他的第四个特点，根据西北地区多民族的环境，他又再三强调各族人民革命大团结的重要性。当时，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人口约1300多万，而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就占了600多万人。在新疆就有汉、回、蒙、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索伦、俄罗斯、塔塔尔、塔吉克、塔兰其、乌孜别克、满等十四个民族。所以，习仲勋号召西北工作的干部都要认真学习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著作，以及熟悉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与文化，并要特别抓紧培养各少数民族的干部，以便在各族平等的基础上，把大西北建设成为一个各民族团结互助、友爱合作的大家族。

在他重视民族政策的思想指导下，西北地区土改中，就明确贯彻了以下的原则精神：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土改，首先必须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向少数民族地主进行斗争时，要由其本民族为主进行，并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特别要首先做好争取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而不可颠倒过来。习仲勋特别掌握了当时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在于争取、团结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物，以联合部分封建上层先进分子去反对大部分封建势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支持土改、至少保持中立。他认为这是甘、青、宁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

他对西藏工作，总是强调要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有些事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要赶时髦，要以稳定局面为主，否则反而走弯路，他很早就重视搞好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团结，

把民族之间、宗教界之上层和下层、喇嘛和俗人、农民和牧人，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50年代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工作时，和鲍尔汉、赛福鼎、黄正清、喜饶嘉错、昂谦、马腾霭等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物之间的深情厚谊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和班禅大师40年交往中凝聚的亲密友谊更是难能可贵，他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情谊。正如班禅对习仲勋说的："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一开始你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又是朋友。你是为我好，我感激。"习仲勋也赞誉他："班禅就是这样一位心底透亮的大师。"(见198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习仲勋所写《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一文。)这种出自双方的肺腑之言和真情实感，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起来的。

调到他身边当秘书

1950年初，我从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新闻处处长。新闻处的主要任务是，从行政上管理旧西安两家私营报纸，同时又兼管向西北各省区发布新闻的任务。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五省区所在城市的报纸，需要及时刊登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党政领导机关的指示、命令、决定以及党政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等，都由新闻处十多名编辑、记者承担采访、报道。在此期间，和西北局习仲勋书记常有接触，而他又从来十分重视新闻工作，而且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象老战友一样自然而和谐。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我曾受命采访习仲勋，并且写了"人民的忠实勤务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习仲勋副主席"的访问记。经过这次采访，我对习仲勋当时已有23年革命历史和他的丰富斗争经历，有了比较全面的历史的了解，对他更增加了崇敬的心情。

1952年6月，新闻局副局长林朗找我谈话，说习书记有意调我当他的秘书，征求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又惊又喜又忧：习书记调我当他的秘书，说明他对我的信任，我是非常感激的。但是，我的文化教育的基础太差，水平不够，当记者已很吃力，又不知道怎样当秘书。根据林朗对我多年来的了解，他鼓

励我只要在实践中努力学习，还是可以适应的。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10年来对习书记具有十分良好的印象，我愉快地表示了同意和感激之情。过了几天，习书记找我到西北局他家中面谈。他夫人齐心同志也是早在绥德就认识的，还有他们四岁多女儿桥桥在场。交谈完全是在亲切、自然、活跃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向他表达了我的心愿和顾虑，他鼓励我继续发扬勤奋刻苦、努力学习的精神，在工作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同时还可以向他原来的秘书陈煦同志请教，慢慢地自然会逐步适应的。我回原单位整理交待了我的工作以后，就和我爱人延玉珍同时调到了西北局机关，延玉珍被分配在西北局宣传部报刊处工作。好在西北局机关熟人多，特别是经常有联系的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在延安时期早就认识的，所以并不感到陌生。初到西北局期间，我除了学习、阅读有关文件资料，或向陈煦同志请教以外，主要就是为习书记草拟了一篇在西北林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稿经习书记审定后，以“绿化祖国西北”为题发表在1952年9月19日的《群众日报》，也算第一次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9月间，习仲勋奉命调中央工作，我和陈煦随他同到北京，初次来到这个神圣而又神秘的地方——中南海，自然感到新鲜而兴奋。陈煦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办公厅主任，在中南海乙区，邻近怀仁堂。我被分配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为常务副主任习仲勋当秘书，在中南海丙区，邻近国务会议厅，紧挨周总理所在的丁区西花厅。当时中南海分甲、乙、丙、丁四区，甲、丁区可畅通各区，乙、丙区到甲、丁区则需要事先联系。从此，习仲勋从政务院文教委常务副主任到国务院秘书长、以至国务院副总理，我一直跟着他在中南海整整工作、生活了9年。因此，经常有机会陪同习仲勋进怀仁堂看戏，到紫光阁跳舞，在游泳池游泳、中南海划船；也常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周恩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幸运的9年。

1952年11月，我借习仲勋的专车到车站接我全家人，包括我爱人，两个小孩和岳母，全都住进西城区南草场习的寓所。可是，刚从陕北农村来到首都的老岳母，一坐汽车就头晕，甚至呕吐在车内，这使我非常难堪。而习知道后却没有任何责怪，对老太太是谅解的，而我却很不好意思，感到这一家五口挤在他家，对他的生活干扰太大，经过再三要求，他才答应我搬到中南海紫光阁后边的工字楼宿舍。事后，习仲勋还亲自到宿舍来看望我们，了解、关心我们居住的条件。

为他草拟的第一篇文稿

1952年6月，我从原西北新闻局调任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秘书。8月间，西安召开西北地区林业工作会议，西北林业部蔡子伟部长邀请习书记到会讲话。这是我到任后第一次受命为习书记草拟的文稿。这篇文稿发表于1952年9月19日的《群众日报》上。

这篇短短4000字的文稿，指出了西北受风沙之害的严重性，分析了风沙成灾的原因，提出了开展西北林业工作的三大任务：(1)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切实做到“一人一把种，一户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种树”，发动群众负责管理山林，建立护林组织，使群众懂得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道理，和村村防火、人人防林的自觉性。由群众自己打下百年大计的基础。(2)林业工作既是经济任务，又是政治任务。根据西北森林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使广大林业工作者懂得森林对少数民族生活上的相依关系及其经济利益，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中的林业工作干部，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3)加强对林业工作者的思想教育。在关心林业工作者艰苦生活的同时，要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抱着人类征服自然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对西北人民作出伟大贡献。

40多年来，我国林业工作，特别是“三北”防护林带已经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但是，40多年以前习仲勋这篇讲话精神，对目前林业工作，我觉得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作为从记者出身，现在担任领导人秘书。回忆这次为他草拟文稿的经过，感到还是有所体会的：

（一）秘书工作和记者工作的一致性。我从1943年担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时，在绥德地区就认识习仲勋同志的，但那时我是作为记者身份访问他、报道他，而现在则是以他的秘书的身份，要用他的地位、体验和口气来为他草拟文稿。看来，秘书和记者两者的工作方式方法，还是有一致的方面，那就是必须亲自去参加会议，听取大会报告，参加小组讨论，阅读会议简报，以便及时了解和掌握会议的指导思想、进展情况、反映的问题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必须参加蔡子伟部长向习书记所作的口头汇报，并认真听取习书记对会议中反映问题的看法和指示。不论作为秘书或记者，这些过程都是一致的。

（二）秘书和记者有所不同的地方。我认为主要在于深刻领会领导人的体验，用他的地位和口气来表达。比如，就习仲勋对西北林业工作的重要性问题所说的："绿化西北就是西北林业工作的理想、愿望和方向。"当时，中央已经决定调习仲勋到中央负责领导宣传文教工作。而习仲勋却说："其实，按我个人意愿，我还宁肯到黄委会（黄河治理委员会）去工作，切切实实把黄河治理好。"从中，就不难理解他所说的"理想、愿望和方向"这句话的真谛和份量了。报告中所说的西北林业工作三大任务，则完全是习仲勋长期革命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及他一贯重视民族工作的深刻体会，特别是他对林业工作者进行思想教育问题时所说的："艰苦并不是断送个人前途的地方，反而正是创造个人前途最好的环境。"这样的话，对当时年仅39岁的习仲勋来说，如果没有历经26年艰苦奋斗的人是难于表达出来的。

（三）也不可缺少作为秘书个人实践的基础。比如报告中所提

到的“宁夏阿拉善旗流沙东侵……风沙越过贺兰山，穿过长城……直到陕北榆林，形成八百里金沙滩，侵袭到陕北神木、府谷、横山以至米脂、绥德等地。”而这一带正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当随军记者时，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转战陕北时共同经历过的。回忆当时在夏日炎炎下行军作战，口干舌燥，寒冬风沙中冷酷难耐，以及沙漠行军中步履艰难的情景，深感植树造林、防风护沙的紧迫性。而阿拉善旗又是我从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和曾震五先生同赴阿旗作传达报告时所经历的。阿旗当时属宁夏管辖，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地处贺兰山西侧，腾格里沙漠北端。当年我们从银川出发，越过贺兰山，但见一片黄沙滚滚，车行十分艰难，然而将近阿拉善旗时，但见一片葱葱、绿树成荫。旗内颇多四合院，朱漆大门，雕梁画栋，有“小北京”之称，真是沙漠中的绿州。当然，这里是达理扎雅（当时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王爷府所在地有关。但也说明习仲勋在报告中所说的：“少数民族是习惯种树，爱护森林的。”说明，秘书应当力求和领导人取得共同的领会，才能在文稿中写出真情实感。

（四）文稿的文字加工。秘书草拟文稿，实际上主要忠实地记录领导人的思想和他讲的话，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文字上的加工，把他的思想和原话整理成为文稿。切忌把个人的主观设想、画蛇添足地加以描绘。当然，文稿在定稿之前，特别在正式发表之前，还必须经过他本人的审核。但是，作为秘书的文笔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他的思想和原意之时，他又往往字斟句酌地反复加以修改，直到最后达到他本人完全满意时为止。

当然，这些体会，不论当时，以及以后历次为习仲勋起草文稿，大体也都离不开这些，当然，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在于深刻领会领导人的体验及其指导思想。所以为他草拟一次文稿，也是我得到学习和提高的良好机会。

要正确对待文艺批评

——在政务院文委的领导岗位上

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亲切地称之为“内阁总理”的周恩来，在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总理就集中主要精力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政务院下设四个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另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直属政务院，共30个单位，而其重点在于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机构设置以后，其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复研究确定，首先撤销华北人民政府，将其班底作为政务院基础，并陆续从其它各大行政区抽调部分干部，特别是其负责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习仲勋就在以后和邓小平、李富春、高岗、贺龙、陈毅等陆续从各大区调来北京的。当时，习仲勋受命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协助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委主任郭沫若，领导所属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这对习仲勋来说，无疑是出乎意料的。作为一个只在他家

乡富平县立诚中学和三原县第三师范念过几年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论年龄也只 39 岁，要他协助郭老领导诸如沈雁冰等五六十岁的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新中国的文教卫生工作，的确是缺乏信心的，但在领袖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和积极支持鼓励下，他终于毅然决然地担当了这个重任。

习仲勋到任以后，首先于 1953 年 1 月 13 日到 24 日召开了全国大区文委主任会议，了解了全国文教工作的基本情况，根据党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确定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共同商讨并明确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全国文教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从而制定了 1953 年度的文教工作计划。接着，在 2 月上旬，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在中央一级文教机关具体布置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经过各单位领导亲自参加的调查摸底，逐个汇报，初步了解了所属各部一些基本情况。这一系列工作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相交互叉、相辅相成地协调进行的。

在这之前，大家都认为文教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但主要毛病是什么，关键性的问题在那里？又都不甚了了。经过毛泽东的号召：反对官僚主义！大家都恍然大悟：“官僚主义不反掉，今后工作就难于做下去。”经过反官僚主义的工作检查，主要的问题是，过去发的有些决议和指示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要求过急过高，贪多图快，好大喜功。比如扫盲工作，曾经要求在几年内完成扫盲任务，以致有的地方计划偏高，在教学方法上把部队的一套搬到农村、工厂，固定编班，要求在 300 个小时内完成突击任务。这样便发生形式主义的编班、假毕业，乃至有患神经病，甚至逼的自杀；在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方面，有些高校试图以四年时间学会苏联五年制课程，这就产生普遍紧张的局面，翻译力量跟不上，教授支持不了，学生消化不了。每周教学时间多至 70—90 小时，严重影响师生健康；小学教学方面急于全面推行“五年一贯

制”；戏剧改革中也发生简单急躁和违法乱纪现象。检查各文教机关工作忙乱低效的现象是普遍的。但是一般真正的“饱食终日，一事不做”的人是很少的，大多属于辛辛苦苦或糊糊涂涂的官僚主义。习仲勋根据这次检查出来的问题，分析了它的原因，提出了改进的办法：于1953年3月2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写的报告中提出了：“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他积极地提出改进的办法是：“第一，要把反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不要采取‘暴风骤雨’的方式，而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第二，要正确认识官僚主义的实际，加以分析，对具体事、具体人，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帮助解决。避免轰轰烈烈而又空空洞洞地乱扣帽子，乱找岔子，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第三，重点放在党内”。“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提倡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第五，目前应当是集中力量反对官僚主义，不要同时提出其它很多口号。”中共中央于接到报告的第二天即3月3日就把习仲勋这一报告批转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委党组参政。

1953年3月13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批转习仲勋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第十天，他应周扬的邀请，到正在举行的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讲话。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从国际国内形势谈起，从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展开；从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国家内部积累谈到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指导思想；从积极进取，奋发图强谈到必须防止急躁冒进，好大喜功的偏向；从经济建设为重点的中心思想谈到文教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作方针。最后落脚到文艺创作的问题。他谦虚地说明自己对此是外行，有关文艺理论，创作方法等问题，大家都已谈过。他只提点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

他首先强调了提高作家和领导政治责任心的问题。他用他所熟悉的西北地区作家的情况加以说明。他说，固然不少作家进城后写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挨批评就泄气，这和有些领导人批评不当也有关系，有些党员作家就是不太争气，进城几年了还写不出东西来，有些作家思想方法不对头，虽则人下到了群众中去了，但在丰富的实际生活中，仍然体会不到群众的思想情绪。这些问题作家本身是有责任的。但是，作为党的领导也有责任。比如怎样帮助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怎样通过县区基层干部联系群众，怎样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帮助作家解决思想问题，乃至具体帮助怎样写作的问题。他举例陕西作家柳青写作《创业史》和《铜墙铁壁》的过程中，党的领导是怎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个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象向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充分的时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的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于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批评家就要象园丁培植果树那样，细心耐心，认真负责，把批评的动机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岔子的文艺批评家，也要批评那些错误批评的批评家。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不仅批评作品中的缺点，更要鼓励作品中即使只是10%的正确部

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10%的缺点。但不是泼冷水，而是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士气，激发作家创作的热情。只要我们领导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新的作品来。

这是习仲勋走上国家文教战线领导岗位上第一次在中央机关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他的讲话可能和某些人的观点相左，当时没有整理发表。事后，我在参加小组会上听到的反映，都认为听了习仲勋这次讲话，感到热乎乎的，既开阔了眼界，又增强了信心。

进入国务院

对国务院直属机构——制定了规章制度

1953年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8次会议，任命习仲勋为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9月，习仲勋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代表；29日，在人代大会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当时，周总理要习仲勋的办公室设在西花厅，和总理办公室紧挨一起。过了一个多月，由于周总理经常在夜间办公，第二天起床较晚，习仲勋进出西花厅和召开会议、来往人多，深恐影响总理休息，因而搬到一墙之隔的工字厅北排，和齐燕铭、常黎夫、杨放之、曾一凡等副秘书长的办公室连在一起。工字厅北院为国务会议厅，南院为秘书厅。这样安排，上下左右，联系非常方便。11月4日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分工，习仲勋负责领导不属于各办所管、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国务院秘书厅。

从1954年11月16日开始，习仲勋召开国务院秘书长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内容是：(1)各副秘书长分工问题、即分工管理各直属机构。比如常务副秘书长齐燕铭分工管理总理办公室和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副秘书长常黎夫分工管理秘书厅的工作和国家保密工作、国家档案局工作，办理国务院日常行政事务；(2)建立

办公制度。确定每周五举行秘书长会议；设立机要办公室，负责办理总理、副总理、秘书长的电报文件之收发、分办、传阅立卷及打印等事宜。从此开始，据记载到1956年2月17日相继召开了35次秘书长会议，对国务院秘书厅、机关事务管理局、外国专家局、法制局、档案局、广播局、人事局、宗教局、计量局、测绘局、参事室、文史馆、机要交通局、对外文化联络局、文字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编制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出国工人管理局等十多个单位的职掌范围、编制机构、干部配备、工作计划、检查与总结以及调查研究、组织学习、制定工作条例等等，对国务院机关日常工作有条不紊的运转，一一制定了制度和规范。1955年3月4日第13次秘书长会议上，通过了秘书厅"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时，人大常委办公厅与总理办公室及秘书厅有关工作联系事项的规定"，协调了三个办公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经中共中央批准，还成立了以习仲勋、齐燕铭为正副书记的国务院机关党组，党组成员还包括常黎夫、张策、龚子荣、陶希晋、曾一凡、杨放之、刘墉如、李琦等十同志。我作为习仲勋的秘书，又担任秘书长会议的秘书，协助常黎夫副秘书长和各直属机构领导人联系，准备会议日程、承担会议记录、整理会议纪要，上报周总理，下发各直属机构，抄送国务院八个办公室。秘书厅是秘书长领导下一个重要的办事机构。习仲勋要求秘书厅必须适应国家行政机关工作的发展，逐步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能，把工作重点放在研究和处理政务方面；特别要加强和省、市、自治区政府的联系，采取定期电话联系、健全报告制度、主动联系来京的正副省长、市长，加强机关的接待工作，给予来京办事人员便利，克服官僚主义。我作为秘书厅党委委员和秘书厅的联系，也特别密切。

人民来信来访
不是小事是大事

习仲勋认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主渠道。人民接待室共有干部约40人，分别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除紧急情况需报告秘书长外，每周均有综合情况反映，工作是相当繁忙的。习仲勋曾要我协助接待室处理部分来信，或利用星期天协助接待来访群众。1954年12月30日，习仲勋根据西北来人、来信反映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让我草拟了一份向周总理和毛主席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统购统销方面，食油和煤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供应商品中搭配购货的怪现象，以及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中存在的急躁情绪，强迫命令作风和铺张浪费现象，特别对陕西粮棉丰收后农民购买非生产必需品中大手大脚和大吃大喝现象，而对生产资料很不感兴趣。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反正要参加合作社了！"农民唯恐生产资料被低价入社。三原县一个投机商运去30口棺材，很快被抢购完了。农民对强迫储蓄也有抵触情绪，个别农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甚至发生因此投水自尽几乎致死等等，说明当时农村形势相当紧张。习仲勋让我草拟这个报告时，其中提到："有

的农民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以及有的农民赶大车因车轱辘没油而吱吱发响，气的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哩！'说罢就向车轱辘上尿了一泡。当时我认为这类情况不宜向中央反映。而习仲勋认为这是农民敢于说话的表现，所以还是保留了这一情节。有一次，人民接待室收到一封来自甘肃贫困山区高台县一位乡村干部的信，反映了他历尽艰险，千辛万苦，冲破地方上的封锁，又因路费被窃，以至沿途乞讨到北京，向国务院人民接待室反映当地干部强迫命令，破坏生产，造成人民饥饿，发生浮肿病乃至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习仲勋认真地阅读了来信，立即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报告，同时打长途电话告诉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要他切实负责查处此事。1958 年 9 月，习仲勋考察西北之行到甘肃时，还专门到高台县听取汇报，检查落实情况。

1957 年 5 月 31 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联合召开的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说明了他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他首先严肃批评了从中央到地方上对这一工作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对人民信访照抄照转、错转错办、草率推诿现象。他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全国胜利、进城以后，很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离的远了，群众观点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的关怀淡薄了。光坐办公室，不了解下情，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来信来访只不过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额外负担"，认为"告状的没有好人"。他举例说：国家测绘局在西安要修一建筑，用推土机一下推了 58 亩快要成熟的麦子。他认为即使是花钱买的地，但这种做法，老百姓就很有意见，骂"共产党是什么党！？"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前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但在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突出了。信访工作所反映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他分析了当时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出现的新

问题很多。他要求各级领导恢复和发扬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做好人民信访工作。他提出以下几点意见：(1)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必须各有一位书记和省长分管信访工作，要求在6月底以前把分管负责人的名单分别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2)处理问题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主要是掌握政策，按原则切实解决问题；同时，把千百万人民来信来访所反映的问题，分门别类，加强综合研究，从中找出规律，及时解决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或突出的问题；(3)实行专职机构和大家动手相结合的办法。要求机关干部的一些负责人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其事；(4)按信访反映的问题的性质，分别交由中央或地方各级机关负责处理，避免一律照抄照传；(5)清理积案。利用当时各机关整编的过程，抽调部分干部，突击清理尚未转出去的积案，和已转出去后尚未结案的积案；(6)按干部管理名单，逐级处理被控告干部的案件；(7)分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这次会议草拟的文件，要求与会代表带回各地征求意见后限期返回；(8)这次与会代表对领导上提出的意见，拟结合整风切实解决，并希望大家以后继续对中央各部门提出意见。他最后鼓励信访工作同志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并希望大家继续积极热情、耐心细致地做好这项工作，成为一个优秀的模范的群众工作者。

1958年到西北考察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起来，到处追求工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农业提出“以粮为纲”口号，要求在3年以至一二年内达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口号，要求在7年、5年乃至3年内提前达到原定的15年的钢产量。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掀起一阵虚报高产的浮跨风。报刊舆论大肆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坐在一堆密植的高产麦堆上，形象而生动地制造了一个大丰收的假象。七八月间，报纸又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中国社会基本单位的思想，“人民公社好！”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便在全国农村纷纷建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到处飘扬，全国一片热气腾腾。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以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跨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但人们对实际生活中的浮跨风和混乱现象尚未察觉。当时，周总理要求习仲勋带个考察组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看看情况究竟如何。习仲勋着手组织了包括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以及秘书厅副主任等十多人的考察组，其中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副秘书长余心情。这次西北之行，习仲勋为旧

地重游，老战友、老部下纷纷来访叙晤，自然份外亲切而兴奋。首站西安，下榻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即原杨虎城将军公馆——止园。在省市党政领导陪同下，到处考察访问，当时，人们一般的都是干劲很大，热情很高，那是无可指责的。但所见所闻，却使习仲勋产生不少疑虑，印象深刻的是，对全国农业劳模、礼泉县王保京所在的烽火人民公社的访问。当参观到生产队一块大田时，但见整片一簇簇的小坟堆。“这是干什么呢？”习仲勋新奇地发问。答复是根据北京一位大科学家的“发明”，只要使土地受阳光照射的面积越大就增产越多。习仲勋怀疑地蹲下用手扒开土堆，只见禾苗的根系象豆芽那样十分稚嫩纤细：“你们看坟堆的表面似乎扩大了面积，但底下的根根仍然只集中在一小块，有了阳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产！？”这里的人们甚至幻想把棉花接种在紫荆花的木本树上，以便免去年年种植棉花的辛劳。特别在人民公社摆设的欢迎宴会上，两张方桌合起围坐宾主十多人，鸡鸭鱼肉各色菜肴多达 30 多盘，使习仲勋十分烦躁不安。在人们欢快的叙晤中，不时听到：“人民公社的建立，将很快实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而且，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不很遥远的事了。”习仲勋听了皱皱眉头私下向左右发问：“哪能这样快呀！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吆？”

由于参观日程安排较紧，所以是搭乘夜车从西安到兰州，列车在八百里秦川夜行中，但见铁路两旁到处是火光烛天，大炼钢铁的阵势已经昼夜不停地摆开。

到达兰州，正是瓜果季节，驰名的白兰瓜、华莱士瓜、西瓜、黄元帅、青香蕉各色苹果，自然是主人招待贵宾的佳品。主人陪同我们在黄河上乘羊皮筏，观赏两岸古老的大水车，正灌溉着两岸的良田。兰州又是一块新兴的工业基地。我们参观了白银厂铜矿、阿干镇煤矿、新建的兰州炼油厂等等，而使习仲勋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那个“引洮上山”的山上运河工程。据主持设计者的宏伟理想，要把洮河中游处于陇南山区岷县的洮河之水沿山引到陇东黄土高

原庆阳地区，全长1000多公里，以便灌溉那里几十万亩的旱地；同时，既要利用落差发电，还要在山上开轮船发展航运，成为一条超过世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世界第一山上运河。真是大跃进年代敢想敢干的雄心壮志，令人敬佩的主人陪同我们前往参观时一路侃侃而谈，热情介绍。一到工地，但见数万精壮农民，徒手镢头挖土，肩挑背扛，独轮小车，来来往往，见到的唯一先进工具，就是利用山上山下高低差架设铁索摇轱辘绞运砂土；入夜，只见灯笼火把，重点工地偶尔几盏汽灯，挑灯夜战。那些年头，老百姓深信共产党，听党的话，只知埋头苦干，精神可嘉，实在令人感动。那年甘肃的年成较好，农业丰产，可是，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走上了这个工地，因而无人收割，丰产没有丰收，但仍慌报增产粮食30亿斤，因此，“吃饭不要钱”。还从四川、河南招来了大批劳动力。一路上，一车车大批外地农民欢天喜地来到这不要户口、不要粮票的“宝地”。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由于农民家中无人照管养的猪，猪群跑向农田，丰产的庄稼喂饱了猪肚，入冬天寒，母猪带了一群小猪又返回了农家。可见当时甘肃劳力的紧张状况。

习仲勋和我们随行人员，不久前都在北京参加过十三陵义务劳动的。两相比较之下，这里既无电力电源，又无机械化设备，要完成这样一个宏伟工程，谈何容易。习仲勋和省委书记张仲良是老战友，因而直言相告：“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当然，正在热头上的张仲良却不以为然，只说：“让我试试再说吧！”

可是，没有多久，冬去春来，正当春夏不接之时，发现粮库空空，且不说“引洮工程”立即下马，全省老百姓饿饭之事急报中央，习仲勋受周总理委派，立即负责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领导人开会，安排陕西、四川、宁夏几路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但老百姓已经饿死了惊人之数。当然，这是后话。

在兰州，习仲勋晤见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副省长黄正清，前者是和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早有交往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后者是藏

族宗教的领袖，习仲勋和他们相处亲如知交，再加上余心清和他们的老朋友关系，相叙时显得更加亲密无间。邓宝珊专设家宴款待习仲勋，席间邓对当时出现的浮夸风等极"左"行为即坦诚相见。邓省长还不顾年迈，陪同习仲勋一起考察了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两地区，到达敦煌，已是国庆和中秋佳节，当然更加欢欣鼓舞、热气腾腾。四乡农民驾着手扶拖拉机，成群结队地赶进城来参加国庆大会。翌日，我们参观了敦煌石窟、月牙泉等名胜古迹，大饱眼福，又增见识。但在听取敦煌县的工作汇报时，当地领导人介绍了他们一县一社的创举，以及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的全供制的分配制度时，习仲勋表示了怀疑，甚至发生了争执。这是他这次西北之行屡屡发生的不愉快事情之一。

我们离开敦煌，穿过祁连山，到达当金山口，这里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所在地，哈族县长在县政府新盖的办公楼前蒙古包里热情地接待了习仲勋，并向他诉说当时剿匪政策中的过"左"行动，打击面过宽，关押人员过多等情况。习仲勋当即表示同意这位县长的意见，并保证转告甘肃省领导，释放有关人员，还要我为县长、夫人及其子女和习仲勋一起在蒙古包前合影留念。

由当金山口进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第一站到达格尔木。市委书记兼市长慕生忠，是陕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过去出生入死干革命，后来又在这里艰苦创业已 10 年，把这个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村落，建设成了 2 万多人的交通枢纽，成为开辟青藏公路的后勤基地。现在这里已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习仲勋很熟悉慕生忠，也赞赏他的业绩。慕生忠为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老上级设宴洗尘，还举行了跳舞晚会，这的确是难得的休息。当然，也免不了听取慕生忠对创建这块基地的工作汇报，还陪同我们参观了祁连山北麓的纳赤台铅锌矿。这里和盐湖的盐化工生产，都是格尔木可靠的财源。

离开格尔木走柴达木盆地的北路东行，我们的吉普车队，在广

阔无边、海拔3000多米的戈壁滩上奔驰，日行800里，车过长长的“盐桥”，“桥”面全是整块的盐精，有似光滑的沥青路，连路边道班小房，都由盐块搭成。据说道班工人吃的肉菜，都储存的盐坑内长期享用；沿途偶见海市蜃楼或成群的黄羊，对于我们都是新奇之物。赶到德令哈，已是掌灯时刻，德令哈特委书记薛宏福，是陕北时期就从事财经工作的老干部，热情接待难得光临的老首长自不待说。他陪同我们参观了当地的劳改农场，以及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展览会。薛宏福对柴达木盆地美好的开发前景颇具信心。他还给我们赠送了晶莹剔透的盐精块和闪闪发光的金属矿石留作纪念。

离开德令哈东进一个多小时，偶抬头，只见海拔3000多米高处的青海湖近在眼前，但车行仍需两个多小时才到它身边，碧蓝碧蓝，真是水天一色，鸟岛上的各种水鸟飞翔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令人视野宽阔，心旷神贻。车队沿湖边马路慢慢绕行，但见两旁绿茵茵的草原上散满着点点的蒙古包和群群耗牛在缓缓蠕动，经过由东南流向西北注入青海湖的倒淌河，不觉间爬上了3500米的日月山，司机同志热情地给我们讲解了当年文成公主进藏到达日月山的故事。日月山、倒淌河，在这“两眼泪不干”的荒凉之地，一直流传着藏汉联姻的诗情画意。从日月山到河湟谷地，便是一片葱绿的农业区。车到湟中县，我们下车参观了西北著名的佛教活动中心——塔尔寺。寺前一排整齐的如意白塔，便是引人摄影留念的好景头，寺内装饰着用酥油制成的佛像和花朵，造型生动，体态逼真，它和整个寺院建筑群充分反映了藏族喇嘛的佛教艺术。深谙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习仲勋和前来欢迎的主持喇嘛热情地攀谈着，外地来寺朝拜的教徒们“五体投地”式的行礼，把厚实的地板摩擦成条条槽沟，寺内大喇嘛们正虔诚安详地诵经，小喇嘛们在雕梁画栋下嘻笑玩耍，一片祥和安宁气氛。

在西宁停留几天，既参观访问，听取工作汇报，又为习仲勋草拟了此次西北行的初步总结，我还应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

我的新闻界老战友之邀，对此次随习仲勋西北行的观感，作了15分钟的口头广播。这里需要一提的是，在参观西宁毛纺厂时，车间里的欢声笑语中，听到一阵阵熟悉的上海话，一了解，原来这里的纺织女工中，还有不少上海姑娘。他们都是解放初期随父母参加支援边疆建设而来的，我不禁拿起相机抓拍了几个镜头。因为这次随习仲勋西行，一路之上，既有和延安时期的老战友叙旧，又和新交的南方老乡们谈谈支边的感受，都是很意思的。当我们从甘肃河西走廊一出嘉峪关，想起"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句，作过记者的我，立即设想拟写一篇"西出阳关故人多"的游记，谈谈西部建设的盛况，配发几张南方人支边建设的照片，岂不挺有意思的吆!?当然，我这个设想并没有向任何人宣告。不料由于拍照引起了纠葛。"西北阳关故人多"的文章终究没有写成。但总的来说，习仲勋此次率队考察西北对于他了解下情、亲自发现三面红旗下的浮夸作风和混乱现象，还是发生了一定的作用。对我个人来说，不仅大开眼界，认识了大西北的辽阔和潜力，更切身体会到当年社会大变动中的真实情景，而且体会到习仲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为可贵！

提升他为副总理

1958年的11、12月间，我随习仲勋去武昌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对当时讨论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习仲勋根据西北的考察所得，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说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能说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了共产主义。最大最公，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其结果只能破坏生产，等等。”习仲勋是敢于讲话的，加上他身躯宽伟，健壮，当时才45岁，在中央委员里是最年轻的，格外引人注目。从1958年夏季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慰勉，到秋冬考察西北的反映。显然，这对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深刻印象。当1959年3月我随习仲勋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的秘书工作，当天傍晚刚刚下榻锦江饭店，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赖祖烈来访，给习仲勋送了两条熊猫牌香烟，并出示了“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在新提副总理名单中列有“习仲勋”。赖祖烈此来，既表示祝贺，也有征求意见之意。这突如其来的讯息，的确使习仲勋出乎意料，当即对赖口头表示感谢和谦让之意。赖辞出后随即和我相商，如何对此举表示自己的态度。几经推敲，反复修改，习

仲勋给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书记写了一信，全文如下：

> 昨晚收到《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看到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反复考虑，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在国务院秘书长任职期内，工作没有做得很好，主要还在于自己有毛病，并不因职务关系而妨碍工作，因而内心十分歉疚。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的工作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样，于工作无损，对自己可能更有好处。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
>
> 习仲勋 1959 年 3 月 31 日

这信确确实实反映了习仲勋当时的心境。4 月初，党的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以及上述对副总理配备方案的意见，在 4 月中旬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大会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及包括习仲勋为副总理兼秘书长的《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

1959 年进入第二季度后，国民经济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不仅农业生产情况不好，钢铁生产也上不去。原定当年前 4 个月应完成生产钢 600 万吨，实际只完成了 336 万吨。周总理要求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河南产钢重点地区视察钢铁生产。经调查说明，由于强调“以钢为纲”，别的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急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钢铁生产任务压的过重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以后经陈云同志建议，并取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把当年全国钢产量的任务，由 1800 万吨下降到 1300 万吨。

长葛调查

(一)历史背景

1959年7—8月间,在党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发动批判彭德怀,从而把原定以反"左"作为会议主题,推向了它的反面——"全党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倾斗争"席卷祖国大地。从此,越反越"左",以致酿成严重灾难性的后果。

1959年6月间,习仲勋根据周总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的安排,到河南、陕西进行视察,对于工作中存在"左"的错误,已经非常明确,基本上已经取得一致的共识。当时,毛泽东虽然也逐步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注意纠正"左"的错误,但由于纠"左"不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上庐山会议突然转向"坚决反右",有似火上加油,越刮越猛。主观和客观越离越远,工农业急剧下降,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浮肿病普遍发生,因饥饿而死亡人数大增。

形势逼迫党中央、毛泽东要慎重思考。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

12条，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都是为了纠正“共产风”，恢复农村经济，扭转农村局势发出的重要指示。为了及时了解两个指示贯彻落实中的情况和问题，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当年3月，毛泽东印发了刚刚找到的，他于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亲自组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按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3月下旬，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接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都分头率领调查组，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典型调查。习仲勋率领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和各直属局正副局长十多人，于4月上旬到河南省长葛县进行典型调查。

(二)我对习仲勋调查工作作风的体会

我作为随行的秘书，得有机会参加这次调查，对仲勋同志深入群众、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了一次实际的教育，印象十分深刻。

长葛调查中有关问题，诸如对农村形势的分析，公共食堂问题，劳动保护问题，多劳多吃问题，以及退赔问题，生产队权限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等等。仲勋同志根据他亲自参加的调查，于1961年4月23日和5月9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党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30多年以前这些问题已早成为历史，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代面临的问题，已大不相同。但是，他那种蹲点调查，实实在在地坐下来“下马观花”的作风，仍然值得继续提倡。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1)要密切联系群众,向当地干部群众虚心学习。

仲勋同志在调查组的工作会议上经常告诫我们:我们到长葛来调查,首先要依靠县、社干部的帮助,没有他们当向导,我们两眼摸黑,就不知道怎样工作。有了他们的配合,就可以更好地接近群众,和群众没有了隔阂,就容易深入了解情况。当时,为了领导人的安全,按规定,副总理下乡是要保密的。习仲勋虽则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但他总是外地人,口音不同,又加他身材高大,气势不凡,还有大批干部同行,长期住下来,走村串户,到处访谈,不免为当地群众注目、打问。习仲勋知道后,就正式告诉大家,对他不用保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说明中央对长葛人民的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他更不相信会有人加害于他。有个社员曾当面问他:"你来过没有?你们是参观团吗?你们是北京来的?你们咋这样好?不象过去的参观团,汽车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就推你去!"他认为群众这种朴实的语言,说明党的政策对了,群众对党的态度也变了。

1984年9月20日,长葛县城关镇公社八七村(即原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的党支部全体成员及全村干部群众,写信给当时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向他报告宗寨村从1961年由富变穷,是时隔25年后又由穷变富的生动过程。25年前,习仲勋向党中央邓小平的报告中,曾介绍当时宗寨大队"一个工分只合八厘,干一天十个工分才八分钱,一个劳动力还不如一只母鸡,干一天活还不如一个鸡蛋值钱多。"这个典型曾经震动上下,正如来信中说的:"您的到来,给全队人民以改天换地的力量,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家用集体智慧和辛勤的汗水,迎来了经济振兴时期。"他们信中介绍了宗寨村到1983年的总产值已达到354万多元,比1979年翻了两番多。习仲勋当即复信,向他们表示欣慰和祝贺,说明过去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

很大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呀！”最后，习仲勋希望他们认真学习当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除“左”的余毒，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高峰。

(2)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反对“左”的一套。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我们初到长葛时首先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长葛县址所在地，是从旧县城搬迁出来的新县址。长葛由于深翻地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前任县委书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脑袋发热，独断专行，铺摊子，摆阔气的浮夸风很严重。新县址是按照北京东西长安街气魄设计建筑的，有似人民大会堂那样的大会堂，什么县委县府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分设在宽阔的大马路两旁，占用了大量平坦肥沃的良田。当时还是由民兵架设机关枪强迫农民拆迁后建筑起来的。基层干部中队伍不纯、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之风相当普遍。在中央的12条和60条下达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由于贯彻不力，问题仍很严重。“五风”虽已被控制，但干部中新的作风尚未建立起来。习仲勋看到当时正是青黄不接时，群众生活标准很低，甚至主要依靠红薯干渡日，加之刮“共产风”后退赔很不彻底，群众颇有不满情绪。所以，他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曾直言不讳地加以批评：“你们县级机关的基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红军长征时，那里能搞什么建筑？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学，做了许多工作。延安——革命圣地，毛主席在那里领导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列举了很多脱离群众，大办机关，大盖楼房，大刮“五风”，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的实例后指出：“这些教训都是花了很大代价的。因此，建议长葛县要把所有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保存起来，每年都拿出两次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

意!"这样的振聋发聩的批评,既是尖锐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听讲的人都认为受到了有益的教育。

但是,有一位曾经在原县委机关工作的干部,却私下里悄悄地告诉我:"我们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都来过,中央部长级干部来过的更多。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的那么坏。过去中央冶金部长高扬文对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的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报告,结果把他打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言下之意,你习仲勋作为副总理,说话也该小心谨慎才是。当我把这个意见向习仲勋反映后,他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的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 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他! 过去有人建议要为国务院盖办公大楼,也是被我反对掉的,还受到周总理的支持哩!"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耿耿直直,实事求是的楷模。

7 月中旬,结束长葛调查回北京,我就奉命调动工作。临行前,仲勋同志赠言:"你还年轻,在国务院机关工作已近 10 年,应当到地方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为好。"接着,我离开北京到西安。经陕西省委分配我到宝鸡担任地委副书记。长葛调查中所受体会,使我在地、县工作期间,更加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他教我不要搞特殊化

1961年8月，我将下放到陕西。当时调动工作的去向有：外国专家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广播事业局，但习老认为我还年轻，在国务院机关工作已近10年，应当到地方实际工作去锻炼为好，我愉快地接收了他的意见。到了西安，省委书记赵守一同志找我谈话，征求我对分配工作的意见，他开门见山地问："不知道你希望在上边一点好呢？还是到下边一点好？或者喜欢虚一点好呢？还是实一点好呢？"他问的实在，我回答的也痛快。我说："我在上边时间太久了，再要虚下去快虚脱了。所以还是到下边去实一点的好。"他很同意我的意见，说那就好办，我们打算分配你到宝鸡地委工作，帮助第一书记薛志仁同志把党的工作做好。薛志仁是很好的老同志，过去从事地下工作，在宝鸡工作10多年了。你要和他和地委一班人团结合作，相互学习，做好工作。

到达宝鸡地委，薛志仁同志分配我担任分管宣传文教卫生工作的书记。按年龄，我当时43岁，在地委领导班子中还算是最年轻的。因此，在地区分工上，分配我分管千阳、陇县两个山区县。

同年十月，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书记、专员们按地区分工，到各县督导。我从宝鸡起身坐吉普车翻山越岭先到千阳县，下车稍事休息，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陪同我外出散步，路过一个羊圈时，县长说：

"我们今晚要宰一只羊来欢迎你!"顿时使我大吃一惊:"怎么能为我宰羊!?""那没有关系,这是我们机关自己生产的,不用花钱!"看来,他是毫不在乎的。我说:"不行,我地委书记下来你宰羊,那么,省委书记下来你杀牛呀!?"他还以为我开玩笑、讲客气话。说时,他就命令炊事员拣了一只肥羊往外拉。我急了:"这不是开玩笑!"我严肃认真地说:"我离开北京前,仲勋同志就告诉我,中南海的炊事员给毛主席送鸡汤,毛主席还要问明是公鸡还是母鸡。毛主席不喝母鸡汤,因为母鸡还要下蛋哩。仲勋同志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也是吃的熬白菜!我们国务院机关食堂早上吃的是超声波稀粥,中午晚上吃的是快速蒸米饭,菜和汤是'人造肉'和'小球藻','人造肉'是用菜帮子和残菜叶等提炼而成类似凉粉的食物,'小球藻'汤乃是用尿液泡在温水发酵而成的绿色汤水。仲勋同志叮嘱我下去工作切不可特殊化,我怎么敢、怎么好意思下来宰羊吃呀!?"他听我口气是动真格的。经过一番谈心,总算作罢了。说来也巧,第二天,陕西省的傅子和省长也来千阳视察征粮工作了。我对县长开玩笑说:"要不然,你今天咋办呀?现在咱们既不要宰羊,也不要杀牛。很好地发展你们的机关生产,多好!"席间,省、地、县三级干部一同进餐,荤素四五个菜,边吃边聊,随随便便,和和谐谐。

回到宝鸡,每逢地区秦腔剧团演戏,地区党政领导都得到场观看,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不仅免费招待,前两排都是领导干部,而且座位前还要摆上茶几,沏上香茶。我既不习惯,又不好意思。然而据说这是当地多年来的习俗,已经见怪不怪的了。但我总觉得别扭。经过对第一书记转达了仲勋同志的叮嘱,后来总算把前两排的茶几和茶水撤消了。

一位青年摄影记者见我爱好摄影,多次交谈,也还投机,我无意中谈到了南方鱼米之乡的生活习惯。不料过几天后他竟提来了一桶鲜活鲤鱼。这使我十分尴尬,啼笑皆非。那是天寒地冻的严冬,哪来这活鱼呀!?事后了解,原来那位"好心"的同志,到养鱼场对场

长说，新来的田书记是浙江人，爱吃鱼。让渔业工人穿了橡皮衣裤，破冰下水捕来的。我初来乍到，不好随便加以责备，只得收下，如数付钱，并告诉他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办。

我在宝鸡几年，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和宝鸡的同志相处也很和谐，至今还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上边所讲的那些事也谈不上什么太出格的非法行为，我只不过是从北京所处环境受到的教育来谈自己的感受。

（原载《新世纪领导者》1994 年第 1 期）

在“真理标准”讨论前后

——对广东实施特殊政策的时候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可以说是我们党在思想战线上扭转乾坤的关键。有人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伟大的意义，是毫不过份的。而习仲勋正是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首先勇敢地向党中央提出让广东实施特殊政策的人。

我于1978年12月间参加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理论上进一步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恢复发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思想活跃，畅所欲言，既批判了“两个凡是”那种崇拜个人迷信的错误思想，为进一步深化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扫除了思想障碍；还深入揭发了康生这个阴谋家的真面目，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大趋势下，也不免鱼目混珠，泥沙混杂。其中，既不乏来自“左”的方面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也有来自右的方面的“否定一切”的观点，认为即使1957年以前党的方

针路线也大有问题，要重新检查等等。因此，直到1979年2月中旬会议快结束时，仍在议论纷纷，以致一度宣布的、将有中央领导人来作总结，也迟迟未来。一般认为这个总结难作！以致2月15日再次休会，一直等了一个半月，直到3月30日才由邓小平同志作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澄清了思想，明确了目标，坚定了信心。

当1979年2月中旬理论务虚会休会的时候，国家农业生产正出现严峻形势。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快粮食生产发展速度，乃是经济战线的突出任务。消息传来，自从万里主持安徽工作，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等措施后，农村形势大有好转。《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支持性的评论员文章："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但是，不仅各省市对此褒贬不一，有的省甚至不准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即使安徽省内部的观点也很不一致。其实，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思想放手让大家议论，放手让大家在实践中求得共识。正在此时，理论务虚会尚未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耕今正组织一个去广东农村的调查组，我也报名参加。在广东为期半月内，跑了番禺、东莞、从化、清远、肇庆等市县农村，对类似安徽"包产到户"广东的"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进行了调查，取得的结论是完全肯定的。因为1978年12月，习仲勋刚刚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召开的农工部长会议上，曾经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已在全省广泛推行。这次经我们实地考察，从多方面证明其优越性；同时也说明广东省委领导，从"文革"前陶铸时期的实践说明"五定一奖"是正确的，而当时在习仲勋领导下，更是积极支持。习仲勋正是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统一了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从而取得的明显成就。我们在调查期间还听到，广东省在提前完成1978年公购粮

任务以后，中央有关部门又要给广东临时增加征购任务，致使广东干部、群众中反映十分强烈，认为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对广东实行的政策是“要的多、给的少、不让广东吃饱！”，颇有怨气。

正在此时，我拜访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我向他简要地报告了在北京参加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以及我们对广东农村推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调查所得，和广东对粮食任务的反映。一贯襟怀坦白，敢说真话的习仲勋，从来对邓小平和胡耀邦是十分佩服而尊重的，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更是积极拥护。他早在1978年9月广东省委常委学习会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而且，当时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31日在理论务虚会上所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的文件已经下达。仲勋同志说他已经读到小平同志的报告，非常赞赏。认为目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这个报告非常及时而重要。因此，他快人快语，坦率地说明了他对广东省的长处和优势以及短处和劣势的看法，以及他到广东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中的体会，感慨地认为，主要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广东的手脚捆的太紧了。因此，他认为主要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给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比如粮食问题，可以实行包干政策，在完成上交任务后，就由广东自行处理，否则那种“鞭打快牛”的办法，只能挫伤广东人民的积极性。他认为，不恰当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要几年功夫就可以上去了！

话虽不多，言简意赅，颇有新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调查期间，杨尚昆省长陪同我们参观了正在筹备中的春季广交会，在来去同坐的面包车上的闲谈中，以及后来在杨省长主持的，听取我们调查汇报会上，杨省长向我们阐述了和习仲勋同样的观点。看来，广东省党政领导对上述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结束调查返回北京后，消息传来，广东省正积极为开发三个特区作积极准备。1979年12月习仲勋即亲自带队到香港访问。1980年初，习仲勋放手组织全省地、市级主要领导人到香港、澳门参观。临行前，他鼓励大家放心地出去跑一跑、看一看，开拓视野，大胆地吸收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据广东省、地级干部说，这次习仲勋组织领导干部到港澳参观，对进一步解放干部思想，沟通和港澳客商相互交流，洽谈投资项目，推动广东对外开放、发展经济，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以后公开发表王丛标所写的题为“邓小平与深圳特区”一文写道：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

在会议上，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杨尚昆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省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会议期间，邓小平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话题从延安谈起，谈到当年陕甘宁边区那么小小一块地区，后来竟打出了新中国这么大一块江山；谈到解放几十年了，老边区人民还不富裕，谈话者不禁感慨万分。

邓小平陷入了沉思。然后，他说出了一句应当为后人载入史册的话：“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他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不久，广东、福建两省分别于1979年6月6日、6月9日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两省的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见《邓小平的历程》下第278—279页）

摘自这本书中，题为“对第一号特区强有力的支持”一文中的这一段话。充分说明，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中，对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宏图大略是息息相通的。

1992 年 10 月 12 日，习仲勋为谢非（原广东省委书记）所著《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

“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光荣而又艰难的历程，至今整整 13 年了，我和尚昆同志离开广东后，以任仲夷、林若、谢非同志为代表的历届广东省委，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决策。……最为可贵的是，广东的各级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使广东这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日益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象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南方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是啊！饮水思源，广东人民是不会忘记习仲勋对广东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所以每逢喜庆节日和习仲勋的诞辰，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党政领导干部总要代表人民群众向正在深圳疗养的习仲勋进行慰问、致敬，祝贺他健康长寿！

人们都知道，广东省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是很深、很广的。习仲勋到广东后，花了很大功夫，到各地、市、县，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种种措施。1980 年 6 月 21 日习仲勋在广东工交系统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说：“如果说农业战线上极“左”流毒已经有所肃清的话，那么在工贸金融领域里的极“左”流毒，还有待于继续批判肃清，进一步解放思想。他对解放思想的问题讲了三点意见。但首先强调的是：“解放思想必须和深入实践相结合”，因为“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思想和意见，究竟谁对，谁不对？光在机关会议里争

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辩明是非，才能统一认识。”他以推广清远县办工业的先进经验为例，一度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在1979年3月前，全省有近1000个企业学习了清远县经验的成功实践，说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从1980年11月习仲勋调到中央，到1990年10月经中央批准他到广东深圳疗养的10年期间，他支持协助胡耀邦按照“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则，坚决执行拨乱反正，平反冤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他方方面面的大量活动中，最能说明他的主导思想的，莫过于他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当然，其中不少讲话是代表中央对各项工作表示祝贺、慰问和同意、支持表态性的，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对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宗教政策等方面的讲话，更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立场坚定，反对极“左”，观点明确，是非分明，反对急功近利，力求慎重稳进！

1987年2、3月间，习仲勋到广东视察了一个多月，他在给中央写的“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中，首先报告了广东省广大党员和干部普遍拥护中央会议的几个文件，拥护中央关于个别人事变动的决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能够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办事，发展是健康的。他满腔热情地报告了全省各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但是，他感到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他首先强调地说：“不少人仍然担心党的基本政策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年初中央个别人事变动后，‘怕变’的疑虑增加了！”他举例一位香港朋友曾在广州当面问他“政策会不会变，要不要继续改革？”当然，他的答复是明确的：“我们改革开放政策是党中央集体决定的，是正确的，不会因为中央个别人事变动而改变。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前大好形势，将改革开放进行下去。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认为解决‘怕变’的认识问题，除了继续

从舆论上公开阐明我们的态度外，主要还是通过实际工作去体现党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

从这以后，习仲勋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岗位上。1990年3月26日，他在人大七届三次会议的陕西代表团全体会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他说：“实践证明，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安定团结，各项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发生动乱，各项事业就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千方百计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他还指出：“要稳定局势，还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做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要稳定局势，还必须发挥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他特别拥护、赞赏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稳定国家、稳定社会的重要措施。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地走到哪里就和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七篇

永保劳模本色的刘玉厚

永保劳模本色的刘玉厚

劳模刘玉厚的发现与宣传

刘玉厚是陕甘宁边区时期产生的劳动模范。1943年3、4月间，在大生产运动中，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带领一个调查组，到绥德县模范村沙坪区一乡的郝家桥进行蹲点调查，我作为《解放日报》驻绥德的记者，有幸参加了这次调查。在调查访问中发现，该村共产党员刘玉厚担任过村主任、乡参议员。几年来，他以身作则，一面生产，一面工作，带领全村农民勤奋劳动，并圆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使该村成为模范村。概括起来，刘玉厚为人勤快、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经过村民讨论，终于公推出刘玉厚为劳动模范。经过绥德县委、县政府、绥德地委、专署的表扬和奖励，以及"鲁艺"文工团和绥德文工团等编成秧歌剧的广泛宣传，刘玉厚的模范事迹逐步在全县、全分区6个县普遍传颂开来。以后，经过和延安劳动英雄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和《解放日报》的连续报道，又在全边区宣扬开了。从此以后，劳模之间的生产竞赛在全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广泛而热烈地开展起来。经济上自力更生，思想上劳动光

荣的社会意识，也日益深入人心。

在郝家桥一个多月的调查中，正是春耕季节，有几次我随他一起上山，边走边访问，看他怎样翻地。天刚露鱼肚白，他就扛着又长又大十多斤重的大镢头，穿着他妻子特制的至少5斤重厚实的鞋子上山了。上山后他把鞋子脱放在地头，这样，既保护鞋子，而且镢头着地有劲，翻地又深又松；他的手掌就这样磨练得既大且硬又厚。太阳出来了，他家小孩提着篮子罐子送饭上山，饭后一直劳动到中午才回家吃饭歇晌。他说早起三朝等于一晌（半天），而且早晨身子硬板有劲。他租种地主家33垧（每垧3亩）地，有一半多远在离村6里以外，原因是他不和穷乡亲们争相租离村近的地。他家门外一大堆石板石块，就是他从远地劳动后背回来，准备盖新窑洞用的。当年刘玉厚41岁，他一家父母（60出头）、两弟、妻子、两儿一女、弟媳、大儿媳等共11口人，除小儿外，几乎全是壮劳力。以刘玉厚孝敬父母为榜样，全家人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男耕女织、无一闲人，个个勤劳、节俭，一派朝气蓬勃。3年前，刘玉厚还是替人揽工的雇农，由于新政权的建立，实行了减租减息，加上全家人的积极劳动、努力生产，生活逐步改善，已经上升到中农水平，基本上做到了丰衣足食，成为全村农民学习的好榜样。在对刘玉厚有了深入了解后，从1943年到1944年，我就刘玉厚的事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十多篇报道。由于调查期间结交的友谊，以后，刘玉厚进城赶集，总要到地委机关看望我们。有时还随身带来些炒南瓜子、熟鸡蛋，或新摘下的沙果等给我尝鲜。遇到他进城办事来不及回家，就在机关借宿，和我同睡一炕。就在这样随随便便的交往中，农村中有些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就随时反映上来了；他对某些不甚了解的，也顺便向我打问清楚。

王震奖给他一支手枪

早在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以前，刘玉厚就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民兵自卫队。

1946年3月，胡宗南部队开始进攻边区，刘玉厚毅然参加了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的支前担架队。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6、7月间，我部队进军陇东。当进攻合水县城部队急需云梯时，正巧刘玉厚和担架队员们扛了几十斤重的云梯，跑了40多里赶到，应了部队的急，取得了攻城战斗的胜利。纵队司令员王震早就认识这位劳模刘玉厚，这次他认为刘玉厚立了战功，表扬刘玉厚从劳动英雄转变成了战斗英雄，还特地给刘玉厚奖了一支手枪。1946年10月三纵队建立新兵团，分配刘玉厚担任营教导员。1947年组织上又分配刘玉厚担任三纵队后勤部的粮管员，负责筹集调配全纵队的粮食工作。从此，刘玉厚和王震司令员在转战陕北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解放战争期间，刘玉厚先后在支前、救伤以及组织群众、练兵和领导生产等工作中，都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积极负责的工作精神。

他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共商国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刘玉厚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而且作为主席团89位成员之一和党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并于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现在，我们从香港祖国出版社于1985年5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光辉历程》这本豪华的画册上看到，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式，“主席团就位”的图片中左起第四、第五人就是王

震和刘玉厚。可以想见，作为陕北劳模的刘玉厚，如今在这最高荣誉席上，该是怎样的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会后不久的1950年4月11日和12月26日，刘玉厚先后收到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任命他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953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又任命刘玉厚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0年，特等劳动模范刘玉厚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一届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他作为各解放区劳动模范中的首席代表，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对大会的祝词后，还当场致了答词。以后，他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陕西省政协委员、兴平县政协副主席、绥德人大常委委员等职，但是他仍然踏踏实实地担任绥德县政府四科科员、陕西省农业厅棉花研究所泾阳县二清王农场场长等具体工作，尽心尽力完成任务。1953年经组织批准，他在西安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文化；1956年毕业后重回省农业厅，而后调到兴平县赵村创建机耕站并担任站长兼书记；1959年以后又历任兴平省机械局局长、工交局局长和县人委委员。1963年刘玉厚担任兴平县政协副主席，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整整工作了15年。在这期间，我虽与他天各一方，但关于他作为劳动模范的一些先进事迹，还时有所闻。刘玉厚在兴平马嵬赵村拖拉机站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在他艰苦创业精神指导下，办站第一年就达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这在全省4个站中是仅有的一个。第二年，他在农业部召开的全国机站站长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介绍了他的办站经验。到1962年，拖拉机增加到50多台，成立了4个机耕队，人员由几十人增加到180多人。

“我是党的干部，为群众办点事是理所当然的。”

在三年困难期间，百姓的口粮普遍不足，身为县工商局局长的刘玉厚和大家一样饿着肚子。眼看着困难的严重性，他自己动手，在兴平省人委后院的废弃地上清理掉砖瓦石块，开垦出一片耕地，种了一大片蓖麻，他又动员自己的儿子共同劳动，直到秋后，硕果累累，收打了几麻袋的蓖麻籽，卖给了粮食部门，得到 140 斤食油的奖励。他把食油全部交给机关总务科，作为食堂改善饭菜的补贴。1962 年刘玉厚病后不久就下地劳动，别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劳动是一种锻练，每天劳动一回，全身血脉就畅通了，身体也就舒服了！”那年秋后，他除了完成机耕站的任务外，他种的瓜菜也获得了大丰收，给机关食堂补充了部分吃菜问题。那年他还抱着一个 47 斤重的大南瓜摄影留念。

1970 年 3 月，“文革”期间，他虽担任兴平县人委农业顾问，但因经常挨批斗而无法工作，就回绥德县郝家桥老家劳动，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关心着人民生活，经常到群众中调查访问，了解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宣传党的政策，到工厂学校、驻军作报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少年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热爱党，被人们誉为“义务宣传员”。当他在郝家桥看到马四家没啥吃，老婆有病，孩子很小，眼看生活不下去时，他详细询问了情况，原来马四在 1954 年修水利炸石头时，眼睛被炸坏了，腿部受了重伤，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全靠政府和乡亲们的救济。由于上年收成不好，这年春天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乡亲们自顾不暇，帮不上他的忙，马四的救济粮也吃完了，眼看着就要断顿，怎么办？刘玉厚毫不犹疑地给了马四 15 元，说这是救命钱，先去买点粮食渡过春荒。使马四全家和乡亲们十分感动。这 15 元买了 2 斗高粱、10 多斤黄豆，总算过了难关。马四逢人便说：“是刘大

叔救了俺一家!”

刘玉厚回家以后,总想为家乡办点实事。他看到当地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就和县水保单位研究后,先在张家砭乡几个自然村打了几个大坝,以后又在五里湾、郝家桥、王家岭等村打坝。刘玉厚当时已近70岁了,他不顾年岁已高,和地方干部紧密配合,并和群众一起劳动。在劳动中鼓励群众为改变陕北落后面貌,为子孙后代造福而努力劳动,多作贡献。当时农村没有通电,刘玉厚也为此而往返于绥德、西安之间,在省水保局等领导单位大力支持下,深山沟里也通了电。

老当益壮为民谋福利

刘玉厚自1981年住进县干休所后,就成了义务清洁工。早上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老刘就把干休所院子和附近2公里长的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下雪了,他四五点起床,先把干休所的积雪扫起,一筐一筐倒进地里,然后再把附近公路和行人小道积雪扫净。老刘除了清扫马路外,只要一有空,就到处找活干。一天吃午饭时,还不见老刘回家,家人找遍了干休所和附近单位,都不见他人影。家里人正焦急时,只见老刘带着满身臭气回家了,原来是附近一家医院的厕所堵塞,老刘得知后就找来工具,忙了一上午,帮助疏通了。

刘玉厚还有一桩心事,多少年来一直压在心头,那就是五里湾大河上的大桥还没有修起来,使几条沟里进进出出几万人的来往和物资车辆交通运输问题没有解决,阻碍着这一带的经济发展。刘玉厚建议在这里修一座大桥。消息一经传出,附近群众热烈响应,纷纷找老刘议论尽快办成这件好事。有人还表示愿意为修这座大桥出力出钱。但修起这座大桥起码得十多万元,当地还处于贫困状态,谈何容易!但既然这是群众的迫切愿望,又有群众拥护,只要有决心,相信总能办成。于是,他不顾年迈,不断地找乡、县、省政府,

反反复复讲明修桥的重要性。一次、两次、三次……，路费没人管，只要他的工资发到手，就首先计划着购买来回的车票。他带着书面报告，背着干粮，来来往往，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终于挨到了1988年，陕西省交通厅答应先给5万元。年过八旬的刘玉厚喜出望外，浑身是劲，为建桥到处奔波求人。他先请乡上组织好建桥班子，请县交通局帮助测量、设计、绘图，又经榆林军分区批准炸山打石头。以后他又跑省上，得到省上有关领导人的支持，经省财经厅和榆林地区拨款，共20多万元，大桥终于动工了。刘玉厚内心高兴极了，他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共同修桥，经过一年多时间，大桥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在庆祝典礼上，乡政府打算买些羊肉和油饼请大家吃顿饭，但刘玉厚却拒绝说："修桥工人的工资还发不出去，我们怎么好意思吃这顿饭呀！"刘玉厚就是这样默默地为人民大众办事而从不谋私利。他为大桥取名为"幸福桥"，而且连续几年在桥畔种了一批树苗，现在都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

三次进京探望老战友

刘玉厚怀念在北京的老战友，80年代他曾先后三次到北京看望王震、习仲勋、刘景范、张邦英、白治民、安志文、黄静波、柳随年以及季诚农、高铁、孙克攸、孙德山、田方等人。他每次来京，王震副总理总要留他在家吃饭。1990年绥德仅有的一家卷烟厂由于经营不善将要下马，刘玉厚着急了，立即到北京找到王震副总理，说明工厂的问题可以改进解决，但不敢下马。因为老区办工厂不容易，垮了要再办就更难了，后经王震副总理和田纪云副总理商量后总算保留下来了。近几年来由于改进了经营管理，经济效益还好，可算榆林地区的利税大户，给陕北经济带来了生机。同年11月26日王震副总理患病住院，刘玉厚专程到三0一医院探望慰问。王震给刘玉厚赠送了一只镀金的"九龙杯"作为纪念，还在病床上和刘玉

厚握手合影留念，十分亲切感人；习仲勋副委员长患病在深圳疗养，刘玉厚曾几次去信慰问，习老的夫人齐心也曾经在绥德郝家桥当过乡文书，和刘玉厚也很熟悉，她替习老给刘玉厚回信表示感谢，并回忆往事十分尊重刘玉厚，都是情真谊长的。刘玉厚三次来京，孙德山同志和我都与刘玉厚会晤叙旧，怀恋着往日的深情；谈起现状，如今国家日益繁荣昌盛而同感欣慰。但是，最使刘玉厚耽心的还是当前严重的腐败现象。他特别看不惯层层干部要争坐豪华汽车："照这样下去，还搞什么现代化呀！"他每次带来的陕北老南瓜、红枣、小米，使我们经常尝到陕北风味。永远记着陕北人民。正如《北京晚报》1995 年 12 月 13 日赵江所写的访问记中所说的："这是抗战时期陕北老劳模刘玉厚送来的老南瓜，我们边吃边谈，吃了一块又一块，比吃山珍海味都香。"刘玉厚已于 1995 年 9 月 28 日病逝，我将永远记着他！

（原载《时代与人》1996 年第 5 期）

第八篇

周培源与三峡工程的论证

《同舟共进》[编者按]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已于1994年底正式动工。但是正如新华社记者《关于三峡工程技术问题的报告》(新华社1994年12月15日宜昌电)开头提到的:"由于三峡工程规模巨大,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人们依然十分牵挂和关注它的技术问题。"田方同志这篇文章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忧虑。

周培源与三峡工程论证

周培源基金会来函来人,邀我回忆撰写周老生前事迹。我和周老的关系,主要建立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周老对三峡工程的看法虽与主管部门的观点相左。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何况一代科学宗师的真知灼见,更有留待后人鉴定的价值,记录下这段史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初识于三峡工程的论证

我有缘和周老相识,是在1987年5月。1983年我离休以后,在完成自选的"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中国人口迁移"课题

后，很自然地转移到对三峡工程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一举世瞩目的超大型工程及其100多万移民，理所当然地涉及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特别是1984年3月原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曾经就《组建三峡特区政府实行库区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设想》文稿，批示给吕克白同志和我，要求我们研究后提出意见，更加引发了我对三峡工程的重视。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的会议上，曾多次强调，要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出于对三峡工程将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关注，曾共同努力，收集资料，调研著述，并组织有关各方面专家学者撰写论文，准备编成专集，供决策部门参考。为此，我们觉得需要请一位有权威的科学家给予支持。有人介绍周老就是十分关心三峡工程，并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家。1987年3月间，我冒昧地给周老去信，请求他为我们编的论著写一篇序言。5月5日收到周老亲笔写的长达1400多字的回信。他首先表示赞成并支持我们编写这本书。“但是我还有些看法，提出和你们商榷。”他提了七点意见，其中特别强调了以下两点：“(1)关于修改书名的问题。因为三峡工程不仅牵涉到能源决策，而且和整个长江流域，甚至全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与社会效益都有关系。根据书内选登文章的内容，可否请把书名稍作修改，概括得宽一些。(2)我们要明确要求把长江上游建坝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具体方案制订出来，和三峡建坝的方案相互比较，哪个方案比较合乎‘四化’的需要，然后作出决定。”此外，周老还对三峡大坝在丰水期和枯水期发电容量悬殊的问题如何解决；要重视大型工程的模拟试验与实践之间的误差；调查国外大型工程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要认真总结葛洲坝建设规划中的经验教训以及确切计算工程建设经费等问题，都提出了他的看法。

根据周老的宝贵意见，我们把原来定为《三峡工程和能源决策》的书名，改为《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

书名问题，也就是究竟就三峡论三峡呢？还是从宏观决策上加以论证？我们就是本着周老这一指导思想，相继编辑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四本论著。

不应“就三峡论三峡”

1987年5月，周老为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所写的序言中，回顾了从1919年孙中山先生提出拟在三峡建坝的建议，1932年恽震等三位工程师提出的勘察报告，40年代美国高坝专家萨凡奇来华提出的高坝方案，以及全国解放后，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历次提出拟建三峡工程的建议和方案的整个过程后提出：

“回顾这一段历史，三峡工程所以长期上不了，看来主要问题在于仅就三峡论三峡，而没有从长江流域干支流总体规划，并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实力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战略上来考虑问题。”

“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坝高185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它优选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

周老在这篇序言中接着介绍了长江流域各支流极为丰富的水能资源以及众多可供开发的水电站后，提出了三峡工程所需的投资庞大、工期很长、移民众多；而且，“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中，三峡工程起不了作用”的问题。

周老又从发电、防洪、航运等功能论述了晚上缓上三峡工程的科学依据后积极建议：“因此，为了解决这个宏观决策问题，除要研

究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变化、系统工程等问题。在决策过程中，需要认真贯彻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针，只有贯彻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才能取得符合科学化要求的结论。”

最后，周老又语重心长的告诫：“过去的教训，是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闻名于世。否则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后悔不及！”

根据周老的指导思想，我们以编者名义，撰写了题为《从三个层次的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的“总论”，这三个层次就是：“一要放在长江全流域综合治理开发的总体上；二要放在国家能源决策的总体上；三要放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总体上。”

我们还在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编列了“2000 年中国水电发展的设想”、“长江流域干支流开发程序”、“得天独厚的四川水能富矿亟待开发”，以及“优先连续开发乌江水电的优越性”；接着，又在《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中专列了“别论”一栏，编发了“应加快长江上游支流综合开发步伐”、“澜沧江流域水电经济开发综合考察报告”、“加速岷江综合开发的建议”、“加速乌江干流水电梯级的连续开发”、“加速西南六大水电站开发的建议”等专论，由多位水电专家和地方水电部门用充分的事实说明，我国西南地区真正亟待开发的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更说明周老要求多方案对比论证的建议，是很有说服力的科学观点。

从 1987 年到 1993 年 6 年期间，在周老的亲切和具体的指导下，我们连续编辑出版了四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共 110 多万字，集中了 120 多位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正如周老为拙著《秋实集》所写序言中所说：“几年来，围绕三峡工程上马时机问题，国家广泛征求意见。对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子孙后

代的特大型工程，能够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真是国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大力支持“开发大西南”

1989 年 4 月 3 日，姚依林副总理在七届二次人大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主持招待会的李鹏总理委托，答记者问时说：“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目前治理整顿期间以及将来‘八五’期间，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见 1989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

在姚依林副总理讲话以后，我们和周老共同研究后认为，既然三峡工程在短期内、至少在‘八五’期间不可能上马，何况我们对晚上缓上三峡工程的积极建议，已经在两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中作了充分的阐述。现在应当站在更高的层次，从开发大西南富甲天下的水能资源入手，带动开发西南地区丰富的多品种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振兴西南，支援全国。从这样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出发，无须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再作无谓的争论。三峡工程在开发大西南的全盘布局中自有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设想正好和周老、九三学社中央的工作安排完全一致。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在西南五省区党政领导的配合下，并取得了《开发大西南》电视系列片组委会的资助，组成了《开发大西南》丛书编委会，积极从事调研、组稿、撰稿等编著工作。在两年多时间内，把 200 多位作者撰写的著述编辑出版了包括“综合卷”、“地区产业卷”、“四川云南卷”、“贵州广西西藏卷”、“纪实卷”和“联合开放开发卷”，共 230 多万字《开发大西南》6 卷丛书。为了取得九三中央领导组织上的支持，周老曾亲自主持在九三中央召开两次会议，进行具体安排，并

聘请九三中央的徐采栋和赵伟之两位副主席担任丛书的顾问；责成九三学社所属的学苑出版社执行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

周老为丛书提供了他致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以及“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的研究意见”稿，和国家计委对此问题贯彻执行的研究报告，周老还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指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的要求，依据产业重点和地区布局的原则，加快大西南的开发，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特别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一项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紧迫的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战略任务。”序言分别以“大西南是一块亟待开发的资源宝地”、“大西南是我国人口众多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缩小与其它地区的经济差距势在必行”、“大西南是维系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生态环境的根基”、“大西南是我国面对东南亚和南亚的前沿阵地”、“开发大西南的条件已基本具备”等专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这样一套集体创作的系列丛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在宏观决策中发展区域经济作出了一大贡献，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西南地区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

三峡工程议案表决前后

1992年猴年早春，水利部、能源部和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等11个部门在军事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大规模的“长江三峡工程展览”；由水利电力等出版社编印了整套有关三峡工程的10本丛书共10万多册；更准备好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和长篇的附件，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已将兴建三峡工程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对于这项举世瞩目、事关全局的工程，将要由与会代表抉择后作出决策。特别是利害相关的四川省、重庆市的代表们，不得不三思而行。

他们带来了张广钦、徐尚志、杨尚明、邓明聪以及杜桓产等知名人士所写的“详陈兴筑三峡工程危害请考虑放弃方案书”和“我对三峡工程的几点意见”等文稿。到北京以后，代表们更读到了全国政协赴鄂川视察团团长周培源所写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应当指出，周老虽非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或顾问，又是八六耄耋之年，仍然受全国政协的委托，不辞辛劳，长途跋涉，率团从北京飞成都，参观了都江堰，再到重庆，搭长江轮船沿江而下武汉。一路上，除了视察沿江 7 个市、地、县有关建设情况以外，又听取水利部“长办”和川、鄂两省及重庆武汉及沿江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汇报，阅读大量资料，和 182 位政协委员一起考察座谈。这是他亲自调查研究后作出的考察报告。

不少代表作出了审慎的思考和抉择。最后通过了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案，但仍有近三分之一未投赞成票。这在人大表决史上从未见过，是值得决策者再三深思的。为此，在邹家华副总理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中特别强调了：“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谨慎从事，认真对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三峡工程的建设更加稳妥可靠。”

坚持民主科学精神的一代宗师

6 年来，不论我有事找周老，或是周老有事找我，都由周老接听电话。他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最后总要客气地道声“谢谢！”从 1987 年 5 月到 1992 年 10 月，在此期间，为了支持我们主编的有关三峡工程和开发大西南的 10 本论著，我收到并保存的周老亲笔信函 27 件。几乎每个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的指示。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直到文字、数字、标点符号，全都一丝不苟地加以指点。我们 10 本书的顾问林华、水利水电专家陆钦佩以及林发棠和我，先

后到周老家向周老当面汇报请示达10次左右。尤其使我感动而不安的是，有多次临时需要听取周老的意见或者他有材料交我，他知道我用车不太方便，常是在他参加全国政协有关会议前后，亲自到三里河计委宿舍登上三楼到我家。而这时周老已经是86—89耄耋之年。直到1991年周老的女儿周如玲从美国回来得知后，到我家说明周老已年近九旬，健康状况欠佳，要我尽量少找周老请示联系。因此，近两年除了重大节日和林华等同志前往看望周老以外，就很少打扰他了。

6年来，在和周老交往过程中，使我深深体会到，周老作为一贯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老一辈科学家，在三峡工程论证中始终以民主科学的态度来提出他的合理化建议。按理这和我们党中央一贯倡导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在不断前进的。

万万没有想到，在我离休之后，竟能遇上像周老那样一位对人体贴入微而又坚持真理的伟大科学家，真是对我莫大的鼓舞，大大激励我要更好地发挥老有所为的精神。1989年11月30日，他写信给我，既对我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表示祝贺；又极为赞同我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所写的《延安精神不能失传》一文的观点，并为我题写了“实践延安精神的楷模”的赞词以资鼓励。

啊！周老，您真是广大后生学人的良师益友！

1994年11月于北京

（原载《同舟共进》1995年第2期）

坎坎坷坷论三峡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教授为拙著《秋实集》所写序言中表扬了我对三峡工程论证中作出的贡献，并且说："几年来，围绕三峡工程上马时机问题，国家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对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特大工程，能够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真是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①

的确，像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特大型重点工程，它涉及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国防、政治乃至生态环境等等方面，无不影响深远。有关工程实施时机，工程建设规模，工程在科技上的可靠性，工程论证的组织体制和论证程序，尤其是工程在国家生产力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重大问题，只能按照党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针，才能从宏观上作出正确的决策。新中国建立以来，对这一工程已论证了三十多年，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尤其是 1986 年重新组织论证以来，争论更加激烈。直到 1992 年七届五次人大通过的决议案，虽然已经决定批准将此项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但是决议案仍然特别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谨慎从事，认真对

① 周培源：序（一）载田方著：《秋实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2 年。

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三峡工程的建设更加稳妥可靠”。①

正如李先念同志生前曾经说过的：“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工程万无一失，……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空前的灾难”。②

我们从1985年开始，对三峡工程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和组织众多专家学者撰文论述。于1987年编辑出版《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一书以后，相继于1989年编辑出版《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又编辑出版了《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征求意见稿。回顾这段历程感到，对于上述诸多复杂问题，存在分歧意见，乃至激烈的辩论，这完全是正常的。

这里，我想就本人参与有关三峡工程的论证所经历的坎坷过程作一介绍。

开始参与这场论证

我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曾经听说三峡工程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它的问题也十分错综复杂。上级没有给我们研究所交待研究三峡工程的任务，所以根本没有想到要参与三峡工程的研究和论证。我于1983年春离休以后，出于对过去移民工作经验的兴趣，曾先后对内蒙古边疆移民，湖南柘溪库区移民，上海等城市知识青年开发云南西双版纳的贡献，以及甘肃“两西”建设中的移民问题进行过实地考察和调研，并且从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入手，和林发棠、张东亮等同志合作，组织了各方

① 邹家华：《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见1992年4月6日《光明日报》。

② 李先念同志于1987年5月9日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信。

面的专家学者，编著出版了《中国人口迁移》(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中国人口迁移新探》(知识出版社，1989年)、《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国外人口迁移》(知识出版社，1986年)和《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等论著。

1984年3月原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曾经就"组建三峡特区实行库区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设想"，批示给吕克白同志和我研究后提出意见。因为这个"初步设想"的文稿中说明："鉴于三峡工程将于1986年开工，三峡特区政府的组建和三峡特区建设规划应抓紧进行"。当时，我经研究后曾写报告提出建议，认为：三峡库区移民任务相当艰巨，而三峡工程又即将开工，时间十分紧迫，刚刚筹建起来的三峡特区政府，无论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工作经验、干部条件等等，都难于执行这一艰巨任务；还不如让原来四川、湖北两省所属地方政府办理较妥。所以当时曾建议缓建三峡特区政府。事后成立了三峡省筹备组，从各地调集数百名干部队伍，大力推进筹备事宜。但是，谁也没有责怪我的建议不妥。1986年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联合通知，撤销三峡省筹备组。当然，我也没有因此而认为自己建议如何正确。因为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有责任根据个人研究所得向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见解，至于领导上采纳与否那是由领导决策；个人的建议是否正确将由实践进行检验。

特大型的三峡工程有关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上百万人口的迁移，正好和我们原来研究的课题密切关联。离休以后，我没有其它特定的科研任务，加上宋平同志曾就此问题给我有过批示，因此就邀集林发棠等同志全力投入这一课题的调研。鉴于库区移民对水电工程具有重大的制约因素，1986年10月我应邀到武汉参加了"联合开发长江发展战略研讨会"后，搭长江轮船专程到岳阳，经沙市，到宜昌过葛洲坝到秭归，沿途进行考察，特别调查了库区移民的试点经验，于1987年3月在湖北《学习与实践》杂志上发表

了“人口迁移是联合开发长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应《长江开发报》记者的访问，发表题为“三峡工程，移民先行”的答记者问。主要观点除了充分阐述移民工作的重要性以外，着重谈了“移民工作成功与否，成为三峡工程提高正常蓄水位，扩大工程效益的主要制约因素”；“三峡工程最要害的问题是移民，上百万人不安置好，光修一个大坝是不能算作成功的”。我指出：库区本应举办一些建设项目，因要建坝被淹，所以国家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投入，以致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现在应当首先把库区开发性移民工作办好，不管什么时候建坝，哪怕是不建坝，把当地建设好了，同样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国家每年拨给库区 2000 万元移民经费太少，建议应增加到 2—3 亿元，作为有偿使用资金，变国家单纯的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因此，像这样的报道，曾获得主管部门的赞许。

与此同时，我们分头搜集和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对三峡工程从总体上和各种专题上撰写了不同意见的论述；特别是取得了著名科学家、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教授的大力支持，为我们编著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写了序言；又得到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协助，即使在经济上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慷慨地帮助我们出版这本书。

我们在批阅各方面来稿，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由于三峡工程涉及科技、经济、政治、社会、国防、生态环境等等，问题错综复杂。它的决策正确与否，对整个国计民生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所以在编者的“总论”中特别强调“不能就三峡论三峡”；而应当放在国家宏观决策的高度：一要放在长江全流域综合治理开发的总体上；二要放在国家整个能源决策的总体上；三要放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总体上，即把三峡工程放在这三个层次的总体战略上进行系统的综合论证。[1]

坚持出版三峡工程论证文集

新书出版以后，反响之热烈，确实异乎寻常：《群言》杂志发表了周谷城副委员长读周培源《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序文有感赋诗四首；《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教授为这本书写的“评介”；《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这本书不仅仅论证了三峡工程》的书评；《光明日报》发表了“来自反方”的评述；香港《文汇报》、《北京科技报》、《瞭望》周刊、《团结报》和上海《劳动报》等等相继发表了对不主张早上快上专家学者的访问记、社论和评论文章，报刊上开始透露了对三峡工程上马时机和建设方案的“第二种声音”。这样崭新的论证形势，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更多专家学者参与三峡工程论证的积极性。不少报刊冲破了层层封锁，不断发表了众多的“反方意见”，这对于我们当然也是莫大的鼓舞。于是我们又筹划编辑出版第二本书。问题是出版社由于第一本书赔本近万元，对于要求再次出版就面有难色了。经四处求援，最后总算取得国家科委和四川省政协的支持，才得以出版。周培源教授写了“再序”。根据来稿类别，分编了“舆论”、“总论”、“专论”、“别论”、“外论”五论栏目的《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2]这本《再论》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新的特点：

(1)“舆论”栏内24篇文章中，首次披露了孙越崎等十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指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体制，从原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等经济综合部门和科研机构领导组织论证，于1986年6月改由水电部负责以后，就变成单一的水电专业性的论证领导班子；而且完全由代表水电部一家之言的领导成员组成。所以提案建议恢复原来的论证领导机构主持交由比较超然的中国国际工程

咨询公司，组织更为广泛的各方面专家，并请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银行等单位参加，进行重新全面论证，真正贯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针，取得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个栏内其他作者们还强烈要求在三峡工程论证的宣传中解除舆论封锁，实行舆论监督，以推动三峡工程的论证进入一个新阶段。[2]

(2)"总论"栏内13篇文章，孙越崎的"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治理长江黄河的光辉教导"一文指出：周总理于1958年对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指导方针，"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周总理当年就提出："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还提出了："一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余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二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并明确指出："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用展开争论、全面比较论证的方法，以求作出充分可靠的结论"。[2]

在主持论证的一方片面宣传早上快上的今天，重温上述周总理当年的指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九三学社中央本着"肝胆相照"的精神，坦率指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上游流域规划，"可行性研究论证的客观依据显然不足，致使评价片面而导致决策失误"。根据九三成员中科技专家深入实际调研所得，提出了综合治理开发长江"先支流后干流"的方针。

(3)"专论"栏内18篇文章作者们就有关生态环境、泥沙、防洪和移民问题，对"蓄清排浑"不可能解决泥沙问题，大型滑坡崩塌问题，和控制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对长江口上海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影响，以及经济评估等专题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了晚上缓上的慎重思考。[2]

(4)"别论"栏内10篇文章充分说明，优于三峡工程的长江上

游、支流开发治理的可行性方案很多，包括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嘉陵江、乌江等主要支流水库，其有效库容，远远大于三峡工程，除具有发电、航运、灌溉等综合效益外，对调蓄长江洪水和挡截泥沙，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四川、云南、贵州水能资源十分丰富，名列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前茅。多年来，西南各省已经过长期的勘测设计，都有各自的开发水电事业的发展战略和具体规划。而且一般都具有周期短、投资少、淹没损失小、移民少、见效快等优势。[2]

(5)“外论”栏内14篇外国专家对三峡工程的评说，特别是“加拿大长江联营公司”关于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的评论”和“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评论”，从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美国生态环境学者布伦特·布莱克韦德为《大型水坝的社会及环境影响》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尖锐地指出：“大型水利开发所造成的严峻难题是如此之惊人和普遍。一个国际间的组织网络已经建立，以遏制这一对自然的摧残并提出明智的替代办法”。[2]把环境保护工作列为基本国策的我国政府是决不会漠视三峡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性的。

长达43万多字的《再论》一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充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1989年3月出版，受到当时正在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两会与会者广泛的好评。

站在更高层次看三峡

1989年4月4日，姚依林副总理在“人大”、“政协”两会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主持会议的李鹏总理委托，答记者问时说：“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目前治理整顿期间以及将来‘八五’计

划期间，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①

上述我们编著的两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这次《长江长江》中众多作者所反映的各种不同意见，只不过不同意早上快上，当然也都是‘有道理’的。我们都认为姚副总理的讲话，不仅代表李鹏总理，而且也是完全合乎实际实事求是的结论。

姚依林副总理讲话以后，两年多时间内，我们在九三学社中央和周培源教授的支持下，在西南五省区的党政领导的配合下，以及在《开发大西南》电视系列片组委会的资助下，组成了《开发大西南》丛书编委会，积极从事开发大西南的调研、组稿、撰稿等编著工作。我们认为：对于三峡工程论证中的各种意见，我们已经在两本书中作了充分有力的阐述，现在应当站在更高的层次，从开发大西南富甲天下的水能资源着手，带动开发西南地区丰富的多品种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振兴西南、支持全国，从这样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出发，无须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再作无谓的论争。三峡工程在开发大西南的全盘布局中自有它应得的地位和作用。用两年多时间在学苑出版社协助下，把200多位作者撰写的著述编辑出版了“综合卷”、“地区产业卷”、“四川云南卷”、“贵州广西西藏卷”、“纪实卷”、“联合开放开发卷”共200多万字的六卷丛书。这样一套集体创作的丛书，应当说，对于我国在宏观决策中发展区域经济作出了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田方、林发棠、凌纯锡主编，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

[2]《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田方、林发棠主编，长沙湖南

① 见1989年4月5日《人民日报》。

科技出版社，1989 年。

[3]《长江　长江》，戴晴主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年。

[4]《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征求意见稿），田方、林发棠主编，北京，1992 年。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 年第 1 期）

“匹夫有责”未敢忘

——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田方

《法制与新闻》记者　方晓黎

采访名人，约请作家赐稿，这恐怕是刊物编辑不可或缺的一种“公事”。

田方同志算不算名人，笔者不好断言。但久闻田方早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从事新闻工作，后去延安当了《解放日报》记者，曾任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副社长……

这篇采访记的初衷，原拟就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从老延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田方的“历史长河”中挖掘“珍闻富矿”，但采访氛围的“即景生情”打乱了采访计划，一个偶然感发的话题，把记者的视线从历史长河引向时下人人关注的一个现实大课题。

在书房兼客厅的一间居室里，田方与来访记者海阔天空地畅聊。说到奔赴延安，田方深情地道出了当时大批热血青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和动力；说到随军记者生涯，田方历数自己的亲身闻见……谈兴正浓之际，一阵雷声滚过，骤雨如注倾盆而下，田方似有所感，信手拿起一叠文稿，又指着窗外的暴雨，“前些时候，南方在发大水，有的地方是百年不遇的洪水，长江的防洪是个

大问题。”刚才还是神采飞扬侃侃而谈的田方，此刻被大雨笼罩在一种沉沉的忧虑中。

“长江防洪，不能等待三峡工程，有了三峡工程也决非万事大吉。”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话。

田方告诉记者，他与三峡工程的论证结下不解之缘，是源于1984年3月原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曾就《组织三峡特区政府实行库区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设想》文稿，指示给吕克白和田方，要求研究后提出意见。对移民问题素有研究的田方，这时以三峡工程关乎我国生产力合理布局和上百万人口迁移为基点，切入对三峡工程及长江水利问题的全面研究。

“那么，在三峡工程论证中，您是早上快上派，还是干脆不上派？”记者问得或许过于直截了当。

“我不赞成早上快上，亦不赞成不上，我算个缓上派吧。”

田方掐着手指娓娓而谈，由于三峡工程的库容量有限，只能控制长江上游特大洪水量1500多亿立方米的五分之一左右，对防御中下游湘、资、沅、澧、清江、汉江、赣江等各大支流的洪水，根本起不到作用。众所周知，长江上中下游长达五六千公里，由于其降雨时序不同，历来很少有过上中下游同时出现洪灾的。据记载，1931年和1954年长江两次特大洪水，武汉、南京长期被淹，但上游四川省并没有发生水灾。这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各支流流域地区连降暴雨引起的。多年来，包括今年的洪水情况也大体如此。三峡大坝建在宜昌以上，显然起不到宜昌以下诸多大支流的防洪作用。因此在长江防洪问题上，需要认真分析上中下游各河段的洪灾成因，提出治理对策。应从长江上中下游和干支流的总体上进行通盘考虑，采取蓄泄结合，以泄为主，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结合等综合措施，决不应把长江防洪寄希望于三峡工程的兴建上。就发电而言，三峡工程也是晚建比早建好。因为毗邻三峡的川、滇、黔三省可开发的水电资源占全国一半以上，全国规划建设的水电能源基地，大部分

在西南。三峡工程发电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同西南的五个重点开发河段（金沙江的渡口——宜宾，雅砻江的锦屏——渡口，大渡河的大岗山——铜街子，乌江的洪家渡——彭水，澜沧江的小湾——景洪）相比，或同长江上游及四大支流（金沙江及雅砻江、大渡河、嘉陵江、乌江）相比，三峡工程的发电作用，特别是防洪、航运等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都是较差的。三峡工程每千瓦装机、每千瓦小时所需投资，以及淹没地面积、移民搬迁数量均远高于其它水能源基地。同时由于财力有限，顾此难免失彼，上了三峡工程，不仅建设周期过长，“远水救不了近火”，反而使得西南一批急待开工的水电站不能及时开工，这些水电站如能较早建成，装机容量尤其是年发电量更大于三峡工程。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识见，周培源等一批科学家及知名人士提出了“先上后下，先支后干，先易后难”的方案，即先把长江上游各支流的水电站逐步建设起来，为三峡工程创造条件，待国家经济实力及科技水平有了充分的保障后，再兴建三峡大坝就比较容易了。

谈到与周培源的初次相识，田方感慨地说：“这也是三峡工程的缘分啊！那时我和一些水电专家、经济学家出于对三峡工程的关注，编写了一本论文专集，周老欣然为此书写了《从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的序言，以后我们相继编辑出版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等四本论著，周老不顾年事已高，分别为论著作序，阐明了缓上三峡工程的观点。6年来，我们主编了有关三峡工程和《开发大西南》丛书（6卷）共10本论著，我收到并保存的周老亲笔信函27件，几乎每个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的指示。1989年11月30日，周老写信给我，既对我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表示祝贺，又极为赞同我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所写的《延安精神不能失传》一文的观点，并为我题写了‘实践延安精神的楷模’的赞词以资鼓励。”

“田老，说了半天，咱又回到延安精神上来，听说您在三峡工程

论证上还真有股子延安的劲头。"记者与田方都不禁笑了起来。

"说到三峡论证，我和一批科学家、经济学家真可谓坎坎坷坷论三峡呀！"

田方指点着去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和今年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像三峡工程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特大型工程，它涉及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国防、政治乃至生态环境等等方面，无不影响深远。有关工程实施时机，工程建设规模，工程在科技上的可靠性，工程论证的组织体制和论证程序，尤其是工程在国家生产力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只能按照党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针，才能从宏观上作出正确决策。新中国建立以来，对这一工程已论证了三十多年，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尤其是1986年重新组织论证以来，争论更加激烈。直到1992年七届五次人大通过的决议案，虽然已经决定批准将此项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但是决议案仍然特别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谨慎从事，认真对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三峡工程的建设更加稳妥可靠。'

"这也符合我们的初衷，姑且不论我们主张的缓上三峡工程的意见是否正确可取，仅就这些专家、学者、海外人士积极关注和研究三峡工程一事而言，他们敢于把自己的建议讲出来，这就是'知情出力'，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感。有的同志在文中说：'个人从事水力发电工作50多年，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有些同志曾是50年代拥护三峡工程上马的。但30年来他们不断深化认识，深思熟虑，现在自己否定了原来的看法，如周培源、胡慎思，透过那些言之有据的论证，可见大家爱国报国的拳拳赤心。尤其感人的是，在周培源得知《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需要自费支付印刷费时，专门派人送上300元。

"其实，我们这些写论文、编专集的人，大都行将就木，奔走呼

喊无非是为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着想。1993年7月28日我们9个人联名上书，去年2月1日再次上书时，廖季立已经作古，这次名单中增加的覃修典、徐洽时，是水电、水利界的老前辈，都已经80多岁(今年覃修典又逝世了)，虽然我们都离休、退休了，原本可以无官一身轻，但匹夫之责咱也不能忘呀！”

或许是情有独钟，难以割舍；或许是古稀之年，尚不知老之将至；田方一说起三峡工程，真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执著劲头，一发不可收。

记者对三峡工程的有关技术问题无意评判，以为还是留待专家、学者深入研讨求得最佳方案为好。但这次采访感悟最深的是一种求实精神的追求，未见田方前，记者曾暗自忖度，在心里替田方画过像：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赋诗作文，吟以自适……但得晤面，却与想象中的田方大相径庭，书房里文稿堆成“小山”，仅1983年离休后10年内主编出版的书即达20本，且均为三峡工程论证、开发大西南、中国移民和人口问题等现实重大课题的研究，难怪田方风趣地说：“你不想老就不会老。”

（原载《法制与新闻》1998年第10期）

和周培源的书信往来

从1987年5月开始到1993年11月6年多时间内，因参与三峡工程论证，取得周老的亲切关怀与热情支持。在此期间，除了拜访周老，当面聆听他的指示和电话上联系以外，还时有书信往来，弥作珍贵，特刊登如下：

周老的来信

田方同志：

收到你的来信已近两个月了，其间因要出席政协会议以及一些其他活动，未能即复为歉，请谅。

首先，我支持你决定编写《三峡工程与能源决策研究》这本书。但我还有些看法，今提出和你商榷。

关于修改书名的问题。这因为三峡工程不仅牵涉到能源决策，而且和整个长江流域（甚至全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与社会效益都有关系。根据书内选登文章的内容可否请把书名稍作修改，概括得宽一些。

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与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是坝高150米或185米（见新华社5月

1 日《国内清样》第 1023 期的报导），而是先在上游或先在下游建坝。如果在上游建坝，同样解决发电、通航、防洪、泥沙等问题，则何必浪费人力、财力与物力去做下游建坝的准备工作。

关于 150 米高坝的发电容量问题，钱正英部长当面对我说过：丰水时，发电容量为 1300 万千瓦；枯水时只能发电 300 万千瓦。据 5 月 1 日的报导，185 米的高坝的发电容量为 1786 万千瓦，但未提枯水时的发电容量。丰枯水这样大的差别如何解决，5 月 1 日这个报导一字未提。

我们要明确要求把上游建坝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具体方案制订出来，和三峡建坝的方案相互比较，哪个方案比较合乎四化的要求，然后作出决定。

任何重大工程项目总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即使在基础科学如物理学或化学的实验中都有误差。在工程项目中我们只能做模型试验。但我听说水利工程的模型试验与实践比较的一般误差高达 20%（此点请问问水利专家）。另外可以调查国际上已有的大坝建成后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对这种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有的出国访问的代表团常常带了一个主观成见去调查，总会找到符合他所需要的例子。这种调查不如不去调查。

葛州坝的建设是工程上的成功，但在规划上是有问题的。既然建成，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它来吸取经验。比如，它改进了航运，还是带来新困难？泥沙淤积现在如何，过几年如何？这些都是对三峡建坝很好参考资料。

现在对三峡的建坝预算，有好几种说法，相差竟有五六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何能贸然决定建坝。

最后，如果国家决定建坝，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决不能要外国人来修建。核武器的爆炸，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长征火箭已进入国际市场，都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难道我们自己不能修建三峡水库？即使要修建三峡水库，我的看法是：也要等到上游水库建

成之后看情况再定。经过几十年之后，国家经济情况会有很大的发展，科技水平会有很大的提高，世界和平会有可靠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建坝就比较容易。千万不要修建这样一座世界大坝就会流芳百世；如无充分准备就上马修建，反而会遗恨万年。

我希望你把上述意见中有些可以放入序言中的，请把它们放进去，不胜感谢。

我定5月8日飞西德到Gottingen参加国际科学会议并应邀在会上做学术报告，13日起程返国。6月初又要去美国出席类似的学术会议做报告。我希望我们在5月中到6月初之间约期当面晤谈一次来讨论目前的情况并确定序言的内容。

此复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87年5月5日

田方同志：

昨晚我去周谷老家，请他为《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写书评。他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即先在长江上游建坝，后再考虑三峡工程。他对在浙江省修建的新安江水库也有很大意见。

但他不愿意写书评，理由是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不便写。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必勉强，可以请其他同志写。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7年10月19日

田方同志：

周谷城同志写诗已取来了，今专函寄上。我感到文与字都写得

有点潦草。这样登载在刊物上有损于周谷老的声誉。我建议你和《群言》杂志商量，可否给诗作修改。在征得周谷老的同意后再行发表。未知尊意如何？

此上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87 年 10 月 24 日

田方同志：

10 月 31 日信及附件均已收到。附件已给周谷老看过。对他的诗，他又作了一些修改。今把他的诗稿寄上，请转《群言》总编于友同志为感。

此复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87 年 11 月 2 日

田方同志：

12 月 2 日给周谷老的诗以及 11 月 28 日的信与“能源政策研究通讯”都已收到，谢谢。

你上次在电话中告知我，中央已决定开发乌江水电的消息。前几天在上海出版的《经济导报》对此已发表消息。看来，对三峡工程缓上的问题中央已有决定。

此复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87 年 12 月 5 日

田方同志：

今托申师傅来府。请把《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交给他。要给周谷老的书亦请他转交。不胜感谢。

今天出版的《科技日报》已把你写的该书介绍刊出在第一版上。这也是该报对此书的支持。

此上并祝

龙年工作胜利！

周培源

1988年2月11日

田方同志：

这个“对加拿大咨询集团论证三峡工程的质疑”我感到写得很好。可以听听千老的看法。原件奉还，请查收。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8年8月26日

田方同志：

今送上关于我个人的视察三峡工程的初稿一份。这个稿子是在重庆时向一位政协同志口述后他起草整理的。我作了些小修改。我也送给林华同志一份，请他提意见后再定稿。

来信提到有些同志一定还要上而且还要快上三峡工程，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因为搞了30年这项工程。怎能不上？心里不会甘心。所以我们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

对稿子有何意见，请来电话告知为盼。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8年10月8日

田方同志：

今送上给中央同志的信及报告请阅。

签名条也附上，请查收。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8年11月11日

附周培源致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及各位副主任“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田方同志：

今由邮寄上梁守槃同志写的“关于三峡水电站的经济效益”一文。请打电话给乔培新同志，问问他对此文的意见，然后送《群言》杂志考虑发表。

作者是我国火箭专家，在发射导弹与人造地球卫星上他曾作出杰出贡献，是全国政协委员。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8年12月7日

田方同志：

前两天我寄给你一封挂号信，内有梁守槃同志写的文章，谅已收到。之后，乔培新同志给我打电话，建议对梁文作两个修改。我感到他的建议很好，今转达如下：

在第二页上，把第三段的第一句改为："为了计算方便，假定前述的169亿是按12年平均支出的，其复利（即'利上加利'）的年息为7%（这个利率现在已上升到8.75%）"。

即加上括弧中的一段。

第三页，把第二段中的最后一句，"因此，三峡水电站是没有经济效益的"一语改为"因此，从资金的投入和产出来看，建设三峡水电站是得不偿失的"。

梁文如已送《群言》杂志，请把此信转过去。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8年12月9日

田方同志：

12月17日来信及附件《参考清样》均已收到。谢谢！

来信提到的九三学社将于明年办《民主与科学》报纸事。这与事实稍有出入。九三学社本有一个内部刊物"红专"。由于近年来各地社员反映"红专"是在过去思想改造时期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创办的，今已不适应改革的新形势。对此社中央决定把它改名为《民主与科学》。它仍是一个期刊，而不是报纸。

我高兴地看到，昨天（18日）的《科技日报》在头版上发表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将问世的消息。"看来该报也已感觉到在目前的形势下有发表这个消息的必要。

此复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88年12月19日

田方同志：

关于对8月11日的《国内动态清样》(第2692期)如何向江泽民同志反映，请你和陆钦侃同志研究一下。一个办法是用我的名义给他写封信。根据是，我去年9月曾和全国政协182位委员一道到湖北、四川视察，关于三峡工程问题曾给中央领导同志写过一封信和一个报告(信及报告附上)。今也送给总书记参考。

另外，要说明长办魏廷铮主任的"认识"不全面。

再则今年四川也发生大水，四川人民受到极大的灾难，如果修建了三峡水库，则四川人民的灾难将更为严重。请总书记也可以到四川去视察，听听四川党政领导和人民对修建三峡工程的看法。

如果要用我的名义写，还请你们二位准备(医生不让我多做工作。附上的信和报告请复制几份以便留作他用)。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9年8月12日

田方同志：

兹托申师傅送上给江总书记写的信及水利部文件(89)水三峡字第16号。请复制后把它们还给我。对陆老的原稿我加了一些话。此原稿已交九三学社中央保存。

再奉还张广钦同志的报告，请查收。

你要我题词，请把稿子及有关的书也交申师傅带下。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9年8月24日

田方同志：

陈鸣同志要我为他主编的《中国在前进》题词，我照你的建议用毛笔和钢笔各写了一份。两份都写得不好，请他选择一份使用。今托申师傅把它们送上。请查收。

请顺便把上次送上复制用的两个材料交他带回。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9年8月27日

田方同志：

9月23日大札收到了。本拟即复，后又想到国庆前夕一定会有招待会，有可能见到领导同志，问清情况后在再复你。

政协赴鄂、川视察团于9月24日上午从重庆飞返北京。当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才悉你已离京返家乡探亲。

这次政协委员去鄂、川视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绝大部分同志都不主张现在就上三峡工程。林华同志的报告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经过等你返京后再详谈。

我今要告知的重要消息是：在今天下午的招待会之前，我对一位国家领导同志说（他的名字请不要猜），“我最近和政协同志到湖北、四川视察，有传说三峡工程要上马。”他说，“没有这回事，国家经济今有困难，如何能上？”依据他的回答，我感到可能有人在造谣，混淆视听，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10月3日，我将率政协代表团去捷、罗访问，17日返京，又要主持“和裁会”举办的一个国际会议。大致在20日左右我们可以有时间会晤。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9年国庆前夕

田方同志：

首先我要向你荣获《老有所为精英奖》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也极为赞同你写的“延安精神不能失传”文章的观点。

今把为你将出版的大作《秋实集》的题词寄奉。字写得不好，请鉴谅。

此复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89年11月30日

田方同志：

今托申师傅送上计委文件的复制件，请查收。

你处如有材料要给我的，请交给他带下。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89年12月13日

田方同志：

给刘华清同志写的信及附寄1988年11月给中央同志写的信和报告都已托九三学社中央送中央军委。今把信的复制件寄上一份，请阅。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90年6月25日

田方同志：

今申师傅专程前来，请把需要复制的材料交给他办理为感。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90年7月5日

田方同志：

我托九三同志把来件复制三件。今将复制件与原件一同送上，请查收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91年3月7日

田方同志：

3月29日大札收到，使我了解到有关党政的一些大事，深受教育。

今附上“国内动态清样”的复制件，请参考。

在“大西南的呼唤”一文中，我也发现有下列三点，似乎需要改正：

1. 在第1页上第7行中的‘未’是‘末’字之误。

2. 第3页自下而上的8行中，‘航、和’2字之间似应加上‘程’字。

3. 第5页自下而上的5行中，‘西中’似应改为‘西、中’。

请考虑。文中一些百分数，请再核对一遍。

我在另纸上签了几个我的名字，请你选择1个，作为'序'的题名。

此复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91年3月29日

田方同志：

北京大学数学系一位教授程庆民同志(北大数学系原学生，今为系博士生导师)最近送给我一篇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我感到文章很有说服力。今特复制3份，送给你和林、陆二老一阅。

此上并致

敬礼！

周培源

1991年6月11日

田方同志：

今托申师傅前来取材料。哪些材料须交给钱伟长同志的，请注明。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91年6月29日

田方同志：

今托申师傅送上三件《建议》稿，给你和林、陆两位同志。附件2是程庆民同志的论文。由于你们三位已经有了，所以没有附上。

等九三的同志提完意见后，我们在一起共同讨论修改。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91 年 7 月 27 日

田方同志：

《建议》已于前天 19 日（星期一）送中央统战部转呈中央。除《建议》外，我另写一封信，附送。

今附上《建议》和信各 3 份，送给你和林、陆二老作参考。请勿外传。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91 年 8 月 21 日

附“关于开发大西南缓上三峡工程的建议”。

田方同志：

10 月 3 日来信收到。今送上支持《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自费出版的人民币 300 元。请查收。

此致

敬礼！

周培源

1992 年 10 月 4 日

我给周老的信

周老：您好！

去年三、四月政协、人大开会期间，曾听说人大有270多名代表（占代表总数的十分之一）联名建议把三峡工程推迟到21世纪，并优先开发乌江、金沙江、澜沧江水电资源。当时香港报纸突出报道此事，但在北京却毫无反映。我曾向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副主任郁文同志（原中宣部副部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打问此事。他说根本没有听说此事，他找了很久才找到江泽佳等58名代表的提案。后来，才见到水利部于1989年8月9日对徐采栋代表个人（似乎只他一人）作了一个根本不是认真负责的答复。直到去年10月15日在九三学社总部开会讨论《开发大西南》丛书的时候，徐采栋同志找出原提案的复印件（有270多名代表签名）。对照之下，感到主管部门对此事太不严肃，太不负责任了，看来，在大会期间整个提案委员会都没有立案的。

鉴于近来主管部门仍在进行不切实际的宣传，前天（19日）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中还在夸大宣传三峡工程泥沙问题室内试验的科学成果；又听说四月间"长办"还将在武汉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对于去年272名人大代表的建议及水利部这种轻率的答复，实堪忧虑。宜向领导上提出重议此案。

附有关材料，供参阅。

致

敬礼！

1990年2月21日

周老：您好！

4月17日在九三学社总部开会时，您交待的有关三峡工程的三份材料，经复印后已分送各有关同志参阅。5月3日，林华同志找了陆致侃、林发棠和我在他家交谈彼此的看法。大家认为：

(1)目前普遍议论，由于广州会议的影响，三峡工程很可能又要早上快上了。这个工程虽则并未列入"八五"计划，但"纲要"上写了要"继续抓紧三峡工程项目的审查"。这意味着要在"八五"后期做好准备工作，"九五"上马。事实上，主管部门已经在展开具体工作。一旦"准备工作"开工，就将正式兴建三峡工程。

(2)如果三峡工程上马，由于国力所限，目前在建的许多大中型水电工程，将在资金、材料等方面受到严重影响；开发大西南也势必受阻。主管部门对三峡工程投资额已从过去的361亿元提高到570亿元。按国家对重点工程投资的贷款利率计算动态投资至少在千亿元以上。这就必然进一步扩大建设规模，导致经济总量的失衡，给国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难免出现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局面。

(3)如果照此安排，实际上改变了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对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以及"纲要"的精神，和李鹏总理在今年七届四次人代大会上对"纲要"的说明；而要求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也将受到严重的冲击，从而影响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顺利实现。

(4)根据近年我们对三峡工程的研究和著述，众多专家学者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各种意见，均已明白表述，中央领导是清楚的。正如姚依林副总理所说的，反对早上快上也有充足的理由。

(5)据此，我们固然还可以本着为党为人民负责的精神继续撰文，据理申述。但根据目前形势看来，这样的文章也难于发表；即使在一些次要的报刊上发表出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因此，我们设想，是否可请周老抽点时间，由林华、陆钦侃等同志向您作一次汇

报，听取您的意见，并考虑用周老的名义，再次向江总书记上书建议。当否请酌定后示知。

祝您

健康长寿！

田方

1991年1月5日

周老：您好！

关于编辑出版《开发大西南》丛书的事，由林华同志主持，先后召开过两次在京编委的会议（一次于去年11月5日，二次于今年1月2日召开，均有徐采栋、赵伟之、左阳同志参加）。就有关编书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收集资料、组织文稿，以及和西南各省区有关部门联系组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两个多月以来，各方面来稿踊跃，材料丰富。前天会议确定，第一批即可同时编发三册，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一册着重开发大西南的宏观决策、战略方针，以及有关专家的理论探索等为《综合卷》；一册主要为赴西南采访的报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和《开发大西南》电视系列片的解说词，这两部文字生动活泼，可读性强，为《纪实卷》；一册为国民经济"八五"计划、十年规划有关方针政策，具体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关于加快长江上游支流综合开发治理步伐，以开发水能资源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为《地区产业卷》。

第一册除刊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开发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小组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研究意见——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议之附件"以外，并将以周老署名的九三学社中央致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也同时刊发前列。因为这封信既经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认可；并且也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制的具体化；又明确了九三学社对开发大西

南的倡导者的地位。特此向周老说明编辑的原由。

再以九三学社名义编发的这套《开发大西南》丛书。除首批编发三册外，事实上将持续出版。为此，还希望周老推动九三学社成员继续为丛书多多撰稿。

此致

敬礼！

田方

1991年1月13日

周老：您好！

我向您恳求一事，盼予支持。

我离休七、八年来，的确做了一些在职时想做而做不到的工作。本来，我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作为一个革命者，晚年尚能发挥些余热也是份内之事。出乎意料的是：1989年国庆前夕，受到了中国老龄委员会颁发的《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我是国家计委推荐的两名受奖者之一）。获此殊荣是很不敢当的。但又感到，我们离休干部做了工作，还是受到了社会上的认可和奖励；同时，也说明了离休干部也的确可以老有所为的。所以，近两年来，一直在把我离休后这七、八年的作品汇集起来，现已编集成册，书名《秋实集》，作为对社会的一份贡献！近来，又得到我家乡乡镇企业的支援，他们愿为出版这本集子资助5000元。这一愿望即可成为事实。为此，特恳求周老为这本《秋实集》写一序言并题一书名。当否？请赐教。

附上《秋实集》目录一份和全部文稿共约30万字，拟请九三学社的学苑出版社出版。

致

敬礼！

田方

1991年2月1日

周老：您好！

前不久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所报道的王震、王任重等同志在广州集会讨论要求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建议，实在令人纳闷和忧虑。我认为至少有下列两点值得商榷：

(1)对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应当说，经过近年来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经济形势确有好转，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至今仍有不少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形势仍有相当严峻的一面，而决不是乐观到又可以早上快上三峡工程那样有利的时机。不少人建议(包括徐秉楠等272位人大代表的联名提案)推迟到21世纪，在目前亟宜抓紧时机先上其它更为有利的水电工程，这种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次人大会上邹家华、王丙乾同志的报告中说的很清楚。不知道广州会议上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如何估计的？

(2)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总结我国40年来建设经验提出保持我国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是40年来花了很大代价而取得的切合实际而十分珍贵的基本方针。如果形势稍一好转又头脑发热，又要大干快上，势必重蹈覆辙，把近年来辛苦经营刚刚露头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薄一波同志在1988年中国计划经济学会成立会上讲过：我们党就是"治乱有方、兴邦难"。他列举了解放30多年来几起几落的沉痛教训。包括解放初期治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仅三年时间就走上了五年计划的建设转道；但刚有起色，就头脑发热，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结果闹的国民经济大大下降，饥饿而死的人不少；经过三年整顿，到60年代初期稍有起色，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国民经济闹的处于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同志又来了个"洋跃进"。亏得制止的早，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形势大好。可是现在有些人又要头脑发

热。……这席话，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几年来，一系列符合党心民心的正确决策正在艰难中步步实施之际，又出现要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呼声，实在难于令人理解。

的确，治乱有方，我们颇有丰富的经验，行政、法律、专政、经济等手段几管齐下，是行之有效的。但在真正兴邦，总得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而决不能凭少数高级领导人的意志来行事。否则，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就连治乱也难于有方了。

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党，不得不诉说几句，并望周老能通过适当方式酌情向中央反映。

致

敬礼！

田方

1991年3月27日

周老：您好！

我于前天从宁夏出差回来，听说您最近住院检查听觉，问题不大，甚慰。还望静心疗养早日康复。

在此期间，自然十分关注三峡工程上马问题。读万里委员长在人大常委会的讲话，虽则结论中仍“建议国务院列入十年规划”，但口气还是比较全面。比如说“这项工程事关重大，必须特别慎重对待，应当十分尊重各方面专家各种不同意见。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选择最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方案”等等；杨振环部长汇报中也只提了“三峡工程看来势必要上。目前要加强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扩大移民试点和各项准备工作。”

由此看来，要上已为大势所趋。但是，国家实力究竟能否如愿，最为关键。目前一批已建、在建工程是否将受影响。很值得考虑。

9月2日《经济参考报》载:“国内最大水电站二滩水电站十月中旬动工。”消息说:“世界银行贷款7.4亿美元,国内投资47.2亿元;”9月13日人民日报载:“华能走出发展基础产业新路”,强调90%以上投资靠国外借款,地方集资、银行贷款,实行负债经营”。且不说三峡工程其它科学技术问题尚有严重争论,特别是130万移民就近后靠势必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以及国防军事上重大风险并未解决。引进外资固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以负债经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经营方向,就值得考虑了。记得陈云同志早就说过,借外债搞建设不是我们的方向(大意)。因此,即使国家对此已作为重大决策,仍不免疑虑重重。

当前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非易事。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靠20世纪最后十年能本着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十年规划、“八五”计划的建议和“纲要”的精神,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平平稳稳过去,方能充实国力,增强我国国际地位,才是希望之所在。反之,借债建设,依赖外国,冒天下之风险,实为自乱阵脚之下策。真不知三峡工程主管部门究竟是否充分了解实情,或者另有锦囊妙计,似应早日昭告国人。

我等人微言轻,即使上书领导,也未被重视,实在忧心忡忡,但愿并非杞人之忧天!

致

敬礼!

田方

1991年9月11日

周老:新年好!

关于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声音,真是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似乎真的又要上马了。其实,反对早上快上也是大有人在,只是被封锁,被压制。我们觉得这是国家更大的祸患。

年前，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我们曾到京西宾馆拜访四川省副省长××同志，畅谈一个半小时。据他说，去年四月江总书记考察四川期间，除了在会议上听取省委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汇报（由四川省原计经委主任，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辛文同志作专题汇报）以外，在用餐期间，江总书记曾逐一征询了每个负责同志，包括杨汝岱、张皓若、马麟、辛文、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等同志的意见。要求他们不必代表各单位组织的意见，而是各人谈谈个人对三峡工程问题的意见，所以各人都各抒已见，道出了各种不同意见，比如其中王春正同志就说：对三峡工程的其它意见，我没有调查研究，不好发言，但从国家计委角度来说，反正没有那么多钱来上三峡工程！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般意见（就我所知，好几位国家计委现任领导人都是同样的看法）。当时江总书记表示，他只是过去在北京当部长时曾经听到李锐同志谈过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以外，近年来，听到不同意见太少了！

我们认为：中央高层领导听不到不同意见是最危险的事。我们很想反映一些意见，可是人微言轻，不仅报纸刊物不会公开发表。即使内部上书建议，也到不了中央领导人之手。为此，特向周老反映，这些问题和建议，请审核指正，如蒙同意，是否可以以此作为提纲，并听取周老指示，再拟致江总书记的信。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们想还是要以负责的态度，作最后的努力，是否有当，请周老指示。

祝新年愉快

万事如意！

田方

1992年1月6日

第九篇

我和爱国老人沈钧儒五代的交往

我和爱国老人沈钧儒五代的交往

这个题目似乎太大了，不说沈老一辈兄弟五人，即沈老个人的丰功伟绩、宏文巨著和满堂儿孙，按我的辈份和水平，是不可能写出沈老一大家族的五代基业来的。但是，我毕竟和沈老有过交往，对沈老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他的道德风范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影响了我一生的道路；而且，有缘的是，我和沈老的女婿范长江和女儿沈谱夫妇，和沈老的长子沈谦、张绚夫妇，和沈老的孙子沈人骅、周秉德夫妇，以及沈老的曾孙沈清、冯晓青夫妇，乃至和那对活泼可爱、沈老的玄孙双胞胎嘀嘀和嘟嘟兄弟，和他们或者长期共同战斗、一起工作，或者长期相邻而居，亲密交往。平时相处，似乎一般，但从我相继接触沈老五代纵看 60 年风云，却从而可以读到我们祖国沧桑巨变的一页史诗；可以读到我们民族从屈辱走向辉煌的一段历程。特别是在今天纪念中国人民救国会 60 周年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有似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了！

“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这是周恩来总理1963年元旦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为沈老90寿辰祝酒时说的：“沈钧儒老人今年90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当时沈老抱病参加，在他生前亲自听到党对他如此高度的评价，自然得到莫大的慰籍。当年，沈老身体已渐见衰老，6月初突患支气管炎，住北京医院，经医生多方医治无效，不幸于6月11日上午3时55分逝世。享年90岁。6月14日举行公祭时，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致悼词中又特别强调，“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这个称号，沈钧儒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1936年那是我们祖国被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生民离乱的一个苦难而屈辱的悲壮时代。正是这位爱国老人，时年61岁，长须飘拂，最最使他痛心疾首的，就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只顾打内战，对日寇采取不抵抗主义。就是沈老，在国民党一片白色恐怖下，代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出席并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老主持大会并首先发言，他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只有抵抗侵略，才能求得民族生存！”沈老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当时我已18岁，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望平街（现为山东路）口一家绸缎店当学徒，正在为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而义愤填膺，不可终日而苦无出路。有幸在一位老店员周永浩的启发引导下，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绸缎业联谊会，从事一些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秘密散发传单等活动。当时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正是通过救国会公开名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救国会中沈老等知名的爱国知识分子，或者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书信往返，共商抗日救亡大计，或者组织发起鲁迅逝世治丧委员

会，举行追悼鲁迅的出殡游行仪式，或者组织主持召开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特别是沈老著文发表《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宣扬孙先生创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实际上就是抗日救亡联合阵线的政策；为了支援绥远抗战，救国会发表宣言，发动募捐进行声援和物质支援，所有这些活动，在上海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我们青年学徒店员中，无不产生热烈的反响。当然，这对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共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是十分仇恨的。因此，就在1936年11月23日凌晨，把沈钧儒和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因爱国有罪而逮捕入狱，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从而使全国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使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促发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直到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于7月31日下午被迫将“七君子”交保释放。这一系列活动，对于我既得到了很具体的启蒙教育；而且对我以后参加上海流亡学生战地服务队，从上海经香港到桂林后，同去的青年被分别安排参加胡愈之领导的桂林文化供应社、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大有密切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和沈钧儒长期亲密合作的当代中国知名的爱国知识分子，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脊梁。

他的左倾思想来自他的祖母

沈钧儒究竟是怎样从参加科举到转向革命的呢？沈老的孙子沈人骅，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他祖父的故事：

人骅认为，沈老从清末进士出身，青年时代就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而转向革命，成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当然，这和沈老一贯走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探索救国之路，不断追求真理，一贯反对内战，一贯

参加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活动分不开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当沈老作为“七君子的家长”而第一个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讯时，法官无知无礼地问他：“你是一个老头子，当然不会有左倾思想，你是不是被人欺骗利用的？”意思是想要他承认受共产党利用。沈老毅然地回答：“他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共产党，大家一样的都是为了救国。无所谓谁利用谁。如果说我有左倾思想，倒是从我的祖母那里得来的，我自幼就受了她的感召和启发，所以有了这个思想。”法官听了大为惊奇，而沈老说到这里却笑了起来，接着在法庭上娓娓地叙述了他受到祖母教育的经过。

沈钧儒幼年时代，住在苏州盘门口新桥巷，当时他的祖父沈玮宝任职苏州知府，官宦之家，府第相当阔绰，房后是一条新桥河，河对岸却是贫民窟。沈玮宝虽则官至知府，但因秉性孤傲，刚直不阿，清贫自守，1879 年去世后，家境渐见衰落。当时沈钧儒才 4 岁，他祖母唐如是一个具有伟大胸怀的女性，她不像一般老婆婆那样信神拜佛，而是长年累月地帮助穷人解决困难，她认为世界上不应该有没饭吃、没衣穿、没房住、生病没医药的人。她经常凭着后窗观察河对岸的穷人家的生活，并且帮助穷人解决过冬的寒衣、被服；祖母粗通医术，自备药箱，翻阅医书，抄录偏方，自己配药，自做膏药，帮助穷人医治痢疾、虐疾和肿毒等疾病。她不顾脓血污秽为病人清洗脓肿，敷贴膏药，以至常有病人上门救医。由于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祖母甚至典当自己的衣物首饰来继续帮助穷人。所以当 1890 年祖母去世时，近邻穷人们无不伤心痛哭。时年 15 岁的沈钧儒就深深懂得，祖母所作所为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从此感到天下穷人是这样的多，我们应该给他们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你说我的左倾思想，和我祖母从小给我的薰陶和教育显然是分不开的吧！”

“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

本来，1940年国新社的业务有所发展，还准备在1941年初年会上布置新的任务。沈老的女儿沈谱在金陵女子大学学习期间1937年随父亲从南京辗转到达武汉，就开始从事救国会的抗日救亡工作。长江和沈谱由邹韬奋介绍经过共同战斗、相互爱恋、志同道合，两人同是救国会会员，即使在热恋中也都是在事业上互相帮助和勉励。沈老对长江的为人和才华也很满意。所以他俩在1940年12月10日结婚时，沈老特在来宾签名薄的首页上题赠贺诗：

“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祝吾婿与女，黾勉同心结。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愿吾婿与女，善葆金石质。挽手赴前路，艰巨如山积。鸡鸣怀古训，毋恋衾忱热。河山共举目，战鼓犹如雷。行俟胜利日，轰饮合欢杯。”

婚后一周，长江因去桂林总社主持召开国新社年会而和沈谱暂时离别，没有料到的是，刚进入1941年新年，就发生了“皖南事变”，又因蒋介石密令逮捕长江，而使这对新婚夫妇天各一方，从此开始了“走马灯”式的离乱生涯。

范长江抵达香港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更加险恶，沈谱也受到特务的监视，党组织决定她尽快秘密去港。沈谱离别父亲后，在李济深的帮助下飞到了长江的身边。不料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又将陷入敌手。长江既要在炮声隆隆中为《华商报》出报坚持到最后，又要筹划应变措施，夫妇两人经常在离乱中失散，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就设法离开香港去澳门，又在中途怒海风涛中到一小岛忍饥挨饿地避风达24小时。这对患难夫妻本想重回桂林再转解放区工作，可是重庆来电说蒋介石又二次密令通缉长江，要他立即离开

桂林到新四军。可是此时蒋介石已经派人到桂林抓长江，夫妇两人同行已不可能，只得留下沈谱打掩护，好让长江一人秘密逃离，而沈谱仍回重庆照顾父亲，待到当年8月下旬长江安抵苏北，沈谱才化名改装，横跨6省，利用各种交通工具乃至步行，跋山涉水，万里寻夫，好不容易才到达新四军根据地、盱眙县大王庄和长江团聚。这对患难夫妻能在如此艰难曲折过程中始终坚贞不渝，是和沈钧儒本人一贯的身教言传分不开的。

良师益友范长江

我的一生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三次在范长江领导下工作。第一次，1939年8月，我们从上海流亡到达桂林，是范长江委托张铁生接待我们，并帮助我们分别安排在各个进步文化单位工作，而我和陆清则被分配在长江领导的国新社工作，又是在长江鼓励介绍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国新社艰苦创业中长江对我十分信任，分配我担任国新社重庆办事处经理；《皖南事变》后，长江在自己处于危急环境中，介绍我找沈老协助设法到延安，在我参加《解放日报》工作不久，社长博古曾要我筹组国新社延安分社，以弥补新华社发稿之不足，并邀请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柳湜担任分社社长，取得柳湜同意后，博古又介绍我找叶剑英参谋长，请总参电台发报给香港国新社的范长江，以便联系商讨筹组国新社延安分社事宜，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情况发生变化而未果，但也从而说明党中央是非常重视和关注范长江所领导的国新社事业的。

第二次是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由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范长江和廖承志、钱俊瑞、石西民等奉命由国民党统治区调回延安，分别担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领导，长江又成了我的领导者。当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夕，就是范长江亲自分配我担

任西北野战军首任随军记者，也是他谆谆教导我如何当好随军记者，并在范长江领导下参与了转战陕北的随军报道。

第三次是我随习仲勋从西安调到北京以后，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担任习仲勋秘书期间，范长江则是文委的副秘书长，怎样当好秘书工作，又受到他直接的亲切的指导。

在我一生的革命生涯中，能够分别地在抗战初期、解放战争初期以及建国初期三个历史阶段都在范长江直接领导下工作，确实是难能可贵。他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使我十分悲痛。近年来，每逢中国记协集会，或国新社老战友聚会，或纪念范长江的座谈会，每次和沈谱相遇，总是倍感亲切。1990 年沈谱花了很大的精力，邀集长江生前密切交往的老将军、老战友、老新闻工作者们，在胡愈之、夏衍等 70 多位作者支持下，编著出版了《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范长江纪念文集。我也应邀拟写了"转战陕北中的范长江"，在此之前，我还曾分别给湖南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出版的《国际新闻社回忆》一书写过"国新社往事"，和 1991 年 1 月的《中国记者》杂志写过"范长江的道德修养"。我总觉得范长江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沈大夫和沈师母

这是我和他们相处时最亲切的称呼。

真是无巧不成书。当 1984 年我搬进西便门外大街国务院宿舍时，我住在第四组，沈谦、张绚夫妇住在第五组，成了亲密的邻居。见面不久，就知道他们是沈钧儒的长子儿媳。沈谦是中南海门诊部内科主任。我有四个孩子，经常有些病痛，不论白天晚上，一找沈大夫，总是药到病除。特别是 1958 年夏天，我的小女儿田红，生下 4 个月的时候，因为吃了不干净的牛奶，害了"中毒性痢疾"，上吐下泻，保姆一人在家，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就是邻居沈大夫

出的主意，让保姆赶快雇三轮车到儿童医院挂急诊；同时，沈大夫马上给我打电话，要我立即去儿童医院看孩子。当我们夫妇两人坐汽车赶到复兴门桥西的十字路口，正遇到保姆带小孩乘三轮车往北，停车一看，只见孩子咀唇发青，两眼往上泛白，已经危在旦夕，我爱人见状竟急得哭了，赶紧同到儿童医院急诊抢救，还算及时，转危为安，住了一个月医院，才算治好出院。就拿这件事来说，我们对沈大夫当然是感激不尽的。从此，我家和沈大夫家来往不绝。因为他经常告诫我们，要注意日常生活中的清洁卫生和防病重于治病的道理。他还深情地说明，沈师母为什么从来不害妇科病的原因。这也是和作为丈夫的必须遵守的道德卫生规范分不开的。

沈大夫特别吸引我们一家大小的，还有他珍藏多年好几大本集邮册。每次欣赏完毕，总还要让我们在他多余的邮票中随意挑选一些送给我们。当时我们最喜欢的是匈牙利花鸟鱼虫邮票，特别是天真活泼可爱的成套儿童邮票。从此，使我们也产生了集邮的兴趣，星期天跑邮票公司的机会也多起来了，使我们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雅趣。从此以后传到我们4个儿女和他们的爱人，以至今天我们的孙子、外孙们，也懂得了在这方寸之中寻找乐趣。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我的大儿子田平的爱人杨惠兰的外公姜治方，原来是解放前夕国民党驻波兰的大使，是第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外交官，也是一位集邮专家。他于1944年在葡萄牙举行的首届国际邮展时，曾经送展过旧中国的大龙票、小龙票和实寄封1000余枚，而荣获金质奖章。1957年姜治方参加莫斯科邮展的展品在北京展出时，沈谦曾去参观，感到得益不少，从而写信邀请姜治方到家中参观沈谦的集邮。两位集邮专家在言谈中才知道：姜治方和当时国民党驻比利时的大使钱泰十分友好，而钱泰乃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的侄子，又是沈钧儒老先生的表兄弟。解放后，沈钧儒和周总理谈到钱泰时，周总理曾说："钱泰若愿回国，我们也是欢迎的！"（见姜治方著《集邮和我们生活道路》第80页，外文出版

社 1982 年 7 月出版。)这也是"以邮会友"中一段佳话,也是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一个镜头。

作为沈钧儒的长子沈谦,当年 41 岁,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于 1924 年回国后,历任医师及医学院教授等职。沈钧儒因"七君子"案于 1936 年 11 月 23 日被捕关押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长达 851 天。在此期间,沈老从狱中给沈谦写了 100 多封信,凡是有关狱中生活困难、医治疾病、聘请律师办理辩护以及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联络、沟通讯息,乃至当时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经过沈谦医师这一合法身份进行内外联系。沈谦生性勇敢机智,不畏强暴、胸怀爱国大志,经常协助、掩护其父进行革命活动。"七君子"冤狱期间,更是四出奔走,配合组织,参与营救活动,为"七君子"的获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沈师母张绚,浙江海盐人,幼年从读女子小学,和沈谦结婚后,一直操劳家务,教育子女,虽为家庭妇女,但为人和霭可亲,温文尔雅,与人交谈,总是慢条斯理,印象中是颇有教养的女性。最近一经了解,原来她还是当年和康有为同时参加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张元济的堂侄女。张元济创办商务印书馆,也是颂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反对内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张绚自幼随母亲长期寄居舅家,她舅父载陈霖,曾任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和驻国际联盟大使,也是书香门第,名门望族。可以想见,张绚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养成这种大家风范。我于 1990 年搬回国务院宿舍,沈师母还健在,和人骅、秉德同住一起,经常上下楼梯散步活动。见面时总相互问好。不幸她于 1992 年 12 月病逝,享年 97 岁。

50 年代我们在国务院宿舍作为邻居时,相互交往颇为密切。我于 1961 年秋调到陕西工作,虽则暂时分离,仍经常互通音讯,互赠照片,互致问候,互通近况,回忆往日的情景,可说情真意切。

1965 年秋,沈谦儿媳周秉德随丈夫调西安市轻化工业局干部

科工作，秉德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遵照总理的一贯教导，晚辈们无论到那里都自觉地不暴露这个身份，以免引起下边的特殊照顾。但沈谦总觉得儿子沈人骅时在关中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秉德单身在外工作，人地生疏，难免发生意外无人协助而不放心，所以特地写信给我，说明原委，希望我对秉德多加关照，让她节假日也可有个熟人来往。在此期间秉德曾到陕西日报我家，还陪同她往访沈谦留学德国时的老同学、西安医学院的陈作纪教授，转达沈谦对他的问候，畅谈了当年留德学习的同学情谊。

1972 年"文革"后期，我和老伴延玉珍一起从西安到北京探望老战友，也曾拜访沈谦夫妇，他们仍居住在国务院宿舍第五组，居室布置一如往昔。我们互相交谈别后双方经历，特别是"文革"中的遭遇，幸而双方都还健在，劫后余生，都以向前看精神迎接未来的辉煌相互勉励。他们留我们便饭，边吃边谈，倍感亲切。他曾说他家祖上九辈都是活到 90 岁左右的老寿星。他相信自己也能长寿，没有料到是 1977 年他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时年 82 岁。我为他早逝而悲痛，并永远想念着他。

沈老的孙子谈沈老

沈人骅，是我所认识的沈钧儒五代的中间人物，他出生于 1930 年 3 月。他 6 岁时，就眼看着凶神恶煞的警察半夜敲门把爷爷抓走，接着，他经常跟着父亲沈谦一起去探监，去看望因爱国有罪而坐牢的慈详的爷爷。这对小人骅稚幼心灵的刺激是很深的。他从幼年、青少年直到成年，直接受到祖父的言传身教。至今仍信守不渝的至少有三点：(一)爱国主义思想是最基本的；(二)为人要正直无私、坦坦荡荡；(三)民主作风、尊重妇女。1951 年，年方 21 岁的沈人骅，正在大连工学院电机系一年级学习，眼看着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觊觎我新生的共和国，他激于爱国义愤，

毅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响应祖国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但是，他深恐受到父母的阻挠，(因为他是独子，沈谦夫妇原来还有两男两女，均因政治环境和经济困难而幼年夭折)，所以只有直接报告祖父，获准后瞒着父母去参加了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志愿军空军，担任地勤工作。地勤人员虽则没有跨过鸭绿江，但在严寒的东北后方基地，在设备简陋的野战机场生活还是相当艰苦，工作也是很紧张的，不说别的，手指和鼻子经常冻的僵硬而发白。40 年后，眼看着同学们升学深造、成为教授、总工，人骅依然坦然地无怨无悔。

人骅回忆祖父的一生，完全是为了争取国家和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因此，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充满着浓厚的民主自由气氛。他说："我祖父即使对待儿孙晚辈，从来不兴强迫命令的家长作风，总是相互协商办事，在工作上对待下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他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办公室内，即使是公务员进来给他沏茶，他也总要起立相迎。妇女在旧社会受到几重压迫，是谈不上什么地位的。人骅说："我奶奶虽则文化很浅，但为人通情达理，很受到祖父的尊重。祖父最痛恨旧社会摧残妇女的陋习，如缠足、纳妾、蓄婢等。他俩结婚后，我祖父首先鼓励她放足，到女子学堂念书。人骅举例说："我五公公(祖父的五弟)去世后没有孩子，我祖母当即作主把第二个儿子过继给弟媳妇；我四公公因不满家庭婚姻而出走，我奶奶当即收养了四奶奶刚生下尚未满月的女孩儿。像这样的家庭大事，都是在我祖父外出时，祖母一人独立作主。由于祖母的主张合情合理，所以祖父也总是同意的。说到沈老尊重妇女的传统家风，人骅认为这是使家庭和睦亲爱的根本条件。他说："我母亲张绚嫁到沈家后，祖父对儿媳妇也很尊重。所以我母亲曾很有感触地说：你爷爷对我比对他的女儿还要好！所以我嫁到沈家以后，好象到了另一个天地。沈家人个子不高，我感到自己似乎也高了一截。爷爷还让我把从娘家陪嫁过来的丫环李霜生，收为养女，长大后又

帮助她出嫁”。当然，可以想见，这种代代相传、民主自由、平等和睦的家风，势必影响到当前以人骅、秉德为中心的三代人的家庭生活。而且，更为可贵的是，秉德还带来了闻名遐迩的周恩来总理对婚姻、家庭、晚辈的教导。

人骅和秉德的婚恋

1963年，人骅在济南第五航空学校任教，为母亲的眼看儿子33岁还未成婚，未免有些着急。同楼的邻居何谦，是周总理的秘书，因人骅很少回家，相互并不认识。

那年沈老病逝，人骅回家奔丧，何谦看到沈家还有这么一个大小伙子，心想周总理的亲侄女周秉德那年也26岁了尚未结婚，就从中作了个牵线搭桥人。当人骅返回学校后不久就收到父母的来信，说何谦给介绍个对象，女孩子是个小学教员、共产党员，长的既不美也不丑，云云。信中并没有说明她是周总理的侄女儿。人骅说：“如果当时说了这一点，我还不会接受呢。因为以往接触过的所谓‘高干子女’中有的那种盛气凌人，娇生惯养的习气我才受不了呢！而且，我们也高攀不上。”后来在1964年春节回家，在何谦家结识了秉德，来往了一段时间，相互印象还不错。直到去到秉德家，才知道这个关系。那时秉德刚从朝阳区金盏公社搞社教骑了两小时自行车才回家，累的往床上一躺，就这么随随便便谈了起来。看来，秉德的确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一点娇气。不用说，秉德从12岁起居住在伯伯的西花厅家中，十多年来，受到伯伯和伯母的亲切教导，那有一点“高干子女”的气味。在秉德说来，过了20岁以后，曾相继给谈过几个对象，周总理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的精神有两条：一是晚婚；一是：“这事要你自己作主！”从来不加干预。由于秉德觉得不合适而一个个中断了。现在，眼前这个沈人骅，为人忠诚老实、正直可靠，也是共产党员，曾两次荣获三等功；而且他又是革命左派

旗帜沈钧儒的孙子，伯母再三说："这个家庭我们是了解的！"就这样，经过一段密切的交往，1964年的国庆节，人骅和秉德就喜结良缘。简朴的结婚仪式就在国务院宿舍沈谦家举行。中午，双方的亲朋好友前来祝贺，伯母在秘书张元陪同下也带了丰富多采的礼品前来道贺，有糖果合、茶具、绣花被面等等，特别是伯母亲自拍摄的那张庐山含鄱口风景照（这张照片曾在《中国摄影》月刊发表过），一直摆在西花厅周总理的客厅。这是伯母临走时，伯伯专门拿出来送给的。如今还挂在人骅、秉德卧室内，作为永恒的纪念。

周秉德，周恩来总理三弟周恩寿（字同亭）的长女。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没有子女，秉德在嫡亲侄辈中年龄居长，12岁时就经常到中南海伯父、伯母家居住，在亲属中和伯父伯母来往最为密切。

众所周知，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待自己的亲属，既有亲情又很严格，从来是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们经常告诫秉德："你们要靠自己奋斗，不能靠伯伯的关系而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因此，秉德从女附中读书开始，即使同学中经常有家里的小汽车接送，30多年来的秉德从来是骑着自行车进出中南海；寒暑假期间住到西花厅，也到大食堂排队买饭而不吃小灶；参加工作以后，伯母为秉德和妹妹秉宜在中南海干部宿舍找了一小套住房，并声明要秉德用自己的工资支付租金。因为"不能养成你依赖家庭关系的习惯！"像这样亲切而严肃教导下的秉德，自然和普通干部一样。40多年来，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从事小学教员、区委教育、宣传干事；婚后随军，调西安市轻化工局、市工交办以及贵州工厂政治处；调回北京先后任职北京市首饰进出口公司、市外贸总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特别是调任国务院侨办《华声报》副社长和中国新闻社副社长以来，无不以她自身的品格和才能发展而来。她这种朴实勤奋、通情达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作风，和人骅继承沈钧儒老人的传统家风相结合，自然成为了他们美满幸福家庭的共同根基。

从来自大洋彼岸的长途电话谈起

我们正谈话间，秉德突然接到大洋彼岸美国来的长途电话，来话人名叫任玉书，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早年曾在行知中学教书，从来十分尊敬爱国老人沈钧儒，自称是沈老的学生，和沈老的儿孙时有通信往来。她曾和沈老的女儿沈谱有约，原定今年6月来北京相叙，不料近来摔跤骨折不能成行，特来电说明。

说起任玉书，不禁使人骅联想起社科院编撰的《沈钧儒文集》的出版经过。社科院在编撰《文集》后，就因为没有经费来源，三年不能出版。后来被这位任玉书知道了，她出于对沈老的尊敬和思念，慷慨地作出了经济上的资助，这位爱国老人一生著作的《文集》才得以问世。

人骅在1986年退休后，为了使爱国主义的传统教育，和他祖父的家风得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就协助其姑母沈谱编撰《沈钧儒年谱》。在沈谱已经编集了5年的基础上，再经人骅继续查阅大量史料，翻阅沈老生前遗物，查对沈谦的日记、信件。5年中，不分冬夏奔波于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终于使《沈钧儒年谱》在1991年得于出版。现在，人骅正在撰写《沈钧儒传》文稿。至于到时候是否有经济资助的来源，现在还没有眉目。当然，他想无论如何，先把它写出来，有了切实丰富的珍贵内容，相信总会感动"上帝"而如愿以偿。我也默默地祝愿他终会取得成功！

沈老的曾孙和玄孙

沈清，人骅的长子，和冯晓青在北京外贸公司同事时相识相恋，现已有了一对一岁多的双胞胎男孩，乳名嘀嘀、嘟嘟，学名沈羽谦、沈羽诚，这"羽"字表达了希望他们刻苦学习，早日成才，羽翼丰

满，鹏程万里的愿望，更有意思的是这“羽”字直接表达了双胞的含意；而“谦”、“诚”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优良品格。现在这对小双胞正蹒跚学步，健壮活泼，可亲可爱，不仅给沈家带来了双份的幸福、双份的情趣、双份的活力；对四周邻居也增添了份外的欢乐，人人都爱逗乐这对孪生兄弟。邻居们都认为这是沈家的福份，沈家繁荣昌盛的象征。沈钧儒、沈谦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

但是沈清对这位老太爷的英雄业绩，从他祖父母和父母亲的交谈中和抗战史料中，还是颇有所知而深为敬仰的；冯晓青呢？上学时期在历史课中也学习过“七君子”和爱国老人沈钧儒的史诗，小俩口都感到这是作为晚辈的光荣，也是他们义不容辞必须继续和发扬先祖美德的职责。在他们相恋时，晓青开始了解到沈清的家庭背景后也曾有过“高攀”的疑虑。但一经接触，才体会到这是一家富有传统的民主精神和开明风气的和睦家庭。晓青的父母都是中学的普通教师，完全是勤劳朴实的普通百姓人家。晓青喜产孪生子以后，还是她母亲往返照顾的，两亲家相处也很自然和谐。现在小俩口带着嘀嘀、嘟嘟和父母同住一起。日子过的和和美美、甜甜蜜蜜。

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小俩口自己下海作起了他们熟悉的本行，由于善于经营管理，业务开展的相当不错。现在，他们虽则还谈不上什么“大款”之类，但也算是“小康”。他们懂得当前的美好日子完全是由先辈们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拼搏得来的，所以也深知父亲现在埋头笔耕《沈钧儒传》的重大意义。他们希望继承发扬老太爷那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清正廉洁的家风，教育孩子要以有这样的祖先而自豪，而决不能以此自傲；更希望通过《沈钧儒传》把老太爷的思想作风，从他们手里传给嘀嘀、嘟嘟，直到世世代代永远流传下去。

（原载《炎黄春秋》1997 年第 3 期）

第十篇

我想念他们……

年轻人的引路人

——悼念胡愈老

我直接认识胡愈之同志，那是1939年7月，当我们一群流亡青年正处于困境的时候。我们一行11人，满怀抗日救亡激情，逃出上海“孤岛”，经香港、广州湾，从湛江上岸，在连绵不断的雨季中，步行数百里，历尽艰险，来到文化名城桂林。当时，我们在经济上断绝了来源，生活无援，体弱的同志病倒了，何去何从，同行中又都意见纷纷，其中2人由于受不了旅途的艰苦，中途折返上海，3人参加了国民党所属的《桂林晚报》工作。正在这时，我们受到了以胡愈之、范长江、邹韬奋等同志为首的进步文化、新闻界知名人士的关照和爱护，我们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当然，那时的抗日青年对于这几位先辈，从来是十分仰慕的，尤其是对于为营救“七君子”而自请入狱的胡愈之同志更是敬佩不已。他们派来了张铁生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慰问和接济，给生病的同志治病，给我们讲解抗战的形势以及广西桂林的环境，政治上给予鼓励，工作上又作了具体的安排。我们6人被分别安排在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救亡日报》和文化供应社等单位工作。从此，把我们引上了抗日和进步的行列。开始，我和查云卿（查明灏）、杨以廉三人，就在胡愈之同志直接领

导的文化供应社工作。社址在桂林郊外一个风景幽美的施家花园，一幢两层小楼，约有二十来人，其中还有文化界知名的老前辈宋云彬、王鲁彦等。我们几个青年分担着图书资料、抄写刻印等工作。生活简单朴素，学习空气十分浓厚，除了经常听到胡愈之同志直接的教导和形势报告以外，我还清楚地记得，1939 年秋季的一天，胡愈之同志曾亲自邀请了老一辈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到文化供应社作有关哲学问题的报告。徐老运用人的五个指头为什么要大拇指和另四指分立，为什么剪刀要左右相对的通俗比喻，讲解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观点，以致至今仍使我对“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关系还有比较全面的深刻印象。

我在文化供应社仅一个多月，一天，胡愈之同志找我谈话，说明国际新闻社那里的工作需要人，介绍我去找范长江同志，调我到国新社工作。我们虽然分别在几个单位，由于工作上的联系和假日的往来，还是可以经常见到胡愈之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的。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当时几家进步的文化新闻单位，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都有共产党的领导，而胡愈之同志在这几个单位都具有崇高的威望。桂林成为当时大后方抗日文化中心，胡愈之同志无论在思想上、业务上以及组织工作方面，都发挥了他的核心作用。

全国解放后，我调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工作，当时胡愈之同志担负着国家出版总署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领导职务，经常到政务院文委开会，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但我唯恐他时隔多年，初次见面而不认识我，所以不免要唠叨几句，说明在桂林时期，曾在他领导下的文化供应社和国新社工作过，然而他总是亲切地表示，他并没有忘记，而且深情地表扬我们过去走的道路是正确的，鼓励我继续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努力前进！

这些年来，每当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他那慈祥的容貌时，总感到分外可亲可敬。1981 年 4 月 25 日下午，在北京饭店东二楼举行的

国新社在京同志欢聚会上，85岁高龄的胡愈之同志和到会的40多位同志一一握手时，他还能清楚地叫出许多同志的姓名。正如他在那次会上所说的："国新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座的虽然都在北京，但平时很少见面。因此今天非常难得的聚会，我很高兴。"会后，胡愈老高兴地和大家合影，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原载《胡愈之印象记》第282页）

悼念周老

1993年11月24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周培源同志逝世"的消息，真使我感到太突然又太难过了。因为21日那天我还曾和周老家联系过，据警卫员吕波说：周老最近病情还比较稳定。但是请他为新成立的"湛江师范大学"题写校名的事，周老表示有困难。因为他用毛笔写字手发抖，无法执笔，写钢笔字还可以，但用钢笔给一个大学题写校名是不合适的。当然，我说那就不要勉强。我托小吕代问周老好，希望他好好休息，早日康复。没有料到，3天以后，他就走了。25日一早我打电话问服务员小王，为什么周老走得那么突然。小王说，周老昨天早起还到凉台上做操，吃过早饭后说有点不舒服，谁知躺下不久说走就走了！

今年国庆节前夕我到孙越崎老先生家，为孙老百岁寿辰拜寿，得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要播发孙老的电视片，我还专门告诉小吕请他转告周老到时候收看关于孙老的电视。我祝愿周老能像孙老那样长命百岁。事后据小吕说，周老在当晚九时认真地收看了，还对我的关心表示感谢。

周老是国内外著名的大科学家、一代科学宗师，对于他那艰深的流体力学和湍流理论，我是一窍不通的；对于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国家领导人多方面的丰功伟绩，也只是在新

闻媒介中陆续知道一些。但是，对于周老的为人，他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他那种锲而不舍的高度责任感，我在近六年直接接触中深有体会。他确实使我难于忘怀、对我教育深刻、是值得尊敬的良师益友。

始终关怀三峡工程

我直接认识周老的时间很晚，那是1987年5月才开始的。我于1983年离休后，在完成自选的“我国生产力合理布局”和“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课题后，转移到对长江三峡工程问题的研究。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的会议上，曾多次公开强调要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以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出于对三峡工程对国计民生重大影响的关注，我们共同努力，外出调研，撰写论述，并组织有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撰写论文，准备编成专集，供决策部门参考，因而迫切需要请一位有权威的科学家给予支持。有人介绍周老就是一位十分关心三峡工程、并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家。因此，在1987年3月间，我就冒昧地给周老去信，请求他为我们编的论著写一篇序言。5月5日收到周老亲笔写的长达1400多字的回信。他赞成并支持我们出这本书。“但我还有些看法，提出和你们商榷”。他提了七点意见，其中特别是以下两点：

“(1)关于修改书名的问题。因为三峡工程不仅牵涉到能源决策，而且和整个长江流域，甚至全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与社会效益都有关系。根据书内选登文章的内容，可否请把书名稍作修改，概括得宽一些。

(2)我们要明确要求把长江上游建坝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具体方案制订出来，和三峡建坝的方案相互比较，哪个方案比较合乎四化的需要，然后作出决定。”

此外，周老还对三峡大坝在丰水期和枯水期发电容量悬殊如何解决，大型工程的模拟试验与实践之间的误差，调查国外大型工程要求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总结葛洲坝建设规划中的经验教训以及确切计算工程建设经费等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根据周老的宝贵意见，把原来定为《三峡工程与能源决策》的书名改为《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书名的问题，也是涉及论证三峡工程的指导思想问题。也就是究竟以三峡论三峡呢？还是从宏观决策上加以论证？我们就是本着这一指导思想相继编辑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四本论著；又根据周老的指示，我们在第一本《论》中编列了《2000年中国水电发展的设想》、《长江流域干支流开发程序》、《得天独厚的四川水能富矿亟待开发》以及《优先连续开发乌江水电的优越性》；以后又在《再论》中专列了“别论”一栏，编发了《应加快长江上游支流综合开发治理的步伐》、《加速岷江综合开发的建议》、《澜沧江流域水电经济开发综合考察报告》、《加速乌江干流水电梯级的连续开发》、《加速西南六大水电站开发的建议》等专论，用充分的事实说明我国真正亟待开发的水能资源十分丰富。说明周老要求多方案对比论证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正如周老为笔者拙著《秋实集》所写序言中所说的：“几年来，围绕三峡工程上马时机问题，国家广泛征求意见。对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特大工程，能够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真是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大力支持开发大西南

1989年5月，周老亲自主持了大西南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研究论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可行性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同意，并列入了国家“八五”计划。根据九三学社参政

议政这一重大建议，周老又大力支持我们编撰《开发大西南》丛书。为丛书提供了九三学社这一建议的原文，周老致江泽民总书记的函件，以及国家计委为贯彻九三学社这一建议的研究报告；周老又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指出：1. 大西南是一块亟待开发的资源宝地；2. 大西南是我国人口众多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缩小与其它地区的经济差距势在必行；3. 大西南是维系长江、珠江生态环境的根基；4. 大西南是我国面对东南亚和南亚开放的前沿阵地；5. 开发大西南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序文不仅为我们编撰这套丛书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开发大西南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取得了国家和西南各省区党政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两年时间内，在九三学社所属的学苑出版社协助下，编辑出版了包括“综合卷”、“地区产业卷”、“四川云南卷”、“贵州广西西藏卷”、“纪实卷”和“联合开放开发卷”共 250 多万字的六卷丛书。

为了取得九三学社中央领导组织上的支持，周老曾亲自主持在九三中央召开两次会议，进行具体安排，聘请九三中央两位副主席徐采栋和赵伟之担任《开发大西南》丛书的顾问。

良师益友

六年中，不论我有事找周老，或周老有事找我，都由周老亲自接听电话。他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最后总要客气地道声“谢谢！”在此期间，从 1987 年 5 月到 1992 年 10 月为了支持我主编出版的十本论著，我收到并保存的周老亲笔信函 27 件。几乎每个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的指示，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直到文字、数字、标点符号，他都一丝不苟地给予指点。编撰顾问林华、水利水电专家陆钦侃以及林发棠和我先后到周老家向周老当面汇报请示达 10 次左右；尤其使我感动而不安的是，有多次临时需要听取周老的意见或他有材料交给我，他知道我用车不太方便，常是在他参加全国政协

有关会议前后，亲自到三里河计委宿舍登上三楼到我家面谈。而这时周老已经是耄耋之年。直到1991年周老一次病愈出院后，从美国回来的周老女儿周如玲到我家说明周老已年近九旬，健康状况欠佳，要我尽量少找周老请示联系。因此，近几年除了重大节日和林华等同志前往看望周老以外，就很少打扰他了。但在去年国庆节期间，当他得知我们编辑《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出版社要求我们自费支付印刷费时，周老就派他的司机申师傅送来300元，并写便条表示支持。

万万没有想到，在我离休之后，竟能遇上像周老那样一位对人体贴入微的伟大的科学家，真是对我莫大的鼓舞，大大激励了我要更好地发挥老有所为的精神。1989年11月30日他写信给我，既对我荣获“老有所为精英奖”表示祝贺；又极为赞同我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所写《延安精神不能失传》一文的观点，并为我题写了“实践延安精神的楷模”的赞词以资鼓励。啊！周老，您真是广大后生学人的良师益友！

（原载《群言》1994年第2期）

胡耀邦谈鲁迅杂文

耀邦同志逝世5周年了。22年以前那次谈话，却始终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1972年夏，我从西安来到北京，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由于耀邦同志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我作为陕西日报的副总编辑，和他打过几次交道，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所以就想去看望看望他。

那时候，林彪已经自取灭亡，"文革"热浪有些降温，但"四人帮"还在台上。我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爪牙"，虽则已经查无实据，但并未获得解放，也没有被分配工作。当时我们还不可能了解江青、张春桥之流就是"四人帮"，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反感。特别是1972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突然改变了口号，把原来一段很短时间批"左"又变成了反右（按：1971年9月林彪垮台后，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新闻单位和舆论机关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但，很快"四人帮"就指出林彪是"形左实右，右得不能再右了"，要继续反右），也使人莫名其妙。总之，满脑子的疑团解不开。

刚到北京，我先到协和医院看望耀邦同志，表示慰问和思念之情。不久，他出了院，我和我爱人就到八面槽富强胡同他的住宅去

看望。当时，他还是被赶住在后院，我们是从旁边的小门进去的。没有料到的是，一见面，他就朗声拍案而起：

“田方，你来的正好！你看鲁迅《伪自由书》中这篇文章写的多好！”只见他在那篇《“有名无实”的反驳》文章中，用红铅笔划了好多道道。

这是鲁迅就1933年5月17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报道所写的一篇杂文。一位特约通信的记者访问了从长城抗日前线调防下来的一个排长。那个排长对国民党当局花了三四十万元在前线构筑了阵地及掩蔽部，却因为长城的一个要隘冷口的失陷而不战而退，深表痛心。原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值得称庆，结果事与愿违，不禁感叹：“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

鲁迅就是对这件事发的议论：“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得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第三，……，第四，……。”鲁迅怪那个排长：“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疾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弄懂的。”

耀邦同志是那样高兴地把他发现的这个道理告诉我：“田方，你看，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林彪那套主义不是还在台上吗？”

啊！真是一针见血。我来时正要向耀邦同志请教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那天，耀邦同志还说，他在西安时，被左倾分子整了以后，“我就害了怕，从西安开小差到了北京。其实，怕什么呢？我就顶在那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所以，你也不要以为我胡耀邦有什么了不起，人没有武器是不行的！”

是呀！林彪灭亡以后，我作为“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爪牙”，为什么迟迟不能平反、不能解放!？甚至当时的陕西日报上还时时出现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文章，我似乎也有点明白了。

鲁迅这篇文章已经过去60多年了，耀邦同志那次谈话也过去20多年了。时移境迁，今非昔比，但是，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即使留下一点“左”的或右的残余，也还是有它一定的土壤的，这是不足为怪的。这也可以使人们有个比较，要不然，也难于显示出正确的正确来。问题是，人们不要像那个痴呆的排长那样，不懂得究竟是谁“有名无实”。

写完这篇短文，正好看到“羽田孜当选日本新首相”以及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衷心祝贺”的新闻报道；又在当天《参考消息》上看到法新社东京4月22日电：这位58岁的政治家去年说：“我们应告知我们所有的儿童，他们的前人在过去通过发动战争做过什么事情，否则，人民的头脑将继续是模糊的。”不说别的，我对羽田孜这番话就很赞同。这不仅大大有利于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且，这话对我们也大有启迪：“我们也应该告知我们所有的儿童，他们的前人在过去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做过什么事情。否则，人民的头脑也将继续是模糊的。”

（原载《炎黄春秋》1994年第10期）

怀念高天同志

白血病夺去了我的一位多年的老战友、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同志的生命，实在令人痛惜！

从年龄来说，高天同志比我大一岁，可是就革命新闻工作的阅历讲，他则是我的前辈了。我于1939年参加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当资料员时，他已是多次和范长江等同志转战沙场的战地记者了。

1940年5月，国新社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渝办）被日本飞机炸毁，人员虽无伤亡，但衣被、日用物品，已一无所有。当时我在桂林国新社总社担任会计，深得长江同志的信任。他派我携带总社同志们捐赠的两大箱衣物，代表总社到渝办进行慰问，并委派我担任渝办经理。实际上，是让我协助渝办领导人于友同志经管渝办有限的经费，办理通讯稿的发行，为通讯员、社友、撰稿人服务，以及诸如后勤杂务，以便于友、高天和同志们可以集中精力办好新闻宣传业务。

当时，重庆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渝办地处嘉陵江化龙桥对岸的猫儿石，在半山坡的一片平地上盖起的一座两层楼的木板房里，南望复兴关悬挂的防空警报球，经常是由那位做饭的四川妇女发现后高喊："又挂起了！"我们才收拾起来跑警报。我提着现金和账

本，于友、高天提着文稿，从猫儿石下沟隐蔽。高天同志是于友同志的得力助手，又是新闻业务骨干，而对我们搞行政工作的人，总是积极支持而平等相处的。他那清癯的脸庞上一架眼镜，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见人说话总是含笑示意，平易近人而又诚挚亲切。

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时，高天同志和长江同志去桂林总社参加第二次年会。事变发生后，国新社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亲共宣传”的罪名被封闭。高天受范长江委派和杨赓一起返回渝办，负责应变措施，疏散、安排人员。当时重庆的反共政治气氛已经十分紧张。渝办已成为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点，在我们办事处四周，白天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巡回，我们只能于深夜在室外焚烧一些有可能被视为“异党宣传”的文稿和书刊，包括当时塔斯社的通讯稿和《苏联画报》等都付之一炬。经高天同志和刘尊棋、陆诒、石西民、徐迈进等同志联系洽办，渝办的同志有的经香港到上海转至新四军根据地，有的转向南洋，有的就地隐蔽。我经老河口、南阳到洛阳，又经西安到达延安；高天同志则以公开身份留在重庆担任《南洋商报》的特约记者，继续向当时在新加坡的刘尊棋寄发通讯稿。转移到天南海北的国新社战友们，仍继续坚持他们抗日救亡、团结救国的进步新闻文化工作。我到延安参加《解放日报》工作后，曾在社长博古的授意下积极筹划建立国新社延安分社的工作，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和长江同志联系中断而未果。

1978 年，我从陕西日报社调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知道高天同志已经担任民盟中央领导，成为胡愈之同志的得力助手。其间，国新社几次纪念性集会，也常和高天同志见面，当时，胡愈之、张友渔、黄药眠、刘尊棋等国新社老领导都还健在。高天、于友和我虽也 60 多岁了，但我们还算比较年轻的，因此，集会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大多由我们联系安排，相处时感到分外亲切。

1983 年我离休以后，主要从事对我国人口迁移问题和长江三

峡工程、开发大西南等课题的研究和编著。二者都和民主党派的学术思想密切相关，因而，很自然地又得到高天同志的协助。我们曾在一起促膝谈心，他不仅很同意我的有关观点，而且总是给予热情而具体的帮助。

没有料到，在我们共同参加纪念国新社成立50周年欢聚之后就成了永别！

（原载《怀念高天》第83页—85页，
群言出版社，1995年6月。）

共产党的诤友孙越崎

1995年12月9日，距离阳历新年还有20多天，我想到了应当首先向尊敬的孙老寄赠贺年片，这已经是我们相识10年来的惯例了。没有料到的是，寄出贺年片的第2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发了孙老病逝的讣告。这太突然了，想起这10年来他对我的教导、鼓励、关怀和支持，使我太悲痛了。

像我这样的晚辈，怎么能认识孙老这样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老人家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984年3月，我从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中国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和著述，转移到对长江三峡工程问题的研究。1986年10月，我应邀到武汉参加了"联合开发长江发展战略研讨会"后，搭长江轮船专程到岳阳、沙市，经宜昌过葛洲坝到秭归，对坝区的移民试点进行了调查。调查归来，在"顾问"国家计委原副主任林华同志和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同志的领导下，筹划编著《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正在此时，年已92高龄的孙越崎，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调查组的同志们，一行10人，对长江上中游进行了38天的实地调查，并在1986年10月联名写出了长达1万多字的《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份颇具权威性的报告共分4部分：(1)考察国内外治

水历史说明三峡工程设计不对头；(2)三峡工程概算埋伏特大，实际占用资金为概算的6倍以上，埋伏着严重通货膨胀的祸根；(3)三峡工程利用外资，有招祸的危险；(4)三点建议：1、整治与疏浚相结合，大力疏通长江；2、借鉴美国和联邦德国治水经验，在长江各支流上实行梯级开发；3、开发水电必须先易后难。接着，在1986年12月水电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孙老又以同样的题目发表了长达1.5万余字的讲话，内容包括：(1)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2)发展水电要先支流后干流，要水火结合，因地制宜；(3)川江"航运第一"，在泥沙问题未解决前，应先整治航道。孙老的结论是："三峡工程最大，工期最长，花钱最多，是长江开发中的主体工程，但决定什么时候上，要看条件成熟了没有。这里最主要的是个先后次序的指导思想问题。"孙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语重心长地说："我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并响应'知情出力'，争取做党的诤友的号召，以93岁老人一颗赤子之心，率直发言。"

上述的调查报告和孙老的发言，都编进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1987年11月湖南科技出版社)一书中。如今温故知新，两篇文章的真知灼见，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著名的专家学者和海内外舆论界纷纷发表评论赞颂此书；并有更多作者继续给我们供稿。因此，我们又相继筹划出版《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由于林华同志和孙老同住在木樨地24号楼，因此，我有较多机会拜访孙老，既向他请教，也受到他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认为我们能够组织众多的专家学者以及舆论界从各个方面全面地宏观地论证三峡工程，并编辑成书，公开出版，对于他的一贯主张，也是有力的支持和配合，这对于国家的最后决策是大有好处的。随着交往增加，彼此相知日深。在此期间(1988年至1989年间)，孙老为了草拟有关三峡工程的

文章，曾经多次与我在电话中长时间（每次均在半小时左右）交谈。他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谈吐有序，经常使我唯恐影响他老人家的休息和健康而欲罢不能，往往是电话中听到他夫人王孟仪同志的婉劝方止。

就在像孙老那样众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终于继续出版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1989年3月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书中又编进了孙老的《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治理长江黄河的光辉教导》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两篇大作。

从1988年4月19日到5月16日，我随林华同志率队对澜沧江流域中下游的资源情况进行综合考察，一行30多人，行程3000公里，收获十分丰富，考察结束时，取得同行的专家学者们的支持，又以林华同志为顾问，编辑出版了《澜沧江——小太阳》一书（1989年3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孙老又为此书撰写了题为《水色云南》的书评（见1989年5月14日科技日报），指出："澜沧江中下游可开发8个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37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708亿度。作为民间传说澜沧江是太阳的第10个儿子，是名不虚传的。云南省领导据此提出的'电力先行、矿电结合、对外开放、综合开发'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孙老从而进一步指出："利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澜沧江中下游水能资源的梯级开发，是完全可能的，也一定能够开创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开发西部地区资源、实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新路子的！"我们编辑《澜沧江——小太阳》一书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仅仅以云南一条江的梯级开发的综合效益已相当于一个特大型的三峡工程，如果从整个大西南丰富的水能资源的开发，三峡工程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就更清楚了。孙老的书评说明了这个精神。

1989年秋，由于我离休后作了一些贡献而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我的工作既然取得了社会上的认可和鼓励，因此，我趁学苑出版社出版我主编的《开发大西南》6卷丛书的机会，汇集了

离休以后前8年作品的成果，编著了个人的《秋实集》，又得到了孙老的热情支持。1989年12月，孙老为我这本新著题词："笔耕不已，硕果累累，老有所为，壮志可佩。"既为《秋实集》增添光彩，又是对晚辈的鼓励和慰勉，令人十分感动。

1993年10月和1994年10月，孙老先后赠我《孙越崎文选》和孙越崎传》两本大著，将是我学习孙老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的珍贵史料。10年来，在我主编出版的《论》与《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澜沧江——小太阳》和《秋实集》4本书中，都浇注了孙老关怀支持后辈的心血，使我不仅向他学习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一丝不苟的调查研究精神；更可贵的是他那种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为党为国的坦荡胸怀，更是我辈需要认真学习的。正如他儿子孙大武同志在孙老逝世后，对香港《文汇报》记者访谈中所说的："我父亲对三峡工程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一个工程的决策，究竟是否符合民主化和科学化精神，相信历史最终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原载《长忆百龄翁——孙越崎纪念文集》
第303页—306页，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12月）

大西南的儿子陈晓同志

我能够在耄耋之年结识象陈晓同志那样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优秀青年、真是我晚年的一大幸事；然而，现在要我为他拟写悼文，实在是一大憾事，太令人难受了！

我和陈晓相识，是在为宣传《开发大西南》、包括 6 卷丛书、电视系列片、大型彩色画册等系列工程的共同努力中开始的。

1989 年 4 月，姚依林副总理在七届二次人大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李鹏总理委托答记者问时说："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目前治理整顿期间以及将来'八五'期间，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详见 1989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

在姚副总理讲话以后，我们编著的《论》与《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两书的顾问林华同志（国家计委咨询组副组长）和两书书序作者周培源教授和部分编委共同商议认为，既然三峡工程在近期内、至少在'八五'期间不可能上马；何况我们对晚上缓上三峡工程的积极建议，已经在两本书中作了充分的阐述。现在应当站在更高层次，从开发大西南富甲天下的水能资源入手，带动开发西南地区丰富的多品种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振兴西南，支援全国。从

这样高瞻远嘱的发展战略出发，无须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再作无谓的争论。三峡工程在开发大西南的全盘布局中，自有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这一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设想，正好和周老、九三学社中央，以及西南五省区七方的党政领导的思考完全一致。就在这时，林华向大家介绍了正在为此而努力工作的陈晓，并把《开发大西南》6卷丛书，列入了《开发大西南》电视系列片、《开发大西南》大型经济画册一起，和中央电视台、中国税务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四川记者站共同合作，组成了联合宣传《开发大西南》的系列工程。经过两三年来紧张而艰苦努力，这三项构思宏伟、涉及广泛、规模巨大的系列宣传工程相继完成问世，对开发大西南的经济发展，无疑地已经发挥了它积极的促进作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整个过程中，陈晓奔波于高山峡谷、急流险滩，奔波于西南五省区七方，有关各行各业，奔波于西南和北京之间，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协调、策划谋略工作，进行了艰巨的采访、写作、拍摄工作。充分显示了他年轻有为，有胆有识的骨干作用。

我和他就是在这一亲密无间的合作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从他身上汲取奋发图强、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精神，他鼓励我发挥余热、老有所为、老骥伏枥的精神。在四年多来多次交往中，他帮助我们筹措《开发大西南》6卷丛书的出版经费；作为丛书的编委，他帮助在西南各省区组织稿件，推销丛书；我们共同拜访周老，请周老审核电视片、题词、撰文，和周老合影留念，听取周老的指示；特别是陈晓为丛书撰写的两部电视系列片的解说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脚踏实地，登高望远”。他的工作作风是忠实细致、认真负责的；他的思路是宽阔远大、壮志凌云的。陈晓和江兰为《开发大西南》电视系列片合写的解说词，包括“金凤凰的预言”、“奔腾的太阳”、“神话结果的季节”、“走向现代大交通”、“新的造山运动”、“登

高壮观天地间"、"我们的绿斗篷"、"城市之光"、"你好，印度洋"、"山水撷韵话西南"等篇章。这部电视片在试播以后，就得到了周老的高度评价。周老撰文指出："这部电视片概括了西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40年来为开发大西南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而且明确提出了在大西南经济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对水能资源的开发。"周老还认为这部电视片"对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国情，激发深厚的爱国主义热情是有益的尝试。"

1991年初，在林华主持召开的《开发大西南》丛书编委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本名为《水能兴邦》的文集，这是四川省计经委编辑的对四川"三江"水资源的综合考察报告。这个书名立即引起了我和陈晓的共鸣。我们一致认为："水能兴邦"的书名很有治国兴邦的哲理。这四个字具有双关意义：一是"水"，能够兴邦。特别是我们这样人口众多而又严重缺水的大国，水危机正严重威胁着国计民生，怎样治水、管水、用水、节水，确是和人人有关的国家大事；二是"水能"可以振兴邦国。现在全国能源紧张，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怎样合理地安排水能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但，无论作为"水"和"水能"，如果不讲究客观规律，乱加治理，治理不好，就可能成为"水患祸国"和"水能伤邦"。对这个双关意义理解的对、执行的好，无论对于开发大西南，对于整个国家建设，都可以作出极大的贡献；否则，反其道而行之，就可能成为祸国殃民、遗害子孙。这是不乏先例的。所以，怎样写好这篇《水能兴邦》的大文章，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我们两人的观点确是息息相通的。当时，我正编发《开发大西南》丛书的"纪实卷"的稿件，当即以"水能兴邦"为题，撰写了"编前话"。而陈晓因到四川后，就组织力量筹划拍摄《水能兴邦》的电视系列片。他又亲自为这部电视片拟定了解说词。包括"江流无言"、"群山作证"、"龙腾凤舞"、"太阳之子"、"光荣与梦想"五个篇章。正是他用深入群众、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以及

宏伟壮阔、高屋建瓴的思想风格，才能充分地描绘出“千江百河、独钟四川”天府之国的滔滔江河的不尽水能，“三千兵马、八百诸候”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这支水电战线上的骨干队伍，以及对二滩水电站这座丰碑的崇敬之情，他面对莽莽群山和滔滔江流，启发了丰富的思考，从中找出了肯定答案；他从贵州乌江东风电站工地上为截流而拼搏的水电九局局长俞崇尚之死，写下了为向人间输送光明而悲壮地倒下的生死记录。陈晓作为大西南的儿子，从先民们昂首问苍天，低头叩天地，艰难困顿的历史长河中，从 1912 年在昆明石龙坝建成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开始，从鲁布革水电站揭开水电建设新篇章，从颂扬云南漫湾电站的建成以及澜沧江八个梯级电站的开发前景，预测到：当金凤凰翱翔于云天、神龙起舞于幽谷之际，那从冰峰上飞泻而下的雪水将化作照澈天宇的光明。……他用炽烈的感情，给人们提示了充分的信心。奔涌不息的江河急流，将如一轮升腾的太阳，在水电建设者手中托起，开发水能事业所结出的硕果将属于今后所有的世纪！

《开发大西南》和《水能兴邦》两部电视系列片，在中央电视台反复重播多次，给千百万观众在视觉上留下了清亮而深刻的印象；而两部电视片的解说词在《开发大西南》丛书中为当代和后代留下了永存的丰碑！

1993 年 11 月底，陈晓给我寄赠了一本他和谷雨、江兰合著的《噫，蜀道——从先秦石栈走入现代大交通》长篇纪实文学。扉页上谦逊地写道：“恭请田方老赐教，晚生陈晓。1993、11、28”

这本以继承和发扬当年诗圣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精神的纪实文学，应该也是陈晓少怀壮志的另一座丰碑。四川省作协副主席高缨先生写的序言中作了很好的介绍：“作者以厚重的气势，细致的笔触，翔实的材料，全方位地书写了巴蜀大地上的公路建设。远至商周先民开凿古道，近至当今铺设现代化高速公路。北自雄冠天下的剑门关，南到川滇丝绸之路。上下数千年，纵横三千

里，写出了路的往昔，路的现实，路的未来，淋沥地表现了对路的顶礼膜拜。”陈晓等三位青年作者，满怀真诚的激情，背上行囊，足踏万里，遍访知音，疾书成卷，实在令人尊敬。

陈晓，1991 年经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9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苍天无眼，蜀道无情，这样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正在为开发大西南的水能和道路建设的憧憬中发挥光和热的时候，在“蜀道之难”中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陈晓同志，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上面介绍陈晓的事迹，只是我近四、五年来和他在工作交往中的感触。但我思忖：这么年纪轻轻，怎有这般抱负和才气？最近经他二姐陈德琦的追忆，以及她提供的有关资料，才进一步认识到，陈晓的成就远不止此，陈晓的成就自有源头。

（一）陈晓勤奋好学、自学成才。他虽只初中毕业，但在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中，无论在农村插队、汽车队劳动，或为文学编辑、新闻记者时，无不刻苦用功、积极钻研，所以很快崭露出他的文学天才。1977 年仅 27 岁时，根据他父亲陈孟熙对胞弟陈毅的回忆，撰写 2 万多字的《忆陈毅同志留法勤工俭学前后》一文，就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重视，1981 年经过四川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干部进修班学习以后，更提高了文学创作水平；他又热心公益事业，关心生态平衡，他是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的理事。他先后发表文学作品共 50 多万字。其中《家书》、《啊！白鹭》、《哦！大熊猫》，曾分别获得四川文学奖、安徽文学奖，以及 1985 年国际和平年文学二等奖。

（二）陈晓立志学习陈毅二叔报效祖国的英雄壮志。他根据父亲口述陈毅勤工俭学经过以及面临二叔的教导。对他父辈当年为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卖国条约而被法国政府武装押解回国深感痛恨；对青年陈毅当年听了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

侵华、21条等丧权辱国所激发的爱国热情、受到极大的教育。他对二叔生前那种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胸怀坦荡、博学多才、呕心沥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很深，影响很大；对他二叔和自家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和欺凌，忿忿不平。因此，陈晓作品中气热磅薄、富有激情，是和他学习陈毅二叔那种坚强果断的性格和开朗敏捷的思维分不开的。

（三）陈晓着重于实践中锤炼自己。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无论走到那里，他都能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他曾多次舍己救人。1971年8月四川省供销社车队因雷击爆炸起火，他为抢救一名小孩冲进火海，以致左胳膊被挤断，曾受到成都市革委会的表彰。他曾经骑自行车跑过11个省市，探索祖国河山奥秘，收集大量素材。大大丰富了他的感性认识，加深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正如他生前未及加工的长诗中写的：

“我对你说，大西南，
承受了您太多的爱，
却无以为报。
我对您说，大西南，
我将升腾您高远的蓝天，
做清晨一缕五色的云彩，
把昨夜的渴望，
凸现在今天。
……”

陈晓同志，您那年青的壮志，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94年12月24日。

（原载《纪念陈晓》第206页—212页，四川省陈毅研究会出版，1995年8月）

第十一篇

笔耕选粹

《开发大西南》丛书

“联合开放开发卷”

编前话

我们于1991年9月编辑出版发行《开发大西南》丛书五卷(包括综合卷、地区产业卷、四川云南卷、贵州广西西藏卷、纪实卷)以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和反响。认为这套丛书对于认识大西南,对于指导开发建设大西南的科学决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理论依据。近年来开发大西南的形势发展说明,这套丛书的问世,确是非常及时而深有意义的。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发表以后,大西南各省区党政领导、各族广大干部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思想上得到了又一次大解放,观念上更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快沿海、沿江、沿边改革开放的步伐,并采取了全方位开放促进西部地区开发建设的决策。国家在宏观经济指导上,按区域内在经济联系进行规划,突破了原来的行政区域格局,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省区党政领导

和科研机构又进一步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和经济理论上的探讨。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和更高的层次上，重新认识了省情、区情，以及各自在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和大西南开发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优势、劣势、天时、地利、人和等等因素，提出了更具时代精神的改革开放、开发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措施。

首先是1992年4月下旬，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广西北海市主持召开了“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区域规划”会议。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广东、海南等省区领导，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在北海市共商以经济的自然联系和资源、区位优势互补为纽带的区域经济规划问题。开始在我国确立了第一个中国经济的新框架——西南及华南部分省区的区域经济，从而把开发大西南推上走向东南亚、面向全世界的新境地。

1992年4月底，九三学社中央召开了“第二次振兴大西南经济研讨会”，对大西南岩溶地区扶贫开发、经济发展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具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建议，九三中央主席周培源再次上书江泽民总书记，建议加强开放开发建设大西南贫困的岩溶地区，帮助各族人民群众解决温饱问题，摆脱贫困，走向小康。

接着，7月上旬，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广西沿海地区综合开发规划会议”，根据广西北部湾这一沿海的区位优势，提出了“扩大开放，联合开发，加快建设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明确决策。当前着力加快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高效益、外向型企业；并以“扩大开放，大胆改革，推动大通道建设的全面起步”为规划的指导思想。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会上指出：“把广西建设成为西南出海大通道，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和措施。

7月下旬，由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主持，在昆明召开了五省区七方经济协调会第九次会议。田纪云副总理参加了会议，李鹏总理为大会题词：“希望西南各省区联合起来，加快改革，扩大开

放，走向东南亚”。与会者决心以联合促开放，以开放促开发，把大西南经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田纪云副总理在讲话中提出：“希望西南各省区解决思想，敢闯敢干，力争大西南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走上新台阶。”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西南各省区的殷切期望。

8月5日，由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研究报告论证会”。由马洪同志主持了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到会讲了话，指出：“一定要支持大西南联合起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论证会通过的“研究报告”，对北海市今后十年发展规划的大体构想是：按照建设西南大通道的战略设想，建立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扩建万吨以上港口码头，加速修建铁路，增辟空中航线，加速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努力为西南、华南服务。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兴农、推动林、牧、副、渔及乡镇企业全面发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石油化工和转口贸易，加速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逐步形成支柱产业、基础产业、服务产业相互联络，循序渐进的框架，从而使经济建设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在召开几个会议商讨决策，制订规划的同时，国务院于6月中旬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南宁、昆明及凭祥、东兴、畹町、瑞丽、河口等五县市镇。7月底，国务院又批准了贵州的福泉、荔波、三都、从江、榕江、黎平、玉屏、兴仁、习水、金沙等21个县对外开放。

大西南各省区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在全面启动。来自昆明、重庆、成都等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报告说明，谁占领了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谁就拥有高速发展的生产力。几年来建立开发区的实践要求显示开发区良好的发展态势，必须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雄厚的技术力量；要具有灵活的运行机制和优惠政策；并利用技术、知识密集优势大力开发高新技术及产品。国家确定对攀西——六盘水综合开发区，分为起始期、重点展

开期和全面提高期三个实施阶段，大力发展钢铁、煤炭、有色、磷化工、电力等工业，使之逐步成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能源是国家开发大西南的重点产业。云贵川三省，除在建的漫湾、岩滩、天生桥等大型水电站外，还将在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乌江等江河上建设十多座大型水电站，总投资额是相当可观的。联结粤港澳与西南水电能源基地长达1000多公里50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将于近年峻工，实现西电东送。为了加速大西南开发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大西南的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运输基础建设正在加紧实施。仅南昆铁路总投资就达65亿元，并将提前建成投产。对公路建设，"八五"期间云贵川三省将投资60多亿元，重点建设高等级公路、出海路、出境路。机场建设也正加紧进行。此外如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也正积极改善。

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指挥下，在大西南各省区领导和各族干群的共同努力下，大西南的开发建设，来势很猛，速度很快，已经进入初期的实施阶段，给大西南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少领导和群众的思想观念还跟不上改革开放大潮对大西南的冲击涌动；西南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滞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全；不少地方被人才问题、资金问题、交通问题、风险问题以及旧的条条块块、框框套套所束缚，放不开思想，拓不宽视野，迈不开步子。

在新的形势下，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克服困难，把大西南的开发建设推向新阶段，大西南各省区领导及有关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又提出了新的见解，写出了水平很高的新的学术论著和规划方案，省区领导发表了许多高瞻远瞩的讲话……。

为了适应全国改革开放新形势和开发建设大西南的紧迫要求，为了满足关心大西南开发建设的广大仁人志士的愿望，我们在前五卷的基础上，经过精选编辑了《开发大西南》的"联合开放开发

卷”。我们希望她的问世，对开发建设大西南能起到指导、推动和促进作用，并得到大西南各省区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共鸣和支持。

主　编：田方　林发棠

1992 年 9 月

（原载《开发大西南》“联合开放开发卷”第 1 页—4 页，
学苑出版社，1993 年 4 月）

《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编前话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由于这个工程过于巨大，牵涉到的问题过于复杂，从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军事，直到生态环境等等方面，无不涉及，且无不影响深远。因此对其兴建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如建设方案、工程实施时机及条件、工程科技上的可靠性、工程论证的组织和论证程序，尤其是工程在国家宏观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重大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对三峡工程建设的诸多问题及其利弊得失有所了解，我们曾于 1987 年、1989 年将对三峡工程持不赞同意见的主要论述编辑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两书，受到中外有关方面广大科技专家学者和关心三峡工程的决策者，以及读者们的重视与支持，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并在表决议案中特别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谨慎从事，认

真对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三峡工程的建设更加稳妥可靠”。会议决定批准将此项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关于三峡工程的建设，我们也是同意的，并不存在上与不上之争，只有早上快上与晚上缓上的不同看法。鉴于90年代是我国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刻，在当前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同时面临着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在邓小平同志今春南巡重要讲话以后，全国出现了加快改革、扩大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并向内陆地区推进全方位开放格局和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并按照经济联系与形成对外通道的原则，大西南便可以通过联合开放开发促进区域经济的更快发展，力争90年代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步上一个新台阶。但由于国家财力、物力有限，而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必须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和应兴应革的大事分别轻重缓急与统筹规划，尤其需要抓住时机办好上海浦东开发区建设的这个龙头，以便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的开放开发；促进七大经济区域的综合发展，加快我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进程。这是合乎国情、顺乎民心的。至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不少重大科技问题至今仍存在许多不同看法，尤其在宏观决策上没有取得合乎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可靠保证；若贸然动工，风险太大；还由于建设周期太长，投资过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对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不起积极作用；而且万里长江是四川对外的主要通道，三峡工程开工后，航运必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关系到四川的整个改革开放全局，尤不可不慎重考虑。因此，三峡工程决不是修建一个大坝的技术问题，也不能就三峡论三峡。对它的动工兴建时机有待于认真研究和审慎决策。

为此，我们特将对三峡工程兴建时机及所存在主要问题的看

法辑成《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供党和国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布署时参考。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疏漏与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主　编：田方　林发棠

1992 年 9 月 21 日

（原载《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征求意见稿，第 2—3 页，1992 年 10 月）

为《近代中国移民史要》作序

《近代中国移民史要》，对1840年至1990年中国移民作了历史描述和系统分析。它是对中国近代移民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新著，是对边缘学科填空补白的拓荒之作。

1840年到199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伟大时期。中国移民问题成了这个时期潜在的重大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特别是对当代正在发展发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它有助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调整不合理的人口布局和开发人力资源，有益于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认为这本书有四个显著特点：

（一）历史为经，移民为纬。中国近代以来对人口迁移流动缺乏系统研究，要在杂乱无章和其说不一的历史文献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为揭示150年以来人口大变迁，清晰地勾勒出近代中国移民史总体面貌，作者以历史为经，移民为纬，探索了各个历史阶段移民的特征、数量、流向、类型、原因、作用，总结了移民经验和教训，揭示中国移民规律。比如上篇对近百年移民类型作了系统划分。这就是(1)流人，包括因文字狱而罹难的知识分子；

因“罪”而遣的官僚士大夫；被遣戍的起义民众；触犯封建刑律的各类人员。(2)流民，包括逃灾流民；避难流民；避赋流民；寻荒流民。(3)垦民，包括京旗移垦；屯垦移民；招垦移民。(4)城市移民，包括产业移民；城市贫民。其线条清晰，一百余年间林林总总的移民一经梳理，便令人一目了然。再如下篇对建国后移民的基本经验教训作了高度概括，从移民规律性方面揭示了移民的客观性、条件性、向上性、递进性。从移民的基本原则上概括了系统性原则、求是性原则、生态平衡性原则和文化性原则。从移民关系角度，探讨了移民谋生手段与居住条件选择关系；人口流动与季节关系；产业结构与人口容量关系；交通发展与移民建设关系；安置移民与生产生活方式关系；新社区开发与服务性移民移入关系；移出形式与安置方式关系；移民迁移距离与扎根巩固关系；移民投资与效益关系；思想教育与移民巩固关系。可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说明作者对这方面具有长期调查工作的经验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才能做出这样的科学概括。作者正是通过对近代以来移民历史演变的探讨，为中国移民研究理出了一条基本线索。

(二)三条轴线，勾玄索隐。人口移动类型复杂，流向各异，怎样才能把握住近代人口移动的基本主线呢？作者紧紧抓住“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条轴线，钩玄索隐，着重探讨近代以来人口迁移三大流向特征、原因、作用。可以说，抓住了“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就抓住了近代移民的基本线索。围绕三条轴线，还介绍了其他方面重要移民，比如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陕北的移民。特别是对“下南路”作了充分肯定。这段历史，我是比较清楚的。当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作记者时，曾系统地报道过当时陕甘宁边区热气腾腾的移民运动。当时党中央对解放区移民是非常重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是继承了陕北人民“下南路”的传统习惯发展起来的；成为党克服严重困难，发展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结合部队屯垦，巩固边防的战略措施。不难

看出，三条轴线，贯穿全书。能够抓住这“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条轴线，可以说是作者对中国近代移民研究的重要贡献，也使这本书有了自己的特色。

（三）纵横交织，史论结合。该著述与一般史书不同，在构架上有自己独到之处。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1840至1949年一百余年中国移民演变史，侧重从纵向勾画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移民发展的来龙去脉；下篇介绍1949至199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40余年中国移民现状与发展，侧重从横向剖析当代中国移民的基本结构、基本特征以及一些带规律性的基本经验。从构架上看，同李德滨、石方著《黑龙江移民概要》有相似之处，上篇侧重纵向，史学味浓；下篇侧重横向，人口学与社会学味浓。侧重不是一边倒，而是有兼顾。纵观上篇，述史有论。作者运用考古学、人口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移民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及功能。使史不只是述，而是升华。通览下篇，贴史而论。作者运用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等概念和方法，对40余年移民发展进行剖析。如刀横切，透彻清晰。这种纵横交织、史论结合，既有助于了解移民发展脉络，又有益于把握移民的基本构成。

（四）贵在突破，妙在创新。作为一部学术专著，该书立足于现实，从广度上发掘过去，从深度上开拓现实，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见解。比如通过大量历史文献，较有说服力地估算出清代东北移民数量；提出西北移民的路线，特别是西北移民的职业况状；给陕甘宁边区移民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各省移民过程不平衡性的比较研究；对建国后移民文化特征的相关分析；对80年代流动人口原因的剖析；对建国后移民经验教训的总结，都有独到之处，都有所突破和创新，给人以启迪。再就是在方法上，不是简单地叙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兼及各家之说，提出分歧所在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以供人们思考和探索。比如对海外移民的溯源，介绍了周武王封遣箕子赴朝鲜说；徐福东渡日本说，西汉商路开通时中国海外移民说；魏

晋南北朝时期移民日本的汉族归化人说；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显见，该书不仅有自己独到见解，还能吸纳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使该书更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是从1840年写到1990年，正好150年。我在1994年4月曾向作者提议，可否将此书写到1995年，这样就能把90年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后出现的人口移动问题，特别是年复一年的“民工潮”、水库移民等这些成为当代社会难点的问题写出来，其时代感会更强些。后来我知道，该书因出版经费问题已耽搁了一年，一些原来拟有的重要内容，如个人迁移史研究、国际移民等已割舍了。篇幅与内容受到现实困境的限制。好在90年代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如“民工潮”、水库移民、人才外流、出国热等，李德滨在其近著——本书的姐妹篇《跨世纪大潮》一书中将有专门阐述。

（原载《近代中国移民史要》第4页—7页，
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5月

《延安记者》前言

田方　午人

199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后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又是延安《解放日报》改版50周年。我们汇集了当年延安记者、编辑们的部分通讯、报告、特写和评论，编辑出版这本《延安记者》，借以介绍延安时代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新华广播电台和《边区群众报》记者们的战斗历程，也为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用的经验，以便继承《讲话》和"改版"精神，谱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严峻的年代。当时，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的战略重点从国民党正面战场转移到我各个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一方面对抗战动摇，同时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对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停发军饷，并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和搞军事磨擦。因此，广大敌后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进入一个最困难的时期。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的物质生活遇到极大困难；在广大新、老干部和文艺界人士中间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抓住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克服困难，推进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1942 年和 1943 年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的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①

《解放日报》的整风运动是从改版开始的，又通过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来推动整风和生产运动。1942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共产党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②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那篇划时代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讲话，深刻地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以及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问题，要求文艺界以切实的严肃的整风精神，解决文艺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个“讲话”给文艺界、新闻界和所有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引发了他们思想上和写作上的丰收。

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根据毛泽东的教导和党的方针政策，纷纷深入群众，联系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宣传在大生产运动中劳动人民的英雄事迹，忠实地、及时地记录了这段光荣的战斗历程，起到了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使报纸呈现出一派生机，为广大读者所欢迎。

---

① 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 564 页，中共中央资料出版社，1986 年 4 月。

② 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90 页，新华社出版。1983 年 12 月。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回顾了这段历史，深感当年的经验十分宝贵，不但值得延安时代的记者们很好地总结和继续提高对它的认识与理解，还可以给新闻战线上的年轻的一代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主张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两者缺一不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就是为了新时代更好地发展；新的发展也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的今天，全党、全国紧紧抓住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就全国来说，抓经济建设一手硬，抓思想政治工作一手软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今天报纸的任务同样需要宣传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极其重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路线。象过去抓紧两个环子那样，带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链条，不断夺取新的胜利。这同样也需要利用报纸来宣传我们的成就，批评工作中的缺点，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编辑这本集子，正是为了发扬当年延安新闻界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深入实际、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传统，希望在今天的新闻事业的改革中，作出新的贡献。发扬革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继往开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图，作出新的贡献。

当我们在这个集子里编入 70 多位老战友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时，我们以无比的深情怀念当年的老领导和先后逝去的战友，我们也庆幸还健在的同仁能在这个集子中，回顾往日的风采和战斗历程。清凉山上同甘共苦的朴素感情，是那么纯洁而高尚，是那么真挚而亲切。

这个集子除选辑了当时延安各新闻机构的史实以外，主要是请当年延安同仁自选的一些作品。其中有的是他们采访写作的通讯报告，有的是各自的体会和回忆，有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论述，只是由于篇幅有限，有的文稿只好割爱，未能全部发表，少数文章作了必要的删节，对积极供稿的同志和协助选辑亡友作品的同

志及其家属，表示深切谢意！

（原载《延安记者》第1页—3页 1993年3月，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路魂》——吹来一股新风

女儿给我带来了一本书，名叫《路魂》。路之魂，自然引人遐想。路、公路，特别是陕西的公路，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陕西公路职工文艺作品选，更使我发生兴趣。

路，有人修的路，曲曲弯弯；有人生之路，坎坎坷坷。走不完曲曲弯弯人修的路；历不尽坎坎坷坷人生之路。在转战陕北的战斗生涯中，我随彭（德怀）、习（仲勋）大军开始在山间小路里迂回；继则横穿大路两头伏击敌军；最后就在大道上大摇大摆地追歼敌人。直到取得全国胜利。进城之后，我跑遍了八百里秦川，从潼关到宝鸡的阳关古道；到汉中、安康采访的秦巴山路；还有那“文革”期间到商洛蹲点劳动、走过李自成营地山寨之路；更有缘的是在那“史无前例”中我女儿作为“黑帮”子女，失去了继续求学和进工厂的权利，过早地被招进了陕西公路系统的路工队伍。为父母的耽心弱女子受不了路工的艰苦生活，曾到工地去探望过她。出乎意料的是，那里不仅有着不少像她那样的青年男女，还有更多长年累月操劳的老路工，以及路工队久经锻炼的领导干部，他们以路工们特有的纯朴与诚挚待人。在修建宝鸡渭河大桥的河边营地帐蓬里，受到过他们的接待和慰勉，使我们放心让孩子在路工队劳动锻炼。20多年来，孩子终于在这里成长起来。这是我拿到《路魂》时自己的内心

感受。

翻开这本320多页的《路魂》，里面包涵着一百多位作者的散文、通讯、小说、诗词、书画各色品种，除去书画不能以字数计算之外，平均每篇文稿不到900字。当然，每幅字画也都苍劲清雅，引人入胜。真是一本格调高雅，文笔简洁清新的好书。不论哪个品种，都是小巧玲珑、短小精悍。说她"字字珠玑"，似乎不太确切。我在春节期间几个夜晚在床头读她时，恰如剥开了一只临潼的石榴、一粒粒红艳艳、水灵灵，晶莹剔透，酸甜酸甜。读了一篇再读一篇，尝了一粒再尝一粒，不知不觉几个夜晚就读完这20多万字的作品选。

《路魂》值得称道的是，它真实地反映了陕西3万多公里公路上3万多路工的真情实感，写出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精神，以及他们精神生活上绚丽多采、丰富饱满的新风尚。我想可以概括说明两点：

（一）《路魂》反映了新路工群体中新的价值观，以及他们中焕发出人间真正的爱心。作者们大多来自城乡知识青年，他们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说明他们都曾受过一定的文化教养，如今都在那荒僻山里拼搏。"初为道工"的作者刘贵成写道："当听到一位年近花甲的干部模样的老张说：这条公路是县里通往外边的唯一通道，全县的兴旺和幸福全系在这条路上。交给你们了，拜托你们了！"说罢，还深深地向大伙鞠了一躬。听了老张的话语，我只觉得胸中有股热流往上涌。从那以后，我精神振作起来了。挺起胸、昂起头，在公路上用铁锹挥洒道工的风流，用铁镐开拓道工的追求，用畅通诉说道工的心愿。这就是我找到了道工的感觉了！是啊！如今有多少交通闭塞的贫困山区，由于修通了公路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发展。但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到这就是道工们的风流、追求和心愿！？

是的，当代有知识的青年懂得：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来检验自己

的价值，才能用社会效益来衡量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也就能正确处理个人恋爱、婚姻、家庭和人际关系。“三个班长的故事”作者郭全运，就是用那高尚的情操、可贵的品质来树立起路工的形象。当“躺在大山怀抱里的十四个养路工”听了那三个班长的故事后，就明白了：“没有爱情的生活是缺乏色彩的，但它毕竟还是生活。但是没有路的世界就不成为世界了。把我们的爱献给公路吧！因为人们需要路。”

当代女青年并不都是整天沉醉在卡拉 OK 的欢乐中，也并不总是爱做那粉红色的梦幻，像宁颖芳笔下那样的姑娘，如今虽在公路部门机关工作，但她早在大学时代就忠贞不渝地爱上同学磊。磊在秦岭脚下一个小小道班里当养路工，任凭母亲百般劝阻，她总抛不下那远离繁华都市的那片幽静土地上的磊。“妈，那个道班有什么不好，条件苦点，可以磨炼他的意志，以后与我同患难；再说那地方山青水秀，怡情爽性，我爱幻想又爱写作，……”母亲扭不过这倔犟脾气的灰姑娘，终于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宁颖芳就这样把公路写成了“确实成了我们家的爱情彩带”。

还有象“理解”的作者李继智，写出了他在大街和一位白衣天使的同学相遇。当谈到他是一个养路工时，顿使同学惊讶。但当他介绍了群众对养路工的赞誉后，只表明“养好路就是我们的职责，别人理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那位同学冷不防地轻轻吻了他一下，还说：“假如一个救死扶伤的喜欢一个架桥修路的，这是缘份？还是理解！？”此外，如“爱你无悔”、“医疗室那个女子”等篇章，好的例子不胜一一枚举。相信读者们欣赏之余，就会认识到当今路工们心灵的纯净和洁白。

（二）《路魂》是对“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和“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实践与探索。陕西省公路局党委书记岳培生在书序中介绍：“公路有多长多远，我们公路人的故事和情感就有多长多远。……如果社会上谁对公路人及他们的工作还不甚了解，那就请抽

闲读读这本集子，作品定会帮助你认识和了解他们。”作为一省公路部门的领导，他所以具有这样的信心，就是依据他平时是用怎样的精神来教育、塑造人的。陕西公路战线上的公路人，所以能够捧出一篇篇凝结着汗水和泪水、困惑和希冀的公路文学作品，跻身于文学的殿堂，就在于他们在党的关怀哺育下，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他们在劳动之余学文化、学技术、学知识，使自己的文化素质逐步提高；在劳动之余拿起自己的笔，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自己的心声；也使全社会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这本集子是从《陕西公路报》(旬报)的文艺版上选录的。这份创刊仅两年时间的小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美好的成就，同样是和公路部门领导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分不开的。我们可以从《陕西公路报》上看到，他们是怎样用相当的篇幅来颂扬全省公路职工甘当“铺路石”的默默奉献精神，介绍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和先进经验。特别是报纸的文艺版，是编辑部下了功夫，办得富有特色的一个版面，使得爱好文艺的公路人有一块发表他们作品的园地，并且在这块园地获得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从报纸的文艺版编辑到《路魂》的编辑，已经用充分的事实说明，这些优秀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生活，从不同的角度讴歌了公路人的群体形象；从而又用这种优秀作品介绍出去，使人们受到鼓舞和启迪，再去推动陕西公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用公路人新的思想风貌，凝聚在雄浑壮观的黄河、秦巴神奇秀美的景色之中，缓缓吹来一股新风，冲刷了繁华都市喧嚣的杂音，纯净人们被污染的灵魂。一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路工，仍恋着路，又把他的儿女送进养路工的行列，凝视沉思地说：“人生就是跨越一条条有形无形的路，没有路，就失去了前进的目标！”这是常晓莉写的“选择”中描述的。由于她听了这位老路工的诠释的人生真谛，割舍了“一场四年培植的春梦，就那么飘飘远去。……我留下了，真的留下了！”

我不能笼统地指出她的稚嫩和不足，我只虔诚地祝愿她日益

茁壮成长；更希望专业的记者和作家们，深入到这支桔黄色的队伍里去发掘其中丰富的宝藏！

（原载《陕西公路》报 1995 年 3 月 15 日）

《青春的脚印》是美好的

《青春的脚印》写的是40年代成立的绥德文工团回忆录。30多位作者，都是当年豆蔻年华的团员，由贺鸿钧、贺鸿训姐妹俩主编。我读着读着，不由得把我也引回到了那个时代，那时我是延安《解放日报》派驻绥德的记者，和文工团时有交往，他们所写的人和事、演的秧歌和戏，我也相当熟悉。

一把金钥匙

当年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给《青春的脚印》题写了“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开拓创新、繁荣文艺”。这题词概括了“讲话”的精神，也是绥德文工团实践所体现的精神。习仲勋对绥德文工团的成立、成长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习仲勋为了满足当地群众爱看秦腔的习惯，于是就从他原任党政领导的关中分区的“八一剧团”调来了杨公愚为首的一批秦腔演员，任命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为团长、杨公愚为副团长，又调吴堡县委宣传部长黎智为指导员，足见习仲勋对文工团的重视。1944年夏组成了秦腔和秧歌合一的文工团。在老演员的精心培育下，一批年轻的秦腔演员成长起来了，很快就可以外出公演了。习仲勋亲自参加了由地委宣传部召开

的会议，专门讨论文工团的方针问题。当时习仲勋根据两种不同的意见发表了他的见解：绥德分区 6 个县，人口 50 万，是全边区人口的 1/3。这里群众主要的文娱活动是逛庙会。哪里有庙会，附近群众就去看戏，这是他们的习惯。庙里收入的香火钱就付给唱戏的。过去，这些都是旧戏班子包的。他们不管什么戏都演，只要赚钱。绥德文工团是地委宣传部领导的，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去演，经费负担很大，地委只能拨给 1000 元宣传费；演出时还要动员群众去看，农忙时就会耽误生产。文工团有三部分人：秦腔老艺人，农村招来的孩子和绥师、米中的同学。这三部分人互相学习，既演秦腔，又演秧歌剧。用这样的文工团去赶庙会，改造台口。去掉秦腔中封建迷信思想，保留象“空城计”、“打渔杀家”等较好的节目；再加上像“血泪仇”那样用秦腔音乐改编的现代戏；以及描写抗战、发展生产的秧歌剧，那就不仅鼓舞群众教育群众，还可以增加收入，减轻公家负担，发展文工团本身。只要按各个庙会固定日子去演，就不会违反群众习惯，也不妨碍生产，岂不很好。

习仲勋这一席话，使得从鲁艺来的专业老师们都很佩服。于学伟认为这是给文工团的一把金钥匙，指明了文工团为 50 万人民服务的方向。

生活在陕北人民之中

文工团员们懂得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的道理，就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陕北人民的儿女，所以并不困难。比如杜锦玉写的“占领庙会舞台的故事”中回忆：在开展扫盲运动时，他们到子洲县周家屹崂去创作《上冬学》剧本，有的人在村里主持办冬学，女团员们就到妇女中去动员，教姐妹认字。“村里的姑娘、媳妇很快跟我们成了好朋友。她们喜欢我们这些女八路，跟我们结拜成干姐妹。在炕头上围着我和鸿钧，轻声吟唱自己编的信天

游：'羊羔羔吃奶双圪膝跪，为人拜下些干姐妹。''阳畔上核桃背畔上枣，咱就看见干姐妹好"。'种下白菜卷起心，为人看见干姐妹亲'。有的姐妹细针密缝纳的袜底，绣上小小的花朵送我们，还说：'针线好坏你不要嫌，做双袜底留想念！'这种纯朴真挚的感情和动人的信天游，深深地感动着我们，看到了她们一颗透亮的心。"是啊！这就是丰富多彩的陕北民间艺术。他们的小本本上，每个人都记下了成百上千句的民间谚语和信天游。

赶庙会　艰苦奋斗
挣银元　自力更生

赶庙会演戏十分辛苦。一天演出三场戏，新戏老戏每场至少三小时，三天换一个庙会，一个紧接一个，换一个台口总得行军几十里。观众接受新文化思想教育后，也忘不了给他们辛勤劳动的报答。比如陕北农村中唱"还愿戏"的习俗。每次赶庙会，老百姓为了消灾灭难，给文工团交一块银元，请你唱几句戏。1945 年农历四月初八，文工团上山演了 9 天 9 夜的戏，陕、甘、宁、晋、绥(远)等省各族农牧民、商、贩、富豪不远千里来朝山，求神、拜佛、还愿、上布施、做生意，半个月内每天上山两三万人，庙会仅银元收入达三四万元，给文工团报酬近 1000 元。连同几次零星收入共 1000 多元，文工团领导决定，立即派人将银元送回地委宣传部上交。有 45 斤重的一千多块银元，领导上交由美术组的团员木子负责运送。木子用新白布缝成一长条袋带，象子弹带那样把一块块银元双排并列带内，从双肩到腰间绕几圈绑在上身，外穿布衫。在一天一晚时间内，从葭(佳)县白云山下得山来，路经吉镇，翻山越岭，步行 180 多里送往绥德。天干热饥渴，夜遇饿狼威胁，待木子到绥德地委宣传部时，由于一路惊吓疲劳过度导致休克。事迹感人，催人泪下。

固然，50年以前，我们是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而今天，历史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一切的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言。但是，毕竟，我们的国家终究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改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并没有过时。然而为什么今天多少红得发紫的歌星、舞星、电影明星们赶一次穴就要报酬几万、十几万元，有的甚至还要偷税、逃税！？看看《青春的脚印》，也许会受到启迪。

（原载《改革时报》1995年3月30日）

面对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感言

我是1918年6月出生的，至今整整77个年头了。回顾走过的历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划个粗线条，至少也有这么五个台阶。真没想到，我们这代人竟经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代的历史巨浪是那样的惊天动地！能够活到今天，实在也是不易呀！多少仁人志士先我们而走了，想起他们来就感到难过。

冤有头，债有主。从我稍稍懂事开始，就认识了那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它，逼得我们祖国处在危急存亡之秋；是它，迫得我们民族面临灭顶的深渊；是它，使我开始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是它，驱我走到了抗日民主的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在那里，毛泽东教导我们：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全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那里，毛泽东使我们明白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根本宗旨”，在那里，毛泽东率领我们全

党在中国人民中建立了:“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新的三大作风。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终于同全国人民一起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把革命从胜利推向胜利。

如今,我们究竟怎样面对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如何才能不愧对过去的光荣和自豪,如何才能不愧对先我们而去的烈士的英灵。看来,这还不能说是一个小问题。从近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猖獗活动来看,从6月9日日本国会通过的那个“既不反省侵略罪恶又不表示对侵略罪行道歉”的决议来看,我们实在应当高度警惕。我们既要庆祝胜利,强调中日和平友谊,加强两国经济合作,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同时,我们更要认清:美国在战后初期,出于对世界冷战局势遏制战略的需要,伙同蒋介石集团开脱和释放了不少日本战犯,从中埋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孽根,以致一脉相承发展而成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我们切不可低估它的反动能量;而日本联合政权屈从右翼势力压力的右倾化,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包括绝大多数主张中日友好的广大日本人民,对此也是难于坐视不顾任其猖獗的。

村山富士首相上台时就表示:日本将在战后50周年之际,以日本国会名义通过一项反省战争决议。但是,一年来,直到今年6月9日,日本国会才通过了联合执政的三党所提出的、那个回避承认侵略、拒绝反省道歉的“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表决时拥有200个席位的新进党中的推进派提出修正案,要求决议明确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的反省谢罪之意,也遭到联合执政党的拒绝。

我们不禁要问: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要美化过去的侵略历史?日本联合政权为什么要以迎合右翼势力来避免其倒台?等等等等,不正说明日本当前政治动向的右倾化?

日本政治动向为什么要右倾化?右翼势力为什么如此竭力反对不战决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筹划为侵

略战争翻案？他们的罪恶的目的岂不已昭然若揭？他们就是要妄想继续实现其先辈向海外侵略的野心；就是为了在日本人民中间灌输军国主义的战争史观，以便能动员起他们来向海外侵略，实现其先辈"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联系到日本的"不反省决议"正产生在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鼓励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向中国挑战这一严重事件的氛围影响之下，尽管日本村山富士政府声称不会批准李登辉入境，而日本一批亲台议员，却公然表示将力争使李登辉实现访日并为此在大肆活动，以步美国一些议员们的后尘。如此唱和，岂不值得人们严重警惕？

同胞们！我们千万不要沉缅于当今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境遇中乐而忘忧。面对那些不怀好心的日本右翼势力和向右倾斜的日本政府；加上正在玩火的美国政要和台湾当局一小撮人的勾结，我们要居安思危，自强不息。打铁先要本身硬，才能长治久安，居于不败之地。但是，令人十分担忧的是，我们借以打败敌人的锐利武器：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三大作风，却被一些人任意玷污，悄悄地以权嬗变成受人嘲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密切联系领导，理论联系实惠，表扬与自我表扬了。"你说它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吗？却也有几分真实可凭；你说它是发牢骚、讲怪话、恶意中伤吗？却也可使我们汗颜而起到某种警言醒世的作用。它不是也深深触到了我们当今某些流行病的病根子么？所以是不能把它只当作一般的流言蜚语来对待的。可不是吗？有些人不正是在这样地自毁长城吗？如果我们不能重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能重振三大作风，岂不等于自己解除了战胜敌人的武装？我们东邻友邦那股子右翼势力和西方的美帝国主义野心家们岂不可以不战自胜了么？虎视眈眈居心叵测的美国反动势力和台湾一小撮出卖民族利益的李登辉之流的鬼蜮伎俩不是就要得逞了吗？警惕呀！在密切关注着东西方恶棍们蓄意伤害我国的同时，要更加清醒头脑，加强我们自身的锻炼！

这就算我77诞辰时面对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有感而发的肺腑之言吧。

（原载《杂文界》1995年第4期）

商品经济本来就姓“商”

我不是考古学家，但是对于文物古迹之类的，还是比较感兴趣，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可以看到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既丰富多采，又形象生动。比如那枚小小的骨针，尽管它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用兽骨磨成针是可以设想的，至于那细细的针眼究竟是怎样钻出来的呢？耐人寻味。

我终于有机会在河南渑池的仰韶址发现了它的秘密，不禁对我们聪明的祖先更增敬意。仰韶村是仰韶文化最初发现地。它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以磨石器为主，骨器相当精致。我曾经参观过其中一个制作骨针手工作坊的遗址。真是看得我兴致勃勃，其情其景至今难忘。

展览室精心依次陈列着：整块整块的牛肩胛骨、剖割成不到半寸宽的长条条、用坚硬的石器制成的圆锥尖、再用圆锥尖在骨条的两面钻孔、孔眼钻通以后再把骨条在石器上磨成针。就这样，既有锐利的针尖，又有“引线”的针眼，然而。其间的废品率很高的。当时要磨制成功一枚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以联想到的是：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样的批量生产，决不只是一家一户为了自家的需用而生产的；它应当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因素的产品。因此，这个手

工作坊所生产的骨针也应当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商品。不过，那时人们头脑里还没形成商品这个概念，所以也没有“商品”这个名词。

那么，这样的劳动产品为什么后来叫“商品”呢？据《辞海》对“商”字的解说，可以按“部落名”、“朝代名”、“古地名”三种说法来释“商”义，并逐步同“商品”这个名词产生了联系。按“部落名”说：当时的始祖名契，居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传到其孙相土时，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相土三世孙冥，善于治水。冥子王亥，从事畜牧业，传到汤，灭夏桀建立商朝。从契到汤，共十四代。按“朝代名”说：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建都亳（今山东曹县南）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商也被称为殷。农业比较发达，已用多种谷类酿酒，手工业已能铸造精美青铜器和烧制白陶，交换也比较扩大，出现规模较大的早期城市，为当时的“文明”大国。传到纣，被周武王攻灭，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约当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十一世纪。再按“古地名”说：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商自盘庚迁都于殷后，周人改称商为殷，而商人自称则仍为商，故殷都仍称中商。

另据史料记载：自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后，他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并命“三监”管辖武庚。武王死后，“三监”和武庚勾结，率领遗老遗少，兴兵作乱，被成王之叔周公平定。为了防止遗民继续作乱，便把他们浪放到洛阳一带。这些失去了政权的商朝后裔，又失去了土地和奴隶，无以为生，只得主要从事贩卖农副产品。从此，这个职业便成了商遗民的专门职业。就是这样；其部落因居商丘之地而名“商”；其灭夏之后建立的奴隶王朝又因之而称“商朝”；后来“商”的遗民又为其所从事的生业带来了这个“商”名。后来的人们便称交换的产品为商品，称经营商业的人为商人，从事商品经营的行业便被称为商业了。

古今几千年，社会不断进行历史演进变化，但商商相承至今未改这个商字。所以说商品经济本来就姓“商”。千古都称“商”的原

因，大概还因为历来的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都要用它来进行交换；而且在生产过程中都要产生“剩余价值”这种共性。但是在人类社会上升的阶梯上，每登上一个大的台阶，又各因生产、交换；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上具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性质，而具有各个不同社会的个性。比如，奴隶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可以加一个“奴”的复姓，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可以加一个“封”的复姓，但由于这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当时社会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所以没有人称它们为“商品经济”；后来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其社会经济中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成了其社会经济的主要形态，不仅社会产品统统成为商品，就连劳动力，包括各种各样高级人才的劳动力，也都可以作为商品了。因此人们不仅要为它加一个“资”的复姓，而且把这时的商品生产及其市场称作商品经济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由此还使不少人误以为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具的特征，当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旦被推翻，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便会断子绝孙的。我国社会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由于历史演变的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因而就习惯地误以为计划经济才姓“社”，而商品经济则姓“资”，现在我们终于“换了脑筋，认识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经济手段，从而认真着手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并为它也加一个复姓，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姓“奴”、姓“封”和姓“资”的商品市场和交换都各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否则便分不清青红皂白了；看不清发展过程和发展脉络了。但这三姓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却又有它们另一方面的共性，那就是它们都是私有制条件下具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对抗矛盾关系的商品生产，生产者用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都分别被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剥夺走了。因此，这三种社会制度下的商品生产

本身，都存在着无法完全愈合的致命伤。最后不得不由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

至于像我国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有它的特殊性：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尚处于低水平阶段。所以，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其它经济共 9 种类型的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参见 1992 年 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我国经济类型划分新标准出台的报道）；既消灭了剥削制度，又存在残余；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和其它各种分配形式的并存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综此可见，第一，商品生产和交换，古已有之，今后还有，绝非资本主义所独有，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商品经济只是资本主义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第二，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古今概同，不同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完全没有质的差别的观点，也是不切实际的；第三，有了商品才有市场，有了商品必需市场，商品经济必然发展到市场经济；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由其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而各有其特殊性，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大问题。特别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殊性的研究尤为重要。这里由于论题和篇幅所限，不作详述了。

（原载《中国企业家》1993 年第 1 期）

钥匙在锁家

锁他爸叫金谷奇，是印刷厂的工人。据说金谷奇的爸是地主分子（其实是小土地出租者），早已去世。谷奇长得很像他爸，他妈思念他爸，就把谷奇的相片放大、在咀巴两边画上两撇小胡髭，就作为他爸的遗像挂在墙上作个纪念。

因为这么一件事，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造反派给谷奇戴了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帽子。虽然他是工人而没受什么批斗，但把他的宿舍发配到地下室，和我这个“走资派”作为邻居，同住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层。

本来，谷奇只有一男一女，为了拴住这个宝贝的独生子能够长命百岁，所以取名“锁”。孩子那时才五、六岁，长的怪逗人喜爱的。可是由于谷奇心情不佳，孩子稍不听话，他就拿起扫帚打锁，奶奶妈妈都劝不住，只是我过去说几句话还可以劝阻。

那时我由一个省报的副总编贬到打扫院子、厕所，送报，印刷厂劳动；我老伴作为延安儿女，什么把柄也没有，但作为“黑帮的老婆”，也由编辑贬到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因此，我们和老金交往接触较多。就这么来来往往，我的一家和他的一家就比较熟悉了。他家有事找老田商量，我家有事就找锁家帮忙。我家的4个孩子比他家的两个孩子稍大些，也能玩在一起。所以虽则在那黑黝黝的地下

室，也还热热闹闹的颇有生气。

随着时间的转移，“文革”逐步降温，林彪自取灭亡以后，形势慢慢有所缓和，单位盖了新宿舍，虽然相当简陋，但总比那原来是蘑菇房的地下室强多了。又巧，我家和锁家同在二层楼，锁家在楼道口，我家在楼道里；锁家有老奶奶看家，我家大人要上班、小孩要上学。其实我的所谓上班，主要是把印刷出来的省级报纸、中央级报纸和参考消息及时分送到各个办公室。我家大人小孩进进出出钥匙不够用。所以出门以后，只得把钥匙托锁他奶代为保管，门上贴个条子写着“钥匙在锁家”，谁回来一看就明白了。

大家都知道，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即使平时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敢来往。可是我家和锁家的往来，却无所顾虑。在地下室的交往是无人监视的，搬到新宿舍同住一层楼交往就更多了。我们相互交谈家事、国事、孩子事，有时在星期天还在一起打个拼伙，同饮几杯。所以简简单单的“钥匙在锁家”几个字，却凝聚着史无前例的日子里缔交的深情，是难于令人忘怀的。

（原载《改革时报》1995 年 5 月 4 日）

如何借鉴移民

1944年2、3月间，春节刚过，在绥德小城宁静的街面上，响起了阵阵歌声。原来是从葭(佳)县来的一支70多人的移民大队，撑着红旗，高歌："移民好，移民好，移民工作闹开了，葭县起身延安跑，移民变工把荒掏……"。大家边唱边走，红火热闹，高高兴兴地从葭县唱到绥德，又从绥德唱到延安。解放日报曾用大量篇幅报道了蓬勃展开的移民运动。

写到这里，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我是怀旧吗？今非昔比，今天的情况毕竟是大不相同了，转念一想：情况虽则有别，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了。中国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因素。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移民活动，从未间断。旧史新作，卷帙浩繁，大量记载着从原始社会到近现代的人口迁移流动。特别是从西汉文帝(公元前179年)以来，经东汉、三国、西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历代都有军垦民屯的大量史料，说明历代政府为了巩固边防、拱卫首都，强兵足食、发展农业、调节人口、安置复员等等目的，无不采取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迁移流动。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实践和理

论上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一年一度春节过后民工潮的涌动，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流动时间越来越长。引发了铁路交通运输等部门和有关人口流出和流入地区各级政府的重视，分别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加以疏导，新闻媒介也纷纷作了充分的报道。但是，由于在国家建设的总体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划上，还没有把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列入议事日程；没有像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那样把移民运动作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政策上以至具体措施上切实推进移民运动。因而至今仍然只是在民工潮高涨时轰动一下，事后烟消云散，不了了之。十分明显，只有在国家整个宏观决策上实行计划生育与迁移流动相结合的人口基本国策，才能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的基本问题。

40 年代陕北的移民运动，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作为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记者，不仅采访报道了这个移民运动；而且，深入群众、联系实际，对移民问题作过系统的调查研究，还亲自参与其事；从而使我第一次在当时绥德这块新解放区亲眼目睹贫苦农民那种一无所有的悲惨生活；以至为什么当 1983 年我离休以后首先就投入了对我国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和著述（见拙作《秋实集》），乃至目前仍然关注着三峡工程中 100 多万移民问题，以及年复一年春节期间的民工潮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实际上它有着发展生产力的共同规律，有着从实践中带来的感情上的印记，当然也更有着发扬移民运动中延安精神好传统的愿望。

1942 年 2 月 6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公布优待移民实施办法，给各专员、各县市长发出命令，明确指出：为了奖励边区内外各地难民贫民的迁移，以便从事开荒生产、繁荣经济，特划定延安、甘泉、富县、志丹等 7 县为移民开垦区，并制定这个“实施办法”。“办法”显得很具体而周到。比如其中第五条规定，凡移民开垦区内的

县、区、乡政府，应帮助移民取得荒地和必要的熟地和居住的窑洞；帮助介绍老户和移民变工合作，发动老户给移民借贷粮食、籽种、农具等，帮助移民向银行取得耕牛贷款；切实执行边区政府规定的3年免交公粮，并减轻其义务劳动，帮助移民组织村、乡政府；如人烟稀少、过于荒凉的移民地区，先组织机关部队居住，然后再组织移民迁居。第6条还规定，有关乡、县要设立移民站，帮助移民解决出发时的各种困难，如包括贫困户补助路费，解决医疗卫生问题；帮助动员牲口解决移民妇女、小孩和农具、家具等搬迁运输困难；给移民开具介绍信给安置区的县政府以及沿途各级政府给予方便和照顾。可以说政府帮助移民解决困难，作到了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的程度。

（原载《改革时报》1995年6月18日）

故乡的蝴蝶

（《海宁报》编者按：此文叙述的是一件真实的“奇事”，读之令人倍思故里，热爱桑梓。）

（作者按：此文最先发表于198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曾编入1992年7月出版的本人《秋实集》；1995年12月30日我家乡《海宁报》也予发表，颇感亲切，特再辑入以飨读者。）

我离开家乡海宁参加革命已五十多年了，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始终是浓浓的。

我家乡有位老表姐，已经年迈了，是个裁缝。她这些年富了，给在浙江的所有亲戚都做过衣服，就是没给我这个在北京的表弟做过，心里怎么也过意不去。早些年专程来京，给我们全家每人做了几件衣服。寒暄中，她知我一直怀念家乡的代代桔，回家后，便很快托人给我捎来两株盆栽的代代桔，简直使我心花怒放了！

来自家乡的代代桔，经过我和老伴、小女的精心培养，长得浓绿油亮，生机蓬勃。入夏以后，枝头还结出了几颗扁圆形的果实，给我的小晾台花园增色不少。反复察看，还发现在两株桔树顶部，分别挂着一个形色和桔叶十分相似的茧子，茧根粘在枝上，茧头上分别有两根细丝与枝粘着。任凭风吹雨打，也不会使它脱落。我想，它一定是从家乡土壤里带来的虫卵孵化成虫然后结茧变蛹的。

三天后的一个早上，一只美丽的蝴蝶脱茧而出，那五彩缤纷的鳞翅，巧夺天工的图案，和谐自然的花纹，浓淡相宜的色泽，超过了人间任何的美术设计。这小小的昆虫，真是集美的仙子！

我的小女酷爱制作花草、蝴蝶标本。近几年她学习紧张，很少得闲。每次我和妻子从南方旅游回来，总给她带回几片奇花异草，引得她一片喜欢。但是我们年纪大了、腿脚不灵，总是捉不到一只美丽的蝴蝶，虽然遗憾，却也无可奈何。这一回，蝴蝶就停在眼前，而且嫩翅尚未展开，我毫不费劲地逮住了她，轻轻的夹进小女的标本夹，我们全家拍手欢呼，小女更是高兴，比考了一百分还高兴，看着蝴蝶，竟几次催她吃饭都顾不上。

可是事后，我的心头莫名其妙地有些不安，伏案编书时，也常常会分心。这是怎么回事？几经寻思，原因还出在那只美丽的蝴蝶身上。我打开女儿的标本夹，啊，想不到她的生命力这般强，她不仅活着，还想飞呢！我心中一喜，随手把她放了。目送她翩翩飞向湛蓝的天空，心里顿时感到释然。默默地预祝她飞向万紫千红的花丛，为人间增彩添美。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对她的担心和挂念。我常常面对代代桔，对着那发了黄的空茧壳出神。一天，两天，望眼欲穿，终不能看到她那美丽的仙姿归来，怪想念的。饭桌上，我常常停下筷子，惋惜地对小女说："她飞走了几天了，再也不回来看看她的老家。""谁让你放的？不放你不就随时可以看她吗？"小女看我不高兴，就逗趣地说，"爸，你索性驯养一种鸽子式的蝴蝶就好了，让她飞去又飞回，嘻嘻。"虽然看不到蝴蝶，可小女的趣话，也给我几分愉快。

第四天的早上，我正给花浇水，只见一只蝴蝶朝我翩翩而来，我心头一震，放下水壶，拭拭眼睛，啊呀，莫非是她又飞回来了，我象秋翁遇仙一样喜出望外，想喊老伴和小女，又怕惊了她。似乎是她，又不全象她，但她绕着代代桔飞上飞下，亲热，眷恋，好象久别重逢。正在我惊喜时，另一株桔树上一只同样美丽的蝴蝶脱茧而

出，更加惹人喜爱。老伴和小女轻轻地敲敲窗子的玻璃，原来她们也早看到这景象了，四只眼睛惊喜得那么大！我们兴奋地用手指打着哑语，都象孩子似的。

两只蝴蝶，翩绕着两株桔树，上上下下、高高低低，飞舞了一圈又一圈……

她们太眷恋生之育之的“母亲”了。只见她们落在“母亲”的怀抱里。剧烈地颤动着美丽的翅膀，象是闻“母亲”的芬芳和馨香，象是吮“母亲”的乳汁……我的心也在颤动，长久地颤动……

（原载《海宁报》1995 年 12 月 30 日）

读《周王庙镇小城镇建设启示录》有感

（《海宁报》编者按：田老4月7日来信说，读了《海宁报》3月25日刊登的“农村改革的又一座丰碑——周王庙镇小城镇建设启示录”这篇报道，十分高兴，由此写了一篇“读后感”。在这篇“读后感”里，表达了革命前辈对家乡海宁的深切关怀，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读之令人振奋和鼓舞。特予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周王庙人，读到这篇《启示录》，实在太令人感奋了。

去年中秋佳节，应海宁市人民政府之邀，我回家乡参加“94中国国际钱海（海宁）观潮节”。顺道到周王庙探视，就觉得比6年前那次回故乡时所见的面貌大有改观。今年2月，市政府叶维宗同志来信告知：“你家乡周王庙镇工业产值突破10亿大关，还获得希望杯金杯。”这些见闻都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但终究不明底细。这篇专题报道启示读者：周王庙走上了乡村城市化之路；周王庙的工业发展充分发挥了聚集效应；周王庙城镇建设的前景灿烂。使我读到周王庙这座农村改革的丰碑的丰富内容和宝贵经验。

我熟悉文中的插图：“周王庙旧镇一角”那种水阁房，也认识压

题那幅全镇鸟瞰图。回忆60多年以前我去盐官海宁县立商科职业学校(今海宁一中前身)上学后,曾经梦想周王庙也能象盐官那样多好呀!如今可说梦想成真了。

"启示录"告诉读者:周王庙镇的业绩,不仅是我故乡的荣誉,而且更是"嘉兴市唯一被建设部列为第一批小城镇建设的试点镇"。既然是"试点镇",它的经验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这里我想首先就小城镇建设和人口问题补充一点意见。

文章首先从周王庙作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工贸型城镇",报道了二、三产业的发展、筹集资金、改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直到教育文化、医疗设施也得到同步发展,以致引伸出"乡村城市化应该是人口规模相对集中、经济比较发达和社会进步的一种综合体现"的观点。非常正确,提到了相当高度的水平。

近年来,我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就是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曾就此编辑出版过五本论著。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为此写过"下好中国人口问题这盘棋"的序言。他开门见山指出:"人口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我曾提出要下好人口这盘棋(这里指的是围棋)。大家知道,下围棋时只要做好两只眼,全盘就活了。我国人口这盘棋也要做好两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一是合理组织人口迁移。"(见寄上的拙作《秋实集》第323页到328页)。如果说,"启示录"已经报道了"发展小城镇",那么,我希望能够对"中国的大问题"中"合理组织人口迁移"方面继续作出报道。比如说:周王庙镇前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人口变化状况,镇区面积变化状况,西距长安镇和东距郭店镇的变化状况,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包括外地和外省的各多少),现代化企业对劳动力文化技术素质的要求,以及乡镇企业职工对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的要求等等,如何满足新一代居民的要求。似乎都需要作出相应的报道。

按我的想象,作为"试点镇",对于"聚集效应"、"灿烂前景",对

“启示录”继续作出之一、之二、之三……的连续报道，都是必要的。我还想到“事在人为”，周王庙镇的改革所以能够树为丰碑，当然是和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这一班人是怎样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结合实际，同心同德，全心全意地努力奋斗的？他们的精神风貌、思想作风，有哪些值得人们学习的，不是也非常值得报道的吗？我真为我们家乡有那么一批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接班人而高兴！

（原载《海宁报》1995 年 4 月 29 日）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1993 年 12 月 24 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灾难无法预约”的长篇报告。说的是各种灾害事件随时都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而面对灾难主要看我们是否具备自救能力，关系甚大。的确，近个时期以来，各地灾难事件屡屡发生，再一次给大家敲响警钟，我们不能听天由命。问题是，各种各样的灾难不知何时何地发生，因此防灾自救能力，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积累，待到用时，方可从容对付。我的几次遭遇，都在有惊无险中安然渡过。但事后回想起来，都是十分后怕的！

“火来水淹”也要区别对待

时间已经挨到了 1974 年的上半年，“文革”正在逐步降温，形势在慢慢地缓和下来。我家在那原来作蘑菇房的地下室已经住了七、八年，单位新修的宿舍快要竣工，有希望搬进新居。孩子们正在长大，衣着用具、学习用品逐渐增多，没有一点家俱显然不行。我托黄龙山林场的朋友代买了半立方的木料，找了一位青年木工，在地

下室的房间里做家俱。眼看着木工把木板锯成木条，又割成长短、粗细、大小不等的零料，划线刨光，打榫凿卯。一会儿框架支起来，抽屉装起来。小木工手艺精巧、构思精密，颇有羡慕之情。真的，当时确有不少知识分子很想丢笔从工。

我必须为木工供应两餐。除了从食堂打回饭菜，还得添加两个小菜，就在地下室用煤油炉当炊具操作。一天下午，眼看炖菜的煤油炉火快灭了，我就不加思索地拧开加油盖，拿起煤油瓶为它加油。没有料到，煤油刚刚注入炉内，突然"砰"的一声，一股火焰直往上冒。这是一座年代已久的木头房子，墙上糊满了报纸，又加上满地的刨花，眼看火焰已经窜出，一场火灾即将酿成。小木工慌了手脚，端起一盆水就要向煤油炉泼去。我却立即加以制止："千万不能泼水！"顺手拿起一床棉被，往着火的煤油炉盖去，火势立即扑灭，一场虚惊总算结束。但是，我心跳十分剧烈。当时"文革"势头渐缓，可我作为"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爪牙"的帽子尚未摘掉，也还没有作出结论。如果这场火灾由我而起，岂不成了"纵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吗？真是不寒而栗！所以要求木工保密，千万别告诉他人。

说来也巧：因为我并没有这种灭火的常识。按一般常理，也只会象小木工那样"火来水淹法"。危险的是，水根本不能灭掉油火，只能使油火随水流到别处，从而使满地刨花燃烧起来，那时火势就更难扑灭！那么这次灭火法是从那儿得来的呢？真是幸运：就在两天以前，本单位西楼宿舍一家发生火警，我随着"救火"的呼声直奔西楼。不料，尚未进楼，人们就出来了，说"没事，已经扑灭了！"是怎么扑灭的呢？人们在途中议论纷纷，我只听到并行的两位工人在说："煤油炉着火，根本不用大惊小怪，用一床棉被一窝就把火闷死了！但千万不能用水泼，泼水灭火，越泼越旺！"这话，我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不料，不到三天就用上了。古人云："三人行，必有吾师！"是有道理的。

游黄山乐极生悲

1983年5月，离休后第一次享受外出定点疗养。单位组织集体游黄山。从合肥到黄山，第一天从后山搭汽车上到半山，同行的五对老年夫妇都到此为止，就在半山游览。就我俩不服老，和比较年轻的同志再步行登上北海，再从北海转到前山，下玉屏楼。一路之上，但见那奇峰怪石、那缥缈云海、那万丈银瀑、那石中名松，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各色杜鹃花，真是美不胜收，目不暇接。待到玉屏楼，天色已晚。打前站的同志事先已在宾馆订好床位，准备过夜。玉屏楼即古文殊台，是黄山五个风景点之一。夕阳之下，它背靠玉屏峰，东南天都峰、西北莲花峰，群峰丛立，相互比美；再加宾馆左侧就是那有名的迎客松，右侧为送客松，宾馆门前不大的平台前沿，在陡壁悬崖的石缝里钻出来那盘根错节的倔强奇松，无不可一一入画，谁都想在这里和它们逐个合影留念。入夜，云雾飘进宾馆，腾入房间，真是人在雾中，雾在人中，虽然稍感潮湿，但一天倦游下来，和着被窝，在窗下潺潺流水声中，安然进入梦乡。

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一早醒来，风雨大作。玉屏峰地窄房少，又是上上下下必经之地，游客不得在此停留。虽则穿上塑料雨披，却根本不起作用。只得硬着头皮，迎着风雨，过了一景又一景，出一线天，直下小心坡，小心坡左临深渊，右傍险岩，虽有安全栏杆护卫，总感到两腿发软，也不知下了多少台阶，在风雨中既无暇赏玩，连中途休息也难落脚，直到天门坎、半山寺，下到慈光阁，风雨渐停天色已晚。谁知一坐下休息，两腿再也站不起来了。经我老伴和旅友把我两臂架起才上了汽车，送到温泉黄山宾馆，又在众人帮助下进入卧室。我第一次发现我的两腿根本不起作用了，也是第一次发现自己上身的重量。心想平时在不知不觉之中，双腿对我一生的行动承担了多么大的责任啊！但更使我发愁的是：这次一下回不了北

京了，只得就在黄山住院治疗好后才能回家，还不知得化多少时日？真是乐极生悲啊！

急中生智，突然一个念头闪出："文革"期间劳动中，不是装卸垃圾，就是装卸煤炭。特别是在夏天劳动下来，大汗淋漓、热不可挡，常用冷水冲洗，结果经常腰酸背痛，特别是膝关节疼痛难忍。难友中一位医务工作者曾经传授一方：就在临睡前用烧酒点燃后，手抓燃着的烧酒，连火带酒猛擦痛处，即可消炎止痛，屡经实验，确实有效。经老伴上街买来白酒半斤，如法炮制，在红肿的两腿膝关节部分猛擦；虽则两手背汗毛尽被烧脱，但膝关节渐见轻松。一天的疲劳和紧张，很快进入梦乡，梦中还在风雨交加中下着不尽的台阶。出奇的是：早晨一觉醒来，习惯地下床入厕，两腿居然站立起来了，行走照常。我发现：我的膝关节康复了！

事后据医生说：这是连续不断地下台阶时膝关节磨擦生热发炎，又经风雨侵袭，形成急性水肿，用烧酒火疗，确有疗效。我们民族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偏方秘方，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出远门时不妨随带些急救药物

1991 年 8 月底，我应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去银川参加一个有关人口迁移问题的研讨会。会议首先组织我们参观银川附近新建立的移民村，而后开会讨论。第一天参观从宁南贫困山区隆德县潮湖区迁来的移民点。这是一个新的创举，等于在银川郊区来了一块飞来地。我们看到了不到 3 年时间，移民们便脱贫致富，过着幸福的生活。江泽民总书记也来这里考察过，并给予好评。使大家获得了具体的印象，增强了对移民工作的信心。第二天，大家又兴致勃勃地去参观另一个移民新村。上车前，大家为了尊老，特让我坐在前座司机右边。开车后，大家有说有笑，畅谈各人观感。车行约 2 小时，一辆农用拖拉机迎面而来，突然，一个铁轮飞来，砸破窗

玻璃，猛扑我的头部。一阵震痛，我用手一摸，满脸满手的鲜血："不好，我被砸伤了！"真是祸从天降，猝不及防，怎么办？汽车停住了。出人意料的是，来自哈尔滨的李德滨同志从他的提包里取出了止血粉、消炎粉、还有药棉、纱布。一抹一扎，血就止住了。汽车赶紧调头回银川。我总算缓了口气。心想刚才亏得我正回头和后座的同志拉话，所以那块铁轮只砸烂了我右耳的一半，右肋骨骨折。如果当时我面对正前方，铁轮迎面砸来，那就面目全非，更难设想了。也算不幸中的大幸。

车到银川人民医院，正是星期天的中午，连急诊室也没有大夫。怎么办？事又凑巧，一位院长同志正在值班。当她得知我是从北京来银川开会的老干部，当即拿起电话把正在家中吃饭的有关外科、骨科、麻醉的大夫、护士一一请来，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消毒、皮试、打破伤风预防针、麻醉药、耳朵缝了 30 多针，骨科大夫也用捆绑法作了固定，而且立即安排住进了干部病房。一切进行的有序而又安全、顺利。住院半月出院回家，东道主还派员护送北京。十分令人感动。痛定思痛，归根到底，全靠同行的李德滨同志的一番细心，"有备无患 "！他常出远门，有了经验。我想，如果那次没有他的急救药物，我在返回银川的两小时中，不知要多流多少鲜血呀！

人生一世，不仅政治上的坎坎坷坷在所难免，如今看来，生活上的灾难，也会时刻发生。现在，经济在飞速发展，社会在快步前进，各种各样的灾难，防不胜防。特以个人遭遇，提供各界人士注意：尽可能提高灾害意识，增强自救能力，是为至要！

让说心里话蔚然成风

《我的心里话》是个好题目，如果让人们把真正的心里话都讲出来，确是好事。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说心里话理所应当。因为我们这些人从国家危难存亡之秋走过来，活到今天，已经是万幸的了。多少英雄人民、革命烈士倒在了血泊之中，已不能说话。如今我们在这块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还能老有所为，还有什么顾虑呢？说到党风、政风、民风、社会风气以及身边琐事，不尽如人意的事仍然不少，但我想，不论哪个朝代、哪种社会，这类事总是免不了的。谁有感触，有意见，把心里话说出来，至少可以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当然，对于那些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事，心里话好说，不犯大忌。比较费考虑的是谈国家大事。

我是不主张“莫谈国事”的，因为它既不符合共产党的党章，也不符合国家的宪法。而且我们些人之所以投身于革命队伍，就由于素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如今虽然年迈退职，但是，眼看着有一些国家大事，由于某些负责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滥用职权，盲目蛮干，我怎能视若无睹，缄口不言？

我不是不敢讲话的人。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党历来倡导的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所以对于那些自己有所了解的事，也讲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对有些问题还写了文章，而且著书立说，大声疾呼。说点心里话，心底无私天地宽，也符合党所要求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精神。担心的就是讲了没用，说了白说。当然，白说也要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么！

现在，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左”的流毒未尽，一有风吹草动，有人还会故技重演，兴妖作怪，陷害好人。因此，根据笔者的体会，要说真心话，还得倍加小心。

但愿《群言》杂志一年来倡导“我的心里话”，能逐步蔚然成风，能逐步吹散上述那些阴霾，才真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原载《群言》1994 年第 1 期）

希望医院少折腾老人

今年4月11日上午9时，我到北大医院干部门诊挂了眼科号，爬上三楼，分配在第一诊室候诊。大夫告诉我说："你知道吗？看眼病要先检查视力。"的确，我原来确实不知道这个规定，因为我的视力不错，只是晨练时迎风流泪，想的比较简单。没料到的是：在检查室排队轮到我检查时，大夫又说："先到二楼去交费！"下二楼交费处排队见到会计时，会计又说："先去领检查条！""那里去领？""到给你发病历处去领！"只得下一楼到干部门诊挂号处去领。挂号的护士又说："你看眼科的检查条应当到眼科去领！"无奈，只得再爬上三楼眼科才领到了检查条，再下二楼交费2元，再上三楼排队检查视力。

已经78岁的我，进入视检查室，已经被折腾得精疲力尽，两眼昏花，模糊的连最上层的E也辨不清方向了。

看病时，我向大夫诉说这番折腾的经历。大夫问我开始看病时是那位大夫接待的。我不好意思地暗示就在旁边那位戴眼镜的大夫。她说这位大夫刚来不熟悉，疏忽了！又说，如果你挂普通号，挂号处就会给你检查条的。可是干部门诊就没有这个规定。

我认真一想，问题似乎并非仅仅如此而已。归根到底，恐怕还在于只是从医院本身方便考虑得多，而为病人着想的少了一些。

设想，如果医院能设身处地为病人特别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多想一想，尽可能把看病的程序搞简单些，在各个环节服务的医护人员给病人多说几句话，把看病的程序和要求讲清楚，并尽可能提供一些方便，这种楼上楼下来回折腾，没病添病的事不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吗？

值此医疗制度全面改革之际，希望医院也能把这类问题解决一下。

（原载《北京晚报》1996 年 6 月 8 日）

喜闻家乡群众文化的先声

我家自订的、人家赠送的报纸刊物不少，而其中最吸引我的，还是家乡——海宁市文化馆主办的《群众文化》。这张四开四版、每月一期、玲珑剔透的小报。一版是“乡镇文化”的要闻；二版是“乡韵潮声”的通讯报告；三版是“紫薇文苑”的散文随笔、诗词歌赋；四版是“企业之光”中的企业文化。尤其在二、三版，它上边既有现代风采，还有文物古迹；既有奇文妙语还有图片插画；而且编排紧凑得体，印刷清晰精美，是报刊印刷中少有的。看来，编辑同志和印刷工人配合的很默契，否则是很难办到的。以最近一期为例，从“石井枯桥”、“蚕花姑娘”的摄影，到“钱江秋涛”、“桃李满天下”的插图，真是图文并茂、美不胜收。临睡前，翻着、看前，迷迷糊糊地就在睡梦中回到了故乡。

可不是么！从周王庙镇经伊桥乡到湖塘镇。94—95 钱江国际观潮节，连续两年承邀回乡观潮 期间，都曾前去拜访过。不到 10 平方公里的周王庙镇，工农业总产值将达到 14 个亿，荣列为“嘉兴市唯一被国家建设部列为第一批小城镇建设的试点镇”。因为她作为海宁市的强乡重镇——皮革之乡，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工贸型乡镇。它不仅在发展二、三产业、筹集资金、改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等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在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鲜明成绩。该镇文化站曾多次被评为海宁市先进文化中心，先进文化站。在北京几十年从未进过卡拉OK的我，去年秋季回乡期间居然在周王庙镇干部的陪同下开了一次"洋荤"，进了一次卡拉OK厅，唱起了"陕北江南南泥湾"的陕北民歌。真没有想到，文化站和企业携手，在周王庙还举办了"储蓄杯"乒乓赛、"富邦杯"卡拉OK歌曲大奖赛、"多孔杯"硬笔书法赛和"农行杯"百科知识抢答赛等等，与此同时，镇文化站还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开设了东方娱乐厅、星辰舞厅、强强书屋、天宁茶室等等，使居民们在劳动之余有一个文明舒适的环境、得到娱乐和休息，我真羡慕当今父老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我又注意到了对海达电子机械厂厂长李四平的访问记——"经营读书两不误"。我曾由海宁市档案局许树刚局长陪同下到湖塘镇参观过了。和李四平初相识，就感到此人不凡。他虽则只是经营过塑机、冷裱机、冷裱膜、切卡机、电脑彩色名片等系列产品、几十人的小厂厂长；但是，他却是湖塘镇文化站活动的台柱。湖塘镇文化站所以能成为先进的佼佼者，是和李四平的支持分不开的；而且，李四平更是一位谙熟社会主义乡镇企业经营之道又有文化素养的企业家。如果能够更好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那么具有悠久历史、而有"小桃源"美名的贡师泰、朱熹的老家，相信将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建设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我已年迈，但正由于耄耋之年而思乡之情更切；何况，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将要召开，海宁市按照《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浙江省东海明珠工程》规划，要加快博物馆、文化馆新馆和乡镇文化设施建设，广泛开展城乡群众性文化活动，抓好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社会文化。相信在这美好的发展前景中，《群众文化》将会起到更加潜移默化的作用。

（原载海宁《群众文化》1996年6月）

和习仲勋生活在一起

到绥师打球去！

1943年2月，习仲勋同志从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调到绥德分区担任地委书记。当时我是延安《解放日报》驻绥德记者，在日常采访活动，特别是随他一起到绥德模范村蹲点调查中，相处得已很熟悉。他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从那时起，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习书记”。直到现在，熟识的人还是习惯这样称呼他。

当时，我们同住在地委机关院内。每天晚饭后，他从里院出来，经过地委宣传部小院门口，就会高声叫喊：“田方，到绥师打球去！”我就随他出去。我当记者，接触的事儿多，他就问长问短。我们边走边谈，约摸20来分钟，就上了半山坡绥德师范学校操场。他一脱外衣，卷上袖子，就和同学们跳跳蹦蹦地打篮球了。我也一起打着。但是往往打着打着，转眼间，习书记就不见了。我以为他和学校领导人谈话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正和绥师干训班的党员学生齐心谈恋爱。齐心性情温柔，为人老实、俭朴，待人诚挚恳切。他们结婚不久，习书记就让齐心到郝家桥去当文书，到基层去锻炼。

面条比米饭好吃

1952 年 6 月，我受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担任习书记的秘书。1952 年 9 月，中央调习仲勋到北京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我在文委担任他的秘书。开始，我随他一起住在西城区南草场他的寓所，并且和他共同用餐。他知道我是浙江鱼米之乡的人，总要让厨师老王师傅为我调剂吃些米饭鱼虾之类，他是陕西关中人，习惯吃面食：馍馍（馒头）、面条、杂面、饸饹、饺子、小米粥。我跟着吃着吃着，也慢慢地习惯了。直到现在，面食几乎占了我的饭食的一半多。跟习书记一起吃面，他说：为什么人们习惯地说油、盐、酱、醋，而不说酱、醋、油、盐呢？原来这里还很有道理。因为吃捞面，面条刚从锅里捞出来，必须先用油一调，才不致使面条粘连一起，用油把面条调开以后加盐，盐味才能随油调匀，先加酱油再添醋，才有滋味。他吃面条，只配几碟调料和小菜，辣椒、菠菜、胡萝卜、黄瓜丝、花生米，偶尔配上一盘炸酱。难得吃几次饺子，羊肉臊子面、荞麦饸饹、或者翡翠面（用菠菜泥和面），那都是比较讲究的待客用餐。相比之下，南方饭食要复杂得多，简单的四菜一汤，也得煎、炒、蒸、烧，费时费钱，吃不多久，饭菜就凉了，不像吃面条总是那么热乎乎的。因此，我也就习惯于面食了。

他很谅解陕北老婆婆

1952 年 11 月，我回西安接家属来北京，到京后借用习书记的“吉姆”牌专车接站。我的老岳母是陕北绥德农村人，这次从西安到北京坐了 20 多小时火车已经晕车，一下火车上汽车，几个弯儿一转，临到习书记家门口，便“哇！”一声呕吐了。这怎么得了，司机小王师傅非常为难，我也怪老岳母怎么不多忍一会儿。可是习书记迎

出来，见了不仅没有丝毫怪怨，还安慰老人好好休息。因为他对陕北老婆婆太熟悉了。在一块吃饭时，他还给老人挟菜呢！那时我一家老小五口都住在习书记家，觉得对他干扰太大，但习书记并不嫌弃。经过我几次要求，他才同意我搬到机关宿舍住。我一家搬到中南海紫光阁后边的工字楼宿舍后，习书记还专门来看望。

别把洗澡水浪费了

几乎每天夜晚，习书记都有会或参加应酬、晚会，往往深夜才回家。每晚洗澡，大概就是他最好的休息。洗完澡的澡水还不脏。他觉得放掉太可惜了。于是，他叫孩子们利用他的澡水洗澡，洗完后还要他们把脏衣服洗干净。他的家庭开支全交给家里秘书张志功管理，每月向他交帐。根据习书记勤俭持家的习惯，张志功管帐也十分严格，以至孩子们要张叔叔给五分钱买冰棍吃也颇费口舌，孩子们懂得自己多用了零花钱记在帐上要受到爸爸批评，所以从小都养成了节俭习惯。

（原载《羊城晚报》1996 年 5 月 4 日）

一幅没有题名的舒同墨宝

舒同，我国党政军历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代中国杰出的书法家；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患难之交。60年代前半期，他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主管宣传文教的书记，我是《陕西日报》的副总编辑，他直接领导我们，经常向他请示汇报，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当时陕西有些首长一对照，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印象相当深刻。"文革"期间，我们同遭劫难，他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陪斗，同受皮肉之苦。我们都患有各种疾病，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们同住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就医，朝夕相处半年多。出院后，彼此生活上相互关照，往来频繁。我对他原来不幸的家庭生活颇表同情，他对我也无话不谈，彼此相知日深。70年代后期，他担任中国军事科学院长期间也有往来。因老病复发，又同住三〇一医院，交往又多。

舒同，翰墨一生，70多年来，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向他求字者何止千百，他平生书作不下两万幅。我自幼从师学过何绍基书体，一度达到痴迷程度，至今记忆犹新。因家贫辍学，及后虽已荒废，但对那"雄逸而不轻飘"之气的何体仍极欣赏，如今耄耋之年，偶尔兴至，仍要挥毫练练。后来，读到既含何体而又有其独特风格的舒体，更见其端庄凝重，疏散飘逸，有凛然正气，无邀宠媚态，更是爱不释

手。因此，我家也珍藏着舒老的书作多幅。1980年他为我题赠的中堂：杜甫《旅夜书怀》诗，其中下四句为："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地？天地一沙鸥"。充分反映了舒老的自豪自解：既胸怀经世大志，所以说名岂文章而著，官实因论事而罢，偏用老病自解。浩然正气，跃然纸上，激励人志，勿作欺世盗名之辈。还有一幅给我题赠的对联是："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也是激励人淡泊明志之意。他还为我主编的《中国生产力合理布局》、《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移民史略》、《国外人口迁移》等书封面题写书名。而更为稀有的则是1977年4月他为我题赠的毛主席《咏梅》横幅，现在想起这幅无题名的舒同墨宝往事，犹感慨良多，特记述如下：

1971年"9·13"事件中林彪叛逃国外自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沙丘后，我作为参与炮制《刘志丹》反党小说的"反党分子"、习仲勋"黑爪牙"，经过在报社内部劳动一段时间以后，还要下乡蹲点劳动，被发配到商洛杨峪河公社上赵塬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蹲点劳动期间，我害了一种剧烈的腹痛症，在商洛地区医院住院检查没有结果，先是到西安住进陕西省医院检查，以后又到医疗条件较好的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求诊。恰好，舒同同志这时也在这个医院住院治病。在此期间，我们相互倾谈的很多。我见到舒老十分孤独，所以经常到他病房和他闲聊解闷，并把我老伴送来的鱼虾等南方菜肴与他共享，我们之间交往愈多，相知愈深。直到1976年10月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消息后，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相互庆祝。舒老这时精神焕发，兴致浓厚，健康状况日见良好。我们几位病友，以及为舒同治病、护理的大夫、护士们，纷纷要求舒老题赠墨宝，舒老欣然同意，司机从他家搬来了文房四宝，就在病区餐厅拼凑的几张方桌上，连续写了3个上午，才充分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当时，"四人帮"虽被粉碎，但百废待兴，问题堆积如山，特别是许多人被整后政治帽子扣了不少，都还没有作出平反结论，背上的

政治包袱尚未卸下，人人心有余悸，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舒老给各人的赠题都是毛主席诗词。舒同就是用毛主席诗词来鼓舞人们的斗志与信心。因为舒同早在1932年春漳州战役后，就和毛主席一起交谈诗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有人请毛主席题字，他总是推荐舒同。因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名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都是舒同题写的；“延安新市场”是舒同题的牌名，而毛主席又题写了一副对子：“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这是两位书法家难得的合作。

那次题字后不久，“五一”劳动节，我大女儿结婚，我穷，无力送她嫁妆，就把舒老书写的毛泽东词《咏梅》送给她了。参加婚礼的亲朋友好发现他们新房这条横幅时，都表示十分惊讶，大家都认识这是大书法家舒同的字，可是对这种既无上款，又无下款的条幅感到十分新奇。“文革”的恶梦刚过，那时，“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前景虽然光明灿烂，但人们心中还心有余悸。这时虽则“风雨送春归”，但“已是悬崖百丈冰”，只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此时此情此景，《咏梅》这条横幅真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现在，时过境迁，有人劝我找舒同补题上下款，岂不更加增色。我却没有从命。因为这就是历史的本色，这就是时代的记录。

（原载《炎黄春秋》1996年第8期）

我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问：您的优势和特长的什么？

答：所谓的优势和特长，在我来说，乃是在我这一生人生道路上自然形成的。

回顾我7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我的成长历程，基本上和多灾多难的祖国所处的大背景分不开的。我3岁丧父，是由我母亲和姐姐抚养长大，我是孝子，也很爱家。所以，如果没有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就不会卷进抗日救亡的风暴；如果没有三座大山的压迫，特别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也就谈不上参加革命。这是我们所处那个时代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锤炼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自觉性和积极性和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这几乎是我们同代人所共有的特点。至于我自己的个性方面，我想和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分不开的，我当过编辑、记者，特别是随军记者，作过新闻行政机构的政府官员和省报的副总编辑，作出过一些成绩，虽则不够辉煌，但总是新闻工作的很多特点培养了我，而其中最突出的：正是由于我的基础很差，水平不高，所以需加倍努力，才能赶上客观的要求。因此，我自问自己是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尽量发挥了自己的力量，自问自己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自己。这种自觉的勤奋精神，一直持续到我的晚年。我在离休以后的前10年，和

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曰我主编，编辑出版了 20 本论著和纪实报告，以至 1989 年金秋还荣获了“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近几年来仍在不断撰写有意义的回忆录，为我的老首长主编《习仲勋的革命生涯》。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那儿来的这股劲呀？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不用扬鞭自奋蹄”！我属马，但是这种“老骥伏枥”之志，却并非轻易得来的。我国新闻界的老领导、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吴冷西为拙著《秋实集》所写的序言中所说的：“在长期新闻工作中，作者以其执着、勤奋和实干为同事们称道，也患上新闻工作的‘职业病’，时时手痒，总想写点什么。”真是一针见血，确实如此，我的优势和特长，就是在革命新闻工作长期培育出来的那种自觉勤奋精神。我发现我的战友们都有这种优势和特长。

问：您是怎样选择您的事业和走向？

答：我选择我的走向，这有我们那个时代的特点。

我虽则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也曾为中央首长习仲勋当过 9 年秘书，担任过地委书记，十年“文革”复出后担任过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但我认定的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说，应该是新闻工作，不仅在职时曾经在新闻岗位上干过 20 多年，并且主要是以记者的方式方法——搜集材料，调查研究，从事写作，来承担秘书工作，作为地委书记也是领导报纸等宣传工作。离休以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中国记协邀请我率领记者团到内蒙古进行易地采访；还和 10 多位中青年记者共同采访写作，编著了近 30 万字的《内蒙古好地方》一部纪实报告；即使在离休后编著那 20 本论著中，基本上也是沿用编辑记者的方式方法。的确，这种优势和特长，是随处都可以发挥出来的。

按理，我既不具备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经过新闻专业学校的培训。我之所以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起源完全出于偶然，当然其中也不乏必然的因素。那就是，我的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从邹韬奋、夏衍等主办的报刊上得来的；对爱国老人沈钧儒曾经

留下深刻的印记；当年我们“上海流亡青年战地服务队”流亡到香港，是经过香港新闻界的大力宣扬取得港九各界支援下走向抗日战线；一到桂林，很快就接受了新闻界和文化界范长江、胡愈之、邹韬奋、夏衍等人对我们的安排，分别参加了他们所领导的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和救亡日报等进步的新闻文化机构的工作。我就是从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岗位上奔向了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副社长的岗位。当时战争环境，不需要个人执意的选择，不必要由个人为终生事业去取向，而是凭着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个人服从组织的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问题在于能够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不懂就学，在实践中学，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只要你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够作出成绩，受到人民的认可。

问：请您说说您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机遇。

答：如果说什么“成功的机遇”，也只是事后的现在来说，当时并没有这么明确的概念。

我从 1939 年参加革命开始，到 1983 年离休的 44 年间，是做过不少工作的，应当说这些工作对革命事业都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些贡献只能说是一般的、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所应该作的最起码的工作。而真正说得上突出贡献，恰恰在于离休后这十多年所作的。离休后的前十年，在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的密切合作下，由我主编出版的 20 本论著和纪实报告。包括：《内蒙古好地方》、《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中国人口迁移》、《中国人口迁移新探》、《中国移民史略》、《国外人口迁移》、《论、再论、三论、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澜沧江—小太阳》、《开发大西南》丛书 6 卷，包括“综合卷”、“地区产业卷”、“四川云南卷”、“贵州广西西藏卷”、“纪实卷”、“联合开放开发卷”、《延安颂歌》、《延安记者》和个人的《秋实集》，共约 600 多万字。这些论著还受到了诸如费孝通、周培源，孙越崎、钱伟长、王淦昌，邬沧萍、苏星、何建章、罗元铮等

专家学者的赞同和支持，他们分别为上述论著撰写了序言和评价，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我在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取得这些成绩的由来。如果说这些都是成功的事业的话，那么，最大的机遇就是抓住了离休以后的宝贵时光，充分利用这一宝贵时光，把我的离休生涯作为个人有生之年第二生命的起点。但是，机遇是客观的，外在的，只有和自身主观的、内在的因素相结合，外因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只有把我在职期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当前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把余热升温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十多年来的体会是比较深的。大体可以概括以下几点：

（一）首先应当肯定的还是以往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功底。比如《内蒙古好地方》一书，就是中国记协邀请我率领记者团对内蒙古进行易地采访的产物。本来，中国记协领导并没有指令我们要编撰出书的任务；同行的记者们也大多只想借此机会到边疆进行一般考察观光，最多在采访结束时发几条新闻报导，也没有编书的打算，何况我个人已达65岁老龄了。但当我看到边疆地区党政领导、新闻界同行以及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对来自全国的记者团如此热情欢迎和接待，以及他们多年创造的辉煌业绩，深深感到不把他们广泛而充分地报道出去，有愧于一个人民记者的良心。但我虽则身为团长，却不能以个人的愿望强加于人，只是在白天连续参观访问之后，在夜晚抓紧时间写作，以一个年长者以身作则的行动，带动了全国十多位中青年记者一起集体创作，在一个多月实地采访结束后不到一年时间，一本近30万字的《内蒙古好地方》就问世了。

本着这样的精神，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授命我主编的《延安颂歌》一书，因受到好评，研究会还特意给党代会的代表们赠送人手一册。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和延安《解放日报》改版50周年，我又受命和他人合作主编出版了《延安记

者》一书，以阐明面临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中仍需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

（二）从事新闻工作在职期间钻研问题精神的继续发展。比如对我国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和著述，就是来源于40年代我担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时，对陕甘宁边区移民运动的采访报道。当时全边区都处于地广人稀的情况下，仍有南部地区地多人少和北部地区地少人多的区别，以及陕北农民“下南路”的习惯，移民运动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发动的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经验联系到新中国建立后人口迁移的新情况，结合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无论从实践和理论上讲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经过一番四出调查研究，以及对众多专家学者的组织活动，从1983年到1986年就相继编辑出版了5本论著。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还取得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精心指导。

（三）进行学术研究必须敢于直言，坚持真理。我于1983年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岗位下来以后，经过对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一举世瞩目的特大型工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处于何种地位，以及他将迁移130多万人口的问题，正是我所关注的问题，何况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曾指名要我参与对成立三峡省筹备工作，以及三峡工程移民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个人意见。但是，一经接触，就感到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决不是单纯的修建一个大坝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生态环境、军事国防、政治等全局的问题，除了本身必须亲临其境，实地考察，调查研究以外，还必须广泛发动与组织有关上述各方的专家学者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然而研究的结果却与主管部门的观点恰恰相反。特别是这一特大工程的上马时机问题，我们认为当前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还不具备上马条件。这就和主管部门主张“早上快上”决策大相迳庭。我们在周培源、孙越崎、李锐、陆钦佩、林华等老一辈科学家学者们的大力支持下，本

着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精神，实事求是地据理力争，相继出版了四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1992年七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在几近总数三分之一的846票反对、弃权的史无前例的情况下，才勉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三峡工程的议案。这个举世瞩目的特大型工程终于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我非常佩服主其事者英雄胆略，但我更相信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问：您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绝招是什么？

答：说不上绝招，只是面对现实，用现实的方法。

的确，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我的藏书不多，也得几千册，还不断添进、和友人交换。每天收到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香港《文汇报》、《中国老年报》、天津《老年时报》、家乡的《海宁报》、《大众文化》、《法制与新闻》、民盟的《群言》、九三学社的《科学与民主》、《科技潮》、《中华魂》、《经济改革与发展》，和广东的《同舟共进》、《家庭》等等期刊；再加临时在报摊上看到好就买的《南方周末》、《报刊文摘》等等。这么多读物，无论如何难于完全阅读，何况一天只是24小时。当然，问题就在于面对现实，周密安排。

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6点参加晨练，7点半早餐，8点半开始工作，中间有些活动，12点和老伴共同操作炊事，下1点午餐，2点午睡，3点半起床，下午除了必要的工作外，主要是翻阅报刊，晚饭后除了必看的"新闻联播"电视以外，主要到附近公园散步，一般的在9点到10点之间就寝。总之，一天安排的满满的，这就是一天生活的现实。

我的床上总是摆满了报纸、刊物，睡觉中一经醒来，抓起报刊就看。但再怎么紧张，有一个习惯总算坚持了下来，那就是看到好文章，就把它记下时间和报刊名后剪下来。前些年时间比较宽松，就分门别类把它贴在废旧的杂志上，有用时找出参用；近几年似乎更忙了，剪下的好文章顾不上粘贴了，只得把它夹在旧杂志里，有用时再从中找出来参用。的确，这类剪报往往对我很有用处，有时

它可以启迪思考，有时可以引发联想。这是早年记者范长江教导的，当记者的就要象蜜蜂采集花粉一样，只有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才能酿成甜美的蜂蜜。

问：您已年迈，还能如此操劳，请问您有什么养身之道？

答：我今年78岁，论年龄，的确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如今"人生七十年古来稀"已经变成了"人生七十多来些"，一般说来，健康状况尚可。至少每天可以从事写作、阅读、锻炼身体、自理生活，参加少量家务劳动，虽则现在腿脚不够灵活、脑血流比较缓慢，但基本没啥毛病，心肺血压正常，消化系统尚可，就可算是健康的。因为要我谈谈健身之法，才临时想起来概括了一下：

（一）生活要有规律。我基本上按照上述作息时间进行每天的活动，其中特别要作到早睡早起。晚上最晚到10点必须上床，而且，一上枕头就能入睡。夜间尿频，约二、三次，好在尿后上床立刻入睡。晨5点准时起床。

（二）早上锻炼身体。我参加过多种练功法，最后还是落实在打太极拳上。因为它是我国传统的健身运动，最适合于老年人。每天早6点开始，集中在广电部街心公园内打太极拳的约100多人，不论春夏秋冬，已经坚持了10多年。在广电部几位离休干部当教师的耐心教导下，我已经学会了24式、34式、48式三套。虽则很不熟练，但总算自觉自愿地坚持了锻炼。

（三）每天中午二两加饭酒。这是咱们家乡的绍兴酒，味醇、香甜，约15—16度，酒后不上头，调和血脉、帮助消化。此酒我自小喜爱，近十多年很少间断，证明对身体有益。

（四）好吃蔬菜和水果。我饮酒不讲究鱼肉，有花生米、黄豆和豆制品即可，当然我也不忌鱼肉，偶尔调剂的食用还是需要的。一年四季水果不断，但不求价格昂贵只求新鲜。每天早上牛奶、鸡蛋，所以维生素C和钙质的供应有保证。近年来，陕西亲友的赠送，我家红枣的消耗量达五六十斤，已持续多年，近据《老年报》介绍："日

吃三枣，长生不老”，这是偶然碰到才知道的。我家还习惯于多吃姜蒜，喜爱南瓜，据说都是富有营养的。

（五）不太爱生气，特别是离休以后，与世无争，就无所谓生气了。偶尔有不顺心的事，主要也是有关国家大事方面的，就和家人或朋友聊聊发泄一下也就完了。俗话说：“凡事提起千斤，放下四两！”这是很有道理的。不信，可以试试。现在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呢？

（六）最根本的还在于勤于用脑。医学上说脑细胞虽然也要衰老，但经常用脑就可以延缓衰老。这象“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一样，用脑的过程也就是脑细胞运动的过程。当然，勤于用脑并不是胡思乱想，要和有益于人类的精神产品联系起来。所以勤于用脑要结合笔耕不辍，把思想和回忆形成文字，不仅使个人生活感到充实和愉快，也可供当今读者和后人参考。每次成稿，我还必须用圆珠笔复写 3 份，以便找人阅提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同时，复写起来还是右手指头的用劲运动。所谓“十指连心”，手指用劲又有利于心脏的锻炼。偶尔有兴还可以凝神敛气地提笔练练书法，这都是在情趣中进行的锻炼。

我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之中活到如今的。说完了上述方方面面以后，也就再无所谓什么“秘诀”了！

（深圳《天下名人馆》“跨世纪百家访谈录”剪辑）

责任编辑:张朴远
技术设计:郝立庚
封面设计:中　南

ISBN 7-80084-163-4
9 787800 841637 >

ISBN7-80084-163-4/Z·31
定价:25.00 元